
金日成
回忆录
与世纪同行
1

金 日 成

与世纪同行

1

外文出版社
朝鲜·平壤
1994



第一部

抗 日 革 命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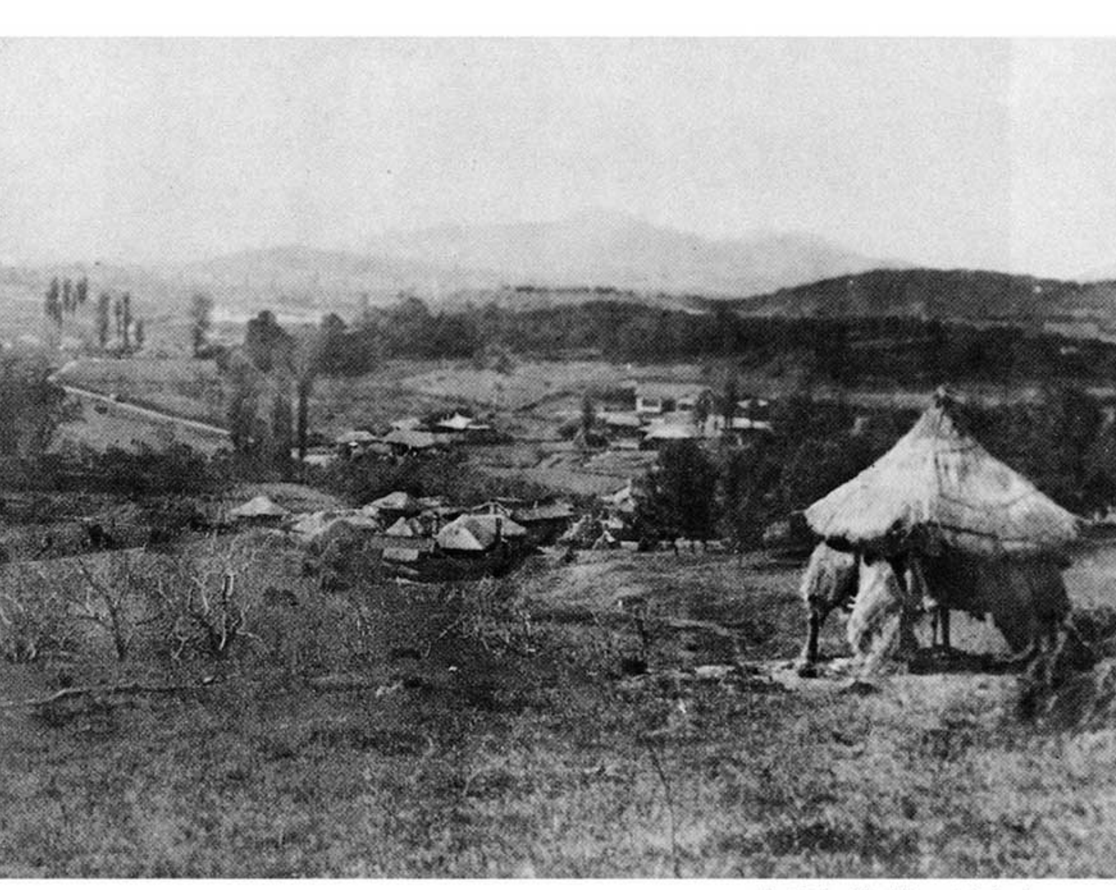
혁명하는 사람은
언제나 인민을 믿고
인민에 의거하면 백번
승리하지만 인민의
버림을 받게 되면 백번
패한다는 진리를 삶과
투쟁의 좌우명으로
삼아야 한다.

김일성

（前页的译文）

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就能百战百胜；被人民唾弃，就会百战百败。革命者要永远把这条真理作为生活与斗争的座右铭。

金　日　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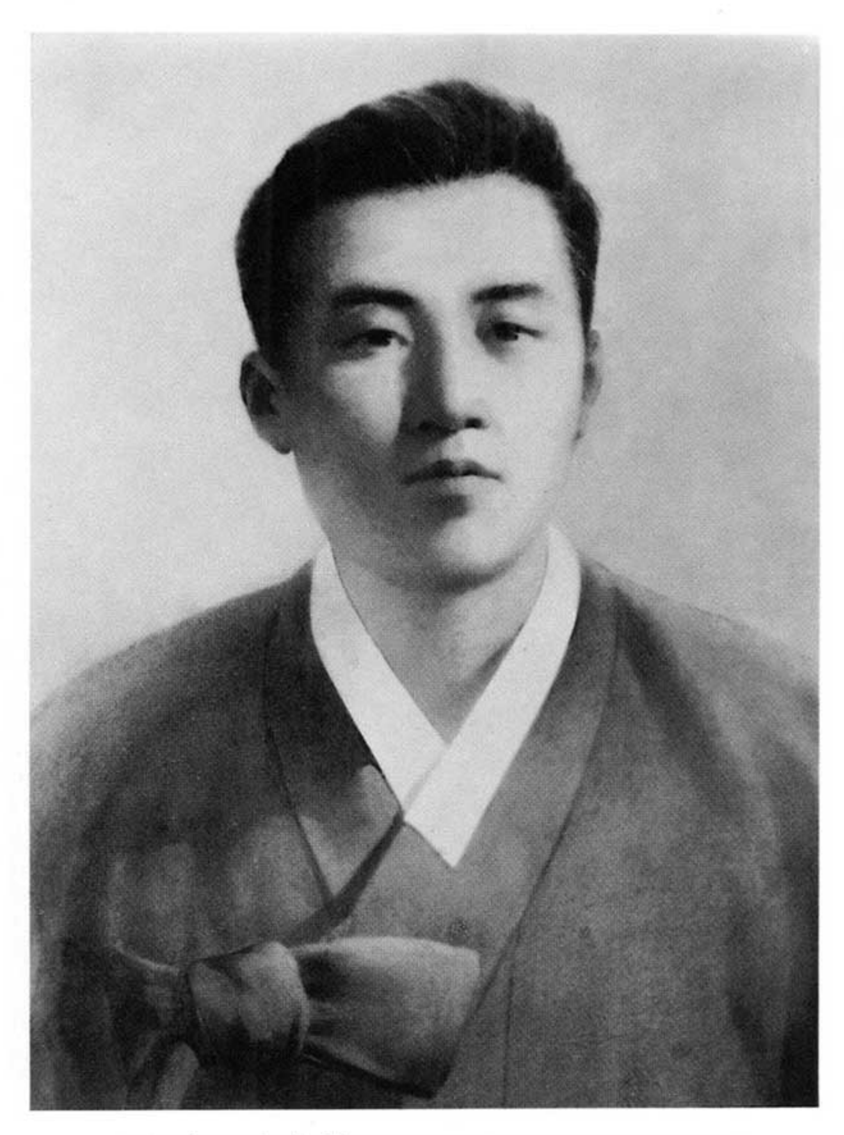


解放前的万景台

我 的 家 庭

祖父　金辅铉（1871.8.19～1955.9.2）

祖母　李宝益（1876.5.31～1959.10.18）



父亲　金亨稷（1894. 7. 10～1926. 6.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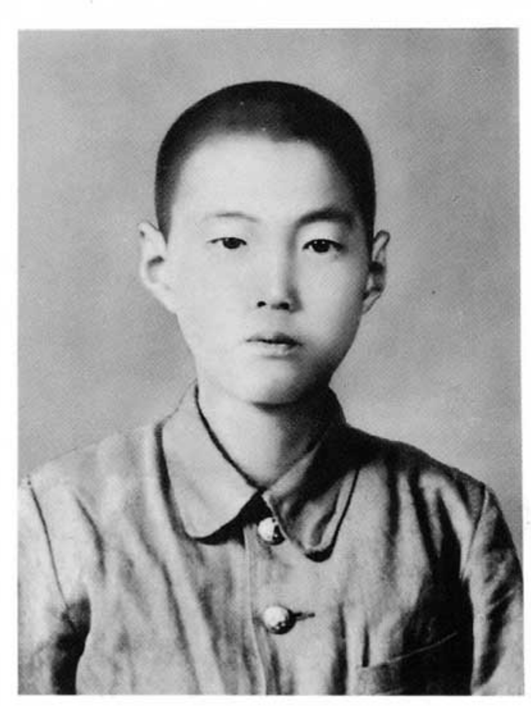
母亲　康盘石（1892.4.21～1932.7.31）

监狱中的亨权叔
（1905.11.4～1936.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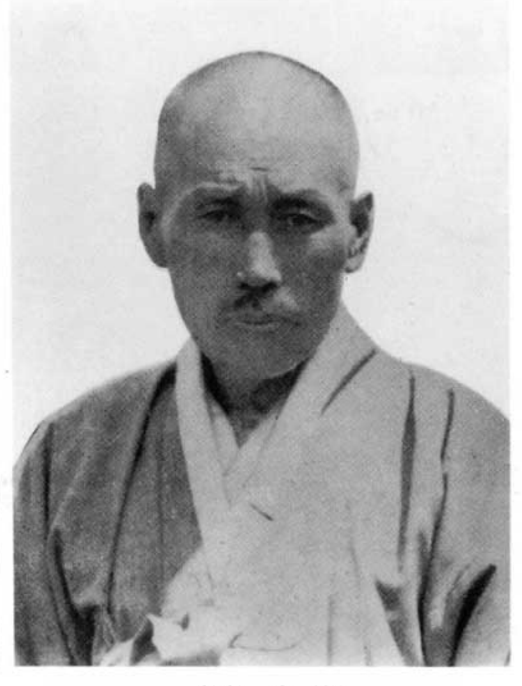
抚松时期的哲柱弟
（1916.6.12～1935.6.14）



外祖父　康敦煜
（1871. 2. 3～1943. 11. 14）



堂弟　金元柱
（1927. 9. 22～1957. 6.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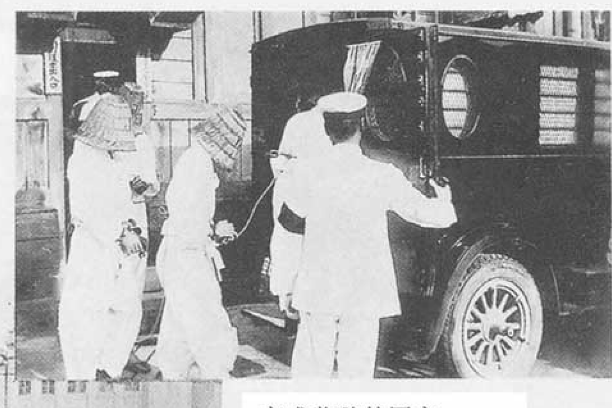


舅舅　康晋锡
（1890. 1. 19～1942. 11.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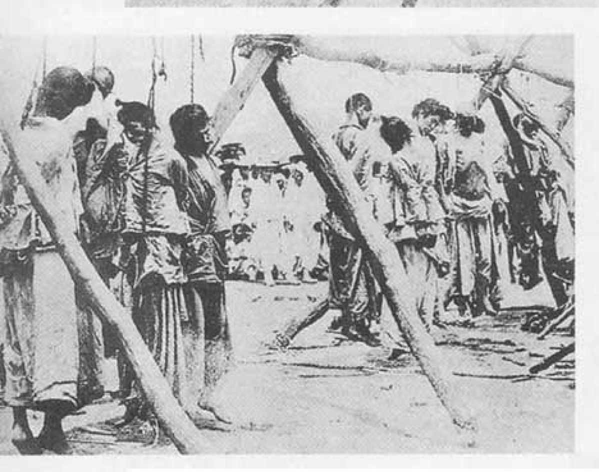
笼罩着悲惨命运的国家



驶入仁川港的日本军舰
（1894）



变成监狱的国家



镇压群众的日本骑警



因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被杀害的爱国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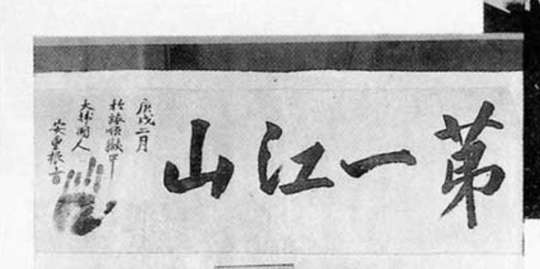


举起反日救国旗帜的义兵





三·一人民起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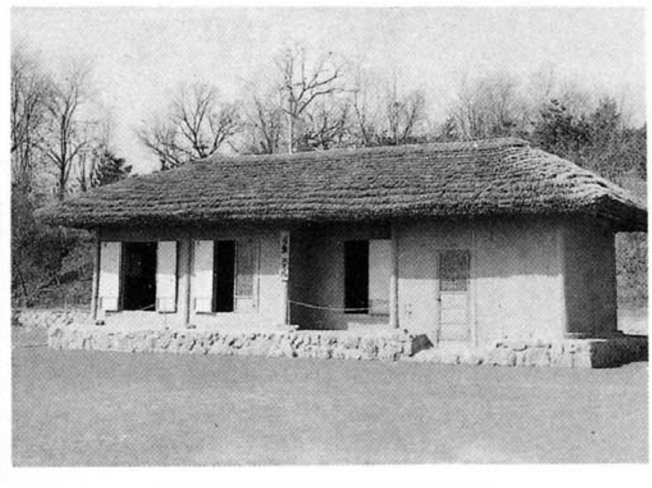


向两个弟弟讲述遗嘱的

安重根和他就义前的题字



我父亲的座右铭——“志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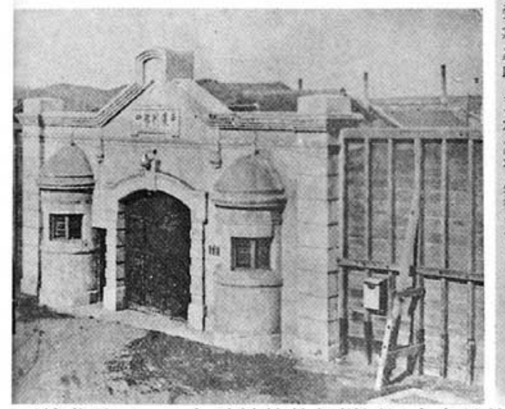
万景台顺和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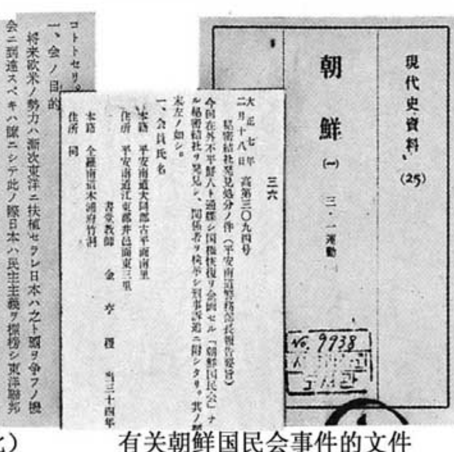
江东郡烽火里明新学校



烽火里碑石契的石碑



平壤监狱（1917年秋被捕的朝鲜国民会会员曾被囚于此）



現代史資料（25）

朝鮮（一）三・一運動

三六

大正七年二月十八日 高第三〇九四号

秘密結社発見処分ノ件（平安南道警務部長報告要旨）

今回在外不平鮮人ト通謀シ国権恢復ヲ企図セル「朝鮮国民会」ナル秘密結社ヲ発見シ、関係者ヲ検挙シ刑事訴追ニ附シタリ。其ノ概要左ノ如シ。

一、会員氏名

本籍 平安南道大同郡古平面南里

住所 平安南道江東郡高井邑面東三里

書堂教師 金亨稷 当三十四年

本籍 全羅南道木浦府竹洞

住所 同

……コトトセリ。

一、会ノ目的

将来欧米ノ勢力ハ漸次東洋ニ扶植セラレ日本ハ之ト覇ヲ争フノ機会ニ到達スベキハ疑ニシテ此ノ際日本ハ民主主義ヲ標榜シ東洋聯邦ヲ形成シ、以テ欧米ノ勢力ニ当ラムトスルヤ必セリ。然レドモ吾等ハ韓国ハ韓国人ニ於テ、支那ハ支那人ニ依リ自治ノ自由ヲ享有スルノ希望ヲ有ス。故ニ吾等ハ将来斯ノ機ニ乗ジ此ノ目的ヲ達スルガ為メ今日ニ於テ同志ノ結束ヲ図リ其ノ準備ヲ為サザルベカラズ。而シテ其ノ手段トシテ左ノ各項ヲ実行スルコト。

有关朝鲜国民会事件的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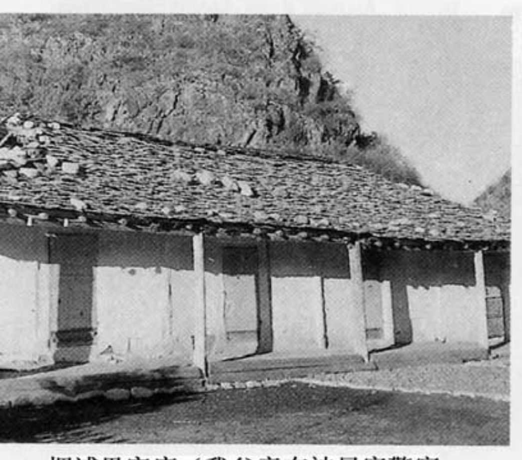
吴东振和他的住宅（在这所房子
里成立了朝鲜国民会清水洞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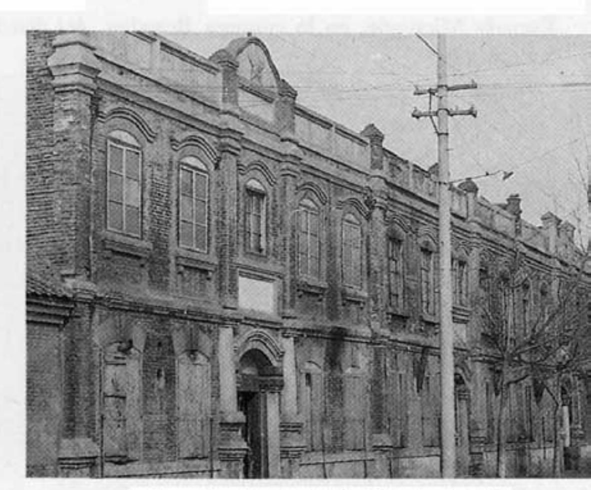
中江客店（反日独立运动者常在此留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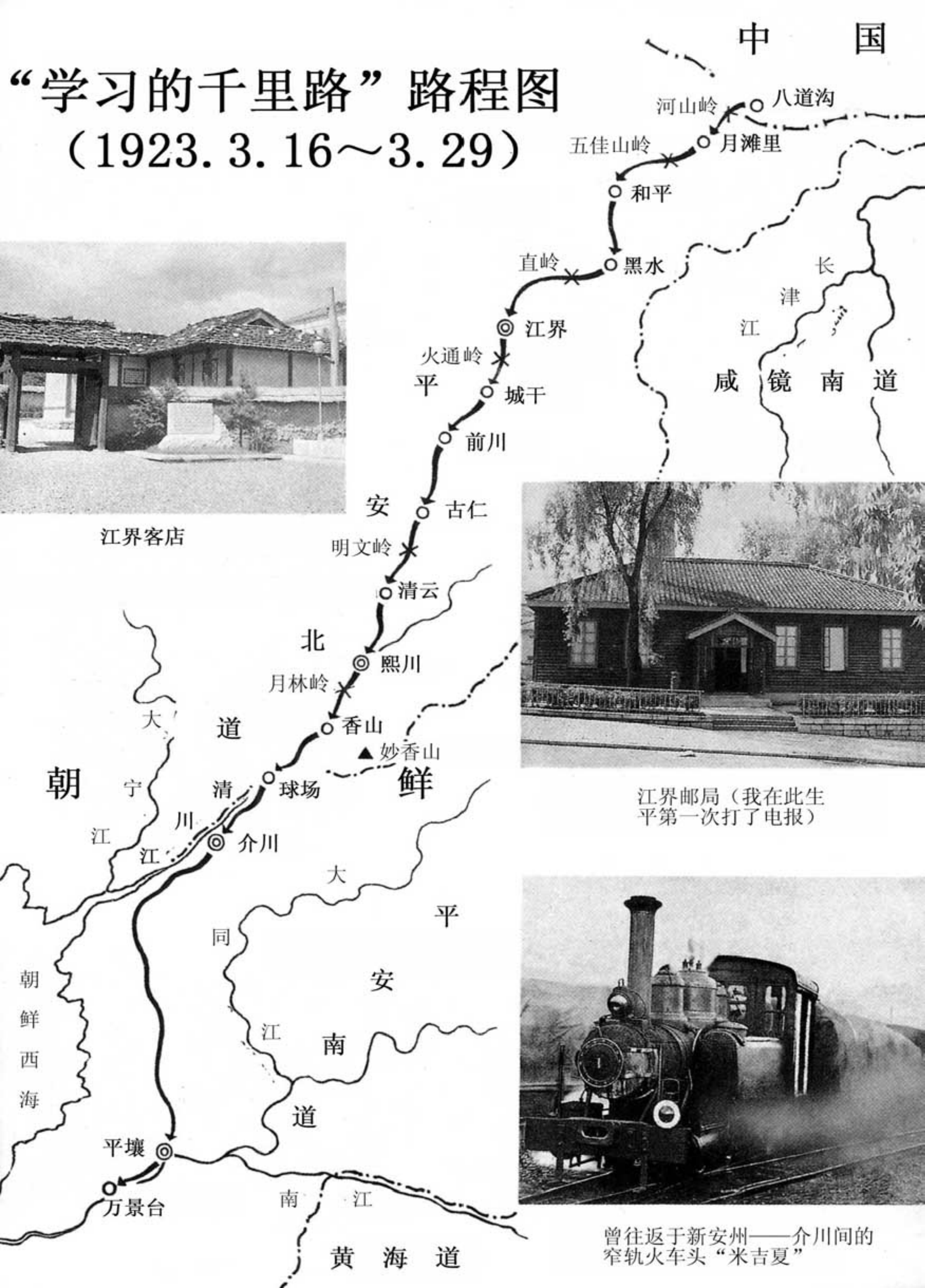
1918年清水洞会议的会场旧址



烟浦里客店（我父亲在被日寇警察
押送途中在此逃脱）



在临江的反日运动者的秘密交通站



“学习的千里路”路程图

（1923.3.16～3.29）

江界客店

江界邮局（我在此生平第一次打了电报）

曾往返于新安州——介川间的窄轨火车头“米吉夏”



七谷外婆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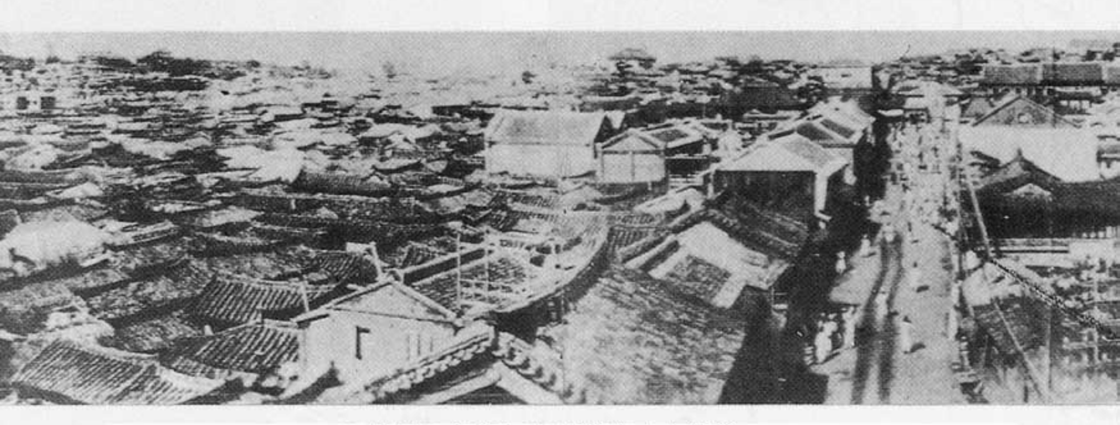
彰德学校



青年时代的康良煜



彰德学校时的知友康允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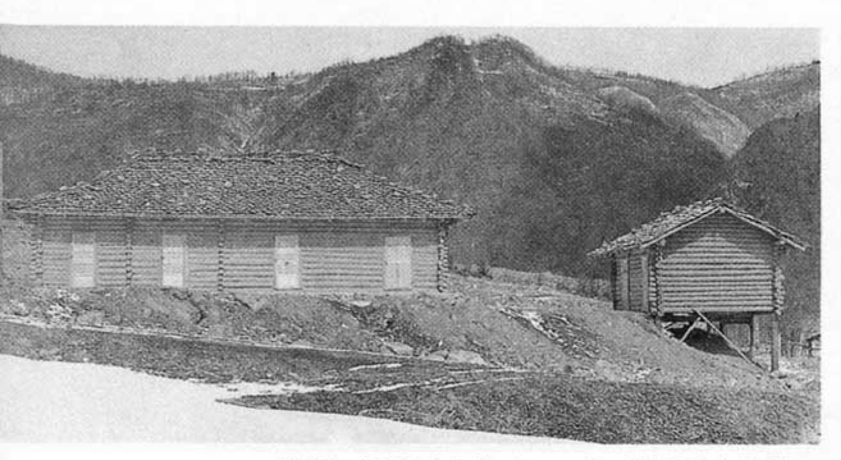
20世纪20年代初的平壤市中心街道



祖国北部边疆小镇葡坪



八道江的洗衣处（葡坪对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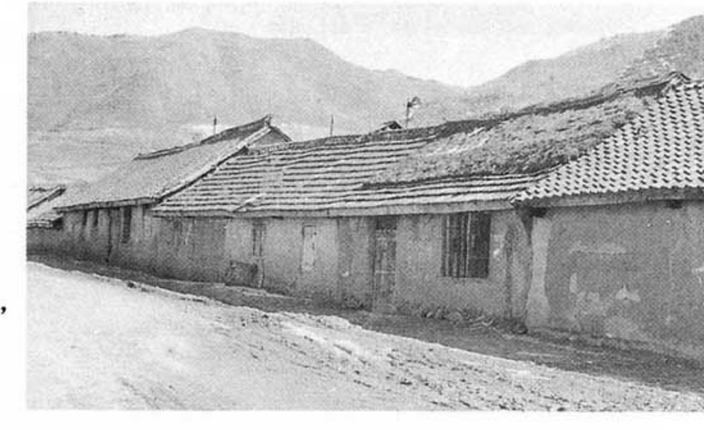
鸭绿江岸的吾仇俳（1925年1月同两个弟弟坐爬犁前往临江时曾在此住过一宿）



独立运动者常来往的临江一个饭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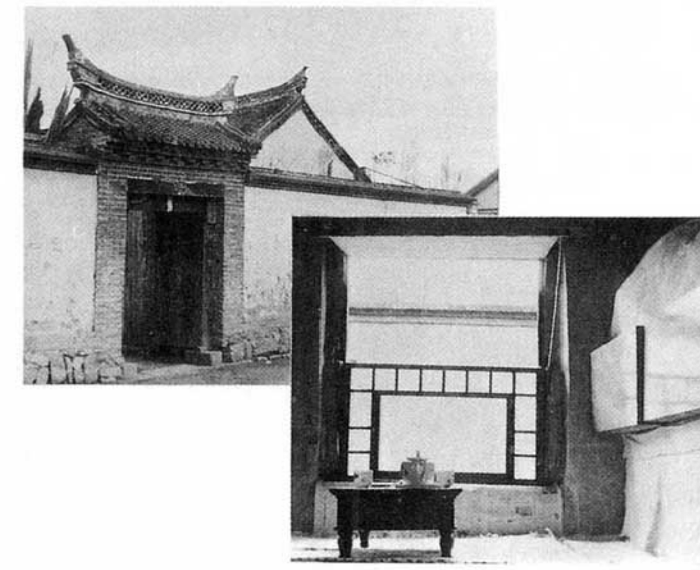


在抚松住过的小南门街的住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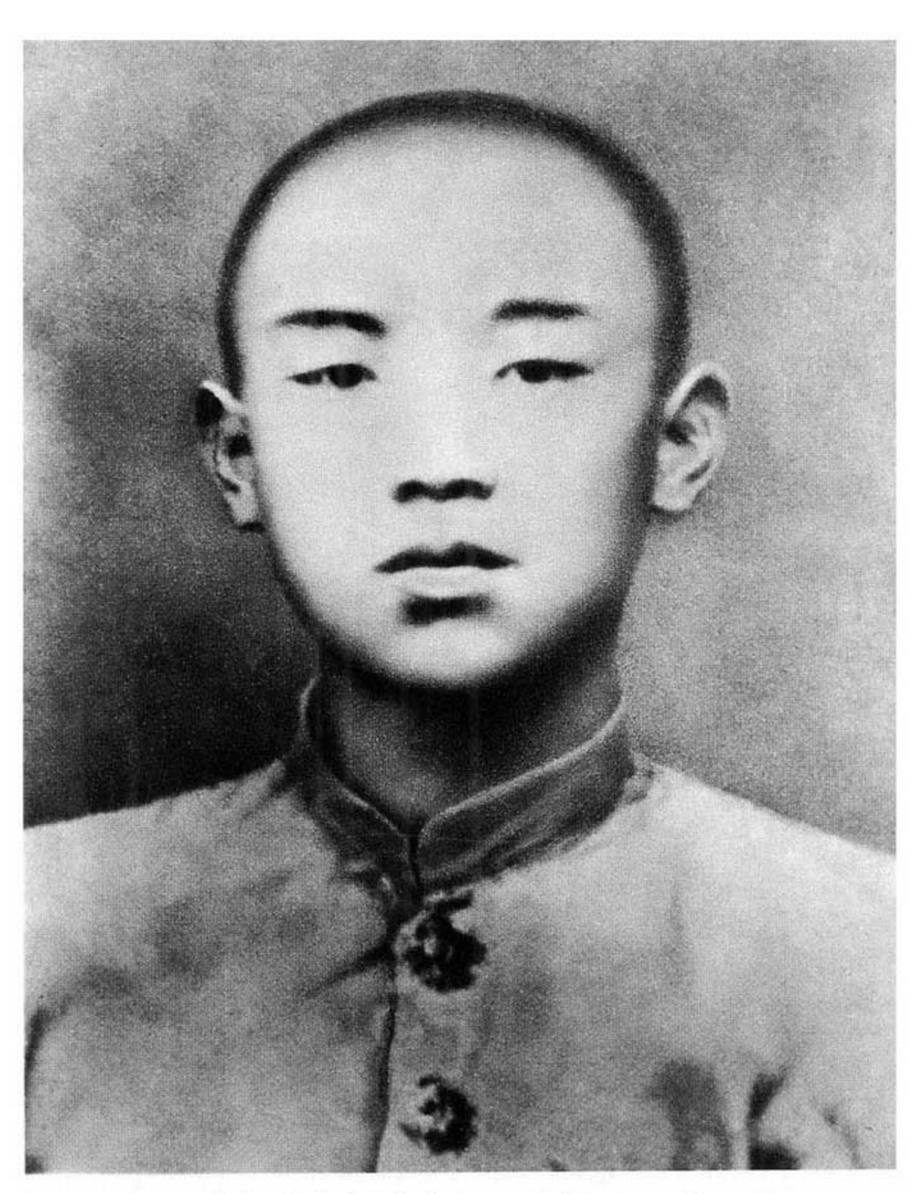


抚松白山学校（苫草屋顶的房子，
《新日》报创刊号就在此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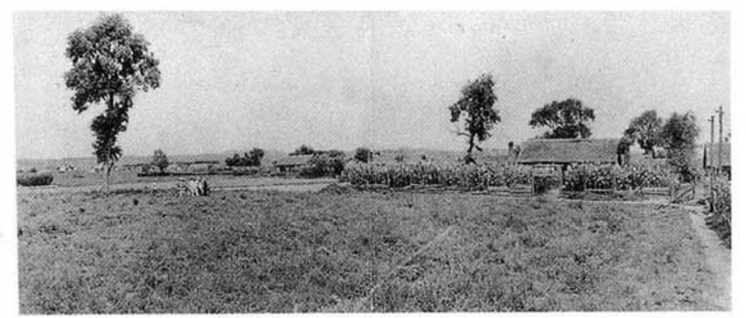




难忘的张蔚华。他在抚松的住宅和他自尽的房间。



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时期（1926年）



华成义塾旧址



华成义塾集体宿舍
及其内部



当时的塾监康济河



金时雨和他的住宅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
的成员时常在此举行
秘密读书会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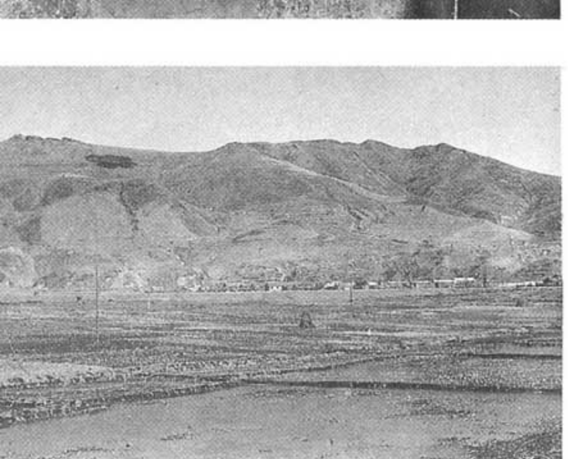




当时的塾长崔东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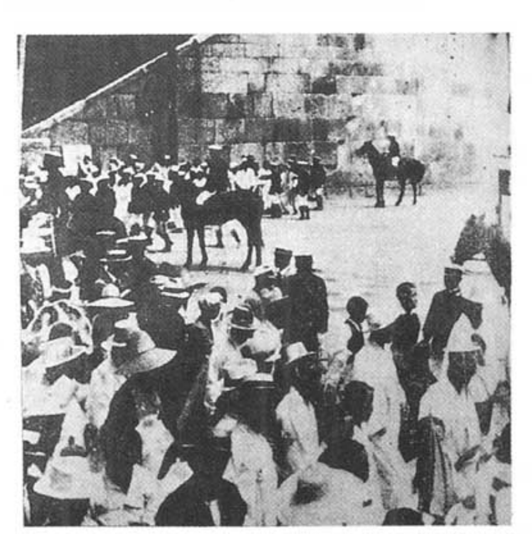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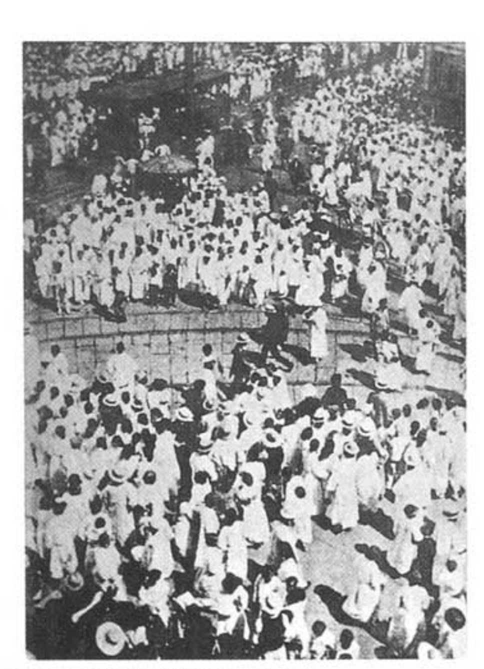
我父亲生前在抚松的住房（1926年6月5日我父亲在此逝世）



抚松阳地村

独立军的女杰李宽麟





六・一〇独立万岁运动（1926年）时期



辉发河畔和桦甸市全景

海外 朝鮮革命運動小史 (第一輯)

九、「ㅌ、ㄷ」와金日成

一九二六年이다 金日成(本名金誠柱、平壤出身)은吉林에서 少年運動指導者의一人으로 一年有餘의時日에 心血을 짜내엿다。

社會的意識이 싹트기 始作한 金日成의純眞한 心理에는 苦悶의波動이일어낫다。

當時民族主義運動線上에는 過去의愛國主義的傾向에서 革命的段階에로 趨向하는 氣運이濃熟하엿을뿐아니라 모든民族主義運動團體는 單一戰線結成의 促進에馬力을加하야 正義府(以下詳述)를 中心으로 協議會、促成會의理論的對立은 이戰線의結成에發展을 意味하엿다。

他方 社會主義運動도 火曜의金燦、서울의李日鎔、上海의具滋英을 領導者로 擡頭하엿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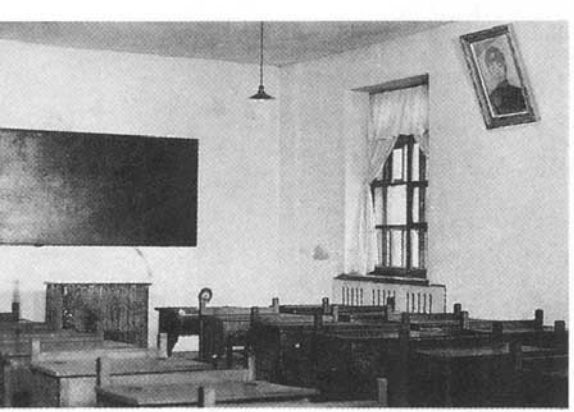
少年 金日成의머리는 아니 學生金誠柱의意識은 이무社會的傾向에서 批判을要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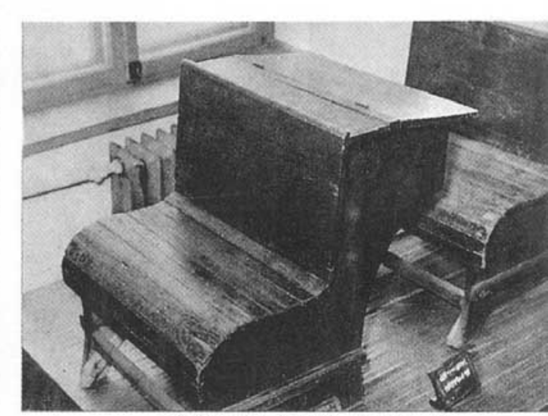
介绍“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立及其活动的出版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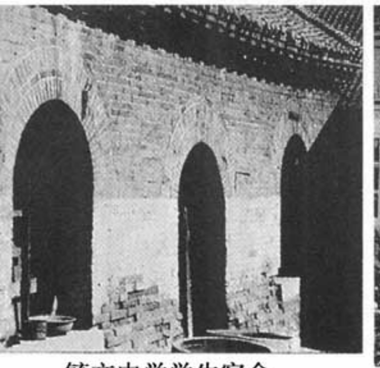


吉林时期（1927年）

吉林毓文中学


毓文中学教室


我在毓文中学用过的桌椅


毓文中学学生宿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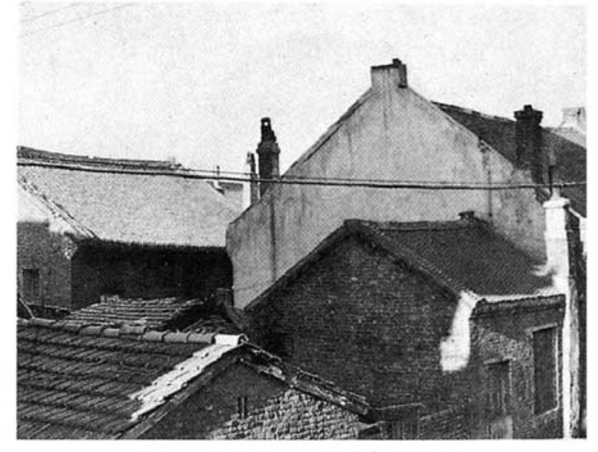
毓文中学图书室



毓文中学帽徽



独立军中队长张哲镐



吉林市尚仪街的复兴泰碾米厂





百餘名은講演會場包圍

百餘名을各處住宅搜索

—軍警을出動식힌吉林當局의處事—

安昌浩氏外二百名同胞를檢擧

婦女兒童은一時監禁

○○會主催講演會席上

大部分은

四十二名

上图：安昌浩；下图：《东亚日报》刊载的消息，介绍当局逮捕前来听安昌浩演讲的听众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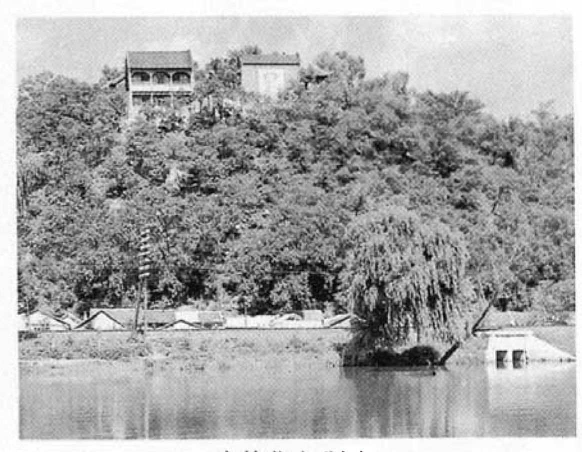
孙贞道牧师



20世纪30年代初的吉林火车站



青年共产主义者车光秀



吉林北山公园

北山公园药王庙和地下室
（这里是当年吉林市内
共青盟员的主要
秘密机会场所）



吉敦線延長其他로

吉林排日險惡化

學生等은每日示威行列繼續

天津排日도逐日深刻

獨逸鐵鑛

從業員을

哈爾賓學生團體

吉會線反對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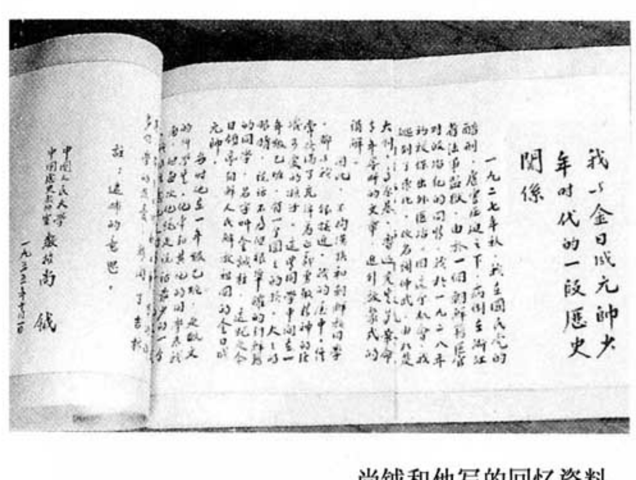
九日警官隊와衝突

百四十八名負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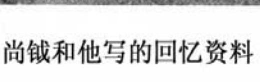
分會主任에

張繼氏就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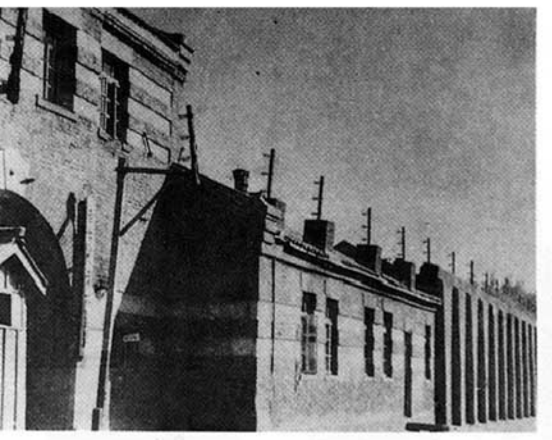
介绍当时青年学生斗争情况的报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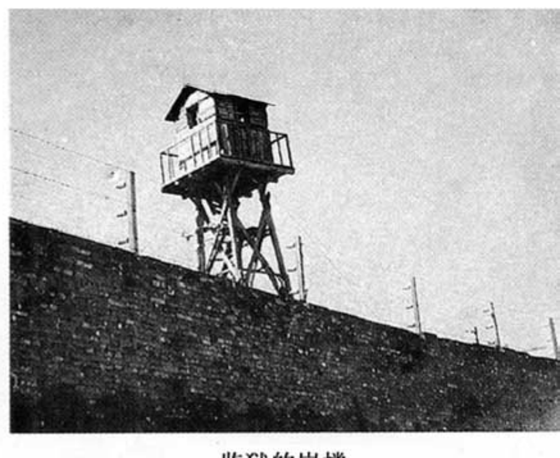




尚钺和他写的回忆资料



吉林监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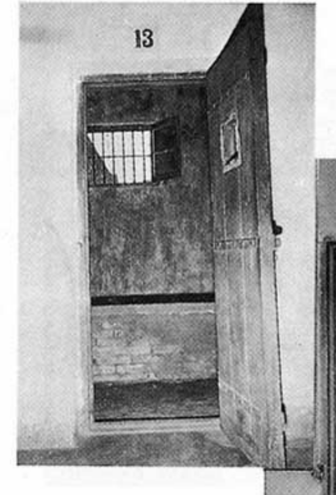
监狱的岗楼



监狱的走廊



十字型的监狱外景





我曾被囚的牢房



在监狱遇见的姜明根



转入地下斗争的前夕与高在龙合影（当时我常穿大布衫子）

前　　言

一个人在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确有无限的感慨。人们走过的路各不相同，耳闻目睹和所感受的生活体验千差万别，回忆过去的心情也就各不相同。

我作为一个平凡的人，作为一个为近代以来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一向引人注目的国家和人民服务的政治家，在深深的缅想和难以克制的激情中，回忆着自己的一生。

我出生在民族灾难深重、乌云笼罩着的亡国初期，在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幻的旋涡中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自幼走上同祖国共命运，与同胞同喜怒、共哀乐的道路，转瞬不觉年届八旬。

20世纪给人类的生活留下了未曾有过的巨大足迹，给世界政治地图带来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变化。与这个世纪同行的我的一生，是名副其实的我们祖国和民族所走过来的历程的缩影。

这条路，不只是一条有欢乐与成功的路，也曾有过撕心裂肺的悲痛和牺牲，有过许多严重的迂回、曲折和困难。在斗争的路上，既有过无数的朋友和同志，也有过不少挡路人。

爱国的精神使我在十几岁时就在吉林市街的石子路上喊出了排日的口号，也使我体验到了避开敌人的追踪进行活动的危机四伏的地下

斗争。我高举抗日的旗帜，在白头山的密林中风餐露宿，抱着光复祖国的信心闯过了万里风雪和浴血奋战的征程，同几十几百倍于我的强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孤军奋战。解放后，又为挽救被分割的祖国的命运，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的长夜；在创建并保卫人民的国家的年代，不得不又经受了难以形容的苦难和不幸。

但是，在这条路上，我从没有踌躇或退却过。

在艰难曲折的人生航道上，我之所以能够没有放弃船舵，顽强地坚持斗争，完全是因为有同志们和人民群众对我的真诚信赖和帮助。

“以民为天”，把人民群众视如上天，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和座右铭。相信人民群众，把他们视为革命和建设的主人，并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这一主体思想的原理，是我最崇尚的政治信仰，是激励我为人民贡献一生的生活纲领。

过早失去了父母的我，自幼就生活在同志们的爱护和期望之中，并度过了我战斗的生涯。我同成千上万的同志们一道闯过了浴血的斗争道路，在这过程中深深地认识到了同志和组织的宝贵。

在那尚无法预卜祖国光复之日的本世纪20年代，在桦甸的山岗上相信我、跟随我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第一批同志；为保护我，不惜用自己的胸膛挡住敌人的子弹的同志；含着微笑替我们走上断头台从容就义的难忘的同志们，没能回到解放了的祖国，他们的高贵英灵永远长眠于异国他乡的山野；那些斗争起点不同，但终究同我们走上了同一条道路的许许多多爱国志士，如今也大都不在我们的身边了。

每当我看到我国的革命在胜利前进，我们的祖国在繁荣昌盛，万民

同声讴歌祖国全盛期的时候，我就更加怀念那些为了这一天而不惜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同志，他们那难忘的形象就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久久不能入眠。

本来，我没有想写回忆录。别国的有名望的政治家和著名文人等许多人都劝我写，说我的一生会给人们以宝贵的教益。但我没有急着写。

如今，金正日同志替我分担了许多工作，我多少能够抽出一点时间了。革命的班在交替，老一辈的革命战士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人世，新成长的一代已经成了我国革命的中流砥柱。于是我开始认为，把我与民族一同度过的一生中所体验到的问题和先烈们为了今天怎样献出了青春的事迹告诉给新一代，是我的义务。因此，每当有空，我就记下一两行。

我并不认为我的一生是与众不同的，我的一生，只不过是献给了祖国和民族的一生，是与人民一道度过的一生，我能为此而自豪，就感到满意了。

我希望我的回忆录能够告诉后代人这样一条真理、一条生活与斗争的教训：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就能得到天下，百战百胜；脱离人民群众，被人民群众所唾弃，就必然百战百败。

先烈们永垂不朽！

1992年4月　于妙香山

目　　录

第一章

笼罩着悲惨命运的国家

时期　1912.4～1926.6

一　我的家庭

我的一生是从朝鲜的近代史中民族灾难深重，悲剧重叠的20世纪10年代开始的。在我出生以前，我国已经沦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皇帝的统治权随着“韩日合并”条约[1]的签署，完全转到了日本天皇的手里，我国百姓变成了任“总督制令”[2]摆布的现代奴隶。以悠久的历史、富饶的自然资源和秀丽的山河著称的这块国土，遭受着日军铁蹄和炮车轮子的践踏和蹂躏。

民众为丧失了国权而悲愤不已。“是日也放声大哭”的余音尚未消逝，数不尽的忠臣和儒生，忍不住亡国的悲痛，自尽于草野和屋檐之下。连受人歧视的屠户也为被放在停尸板上的国家命运慨叹，以死回答了耻辱的“韩日合并”。

从那时起，日本在我国建立了野蛮的宪兵警察制度，不仅仅是警察和普通文官，连普通学校的教师都穿镶有金边的制服、戴制帽、佩军刀。根据日本天皇的敕命，总督掌握了在朝鲜统率陆海军的权力，以及可以任意堵塞朝鲜民族的耳朵和嘴，束缚朝鲜人手脚的无限制的权力。朝鲜人组织的一切政治团体和学术团体，都没能逃脱被解散的命运。

朝鲜的爱国者在拘留所和监狱里被系着铅蛋的皮鞭抽打。刽子手

们原封不动地承袭了德川幕府时代拷问犯人的酷刑。他们用烧红的铁棍任意烙着朝鲜人的皮肉。

连篇累牍的“总督制令”，甚至给朝鲜人的白衣裳泼上了墨水。来自玄海滩彼岸的日本财阀，在所谓“会社令”、“调查令”等法令的庇护下，大量地掠夺我们祖国的金银财宝和各种财富。

我曾去过世界许多地方，看到了不少曾经是殖民地的国家，但从未看到过禁止殖民地人民使用民族语言和姓氏，甚至连吃饭用的餐具都掠夺净尽的无比狠毒的帝国主义。

当时的朝鲜，是名副其实的活地狱。对朝鲜人来说，活着也跟死了一样。列宁非常贴切而正确地指出：“……日本将为继续掠夺朝鲜而战，它把一切最新的技术发明和纯粹亚洲式的刑法结合在一起，空前残酷地掠夺着朝鲜。”在我成长的那个时期，帝国主义重新瓜分殖民地的争斗在别的大陆上也进行得很激烈。就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年，世界各地错综复杂的事件层出不穷：美国海军在洪都拉斯登陆；法国把摩洛哥据为自己的保护国；意大利侵占了土耳其的罗得斯岛。在国内，“土地调查令”出笼，弄得人心惶惶。

一句话，我出生在一个杂乱纷扰的动乱时代，度过了不幸的幼年时节。时代的这种状态，对我的成长是不可能没有影响的。

我自从听了父亲讲的我国亡国史以后，就十分痛恨封建统治阶级，我噙着眼泪下定了为恢复国家主权献出一生的决心。

当别国人开着军舰和火车周游世界的时候，我国的封建统治集团却仍然戴着纱帽，骑着小毛驴，成天吟风咏月，虚度了几百年的岁月。

当东西方的侵略势力带着舰队来攻打我国的时候，他们打开了关得严严实实的锁国之门。从此，封建王朝变成了听任外部势力摆布，争权夺利的交易所。

历来专事崇外事大的腐败无能的封建统治集团，甚至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也在列强的操纵下专事派系斗争。结果是，今天亲日派得势，就由日本军队守卫王宫；明天亲俄派得势，就由沙俄军队守卫王宫；后天亲清派得势，就由清朝军队把守宫廷。堂堂的一个王妃在宫廷中死于外国恐怖分子的刀下（1895年“乙未事件”），国王竟被别国的公使馆囚禁了一年（1896年“俄馆播迁”）；国王的父亲被劫持到国外去过流放生活，却还非要他谢罪不可。

在连王宫的守卫都交给了外国军队的情况下，由谁来保卫和料理这个国家呢？

在辽阔无边的世界上，一个家庭只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珠。然而就是这一滴水珠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它是不能离开世界而存在的。把亡国的悲惨命运强加于朝鲜的近代历史的波涛，也无情地冲击了我的家庭。但是，我们家的人没有在其威胁面前屈服，而是同全民族休戚与共，毫不踌躇地投入了时代的风暴之中。

我们一家，是在我们的先祖金继祥那一代，为了求一条活路，从全罗北道的全州迁到北方来的。

我们家在万景台扎根落户，是在曾祖父（金膺禹）一代。曾祖父出生在平壤的中城里，自幼务农。因家境贫穷，19世纪60年代，跟住在平壤的地主李平泽说好，替他守墓，于是搬到了万景台，住进了那

家地主的守墓房。

万景台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我家旁边的山叫南山，爬到顶上朝大同江俯瞰，是一片像一幅画一样美丽的风景。外地的富豪官僚都争先恐后地买下万景台一带的山地，修造他们祖先的坟墓，就是因为这一带的风光好。这里还有平安监事的坟墓。

我们一家祖祖辈辈都是佃农，家境十分贫寒。我们祖辈三代都是独生子，到我祖父（金辅铉）一代，生下了六个兄妹，家口增到十来个人。

祖父为了让子孙能够糊口，从没有歇过手。在别人都熟睡的凌晨，他就到村里东奔西走地捡粪；夜里则坐在油灯下搓草绳，打草鞋，编草席。

祖母（李宝益）也是白天黑夜地纺线。母亲（康盘石）带着叔母（玄养新）和姑母（金九日女、金亨实、金亨福）白天到地里除草，夜里织土布。

因为家里太穷，大叔父（金亨禄）九岁时只学了一点《千字文》，从没有上过学校，自小就帮助祖父种田。

全家大小都拼死拼活地干活，却常年连粥都喝不饱。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们吃的是用没有去皮的高粱米熬的粥，吃起来扎喉咙，咽不下去。吃水果，吃肉，更是连想都不敢想。有一次，我的脖子上生了火气（一种地方病——译注），祖母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点猪肉，我吃了它，火气顿时就消了。从此以后，我每当想吃猪肉的时候就想，再生点火气该多好。

我在万景台度过幼年时代的时候，祖母常常为家里没有一个挂钟而叹息。她是一个没有物欲的人，但是唯独对一家邻居的挂钟十分羡慕。她羡慕邻居的挂钟，是从我的父亲入了崇实中学时开始的。因为家里没有挂钟，她天天夜里不能安心睡觉，只好眯一阵醒一阵，天不亮就起来，估摸着时间，急忙做早饭。因为从万景台到崇实中学，足有30多里地，不早点做早饭，我的父亲就会迟到。有的时候，她半夜里起来做好早饭，却不知道是几点了，只好蹲在锅台边上，睁着眼睛等好几个钟头，坐等东边窗口发亮。碰到这种时候，祖母就对我的母亲说："到邻居家去问问现在几点了。"母亲走了出去，却不好意思叫醒人家，连人家的院子她都不敢进去，只好蜷缩在篱笆外边，等着他家的挂钟发出报时的当当响声。挂钟响过以后，母亲这才回来把时间告诉祖母。

当我从八道沟回到家乡来的时候，叔母在问过我父亲的情况以后说，你父亲过去上学路远，吃了不少苦；这回你住到七谷外婆家去，离学校近，该多好啊。

直到解放，我们家始终没能挂上一个我祖母那么羡慕过的挂钟。

我们一家人，虽然过着食不果腹的苦日子，对亲骨肉和乡亲的关心、照顾和帮助却是十分真诚的。

"没有钱可以活，没有人缘却活不下去。"这是祖父常常告诫子孙的话，也是我们家庭的座右铭。

我的父亲对新事物很敏感，学习热情很高。他在私塾学《千字文》的时候，就渴望能上正规学校去读书。

在发生了“海牙密使事件”[3]的那年夏天，在鸳鹰村举行了顺和、楸子、七谷、新兴这四个学校学生的联合运动会。这天，父亲作为顺和学校的选手参加了运动会，在单杠、摔跤、赛跑等好多项目中都夺得了冠军。但是跳高项目的冠军却被别的学校夺走了，因为在跳高时他头上的辫子缠住了横竿，失了分。

运动会结束后，父亲就到学校后面的山上，一下子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他无视沿袭了几百年的旧习俗，而且未经父母的许可，断然剪掉了发辫。这在当时来说，的确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祖父听说这事以后，大发雷霆，说是闯下了大祸。因为我们一家人原来都是刚强有主见的。

后来听说，这天，父亲怕祖父发脾气，不敢进屋，只在篱笆外面打转。曾祖母把我父亲从后门领进屋来吃了饭。曾祖母特别疼爱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是我家的长孙。父亲常说，他能够入崇实中学，也是因为有曾祖母的支持。当时，在封建意识还很浓的情况下，我祖父那一代人不喜欢新式学校，是曾祖母说服了我祖父，才让父亲入了新式学校的。

父亲于国家沦亡后第二年（1911年）春天入了崇实中学。当时正是提倡开化的初期，两班贵族上新学堂的也很少。像我们这样连稀粥都吃不饱的穷人家，供子女上中学，的确是十分吃力的事情。

听说当时崇实中学的学费每月要缴二圆。为了交这二圆学费，母亲还到顺和江去捡河蚬，祖父种香瓜，祖母种小萝卜，才15岁的大叔也打草鞋，拿去换钱。父亲也为了挣学费，每天放学后留在学校办的

实习场里做苦工，直到傍晚。然后又到学校图书馆读几小时的书，夜深了才回家，睡一两个小时，第二天凌晨又上学去。

如上所述，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当时在朝鲜的任何一个农村、任何一个城镇都能碰到的那种简朴而平凡的家庭，是一个既无不同凡响之处，又无突出特点的穷人家庭。

但是，只要是为祖国为同胞的事情，我们家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挺身而出，不惜献出一切的。

曾祖父虽是一位给别人守墓的人，却是一位热爱乡土，酷爱祖国的人。

当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船“舍门”号沿着大同江逆流而上，停泊在头老岛的时候，曾祖父同村民一道，把各家各户的缆绳都集中起来，一道道横在万景峰和江对岸的鹍游岛之间，并投掷大石头，阻止贼船前进。

当他听说贼船窜犯到羊角岛，开枪打炮，杀人放火，掠夺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时，便立刻带领村民径直奔到了平壤城。当时，城里的人民群众同官军一道，把许多装满柴草的小船连成串，点上火，顺流推下，烧沉了贼船，把美国海盗全部葬身在水里。在这场奋战中，祖父也做出了贡献。

“舍门”号被击沉后，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又派军舰“谢南迪亚”号，一直进犯到大同江入口，大肆烧杀掳掠。这时候，万景台的人民群众也组织义兵，一致投入了保卫祖国的战斗。

祖父常说：“男子汉应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沙场上。”他经常教育我

们全家人都要为国尽忠，做到于国家问心无愧，而且不惜把自己的儿孙献给了革命斗争。

祖母也教育子孙要刚正不阿，坚强不屈。

有一次，在严寒的冬天，日本人把我的祖母拉到满洲的山野拖来拖去，百般折磨她，企图迫使我祖母诱我“归顺”。但是，我的祖母大义凛然，坚强不屈，呵斥敌人如呵斥奴仆，表现了革命家的母亲、革命家的祖母的气概。

我的外祖父（康敦煜）在故乡办了一所私立学校，教育青少年。他是一位为教育后代和争取国家独立的运动献出了一生的热诚的爱国者和教育者。我的大舅（康晋锡）也是一位早年投身独立运动的爱国者。

我的父亲从我小时候就孜孜不倦地教育我，让我具有高度的爱国精神；也从这种愿望出发，给我起了“成柱”这样的名字，意思是要我成为国家的顶梁柱。

我父亲在崇实中学念书的时候，带着两个弟弟，在我们家旁边种了三棵象征三兄弟的白杨树。那时候，万景台还没有白杨树。那天，我父亲对他的两个弟弟说，白杨是一种长得快的树，我们三兄弟要像白杨树一样茁壮地成长起来，争取国家的独立，过上幸福的生活。

后来，为了革命，父亲离开了万景台。接着，二叔（金亨权）也走上了斗争的征途。只有大叔一个人留在万景台老家。

那三棵白杨长得很好，很快就长成了大树。树荫越过地界，一直投到地主的地里。地主借口有树荫遮着会降低产量，蛮横地砍掉了我

家那三棵白杨。尽管这样，谁也不敢说一句话。当时就是这样一个不公道的社会。

解放后，我回家听到这件事，感到十分惋惜和气愤，就越发想起父亲纯洁高尚的理想。

令人惋惜和气愤的何止这一件事。我老家的前边原先有过好几棵水曲柳，我小时候常常领着小朋友爬上去玩。可是我回到阔别20年的老家时，那棵最靠近我们家的水曲柳竟然不见了。

祖父告诉我那是大叔砍掉的。原来，这里也有令人气愤的缘由。

大平派出所的警察为了监视我们家，天天来这里值班。大平跟万景台隔着一段距离，因此，每到夏天，警察就把这个有水曲柳树荫的地方当成他们的“办事处”，盘坐在树荫下，动不动就唤村里的人来审讯，没事就扇着扇子乘凉，睡大觉，有时杀鸡喝酒，还向我的祖父和大叔寻衅闹事。

有一天，我那老实憨厚的大叔，突然挥起斧头，一口气砍倒了那棵水曲柳。祖父说，当时他看了也根本不想阻止。他说：“俗话说，虽然三间房都烧光了，可看到臭虫都烧死了，心里倒挺痛快。”

听了祖父的话，我不禁苦笑。

我的祖父和祖母，因为有闹革命的儿孙，受尽了苦。他们在严重的苦难和残酷的迫害下，坚守了气节，顽强地坚持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在他们统治的末期，强迫朝鲜人改用日本式的姓名，但我的祖父母没有听从。在我的家乡，坚持没有改用日本式姓名直到解放的，只有我们一家。别人都改了姓，因为不改姓，在城市里日本官厅不发配给

米，活不下去。

亨禄大叔因为坚持不改用日本姓，多次被叫到派出所，遭到毒打。

警察问他："从今天起，你不是金亨禄。你叫什么名字？"大叔回答："我叫金亨禄。"

警察扑过来打他的耳光，然后再问："再说一遍，你叫什么名字？"他仍不改口，坚持说："我是金亨禄。"

警察气极了，比头一次打得更狠。我的大叔只要回答一声他叫"金亨禄"，警察就打他一拳，可是他自始至终没有屈服。

当时，祖父对大叔说，你没有把名字改成日本名字，作得对。现在，成柱正跟日本鬼子打仗，你把名字改成日本名字，那还行吗？就是被打死，也绝不能改用日本名字。

我们这一家里的很多人在辞别祖父和祖母离开故乡的时候，都留下了一定要光复了祖国再回来的誓言，迈着有力的步伐，走出了柴门。但是，在他们当中，回到祖国来的只有我一个。

为独立运动献出了一生的父亲，32岁时在异国他乡辞别了人世。男子32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葬礼结束后，从故乡赶来的祖母，来到抚松阳地村我父亲的坟墓前放声恸哭的情景，至今我还历历在目。

六年后，我的母亲，没有等到祖国独立的一天，于安图逝世。

母亲去世后加入游击队拿枪作战的弟弟哲柱，也牺牲了。因为他是战死在战场上的，连遗骸都没能找回来。

又过了几年，被判了长期徒刑后关在麻浦监狱中的二叔，因遭到敌人残酷的严刑拷打，死在狱中。当时，我家收到一份叫人去取尸的

通知，却因为没有钱，没能取回来。所以，我二叔的遗骸就埋在麻浦监狱的乱葬岗子里。

在20年岁月里，我们一家许多生气勃勃的儿孙都这样死在人地生疏的他乡异邦，化作一抔泥土分散在天南海北。

解放后，当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的祖母迎到柴门外，搂着我，捶着我的前胸，说道："你把爹妈都丢在哪里，一个人回来了？……一起来就不成吗？"

祖母都这样悲痛万分，而我这个把变成无主孤魂、躺在万里他乡的生身父母的遗骸，都没能运回来，只身走进老家柴门的人，心中又该多么痛苦啊！

从此以后，我每当走进别人家柴门的时候就想，这一家里，走出这扇柴门的亲人该有多少？没能回来的又有多少？这个国度里所有的柴门，都有着亲人洒泪离别的哀痛，都有着对那些永不能回来的亲人的深切怀念，都有着失去了亲人的撕心裂肺的痛苦。这块国土上的成千上万的父母和兄弟姊妹，为光复祖国，献出了生命。我们的民族，越过鲜血、眼泪和叹息汇成的大海，冲过枪林弹雨，争取祖国的光复，竟花了36年的漫长岁月。这是连续血战的36年，我们付出了极昂贵的代价。但是，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血战，没有作出这样的牺牲，还能想象到有今天的祖国吗？无疑，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纪，必定成了一个耻辱的奴隶生活仍在持续的痛苦而不幸的世纪。

我的祖父和祖母，都是种了一辈子地的乡下老人。但我要说句真心话，我佩服他们坚决的革命精神，我从他们的革命精神中受到了极

大的鼓舞。

我认为，把儿孙们拉扯大，送他们都走上革命道路，然后默默地忍受随之而来的种种苦难和折磨，还坚持不懈地给儿孙们作后盾，说起来容易，但这是和一两次战斗或几年的监狱生活所不能相比的。

我们一家遭受的这种不幸和苦难，只是被剥夺了国家的我们民族所遭受的不幸和苦难的缩影而已。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下，千百万朝鲜人被饿死、冻死、烧死和打死。

国家亡了，人和山河都不会安宁。在被沦陷的国家的屋檐下，就是那些卖国求荣的奸臣逆贼，也必然是卧不安枕。人，即便活着，也不如丧家之犬；山河，虽依旧存在，却难以保持本来的面貌。

最先认识这种道理的人，叫先觉者；卧薪尝胆，努力改变国家悲惨命运的人，叫爱国者；自己变成一团火，照亮人们看到真理，唤起千百万人民去推翻不合理的旧社会的人，叫革命者。

我的父亲，是我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之一，他于1894年7月10日诞生在万景台，1926年6月5日，在国破家亡，暗无天日的深夜含恨去世，将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

我于国家沦亡后第二年，即壬子年（1912年）4月15日出生在万景台，是父亲金亨稷的长子。

二　父亲和朝鲜国民会

我的父亲把“志远”这一思想作为他一生的座右铭。

家里自不用说，就是顺和学校、明新学校等他所到的地方，他都用毛笔写出“志远”这两个大字，贴在墙上。

我父亲写的毛笔字，是很有水平的，他的笔迹至今还保存着一些。

当时很重视书法，把著名人物和书法家的字画做成挂轴、匾额或屏风装点屋子，成了一种风气。因此，我还不懂事的时候，只是把父亲贴的“志远”二字，当成一般的字画看待。这两个字，父亲不作任何裱褙，只把它贴在醒目的地方。

当我开始懂事的时候，父亲就开始教我要热爱祖国。他告诫我，要真心热爱祖国，就要有远大的雄心壮志。

“志远”的意思，就是要有远大的雄心壮志。

父亲教自己的儿子要有远大的雄心壮志，这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不论是做什么事情，如果不抱着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持久耐心地做出努力，是不能成功的。

“志远”这一思想，不是以追求个人的立身扬名、荣华富贵为目的的庸俗的人生训诫，而是教育人们在为祖国和民族的斗争中寻求真正的人生价值和幸福的革命的人生观，是激励人们一代接一代地坚持

斗争，一定要光复祖国的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

父亲给我讲了很多为什么要有雄心壮志的道理。把它概括起来说，就像一部我国人民的反日斗争历史。

父亲说：

我们朝鲜，本来是一个国力极强的国家。武术发达，打仗没有败绩；文化发达，其光辉直照到隔海相望的日本。可是，如此强盛的国家，由于李朝500年的腐朽政治，一朝之间落到了亡国的悲惨境地。

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日本鬼子用刀枪吞并了我们国家。把国权出卖给倭寇的逆臣，叫做“乙巳五贼”[4]。然而朝鲜的灵魂，这些逆臣是出卖不了的。

义兵高举扎枪，呼出了“灭倭复国”的口号；独立军用火绳枪打死了侵犯国土的敌人。有时，人民起义，高呼万岁，投掷石头，到处打击敌人；人人大声呐喊，向人类的良心和世界的正义发出呼吁。

崔益铉被劫至对马岛，拒不食用倭贼的饭食，以绝食殉国。李俊在帝国主义列强代表们的面前，切腹自尽，显示了朝鲜民族真诚的独立精神；安重根[5]在哈尔滨车站击毙伊藤博文，高呼独立万岁，表现了朝鲜人的气概；甚至年逾花甲的姜宇奎老人，也向齐藤总督投掷了炸弹；李在明为解亡国之恨，用短剑刺了李完用；闵泳焕、李范晋、洪范植等爱国忠臣以自戕的方式发出了守护国权的号召。

曾有一个时期，我们的民族还开展了叫作“国债偿还运动”的令人心酸的运动。所谓国债，指的是日俄战争以后从日本借用的贷款中未偿还的1300万圆的债。为了还这个债，全国的男子都戒了烟。甚至

高宗皇帝[6]也以戒烟参加了这一运动。妇女捐出了节省的买菜钱和佩带的首饰；待嫁的姑娘们献出了嫁妆；连富贵人家的婢女、针娘以及糕饼贩子、蔬菜贩子和卖草鞋的，也都为了偿还国债，毫不吝惜地捐出了浸透汗水的零碎钱。尽管这样，我们的国家还是没有保住独立。

这里的关键在于，必须用一定要收复国家这样一个统一的意志去发动全国人民，培养能够击退敌人的力量。只要有坚定的决心，就能培养力量；培养了力量，就能打退劲敌。

只有唤醒并发动全国百姓，才能恢复国权，而这不是一两天就能做到的。所以才说，要有远大的雄心壮志。……

每当我的父亲，拉着我的手，爬上万景峰或下山回家的时候，常常给我讲这些话。父亲的教导，是贯串着爱国主义思想的。

有一次，父亲对我的祖父和祖母说：

“不能光复祖国，还活着干什么？我就是粉身碎骨，也一定要打败日本鬼子。要是我在战斗中倒下了，就由我的儿子来干；要是儿子不能成功，就由孙子来接着战斗，反正一定要争取国家的独立。”

此后，当我原以为有三四年就能结束的抗日武装斗争，后来竟转入长期战的时候，我回味过父亲的上述教导；解放后，在国家被分割成北南两部分，分别走相反道路的情况下，我亲身经历了这一长期的民族分裂的悲剧，不禁又重新忆起父亲的上述教导，对其深刻的含义敬佩不已。

可以说，父亲讲的话，就是他心中的“志远”的思想和信念，就是光复祖国的思想和志向。

父亲在家境那么困难的时候下狠心入崇实中学读书，就是为了实现“志远”这一远大抱负。

从甲午改革[7]到签署乙巳条约的十多年里，是我国乘着内政改革的波涛，为树立现代的教育制度而做出努力的时期。在汉城，举起主张新教育的火把，开办了培材学堂、梨花学堂、育英公院等学校，开始讲授西方的新学问。崇实中学，也正是这个时期美国传教士在朝鲜西部地方作为传教的一环建立的学校。

崇实中学招生是面向全国的。大批崇尚新学问的青年来报考这所学校。崇实中学设的历史、代数、几何、物理、卫生学、生理学、体育、音乐等现代科目，吸引了希望克服国家落后状态，愿与新的世界潮流同步前进的青年们的心。

我父亲曾说，他也是为了学新的学问才入了这个学校的。私塾里教的晦涩难懂的四书五经等旧学问，是与父亲的求学欲格格不入的。

从崇实中学里，涌现了许多后来在独立运动中开展积极活动的著名的爱国人士，这是与传教士他们的教育目的不相符的。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议政院第一任副议长并接任过议长的孙贞道，临时政府末期任过国务议员的车利锡，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有才华的爱国诗人尹东柱也曾在这个学校读过书。康良煜先生也上过这所学校的专门班。当时，这个专门班叫做崇实专门学校；中学班叫做崇实中学。因为从崇实学校中涌现了许多反日独立运动者，日本人说这所学校是排日思想的策源地。

“学文化，要为朝鲜而学；学技术，也要为朝鲜而学；信仰上帝，

也要信仰朝鲜的上帝。”父亲用这种思想开导他的同学，团结了一批爱国的青年学生。

在父亲的领导下，崇实中学里成立了读书会和一心亲睦会。这些组织，一面用反日思想教育学生，一面在平壤城内外和邻近地方积极开展群众启蒙活动，1912年12月还在校内举行了反对学校当局的非人虐待和剥削行为的同盟罢课。

在中学读书期间，一到假期，父亲就到安州、江东、顺安、义州等平安南、北道和黄海道一带的许多地方去，开展群众启蒙工作和争取同志的工作。

可以说，父亲在崇实中学时期的最大收获，就是争取到了许多能够生死与共的同志。

在崇实中学的同窗中，有很多与我父亲意气相投，感情深厚，共同忧国忧民的人。他们都是胸襟开阔，学识渊博，才貌出众，遐迩闻名的先觉青年。

这些同窗中，出身平壤的人可以举出李辅植。读书会、一心亲睦会，李辅植都参与了，后来为组织朝鲜国民会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三·一人民起义时，他也起了很大作用。我家住在烽火里的时候，他为了见我的父亲，多次来过明新学校。

平安北道出身的同窗中有白世彬（白永茂），是枇岘人，同我父亲交往甚密。我父亲到平安北道去的时候，多半都是由他做向导的。他是朝鲜国民会国外通信员。1960年12月，在南朝鲜成立了“民族自主统一中央协议会”，听说白世彬当时作为这个中央协议会的委员进行了活动。

朴仁宽是崇实中学时期跟我父亲同住一个宿舍的人。我父亲在入学初期也曾住过学生宿舍。1917年春，朴仁宽到黄海道殷栗去当了光宣学校的教员，并在那里加入了朝鲜国民会。他在松禾、载宁、海州等地开展活动，结交同志时被捕，在海州监狱蹲了一年牢。他在光宣学校当教员的时候，学生们以《半岛和我们的关系》为题作的文章，现在陈列在殷栗事迹馆里。看了这篇文章，就能看出当时在朝鲜国民会影响之下的学校学生的思想动向和内心世界的一斑了。

在独立运动者中，同我的父亲关系最密切最深厚的是吴东振。我父亲在崇实中学的时候，他就经常到我家来。当时他是安昌浩开设的平壤大成学校的学生。他跟我父亲的关系，是超过了纯粹人情关系的思想政治关系，因此他们的关系一开始就是真挚而火热的。听说，他最初接受我父亲的思想，是1910年春天在庆上沟练兵场（李朝末期兵营前的练兵场）举行的运动会上。

参加这个运动会的有来自平壤、博川、江西、永柔等地的一万多名青年学生。

这天，在运动会结束后举行的演讲大会上，我父亲发表演讲指出，应当反对部分学生提出的我国要成为一个文明国就要接受日本文明的主张；他说，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问题，应当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他的演讲，吸引了群众的注意力。当时的听众中，就有后来成为正义府司令的吴东振。后来，吴东振每当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就感慨万端地说：“那一天，金先生的演讲大大地感动了我。”

从1913年起，他以批发商的身份往来于汉城、平壤、新义州等国

内主要城市和中国的一些地方，每次来去，都到我家来看我的父亲，就独立运动的未来进行商讨。

最初，我以为吴东振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商人，后来迁到八道沟和抚松去住的时候，才知道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独立运动者。

这个时候，吴东振已经是威名四扬的人物了，一提松庵吴东振，没有人不知道。凭他的财产和背景，他完全可以不走艰险的革命道路，也能生活得很好，可他还是直接手持武器，投入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吴东振对我父亲非常尊敬，十分友爱。他家在义州，来找他的客人络绎不绝。他索性把外间屋整个腾出来做了专供客人住的宿舍。因为客人太多，他特地雇了一个厨娘，专给客人做饭。但是，我父亲一去，他就不让我父亲住外间屋，而是请到里间屋去住，而且让他的夫人亲自下厨房烧饭做菜。

有一次，吴东振偕同夫人到我们家来，我的祖母把盛饭的有盖铜碗作为纪念品送给了他们。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介绍吴东振，固然是因为他是我父亲的至交和同志，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同我的青年时代有极深的关系。我从小就对他有特殊的感情。我在吉林念书的时候，吴东振被日本鬼子逮捕了。多年以后，1932年3月初，当我为了组织反日人民游击队而奔走在间岛一带的时候，吴东振在新义州地方法院受到审判。我过去听到甘地的预审记录文件有2.5万页，吃惊不小，而吴东振的预审记录文件竟有3.5万页，共64卷之多。

审判那天，有几千名旁听人拥进了法庭，原定早晨开审的法庭到下午一点多钟才勉强开庭。在法庭上，吴东振拒不接受日本人的任何审理，还跳到审判长的座位上放声高呼“朝鲜独立万岁”的口号，震撼了整个法庭。

日本审判官惊慌失措，急忙停止公审，然后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胡乱地作出了判决。他们在审理上诉时，判了他终身徒刑。吴东振终于死在狱中，没有看到解放的那一天。

当我们为了组建游击队而艰苦奋斗的时候，报纸上登载了反映吴东振在敌人法庭上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和斗志的审判纪实，还登载了他被押送到平壤监狱时照的带着篓子帽（扣在囚犯头上的类似篓子的草帽——译注）的照片。当时我看着他的照片，感怀万端，深情地缅怀他那坚定不移的爱国精神。

如上所述，我父亲在崇实学校时期亲密相处的人当中，有不少人成长为坚定的革命家，后来成了朝鲜国民会的骨干。

父亲在崇实学校辍学后，在万景台的顺和学校和江东的明新学校教书，为教育后代做出了努力，同时为了团结同志而呕心沥血。据说，父亲辍学是为了扩大革命活动场地，开展积极的实践斗争。

父亲在1916年的假期去过间岛。他当时与哪条线取得联系是不得而知的。他经过间岛到上海，还同孙文的国民革命派接上了头。

父亲对孙文评价很高，说他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据父亲说，在中国，男人剪掉发辫，每星期休息一天的制度得以实施，都是因为资产阶级改革派做出的努力。

父亲特别赞扬孙文作为中国革命同盟会纲领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以及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新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还评述道，孙文是度量恢弘，意志刚毅，且有先见之明的革命家。可是，父亲说，孙文在建立中华民国后，以建立共和制、清朝皇帝退位为条件，把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是失策。

我小时候，还多次听到父亲谈论朝鲜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父亲对金玉均领导的甲申政变以“三日天下”告终，深表惋惜。他曾说，开化党提出的革新政纲中，关于人权平等、废除门阀、录用人材、暗示废除对清朝的从属关系的独立思想等，都是进步的。我听了父亲的评价后，认为金玉均是出类拔萃的人物，甚至想，如果他的改革运动没有失败，或许朝鲜的近代史会是另一个样子也未可知。

我们在后来，找出金玉均的改革运动及其政纲的局限性，并以主体的观点做了分析。

教过我们朝鲜历史的老师们，大体上都把金玉均定为亲日派。解放后，我国学术界也曾长期给金玉均贴上了亲日派的标签。他在准备政变的过程中得到了日本人的帮助，这成了说他亲日的根据。我不认为这种评价是公平的。因此，我对历史学者们说，金玉均在改革运动中，没有注重与人民群众结合的问题，这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因为他依靠了日本的力量，就把他评为亲日，那就会陷于虚无主义。他所以利用日本的力量，目的并不在于搞亲日的改革，而是基于对当时力量对比关系的精细考虑，要使之有利于开化党一边。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策略。

父亲曾说，金玉均的政变落得“三日天下”的命运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改革派不相信老百姓的力量，而只依靠了宫廷内部势力，应该从他们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我猜想，父亲当时到间岛和上海去的目的，是要直接去了解风闻的海外独立运动的实况，争取新的同志，以便树立日后的斗争方略。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时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问题还不大成熟。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的方式和方法还没有创立。

父亲到间岛和上海去的时候，中国革命由于军阀捣乱，帝国主义列强干涉，经历着一进一退的严重曲折。中国革命的基本障碍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外来势力。然而，亡命海外的不少独立运动者却做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的俘虏，谈论该借助于哪个大国，以空谈消磨时间。

间岛的实态，使我父亲更坚定了要靠朝鲜人的力量争取朝鲜独立的信念。从间岛回来后，为了群众启蒙和团结同志，父亲废寝忘食地奔忙起来。

这时，我们离开万景台，搬到烽火里住。父亲和在万景台时一样，白天在明新学校教书，晚上，到夜校去进行群众启蒙工作，总是很晚才回家。

有一次，我在一个学艺会上，按着父亲给写的讲稿作了反日演说。

当时，父亲创作了很多革命的诗和歌，教给学生。

有很多独立运动者到烽火里来找父亲。父亲也常为找同志到平安南道和平安北道以及黄海道一带去。在这过程中，骨干分子成长起来了，并打下了群众基础。

在这样的基础上，1917年3月23日，在平壤学堂谷李辅植家里，父亲同张日焕、裴敏洙、白世彬等爱国的独立运动者一道，成立了朝鲜国民会。加入朝鲜国民会的青年战士们，割破手指写下了血书“朝鲜独立”、“誓死”。

朝鲜国民会是一个秘密组织，他的目的是，全体朝鲜民族团结一致，用朝鲜人自己的力量争取国家独立，建立真正的文明国。它是在三·一人民起义前后，朝鲜的爱国者在国内国外组建的许多组织当中规模最大的反日地下革命组织。

1917年，国内还很少出现秘密组织。韩日合并后组织起来的独立义军部、大韩光复团、朝鲜国权恢复团等各团体，都遭到日本帝国主义镇压，到了这个时期统统被解散了。当时，如果查出在搞地下活动，一概监禁论罪，所以一般人根本不敢想去参加那种活动。就是有志之士，在国内也一筹莫展，只能到国外去组织各种反日团体。连这种勇气也没有的人，就在朝鲜境内，取得总督府的许可，搞一些不触犯他们的消极活动。

就在这样的时候，朝鲜国民会诞生了。朝鲜国民会是具有彻底的反帝、自主立场的革命组织。它的宗旨中阐明：欧美势力将在东洋扩展起来，日本必将同他们争夺霸权，待到那个时机，朝鲜人要用自己的力量达到朝鲜独立的目的，为此要谋求团结同志，并作好准备。从它的宗旨中可以看出，朝鲜国民会不同于希冀于外来势力的人，是站在朝鲜独立必须用朝鲜人自己的力量来争取的自主立场上的。

朝鲜国民会订出远大计划，要派同志们到间岛，把那里变成独立

运动的策源地。

朝鲜国民会的组织很严密。朝鲜国民会吸收成员要经过锻炼和考验，并进行严格选拔，建立纵向组织体系。委员之间使用暗号，秘密文件也都用暗号编写。朝鲜国民会决定每年在崇实中学开学那天召开会员的定期会议。朝鲜国民会以后来组织的学校契、碑石契、乡土契等合法的外围组织作为掩护。朝鲜国民会下设区域长。为了同国外人士取得联系，还在北京和丹东分别派了通信员。

朝鲜国民会是建立在牢固的群众基础之上的组织。朝鲜国民会吸收工人、农民、教员、学生、军人（独立军）、商人、宗教徒、手工业者等各阶层群众入会，它的组织，国内自不用说，还广布于中国的北京、上海、吉林、抚松、临江、长白、柳河、宽甸、丹东、桦甸、兴京等地。

在成立和扩大朝鲜国民会的过程中，我父亲结识了很多同志，如：张哲镐、康济河、姜镇乾、金时雨等。父亲为了一个一个地联络他们所倾注的心血，是难以用语言、文字表达的。为了联络一个同志，他常常不辞辛苦，跋涉千里。

有一次，吴东振在去黄海道途中，突然来到我们家和父亲会面。那天，吴东振显得容光焕发，格外开朗。他高兴地说，碰上了一个出色的人。他说：

“这人名叫孔荣，是碧潼人，年纪还很轻。见识高，九尺高的大汉，又是个美男子。人很稳重，还会拳术，若在过去，无疑是兵曹判书之材哩。”

父亲一听，也高兴地说：“自古说，荐人之功高于人材之功，这么说，吴先生的这次碧潼之行给运动立下了一大功绩喽。”

吴东振走后，父亲叫大叔编几双草鞋，第二天，我父亲穿上新草鞋就上路了。差不多过了一个月，父亲才回来。不知他走了多少路，连鞋帮绳都断成一截一截的了，可是父亲一点也没有显出疲惫的样子，而是满面笑容地走进了院子。

父亲见过孔荣回来，非常满意。

我从小就从父亲那里学到了热爱和珍视同志的道义。

朝鲜国民会的成立，可以说是自“韩日合并”后，父亲多年来在国内和国外积极开展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活动的总结。无疑，父亲是打算通过这个组织铺开一个大摊子的。

不料，这个组织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1917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发现了有关朝鲜国民会的线索。

刮大风的一天，三个警察突然闯进正在上课的明新学校教室，不问情由地逮捕了我的父亲。

跟着我父亲到麦田渡口的一位姓许的人，受父亲的托付，跑来见我母亲。

母亲按照父亲的托付，上屋顶取出秘密文件，扔进灶坑烧掉了。

从父亲被捕的第二天起，烽火里的基督教徒们就聚在明新学校，为我父亲的释放做了早祷。平壤和江东的人民群众拥到平壤警察署，提出请愿书要求释放我父亲。

住在万景台的祖父，听说要审判我父亲，便叫大叔到平壤警察署

去问我父亲，要不要请律师。叔叔对父亲说，就是变卖一些家产，也要在审判时请律师来辩护。父亲一听这话，马上就给堵了回去。父亲说：

“律师用嘴说话，我也用嘴说话，不必花钱去请律师。我根本没有罪，没有必要辩护！”

日本帝国主义在平壤地方法院对我父亲进行了三次审判。每次审判，父亲都坚决表示抗议，说，朝鲜人爱自己的祖国，为此做了点事，要论什么罪？我不能承认当局的这种毫无道理的审理。

于是，审判拖延下去。在第三审时，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判刑。

父亲被逮捕后，亨禄叔叔和二舅（康用锡）一起到烽火里来，要把我们接回万景台。可是，母亲对他们说，要在烽火里过冬。其实，母亲那时决定不搬回万景台，是因为要给找到家来的朝鲜国民会会员和反日运动者接上关系，并处理后事。母亲把后事处理完毕后，第二年春天，才领着我们回万景台。那时，我祖父和外祖父一道，拉着牛车到烽火里来载运搬家的行李。

那年春天和夏天，我过得很忧郁。我问再过几夜，爸爸才能回来。而母亲总是用“很快就会回来的”这句话来回答我。有一天，母亲领着我到万景峰的秋千场去。她抱着我坐在秋千上，对我说：

“曾孙（主席一家都跟着主席的曾祖父和曾祖母称呼主席为‘曾孙’，故母亲也称他为曾孙——译注），那前边大同江的冰都化了，树上长出了绿叶，可你爸爸还不回来。爸爸是为光复自己的国家斗争的，那能算什么罪呢？你要快快长大，替爸爸报仇。……你长大了一定要

成为光复祖国的英雄。”

我回答说，一定那么做。

后来，母亲好几次瞒着我去探监。可是，她从不提起监狱里的事。

有一次，母亲说要到八谷去弹棉花，带着我进城去。母亲顺便到七谷外祖父家，托他们给弹棉花，然后径直到平壤监狱去了。那时，外祖母一再叫母亲一个人去探监，把我留下。外祖母说，怎么好带着还不懂事的孩子去探监？小小的孩子看到铁栅栏里的爸爸，还不吓坏啦。她坚决反对带我去。那时我六岁。

我走过普通江上的木板桥，一眼就认出了监狱。虽然没有人告诉我监狱是什么样的，但从建筑不同一般的样式上和它周围阴森的气氛中，我自己认定那就是监狱。监狱的建筑看着都能叫人吓掉魂，实在阴森可怖。铁门、围墙、望楼、铁栅栏不必说，连门岗穿的黑衣服和他的眼神，都像凶神恶煞似的，杀气腾腾。

我们走进去的会面室，连一丝阳光都照不进，很昏暗。屋里的空气浑浊，令人发闷。

在那样的环境里，父亲却和平时一样微笑着。他一见我，非常高兴地对母亲说，带孩子来，做得好。父亲穿着囚衣，而且消瘦得几乎认不出来了。他脸上、脖子上、手上和脚上都有伤痕，青一块紫一块的。可是他倒为家里的人担心。父亲是那么气宇轩昂，以致看上去虽然叫人心痛，但又觉得值得骄傲和自豪。

“这些日子你长高了。回家要好好听大人的话，要好好用功!”

父亲对看守连看都没看一眼，只是朝我从容地说着话。声音也和

往常一样，一点也不差。我一听这声音，眼泪涌上来。我大声回答说：“是，爸爸，你也快点回来吧。”父亲满意地点点头。然后，他对母亲说，如有卖毛笔的或卖篦梳的到家来，要好好帮他们。这是他指革命同志说的。

那天，父亲不屈的风貌给我留下了平生难忘的印象。

那天，还有一件使我难忘的事，就是在会面室见到了李宽麟。当时，她是平壤女子高等普通学校技艺科学生，同时做为朝鲜国民会会员进行活动。真是万幸，警察的魔爪还没有伸到她那里。

李宽麟带着一个同学（朝鲜国民会会员）一起来见我父亲。那还是封建观念很浓的时代，一个女子到监狱来，而且是来探望一个思想犯，的确是不易的事。在那个世道，这事若传出去，连出嫁都困难。在那种时候，一位打扮时髦的新女性来见思想犯，连看守都惊讶不已，以致对她特别小心。李宽麟却十分开朗地安慰了我父亲和母亲。

那时，我到监狱去见父亲，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母亲把我带到监狱去的深沉用意也是可以理解的。父亲身上的创伤，使我切身地感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恶魔的存在。我从父亲身上的创伤上，直接地、实际地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形象，这远远胜过世界许多政治家、历史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分析和评价所能给予的形象。

在那以前，我还没有亲自受到过多少日本军警的害。我只是曾经看到，为调查户口、检查清洁卫生来到万景台的日本警察，硬找碴子寻衅闹事，用鞭子捅破、撕掉门上的纸，把门扇扔到锅上，把锅磕破砸坏的情形，还不曾看到过他们把无辜的人，折磨得那么伤

痕累累的事。

我在那时看到的父亲身上的累累伤痕，在我进行抗日革命斗争的整个期间，几乎没有一刻离开过我的脑际。我在那次探监时所受的冲击，至今还深深地刻在我心里。

1918年秋，父亲刑满出狱。大叔和祖父抬着担架到监狱去接他，邻居们都聚集在从松山里到万景台的路口等他。

父亲遭到严刑拷打，遍体鳞伤，连走路都很困难。他很吃力地走出了狱门。

祖父见此情景，对敌人切齿痛恨。他叫父亲躺到担架上。可是父亲对他说："我要自己走着回去。我还没断气，怎么能在敌人眼前，叫人抬回去呢？我要让敌人看着我自己走回去。"说着，他毅然地挪动了脚步。

回到家后，父亲把叔叔们叫到跟前，说了如下的话：

"我在坐牢时下了决心，就是水也要多喝一口，一定要活着出去，斗争到底。这世上最坏的就是日本鬼子，怎能饶了他们呢！亨禄，亨权，你们也要跟日本鬼子斗。就是豁出命去，也要讨还血债。"

我听着父亲的话，决心将来跟着父亲去同日本帝国主义拼死活。

父亲一面躺着养伤，一面读书。

父亲的姑父金承铉会治眼病，有一段时期，父亲在他家补养身体，同时继续攻读他在牢里开始学的医学。他回来时，带来了很多好医书。父亲早在崇实中学念书时，就在他姑父家学过医术，也读了许多医书。

父亲可能是在坐牢时就决心改换表面上的职业，不当教员当医

生的。

父亲还没等完全康复就到平安北道一带去了。他决心恢复被破坏的朝鲜国民会组织。祖父鼓励父亲说，一旦下了决心，就不要屈服，要想尽一切办法去付诸实现。

父亲在离开家乡时留下了一首诗：《南山青松》。那是父亲坚定不移的誓言：哪怕粉身碎骨，也要一代接一代地进行不屈的斗争，一定要给三千里锦绣江山带来独立的新春。

三 “独立万岁”喊声的回音

极冷的一天，父亲离家远去了。

我焦躁不安地盼着春天的到来。对我们缺吃少穿的穷人来说，寒冷也是一个大仇敌。

天气刚开始转暖，祖母就念叨着曾孙的生日快到了，这使得她脸上浮起了愁云。本来我生日的时候，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在北方的父亲也可以少受点寒冷之苦了。而祖母愁的却是，在这春荒季节怎样给我做生日才能不至于使我难过。

在我们家里，一到我的生日，尽管是在断了粮的春荒季节，也照例给我的饭桌上摆一碗白米饭和虾酱加鸡蛋炒的菜。在连粥都喝不饱的我们家，饭桌上能放一个鸡蛋，就算是了不起的佳肴了。

然而，这一年的春天，我没有心思过什么生日。父亲被捕使我受了惊吓，现在我又一直为远在他乡的父亲放不下心。

父亲离家不久，爆发了三·一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是十年来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武断统治”下，受尽欺凌与残酷虐待的朝鲜民族长期积愤和怨恨的爆发。

合并后的十年，是中世纪式的恐怖政治把朝鲜变成了一个大监狱的十年；是我们的民族在倭寇的刀光剑影中被剥夺了言论、集会、结

社、示威等自由，被剥夺了一切社会权利和财富，呻吟在巨大痛苦中的苦难深重的时代，是暗无天日的时代和饥饿的时代。

我们的民族对于这种黑暗与掠夺，忍无可忍。他们开展秘密结社运动、独立军运动和爱国文化启蒙运动，不断地积蓄力量，终于奋然站起来举行起义。

由天道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界人士和爱国师生主导，周密地计划并推进了三·一人民起义。通过甲申政变、卫正斥邪运动、甲午农民战争、爱国文化启蒙运动和义兵斗争，我国人民的民族精神连绵不断地继承和发展起来，终于大声呐喊着自主独立的口号，爆发了像火山喷发一样的起义。

1919年3月1日，在平壤，起义以正午12时的钟声为信号，数千名青年学生和市民会聚在将台岗上的崇德女校运动场上，朗读了《独立宣言书》，庄严地宣布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然后高呼着“朝鲜独立万岁！”“日本人和日本军队滚出去！”的口号，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示威队伍一开进大街，就有几万名群众汇合进来。

万景台和七谷的人民群众，也排成队伍拥向了平壤。我们一家人，天刚亮就吃了早饭，都参加了高呼独立万岁口号的示威。刚开拔时只有几百人的队伍，一路上增加到好几千人。群众一面敲锣打鼓，一面高喊着“朝鲜独立万岁！”朝普通门方向前进。

当时只有七岁的我，也穿着破草鞋，夹在示威队伍里，喊着口号走到了普通门。我跟不上怒涛一般拥向城里的队伍，尤其是破草鞋趿趿拉拉的很碍事，于是干脆把鞋子脱下提在手里，跑步跟上了队伍。

大人们喊独立万岁，我也跟着喊。

敌人出动骑警队和军队，到处镇压群众，用刀砍，用枪打。好多人牺牲了。

尽管这样，群众依然不畏强暴，坚决抵抗，与敌人拼杀。在普通门前，也发生了惨烈的肉搏战。

这一天，是我头一次看到人杀人的一天，是头一次目睹到我们民族流血的一天。我幼小的心里燃起了愤怒的烈火。

日落天黑以后，村里的人们都举着火炬，爬上万景峰，再次吹响了号角，敲响了锣鼓，喊出了“独立万岁!”。

斗争持续了好几天。我也一直同亨福姑母一道，跟着母亲上到万景峰喊“万岁”，很晚才下山。母亲每次都给群众送水和作火炬用的麻秆，忙得不可开交。

在汉城，也有几十万群众举行了浩荡的示威，连前来参加高宗皇帝葬礼的地方农民也参加了游行队伍。

总督长谷川为了镇压群众的示威，甚至出动了驻龙山的第20师团的兵力。他们用刀砍杀，用枪射杀，野蛮地屠杀示威群众。汉城市街霎时变成了一片血泊。

但是，示威群众仍然向前进，前一排倒下了，第二排上去；第二排倒下了，下一排再上去。前仆后继，开展了英勇的斗争。

地方人民也都没有为敌人野蛮的武力镇压所屈服，同敌人进行了浴血的英勇斗争。

一个年轻的女学生，拿着国旗的右臂被砍断了，就用左手举起了

国旗，左臂又被砍断，再也不能举旗了，但她仍然没有停止前进，继续高呼着“朝鲜独立万岁!”口号，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日本军警见此情景，都吓破了胆。

以汉城和平壤的示威开始的起义，到3月中旬席卷了全国13个道，波及到满洲、上海、滨海省、夏威夷等海外的朝鲜同胞，发展成了全民族的抗争。那时候，凡是有民族良心的朝鲜人，不问职业和信仰的差别，不分男女老少，都参加了这次起义。被封建礼教所束缚，连家门都不敢随便出去的普通家庭妇女，甚至最卑贱最受蔑视和欺凌的妓女，也都结成队伍参加了示威。

起义后一两个月来，独立万岁的呼声仍震撼全国。及至春去夏来，气势才开始慢慢低落下来。

许多人原以为，喊几个月万岁，继续扩大声势，敌人就会改变想法，撤出朝鲜去。但这是妄想。日本帝国主义是绝不会为这一点反抗而乖乖放弃朝鲜的。

为了鲸吞朝鲜，日本光是大的战争就打了三次。

早在400年前，丰臣秀吉的部下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就率领几十万大军侵入我国，燃起了战火。历史上称为“壬辰倭乱”。

到了19世纪中叶，日本统治阶级经过“明治维新”，走上改革的道路之后，最先提出的是“征韩论”。所谓“征韩论”，是日本军国主义集团为日本的繁荣和天皇国家的威力，力主用武力征服朝鲜的侵略主张。由于日本政界和军界内部的意见不一致，“征韩论”在当时未能付诸实行。但“征韩论”者们举行叛乱，进行了半年以上的国内战争。

据说，如此反对天皇政府，发动了大规模叛乱的“征韩论”者的头目西乡隆盛的铜像，居然至今还矗立在日本。

为了吞并朝鲜，日本既同中国打仗，也同俄国打过仗。美国和英国给日本作后盾。

日本军阀有多么狠毒，可从下述事例略知一斑。

俄日战争时指挥旅顺战斗的是乃木。他攻占203高地时，是从山下到山顶堆起尸体当作阶梯攻上去的。据说，旅顺的白玉山祠堂埋有2.5万多具尸体，而这只是当时死者的一部分。

日本付出莫大的牺牲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他们既未能吃掉西伯利亚，也未能吞掉满洲。当乃木回国的时候，那些上了他的当，冤枉地变成了寡妇和孤儿的日本人，窝着一肚子火，拥到码头，想对乃木报复泄愤。

可是，他们看到走下船来的乃木，胸前吊着三个骨灰盒，便都缄默不语了。原来，乃木自己也在这场战争中失掉了他所有的三个儿子。

不知道这个故事有多少是属实的，但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侵略者是绝不会乖乖地放弃朝鲜的。

然而领导了三·一起义的上层人物忘却了这一历史教训，他们一开始就不顾我国人民高昂的斗争气势，把运动的性质规定为非暴力的运动，仅拟出《独立宣言书》，向国内外阐明朝鲜民族争取独立的意志，就算完事了。他们并不希望运动进一步扩大，转化为民众主导的群众性斗争。

民族运动的部分领导人，甚至想用“请愿”的方法实现朝鲜的独

立。威尔逊的“民族自决论”一出世，他们就抱着美国等协约国代表也许会在巴黎和会上作出朝鲜独立的决议这样一种荒诞的幻想，搞开了不体面的请愿运动。金奎植等几个人，还带着《独立请愿书》，走访列强代表的住处，向他们呼吁过，哀求过。

但是，协约国的代表们都在处心积虑地想着怎样分赃才能分到更多一些，根本不把朝鲜问题放在眼里。

本来，民族主义运动的上层人物把希望寄托在威尔逊的“民族自决论”上，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民族自决论”是美帝国主义为了扼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力,由自己支配全世界而抛出的伪善的口号。美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民族自决”这一骗人的口号，从内部瓦解多民族的国家苏联，并且使殖民地弱小国家的人民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无法团结，以离间他们；同时牺牲战败国，占领其领土。

早在20世纪初叶就通过“桂太郎—塔夫脱协定”“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是万万不会支援朝鲜取得独立的。历史从未记载过大国同情小国,大国赐予弱小国家人民以自由和独立的先例。一个民族的主权，只有依靠本民族自己的有主体的努力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能争取并保持住。这是一代接一代，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被历史验证了的真理。

在俄日战争时期和朴次茅斯和会时期，高宗皇帝曾派密使赴美，揭露日本的侵略战争，发出了要求协助维持朝鲜独立的呼吁。但是，美国为使日本在俄日战争中取胜而不惜给予日本以各种支援；在讨论处理战后问题的朴次茅斯和会上，为了使会谈结果有利于日本，美国

又千方百计地协助了日本。罗斯福总统借口高宗皇帝的密书不是正式公文，未予理睬。

高宗再次派密使出席海牙万国和会，想宣布《乙巳条约》是非法的，呼吁世界有良心的人和讲人道的人主持公道，以保住朝鲜国权。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顽固的阻挠活动和各国代表的冷遇，皇帝致会议的信件没有发挥效力，密使呼吁列强同情的悲愤填膺的陈词和百般努力，都受到了挫折。高宗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对派遣密使承担了责任，只得把皇位让给了纯宗。

海牙密使事件，有力地敲响了震撼封建统治阶级根深蒂固的事大主义思想的警钟。染红了万国和会会场的李俊的鲜血，是对后代的严肃的警告。它清楚地告诉人们，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强大国家也不会恩赐朝鲜以独立，依赖别人绝不能取得独立。

民族主义运动的上层集团不汲取这一教训，把希望又寄托于美国和“民族自决论”，是因为他们头脑里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崇美事大主义思想。过去，腐败无能的封建统治阶级，每当国家面临危险时，都仰望大国，妄图借大国的力量挽救国家的厄运。这种恶习，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民族主义上层集团的身上。

三·一人民起义证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再也不能成为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了。

主导三·一人民起义的那些领导人的阶级局限性，表现在他们还没有达到全面否定日本的殖民统治秩序的水平上。他们搞运动的目的，是在承认日本的统治秩序的条件下，取得保证本阶级利益的

若干让步。这就是使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堕落成为改良主义者，甚至于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大肆主张“自治”的思想基础。

那个时候，我国还没有足以粉碎改良主义的先进思想，还没有把先进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进行斗争的产业无产阶级大军。年轻的我国工人阶级，还没有自己的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作新的时代思想，并且在其旗帜下团结广大劳苦大众的政党。

呻吟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统治下的我国人民大众，要想找到正确的斗争道路，具有真正维护自己利益的先锋队，还需要走遥远漫长、艰难险阻的路程。

通过三·一人民起义，我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坚强的领导力量，任何运动都无法取得胜利。

尽管千百万群众抱着光复祖国的共同意志投入了抗争，但是因为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他们的斗争未能克服分散性和自发性，未能根据统一的纲领和战斗计划开展起来。

三·一人民起义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一条深刻的教训：人民群众要想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下，根据正确的战略与策略，有组织地开展斗争，必须彻底排除事大主义，建设自己坚强的革命力量。

通过三·一人民起义，我国人民向全世界证实了朝鲜人民是不甘做别人的奴隶的、自主精神很强的人民，证实了朝鲜人民是为了光复祖国不怕任何牺牲的，具有不屈不挠的气概和火热的爱国精神的人民。

在这次起义中，日本帝国主义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为了安抚

朝鲜人民的反日情绪，从三·一人民起义以后，不得不在形式上把“武断统治”改成了“文化统治”。

以三·一人民起义为转折点，我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宣告结束，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逐步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震撼了笼罩着悲惨命运的祖国江山，响遍了世界各地的独立万岁的喊声，在我的耳边整整一个夏天没有消失。高呼万岁的喊声，使我比年龄更早地懂事了。在示威群众同武装警察激烈搏斗血肉横飞的普通门前大街上，我的世界观飞跃到了新的高度。夹在大人们中间，踮着脚后跟，喊着独立万岁的那个时刻，可以说我的幼年时期已经结束了。

三·一人民起义，使我站到了人民的队伍里，是在我的视网膜上印下了我们民族真实形象的第一个转折点。当时那高呼独立万岁的喊声，像轰轰的雷声一样，在我的心中久久回荡。每当倾耳静听其回音的时候，我就为我国人民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当年夏天，我们收到了父亲的来信。父亲还把叫“金不换”的中国墨和毛笔，跟信一道寄给了我，那是为叫我好好练习书法特意送来的礼物。

我把“金不换”在砚台上研得浓浓的，然后拿起毛笔饱蘸了墨，在一张高丽纸上写下了“慫ㅁㅁ”（父亲）三个大字。

夜里，我们全家人借着油灯的光亮，轮流地读父亲的来信。亨禄大叔连读了三遍。我的大叔，虽有点风风火火的性格，但是看信的时

候，却像老年人一样沉着仔细。

母亲把信匆匆地浏览了一遍，就交给了我，让我大声地念给祖父和祖母听。当时我还在学前期，但因为父亲在家时教我学会了朝文字母，所以我已经会看书了。

我以清脆的声音流畅地念了信，祖母停下纺线，问道："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吗？"她没等我回答，又喃喃自语道：

"不知是去了俄罗斯还是满洲？……这回在外头的日子够长了！"

我想到母亲只把信匆匆地浏览了一遍，心中有些不忍，便在临睡前凭记忆小声地又给母亲背诵了一遍。我的母亲，在我的祖父和祖母的面前看父亲的来信，从来没有长时间地细读过。可是，她把信珍藏在上袄前襟的里子里，等下地干活歇手的时候，再悄悄地拿出来细读。

我把信的内容大概地说了一遍，母亲抚摩着我的头，说道："好啦，快睡吧。"

到了这年初秋，父亲才回到家来，准备带我们一起去，这是分别一年后的团聚。

这一年来，父亲在义州、昌城、碧潼、楚山、中江等平安北道一带和满洲地方，为恢复朝鲜国民会组织，争取同志，团结广大群众，进行了积极的活动。

父亲主持召开的清水洞会议（1918年11月），也是在这个时期。朝鲜国民会平安北道组织的代表和各地的联络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提出了迅速恢复被破坏的国民会组织，把广大的无产群众紧密地团结到组织里来的活动方针。

父亲回到家来，对满洲的情况，尤其是对俄国的情况、对列宁和十月革命的胜利，讲得特别多。当他讲到俄国建立了工农无产群众当家作主的新社会的时候，掩饰不住羡慕的心情；讲到新生俄国受到白匪集团和14国武装干涉者的进攻，正经受着严重考验的时候，他现出了十分焦灼的神情。

因为父亲讲的都有生动的细节和事实，我不禁猜想他这一程可能去过苏联远东滨海省。

苏联的滨海省同满洲一样，是一个朝鲜独立运动的基地和重要的集结地。在三·一起义时，侨居苏联远东地方的朝鲜人有几十万。这个地方有许多流亡来的朝鲜爱国志士和独立运动者。李俊一行也正是经过这个地方前往海牙的；柳麟锡和李相契也在这里（符拉迪沃斯托克）组织了13道义兵联合司令部；以李东辉为首的韩人社会党作为朝鲜最初出现的社会主义小组，开始普及马列主义的也是在这个地方；以大韩国民议会为名的露领临时政府宣告成立的地方，也是这儿；洪范图[8]和安重根也曾以这个地区为据点开展军事活动。

在这个地区，流亡的朝鲜独立运动者和爱国人民，到处组织自治团体和反日抗争团体，积极开展恢复国权的活动。以滨海省为基地的独立军部队，出没于庆源、庆兴等咸镜北道一带，袭击日本军警，给敌人的统治和边防造成了严重的混乱。有一个时期，从满洲地方转移到这里来的独立军，组编为大部队，同苏联红军一道，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进行了战斗。

当帝国主义联合势力和追随他们的国内敌人从四面八方穷凶极恶

地进行围攻，妄图扼杀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时候，数以千计的朝鲜青年，或在游击队里，或在红军队伍里，手持武器，为保卫全人类当作理想所憧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惜献出了鲜血和生命。为悼念国内战争的英雄而建立在远东地方的纪念碑上，都有刻得很大的朝鲜人的名字。

把苏联的远东地方作为活动舞台积极开展独立运动的洪范图、李东辉、吕运亨，为取得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还会见过列宁。

朝鲜独立运动者在滨海省地区的活动，虽然由于外部势力的插手和派系之间的对立而导致了黑河事件那样令人痛心的惨剧，但可以说它在我国民族解放运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我猜想父亲可能为争取同志去过滨海省，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父亲给我们家里的人讲了北部边境地方人民的示威斗争情况，家里的人也给他讲了三·一人民起义时古平面群众的英勇斗争。

这一天父亲讲的话中，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段话：

“强盗闯进屋里来拔刀要砍人的时候，你哭喊着求他饶命，他也不会让你活命的。屋外头的人如果也是强盗，那么他也不会听到呼救的喊声就跑进来帮你的。要保住自己的命，就要用自己的力量跟强盗拼。对带刀的强盗，要用刀拼，才能取胜。”

父亲已经对独立运动有了新的看法和决心。后来我了解到，在三·一起义时及其前后时期，父亲把活动的据点定在北部边境一带和南满地区，一面密切地注意观察国内外发生的事件，一面坚持不懈地探索民族解放运动的前进道路。对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过程，也予以密切的注意。

正如三·一起义的教训所证明的，只凭举行示威，高喊万岁，是不能使侵略者撤走的，但也不能只靠独立军作战来光复祖国。全国江山刀枪林立，日本鬼子把它变成了监狱，因此，必须在全国各地用全民族的力量同侵略者进行斗争。要想这样，我们也应当像俄国一样进行民众革命。应当让民众站起来，拿起刀枪，同敌人战斗，光复祖国，建设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

这就是父亲苦心探索所得出的结论，也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方针。

当独立运动只留下无数的血迹，跳不出停滞状态的时候，我的父亲认识到靠那种方法是不能成功的，便提出了民众革命的主张。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的父亲开始对共产主义思想产生了共鸣，后来以三·一起义为转折点，整理了自己的思想，下定决心，要改变我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使之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

1919年7月，父亲在清水洞会议上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在此基础上，同年8月他在中国宽甸县红通沟召开的朝鲜国民会各地区负责人、联络员和独立运动团体负责人的会议上，正式宣布了改变我国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提出了要同时代的变化采取统一步调，用我们民族自己的力量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一个维护无产民众权益的新社会的任务。

我的父亲提出要改变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这是他在反日民族解放运动中建树的又一项功

绩。

父亲常常这样朴实地表达自己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那就是要建设一个对没有吃的人给粮食吃，对没有穿的人给衣服穿的新社会。他通过实践活动用先进思想唤醒了工人、农民以及广大劳动群众，组织并扩大各种群众团体，把群众组织成统一的革命力量。

父亲建树的又一个业绩，是在准备新的武装活动、实现武装队伍团结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就。

他抱着不是依靠“请愿”或“外交”，而是开展武装活动才能光复祖国的坚定信念，促进了准备新的武装活动的工作。

选拔无产阶级出身的爱国青年，把他们培养成为军事干部，改造现有武装团体指挥员和下层士兵的思想，把他们的队伍改造成为能够担负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农武装力量。这就是父亲的构想。

父亲提出了这一方针之后，把朝鲜国民会会员派到独立军各部队，从各方面领导了在这些武装队伍中传播先进思想、置备武器、培养军事干部、加强部队战斗力的工作。

另一方面，对实现武装队伍团结的工作，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当时，父亲感到最苦恼的是独立运动队伍的团结问题。

当时，间岛和滨海省地区有许多独立军部队和独立运动团体。那是睡过一夜就出现一个团体的时代，什么韩族会啦、大韩独立团啦、太极团啦、军备团啦等等。这种独立运动团体，仅南满地方就有20多个。这些团体，如果联合起来很好地实现协调和合作，肯定会发挥很大的力量。然而那些专事派系斗争的分子，一开始就嫉恨并排斥别的

团体，专事争夺权力的勾当。

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独立运动队伍就有分崩离析的危险，不是遭到人民的唾弃，就是被敌人各个击破，已决定的改变运动方向的大业，也就无法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听到大韩独立青年团和广济青年团之间的争执越来越严重，就赶到宽甸去，花了好几天的工夫说服了两个团体的领导人，实现了他们的合并。由于父亲的努力，兴业团和军备团等鸭绿江沿岸一带的武装团体，也合并成了国民团。

用工农出身的人改造原有武装部队的力量，使之重新开始，朝着为共产主义运动开展武装活动的道路前进，并把各个不同系统的武装部队统一起来，克服武装活动的分散性，可以说这是我父亲在准备新的武装活动时萦怀心间的志向。

父亲为实现改变运动方向的方针，费尽了心机，直到生命的晚期。在这过程中，他得了不治之症。

自从宽甸会议宣布了关于改变运动方向，由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以后，民族主义者的思想分化过程加快了。

当我父亲卧病不起的时候，在那些具有共同思想意志的人当中，有的被捕，有的变节，有的走散，能够为共产主义运动全力以赴的人所剩无几了。

民族主义者中，保守的人仍然把自己束缚在顽固守旧的圈子里，拒不接受新事物。但是，不少进步人士选择了新的道路，后来同我们携手进行了共产主义革命。

父亲的关于必须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成了促我成长的特殊滋养。

四　从客乡到客乡

因为父亲常转移活动据点，我们搬了好多次家。

我第一次离开家乡是在我五岁那年。那年春天，我们搬到了烽火里。那时，虽然要同爷爷、奶奶、一家亲人作别，我倒不觉得难过。因为那时，我人小不懂事，对离别亲人想得很少，倒是对新地方、新事物抱着很大的好奇心。

但是，我们去中江的那年秋天，我心里很难过。

看着我们要搬到北方的一端去，家里的亲人都非常难过。只要是父亲要做的事，爷爷一向表示支持，全心全意地帮助。当他听说，儿子、孙子要搬到相隔千里的远方去，不觉愕然了。

父亲在临别时，为了抚慰显得怅然的爷爷，费了很多心。父亲最后一次在廊台上帮爷爷做活时说的话，如今还萦绕耳畔：

“我被登在黑名单里，在朝鲜中部一带，简直寸步难行。我出狱时，敌人对我说，不要搞运动，要在家种地。可是，我即使再坐十次牢，也要进行斗争。日本鬼子是狠毒的，只喊喊独立万岁是不能光复祖国的。”

我们出发去中江那天，我大叔抓着我父亲的手说，就是到远处去，也不要忘记家乡，如果没工夫探家，就常写信。他说着哭得很厉害。

父亲也紧握着大叔的手不放。

“嗯，我不忘家乡，我怎么能忘掉这个家乡啊。咱们没碰上好世道，就这样分离，但总有一天，会争取到国家独立，全家团圆，过起美好日子的。你从小为了帮助我，打草鞋，手都磨出了泡，今天，我又把这一大家子过日子的重担托给了你出走了，我心里真难受。”

“大哥，快别说那种话。爹、娘有我奉养。只管去斗争，实现你的抱负吧。我在这里单等那天到来。”

我看着他们作别，心里不禁悲伤。

母亲那时说，国家独立了，就回家乡来。我当时心里则感到茫然和不安。实际上，父亲和母亲从那时离开了家乡后没能回万景台一次，就长眠在生疏的异国土地上。

当时，我舍不得离开爷爷和奶奶，老回头看他们。

离开自己生长的山川，搬到远处的客乡去，我心里是不愿意的，可是有一点倒觉得放心了，到中江去，离平壤监狱就远了，我想这是好事。父亲刑满出狱后，我心里总感到不安。担心日本鬼子会再次把父亲抓去坐牢。当时我不懂人间世事，想得很天真，以为到远离平壤和汉城的山间僻地去，就不会有监狱，也看不到日本鬼子的凶相了。

我问从平壤到中江有多少里地，人家告诉我有一千里地。我一听这一千里地，就放心了，以为日本鬼子总不会跟到一千里远的地方来。

人们说，中江是朝鲜最冷的地方。可是我认为，只要能保证父亲的安全，忍受点寒冷是没有问题的。

要说搬家的行李，只有母亲带着的包了几个饭碗、匙子的包袱，

和父亲背的一个行李包。搬到烽火里去时，还有箱子、桌子、铜碗、陶器之类的家什，可是这一回没有什么家具了。

那时，父亲的一位朋友和我们同行。

我们在新安州下了火车，经过介川、熙川、江界到中江这段路，一直是徒步走去的。那时，江界方面还没有铺设铁路。

一上路，父亲就为我能不能走这么远的路担心，母亲也怕我跟不上。那时，我只有七岁，难怪他们都为我担心。

有时，我坐一会儿过路的牛车，可是大部分的路是徒步走的。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经历的严重的肉体上的考验。

到了江界，我们在南门外的客店住了一宿，第二天又上了路。这家客店老板和在江界的地下组织成员一道，亲热地接待了我们一行。从江界到中江的500里地，中间有很多山岭和荒无人烟的地段。

我们越过背囊岭时，母亲受了很大的罪。她背着三岁的哲柱，头上顶着包袱，加上草鞋破了，脚上打了泡，吃了很大苦头。

到了中江，我失望了。原来，那里也和平壤的黄金町或西门通一样，有很多日本人。朝鲜人在故乡活不下去，被撵得不得安宁，而他们却连这样的僻壤也不放过，到这里来以主人自居。

父亲说，无论是哪里，只要是住着朝鲜人的地方，就有日本人夹在那里。原来，中江也有警察署，有监狱，还有宪兵队。

我到了中江，看到这里的情况后，才悟到，整个朝鲜这块地就无异于是一个大监狱。

日本人把中江市街上部的一多半变成了他们的移民区，那里有他

们的学校、商店，还有医院。

据中江人们说，日本帝国主义早在10年前就开始向这里伸出了魔爪。签订《乙巳保护条约》后，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了我国的山林采伐权，在新义州设了营林仓，在中江设了支仓，然后，让他们的伐木工移住到这里来。他们所说的伐木工，实际上多半是系统地受过军事训练的“在乡军人”，有事时可以随时出动的半军事集团。在中江，除了他们，还有好几名武装巡警和正规军守备队。

父亲带我们来到中江的目的，是要在这独立运动者常来常往的地方开个医院，以此为据点，更积极地开展反日斗争。有了医生这个身份就很容易伪装自己，免受敌人监视，又可以较自由地和人们接触。

我们在康基洛开的客店住下了。

康基洛为我们腾出了一间最清静、干净的屋子。我父亲在出狱后，到北间岛去过，在中江呆过一些日子，那时他就住过这个房间。

康基洛挂出客店牌子，同时开设牙科门诊和照相馆，他就这样在中江扎下地盘，当我父亲在国内时，他负责朝鲜国民会的国外组织和我父亲的联络工作；当我父亲在国外时，他就负责朝鲜国民会国内组织和我父亲的联络工作。

我父亲通过这个客店，同在临江、长白、中江、碧潼、昌城、楚山等鸭绿江流域一带进行活动的国内外独立运动者取得联系。

康基洛是中江有名的志士，他可以随便出入官厅。他通过官厅搜集到的敌情材料对我父亲的活动是有很大益处的。

我帮父亲放风，侍候到客店来的独立运动者，还去中上、中德等

地进行秘密联络。中江给我留下的印象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我同比我身材高大的日本孩子摔跤，把他撩倒在地。那时，我一见欺负朝鲜孩子的日本孩子就绝不放过。客店老板家的人都怕为这件事惹祸而担心，可是，我父亲却说，在小看朝鲜人的家伙面前绝不要低头。他这样为我鼓劲。

这个时期，中江反日情绪十分高涨，到处接连出现散发传单、罢课、处决极恶走狗的事。

敌人把中江发生的变化，看作是与我父亲有关的。中江警察署根据平安南道警务部发来的通报，把我父亲登记为“不逞鲜人”、“特号甲种监视对象”，并严加监视。康基洛在面事务所看到户籍簿上把我父亲的名字打上了红杠。他告诉父亲说，警察已经把金先生点为逮捕对象，为了安全要尽快离开此地。就在这时，有一个巡警说露了嘴，要逮捕我父亲。中江这地方，父亲又不能呆下去了。

我们只好再背上行李离开寒风凛冽的祖国北端，渡到异国的土地上去。

从中江向北走出一步，就是中国的土地。从中德渡口坐上摆渡渡过鸭绿江时，我不觉眼泪直涌。离开中江，是第四次搬家了。本来，拿中江当成人地两生的地方，感到凄楚，可现在要离开这里到外国去，就觉得这里是和家乡一样的地方了。不管怎么说，中江到底是祖国的一部分。如果说，给我唱摇篮曲，为我荡秋千的地方是万景台，中江和烽火里一样，它使我领略到朝鲜无论到哪里都被日本帝国主义变成了监狱。从这一点上说，它是我难以忘却的地方。

我们离开中江的那一天，天气格外阴沉。晚秋的落叶被吹到摆渡口散落，飘零，天空里候鸟结群向南飞去。看着那些鸟，我心里更觉得凄然。

离开中江去中国的这一程路，对母亲来说，是永远别离祖国的旅程；弟弟哲柱此去以后，也没能再回到祖国来。

人生一世，要经受种种可悲的事，可是在一切可悲的事中，最可悲的是国家沦亡，作为亡国奴离开祖国，这时的悲酸是无可比喻的。背井离乡的悲伤再深切也不能和别离祖国的悲酸相比。如果把故乡比做亲娘，把客乡比做后娘，那么比客乡生疏几倍的外国，应该比做什么呢？

一想到要到既没人要我们去，也不会有人迎我们，而且连语言也不通的外国去生活，就是年小的我也感到茫然，眼前发黑。可是为了实现父亲要光复祖国的意志，我默默地忍受了别离祖国的悲痛。

艄工感叹地说，到满洲去的移民越来越多，不知为什么朝鲜人的身世变得这般可怜！

我父亲说，就这样离弃门前沃田，奔向海外的人，不知有几千几万人呢！

在亡国之前，这个国度的百姓也曾因为无法糊口，成群地到满洲和西伯利亚荒山野地去。失去了生存权的百姓冒着遭酷刑的危险，拼命逃出了这块土地。移民的人流还向遥远的美国、墨西哥等美洲各国滚过去。“四季如春，花开满园，只要撒上种，百谷自然丰登。一天做三个小时工，不过三年就能成为财主。”农夫和打零工的人，听信了这类甜言蜜

语，远渡太平洋到美洲大陆去了，他们受到的是野蛮的待遇，有的到饭馆子或财主家当听差，有的在烈日曝晒的农场做非人的苦役。

但，那时候，不管怎么说，还有个具有国号的祖国。

国家沦亡后，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夺去农田，于是像风扫落叶一般沦落到人地两生的满洲荒野里。

在世代相传的祖宗的土地上，那些梦想一本万利的日本财主和巨商，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而把这块土地侍弄成肥田沃土的主人，却被他们撵到别国去流浪。难怪人们把失去国权的百姓的身世比做一片落叶或路旁的小石头。

现在，几乎每天都有往日的流浪民的子孙，回到他们的父母曾经遗弃的这块祖宗的土地上来。每当我见到那些侨胞，我就回忆起那时在鸭绿江畔看到的流浪民的情景。

到了临江，一切都显得生疏，不如意，可是有一点是好的。那就是见不到几个日本鬼子。

临江是中国辽宁省的边疆商业城，又是一个通向我国和南北满的交通中心。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还不能公然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中国土地上去，因此，他们只是暗地里派出特务去威胁独立运动者。由此可见，临江比中江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

我们一到临江，父亲就请了一位中国老师教了我半年多中国话，然后就把我送进临江小学一年级读书。我入这个学校后，开始正式学中文。后来，又在八道沟小学和抚松第一小学继续学中文。

我从年轻时中文就能运用自如，可以说这完全归功于父亲。

我父亲为什么那么急着让我学中国话，又让我上中国学校读书，当时我没能领会他的意图，可是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出于“志远”思想的先见之明，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如果父亲没有很早就让我学会中国话，那么，我在中国度过四分之一世纪的过程中，每一步都会碰到语言障碍。

老实说，我们的斗争舞台大部分是在满洲地区，如果我说不好中国话，就很难和中国人建立亲密关系，也不可能顺利地同他们结成抗日联合战线，在敌人的镇压极其残酷的东北土地上根本就站不住脚。

我穿上中国衣裳到街上去，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连那些嗅觉像猎犬一样灵敏的日本密探和满洲警察也辨别不出我是朝鲜人。总之，我学了中文，可以说给朝鲜革命带来了很多好处。

父亲通过早已相识的卢京斗，租了一所房子，开了个医院。腾出一间屋子做了药房兼治疗室，在外面墙上挂了“顺川医院”的大牌子。在房间里，挂上了圣佛兰士医专的毕业证书。我想，那是在离开平壤之前，托一位朋友弄到手的。

没过几个月，父亲做医生的名声传扬出去了。他读了几本医学书籍，就开始了临床实践，他被称为名医，不是靠的医术，而是靠的仁术。他无论到哪里，最珍视人。父亲对失去了国家，背井离乡，到异国来过悲惨生活的朝鲜同胞，非常体贴，尽力照顾。到顺川医院看病的人，有不少是空手来，或者拿着一点点钱来。他们若为药钱发愁，父亲就说，要掏钱，就等国家独立后再掏钱不晚。他还安慰他们说，

现在咱们来到外国，过着穷日子，但不久总有一天会光复祖国，重新渡过鸭绿江回去。

在临江时，我们家和在烽火里时一样，总是宾客盈门。其中，大部分是反日运动者，不只是病人。

大舅康晋锡来到临江组织白山武士团，也就是这个时期。白山武士团是以平安道地方的独立运动者为骨干组织起来的武士团。“白山”的意思是白头山。

当时，住在满洲的朝鲜先觉们，非常珍视“白山”这个名称。他们给建立在抚松的朝鲜人私立学校，也取名白山学校。1927年12月，我们在抚松建立的青年组织，也都起名为白山青年同盟。

白山武士团，在临江和长白一带组建的一批小独立军团体中，算是规模较大、队伍整齐的武装团。这个武装团的本部就设在临江县。白山武士团的国内活动地点分布在中江、楚山、厚昌等平安北道一带，还远远伸展到平壤、顺川、江西等地方。

大舅原来在平壤作为秘密青年团体成员进行活动，他来到满洲，直到组织武士团为止，一直住在临江我们家，做了一个时期的伐木工。武士团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外务委员，在平安南道和平安北道一带为进行政治工作和捐募军资活动而奔忙。

大舅常和武士团的指挥官一道到我家来。那时，来过的有边大愚和武士团的财务负责人金时雨。他们时常在我家过夜。别的客人都睡在上屋，而大舅和我们睡在一个屋。他睡时总把手枪藏在枕头底下。

当时，我父亲根据在宽甸会议上宣布的改变方向的要求，为做好

基于先进思想的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倾注了很大力量。我父亲常到红土崖去，就是为了去做白山武士团的工作。

有一天夜里，我从睡梦中醒来，看见大舅和父亲在油灯下拆卸手枪。当我看到手枪的瞬间，不知为什么，在我眼前浮现了在进行三·一独立万岁示威时，在普通门前的大街上见到的情景。那时，我在示威群众中看到的只有铁耙和木棍。从那时到现在还不到一年的工夫，在大舅手里竟看到了枪。千百条性命的牺牲，带来了血的教训，终于使朝鲜的先觉们武装起来了。

几天后，父亲交给我一项到中江去运子弹和火药的任务。看样子，是因为税关对大人搜得很严，才决定让我去做这件事情。

我壮起胆子渡到中江，把子弹和火药装在皮包里，平安无事地回来了。警察在税关上对要坐摆渡的人查得挺严，但不知为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得可怕。

在那以后，大舅为了到国内去开展武装小组活动，离开了临江。

可是，还不到一个月，中江宪兵队伍长金得秀来到临江，把大舅被捕的消息告诉了我们。金得秀虽然是宪兵伍长，他帮了父亲不少忙，是个有良心的人。

我放学回来，看到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时直流泪。为舅舅被捕，全家人都坐立不安，满腔愤怒。

舅舅离开临江后，率领武装小组成员在慈城、介川、平壤一带开展了猛烈的活动。1921年4月，在平壤被日本警察逮捕，后来被判15年徒刑。他坐牢13年零8个月，被保释出来，1942年在家逝世。

原来，舅舅在家乡组织了一个名叫美风会的启蒙团体，进行反对赌博、饮酒、迷信的活动，他的这种活动所以能够升华为救国运动，是因为受了外祖父康敦煜和我父亲的影响。

革命，不是只有一些特殊的人才能去干的，只要给予好的影响，搞好意识化，任何人都可以在改造和变革世界的革命斗争中发挥惊人的作用。

敌人逮捕了我舅舅以后，把很多密探和便衣警察派到临江，企图逮捕我父亲。因此，夜里父亲躲到临江郊区的朋友家去睡，白天回家来办事。

这样，我们在临江也住不下去了。我们家不得不再次打起行李，从异国的客乡，搬到另一个客乡去。全家人都背着，扛着，顶着行李，可是怎么也没法光靠人力搬家，有一位叫方士贤的传教士拉着爬犁和我们一起到长白县八道沟去了一趟。据说，从临江到八道沟大约是250里地。

八道沟和临江一样，是挨着鸭绿江的边境小镇。正像临江对岸的中江有日本宪兵队和警察官驻在所，八道沟对岸的葡坪也设有日本宪兵队分遣所和警察官驻在所。

葡坪在朝鲜的北端，由于独立运动的活动场地已转移到满洲，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带布下了稠密的武装暴力。从葡坪派进来的密探、宪兵和警察，天天钻到八道沟来，到处乱窜，搜捕爱国者。

我们家坐落在离八道江流入鸭绿江的汇合处不远的地方。父亲在这里挂上了“广济医院”的新牌子。

我家右边住着一个姓金的朝鲜国民会会员，左边住着开冷面馆的另一个姓金的，对过也是个开冷面馆的金姓人。

还有，在我父亲领导下，一直为鸭绿江沿岸的武装部队提供物资的商人，哥儿俩也姓金，也住在我家附近。这样，住在我家周围的四家姓金的，都可以说是好人。

只是住在我家后面的一个人家很可疑。后来才判明，那家主人孙世心是葡坪警察署派进来的密探。这个姓孙的原来住在中江，他是按照日本警察机关的指令搬到八道沟来监视我父亲的。

父亲来到八道沟，和各阶层的人们来往。他们当中，有一位姓黄的思想家。他在南社木材所当文书的时候，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在暗地里执行我父亲交给他的联络任务。他一接受任务，就离开八道沟，到各处去执行任务；任务完成，他就返回我们家，等待新的任务。

有时，他和我父亲摆上酒桌，长时间地进行谈话。有时，他们提到《朝日新闻》登的文章如何如何，并热烈地进行对时局的评论。

父亲去钓鱼，他就带着辣酱跟去，到江边帮着拉网，剖鱼肚，同享一番野餐之美。他三年来经常来我们家，有一年还和我们一起过了中秋节。

父亲曾由他陪着到200里外的南社木材所去了好几次。父亲到那里教育工人，吸收工人参加反日组织。罗竹普通学校的教员们也接受了父亲的指导。有一年，这个学校发生的罢课事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葡坪礼拜堂，也是当时我父亲常去的地方。虽然说是礼拜堂，并

不是尖屋顶上插着十字架的建筑，而是盖了木瓦的普通房子，不同于一般的是撤去间壁，打成了通间。自从我父亲来到八道沟，那个礼拜堂就成了教育群众的场所，还成了国内革命者集合的场所。每当做礼拜的日子，父亲就渡到葡坪去，把人们聚集起来，进行反日宣传。有时，还弹着风琴教他们唱歌。

父亲不去的时候，母亲或亨权叔叔就对前来做礼拜的人进行反日教育。我也曾带着哲柱到那个礼拜堂去跟父亲学弹风琴。

葡坪市街上有很多我父亲曾用做秘密联络场所的地方。

在葡坪驻在所当清扫夫的人也做过秘密工作。他探出驻在所的秘密后就去告诉邮件委托所，委托所主人就转告给我父亲。

我也常按父亲的指示去做秘密联络工作。有一次，我为关在葡坪驻在所的爱国者送去了衣物和吃的东西。我去的次数最多的是邮件委托所。父亲叫我到那里去取《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在朝鲜出版的报纸和杂志。那时，父亲用亨权叔叔的名字给《东亚日报》支局做点工作，虽然没有什么收入，但可以免费看报。

我一个星期到那个委托所去两次。在江水冰封以前，去一趟葡坪挺费劲。江水冰封后，就差不多隔一天去一次。我念书时，亨权叔叔也干过这个差使。给父亲寄来的邮件多的时候，我和亨权叔叔就一起去拿来。邮件主要是邮包、杂志和在日本出版的医学书籍。

我们来往于葡坪的时候,得到了当宪兵辅助员的洪钟宇很多帮助。他是在我父亲的影响下，成了革命的支持者和帮助者的。当然，和他的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搞得很顺利的。

我们住的八道沟属于葡坪宪兵分遣所管辖区。驻在所警察和税关官吏都归这个分遣所管。当时，边境地带的宪兵机关的权限是相当大的。

我父亲和组织成员经常注意宪兵监视所的动向，而他们也从不间断对我们家的监视。

洪钟宇穿着宪兵服第一次走进我家药房时，我很紧张，父亲和母亲也对他怀着戒心。

洪钟宇用陌生的眼光在药房里张望了好一会儿，开口说：

“我今天来找仁兄，不为别的，是替安州的张顺凤来问好的。听说我要调到边境方面来，他托我说，到了厚昌，务必去访问名叫金亨稷的一位朋友。我本人也很想见见仁兄，请教请教。”

就穿宪兵服的人来说，他的言行倒是谦虚而文雅。

可是，第一天，我父亲待他挺冷淡。

洪钟宇走后，母亲问道：

“你和中江的金得秀伍长处得那么亲密，今天是怎么啦？”

“我一看他穿的宪兵服，使我再次想起了平壤监狱。”

父亲说，对特意来代人问好的人，这么对待是有些抱歉，等他下回来，好好款待就是了。

洪钟宇后来经常出入我家。

有一天，父亲和母亲商量事时，说出了这样的话：

“如果洪钟宇来刺探我家的秘密，我就要通过他来刺探宪兵队的秘密。这样做失败了，不过是我自己处境危险罢了；可是，如能使他

的心转变过来，那对我们的工作该有多么大的好处啊。中江有金得秀，葡坪有洪钟宇，金亨稷所到之处，哪里会没有宪兵呢。”

从那天开始，我父亲积极地对洪钟宇进行了教育。

父亲不再用对待宪兵辅助员的客套对待他，而是用对待同胞的态度真诚地待他，还尽力款待他。

洪钟宇慢慢地也表露本心，原来他是个有民族良心的人。他的家乡是平安南道顺川。他在家乡拼死拼活地种地，可怎么也闯不出一条活路，于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去考了宪兵辅助员。但是，当他目睹了宪兵和警察野蛮地镇压参加三·一人民起义的示威群众以后，后悔不该来考宪兵辅助员，他想还是回家种地吧。不料，这时接到了考试合格的通知书，还接到了教练传令。他就是这样成了宪兵辅助员的。

日本帝国主义把“武断统治”改为“文化统治”，以“官制改革”为名，缩简了国内宪兵机关，大量设立和扩大了警察机关，同时加强了边境地带的宪兵机关。朝鲜人宪兵辅助员几乎都转为警察，或调到边境地带。在这一变动影响下，洪钟宇来到了厚昌。

有一次，洪钟宇向我父亲表示，想要夺取宪兵队的武装，投身独立运动。父亲很赞赏他这种胆略，说道：

“你要投身独立运动，能下这样的决心是很了不起的。就是身披日本鬼子的军服，哪能连灵魂也给玷污了呢。我们是以具有五千年历史之国而自豪的民族，怎能甘心做日本鬼子的奴隶呢。可是，我想，你留在现在的职位，帮助我们工作，更为有益。你依然穿着宪兵服，可以从各方面支援独立运动。”

从那以后，洪钟宇遵照我父亲的话，很好地帮助了独立运动者。

洪钟宇常来找我父亲，事先告诉我父亲他哪天从几点到几点在摆渡口值班，如有需要过江的人，就在那时派过去。他就这样，好多次保障了革命者渡过江去。我父亲也曾几次在他的帮助下闯过了危险关头。洪钟宇如觉察到父亲身边有发生危险的兆头，就即刻到八道沟，说“警察要过来，请注意。”有时告诉母亲：“金先生若回来，就让他在乡下多呆几天再回来吧。”

有一天，洪钟宇从宪兵分遣所所长那里接受了一项任务，到对岸去探听在那里活动的独立运动者和朝鲜人的动态。他渡到八道沟时，正看到葡坪驻在所的警察把父亲绑着押往渡口。于是，他挡住警察的去路，呵斥道：

“这位先生是为宪兵队做事的，是我们的人，你们为什么背着我们随便逮捕他？今后，如遇到金先生的问题，你们不要干与，只告诉我就行啦。”

结果，那个警察点头哈腰地告饶，并给父亲解下了绑绳。我父亲就这样摆脱了危险。

有一次，出去巡查回来的宪兵向分遣所所长提议说，据说，八道沟的金大夫是思想家，是不是把他抓来拷问一下。

于是，洪钟宇打开记录“情报材料”的宪兵日志说，这些材料都是通过金大夫得到的。要探知思想家的动态，就要假装成思想家，那样才能探知他们的底细。金大夫对我们的事业功绩很大。其实，那些“情报材料”都是洪钟宇自己编造的假材料。

1923年5月，宪兵辅助员制废除了。洪钟宇也想带着家属到中国去搞独立运动。他说，他再也不想在敌人机关里服务了。

那天，我父亲为了说服他费了好大劲。父亲开导他说，回到家乡去以后，还是进警察机关的好，就像过去一样继续帮助我们工作。这样做，会比到独立军去活动，对我们的帮助更大。还托他说，到了故乡，请到万景台去一下，代我向父母问好。

洪钟宇一到故乡，就去了万景台，向我祖父祖母转达了我父亲的问候。他遵照我父亲的吩咐，在故乡当了警察，后来经几次向上级提议，从1927年开始，到大平驻在所当警察。他一到任，就叫一个听差的提上酒、猪肉和桔子来到万景台我们家，给祖父、祖母拜年。万景台属于大平驻在所管辖。

洪钟宇遵循我父亲生前的教导，没有失掉朝鲜民族的良心，始终如一地保护了我们一家。他设法调到大平驻在所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万景台的我们一家人。在他负责南里的工作期间，我的祖父和亨禄叔叔没受敌人多大的折磨。驻在所的头子总是对他训诫说，金亨稷的一家从过去就是反日思想家的后代，要彻底加以警戒，随时搜查家宅，可是，洪钟宇每次都以无关紧要的内容敷衍过去了。

刚解放时，人民群众到处抓亲日派来狠揍，可是洪钟宇没有挨揍，平安地过去了。他在老家当过警察，但从未作过恶，就是看到违反日本法律的行为，也是都睁一眼闭一眼地过去，所以没有招人恨。

他由于过去的历史，遭人误会，但他从未提起他过去做过的事。若是一般人，为了解除误会，也会给我写信的，他却没有那么做。

祖国解放战争结束后，过了几年，为了寻找洪钟宇，我把这项任务交给干部们，终于在顺川找到了他。那时，他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可是，我们还是让他到道干部学校去学习。他在道干部学校学习之后，仍按照自己的意愿，过着朴素、安静的生活。他把自己的残年完全献给了发掘我父亲革命事迹的工作。

对像洪钟宇那样决心为国家，为民族，不失本色的人来说，警察服和警察的牌子都不能成为问题。问题不在于牌子或服装，而在于人的思想和灵魂。

在八道沟时，父亲依旧关心教育后代的工作。父亲把教师的牌子换成了医生的牌子后，仍然像站在讲坛时一样为教育后代的工作倾注心血。通过学校和夜校，对群众做启蒙工作，多多培养有为的人材，才能光复祖国，建设富强的独立国家，这是我父亲的信念。1924年夏天，在三源浦办了个朝鲜小学教员的讲习班，那时，我父亲具体地给他们编定了对学生的教育内容和教唱的歌名。

由于我父亲的努力，八道沟的村里办起了朝鲜人的学校。连葡坪的青少年也带粮到这里来搭伙，学习朝鲜文字。

我父亲无论到哪里都说：

“教育后代是国家独立和建国的基础。”

“人若不识字，就无异于禽兽。识字懂文才会做人，也才能光复祖国。”

我铭记着父亲的教诲，热心用功。我念书的八道沟小学是四年制中国小学，用中国话讲课，科目内容也是中国的。街里没有朝鲜学校。

因此，我放学回家，就接受父亲的个别教育。父亲教了我朝鲜语文、地理和朝鲜历史，还给我讲了很多有关列宁、孙文、华盛顿等世界名人的故事。他还给我指定几本必读的进步的小说和其他书籍，读后发表读后感，这样系统地对我做读书指导。由于有这样的指导，当时我读了很多好书，如:《朝鲜之伟人》、《朝鲜英雄传》、《俄国革命史和列宁》以及各种报刊。

父亲对做功课要求很严，如不好好用功，我和哲柱弟弟自不必说，就是亨权叔叔有时也要挨我父亲的打。

我母亲也常督促我用功学习。我放学回来后，要上山去打柴，她就说:“还打什么柴呀。快去做功课。”这样，她使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学习方面。

因为母亲连一件好衣服都穿不上，总不辞辛苦，为我们费心，所以，我心里总是琢磨如何让母亲高兴。有一次，她给钱叫我买球鞋穿，我便到葡坪去用那钱给她买来了女用胶皮鞋。那时，母亲说:“你年岁不大，心可大哩。我穿什么鞋不行啊。只要你们功课好，长得结结实实的，做妈的就高兴了。”

母亲总是为能让我快快乐乐地成长费心思。正因为这样，我在成长时，从没有忧郁的时候，活泼、乐观。回想起来，住在八道沟的时期，是我最淘气的时节。有时候，因为过于淘气，大人们直咂舌头。不淘气还能算是孩子吗?

在冰封的鸭绿江上，凿出宽一米多的大窟窿，孩子们排成一行站在江边挨个儿比赛跳冰窟窿。想起那个时节的八道沟的冬天，就是现

在也觉得70年前的童心又重现起来。那时，我们说，跳不过那个冰窟窿的孩子，将来没有资格当朝鲜军人，于是大家都飞跳了过去。孩子们为避免当不上朝鲜军人的羞耻，拿出全身的劲向冰窟窿跑过去。步子小的和胆子小的孩子，有时会掉进冰窟窿里。这时候，那孩子的家长就会一面忙着给孩子烤弄湿的衣服，一面唠叨：就因为有那个平壤家的成柱，把这街坊的孩子都变成冻明太鱼了。那时，人们都传说成柱是八道沟的孩子王，所以邻居的大人们每当数说自己的孩子时，就要提起我的名字。

有时，在八道沟后山上和孩子们玩军事游戏直到天黑，弄得大人们心焦如焚。遇到这种事，八道沟的人们为找孩子们通夜睡不成觉。由于时常出现这种事，所以大人们对孩子管得很严。可是，要飞向那万里长空自由奔放的童心，哪里能锁得住！

有一次，和我一起念书的金宗恒从保管在他家仓库里的雷管箱里拿出一个雷管，向我们显摆。他家仓库里装满了要供给独立军部队的武器、被服、鞋子之类的东西。金宗恒的哥哥们通过日本会社的代理店购进好多工作服和劳动鞋，给武装队送去。他们为了给独立军供给物资，备了两艘船，还有马，东奔西跑地成批购进物资。

那天，我们坐在火炉旁嗑瓜子儿，金宗恒把雷管拿到嘴边吹口哨。不料，火星碰上雷管，爆炸了，结果他伤了好几处。他哥哥把他用床单包起来背着，跑来找我父亲。雷管炸伤了人的这件事，如果传到警察耳朵里，就要闹出大事来，所以父亲把金宗恒藏在家里，给他治了20多天。

发生过这件事后，我才知道金宗恒的家是往独立军那里运送军用物资的爱国商人。

这个时期，我干了不少冒险的事，的确是不懂事。不过那时，心里有一个阴影总是无法驱散。随着我一年大似一年，亡国的痛苦越来越大地占据了我的心。

五 《鸭绿江之歌》

1923年初，父亲把我叫到跟前，问道，小学快毕业了，你打算今后怎么办。

我回答说，想升学继续读书。叫我升学读书，是我父母平素的心愿，可是，再次向我问起将来的抱负，我心里有些纳闷。

父亲严肃地望了我一会儿，说，从现在起最好到朝鲜去读书。

这话实在出乎我意料之外，到朝鲜去读书，就要离开父母的身边。这是我从来没想过的。

在一旁做针线的母亲不禁惊讶地说，年纪还挺小的，送到较近的地方去上学不行吗？

父亲看样子决心已定。他一再地说，眼下可能因惜别而感到难过，有些惆怅，但成柱一定要到朝鲜去读书。我父亲从来就是一言既出，决不毫无道理地收回。

当时，父亲恳切地对我说了如下的话：

你从小跟着父母走东走西，受了不少苦。今后，你重返朝鲜，也许比这还要苦。可是，爸爸还是决定让你到朝鲜去。既然是生在朝鲜的男子，就应该熟悉朝鲜。你到朝鲜去，如果能弄清我国沦亡的原因，也就是很大的收获。你回家乡去，要体验体验我国人民过的是多么悲

苦的生活，那么，你就会明白应该做什么。

我回答说，要按照父亲的遗愿，回朝鲜去读书。当时的情况是，有点钱的人家的子弟都提着行李争着到国外去留学，认为到美国或日本去，才能文明些，而且能得点学问，这已成了时代的风潮。就在人人都在登程去国外时，我却上路回朝鲜去了。

我父亲的想法的确很独特。就是现在，我认为那时父亲让我回朝鲜，是做对了。他让一个还不到11岁的儿子一个人去走当时几乎是荒无人烟的一千里地，可见我父亲的性格是不同一般的。他这种性格倒给了我力量和信心。

说实在的，那时我的心情也是很复杂的。让我到祖国去学习，别的都没有什么不好，可就是要离开父母和弟弟，我实在不情愿。可是，想回家乡的心情又是那么热切。对祖国的怀念，对温暖家庭的惜别，这两种感情交织着，弄得我心神不定地过了几天。

母亲对父亲说，是不是等天气稍暖和些再叫孩子上路。要让还年小的儿子一个人走一千里路，做母亲的怎么能不担心呢！父亲对母亲的话没有表示同意。

母亲心里虽然为我要走千里路担心，但还是为了让我按着父亲的计划上路，连夜给我缝制了朝鲜长袍和布袜子。因为这是父亲已经决定的事，母亲也就没再说别的。这也是我母亲的特点之一。

要出发的日子快到了，父亲问我，从八道沟到万景台有一千里地，一个人能去吗？我回答他，能去。于是，父亲在我的手册上画了路程图。从厚昌到哪里，从和平到哪里，又从哪里到哪里，都详细地标上

了地名和里程。他还让我在途中给他打两次电报，一次在江界，一次在平壤。

我从八道沟上路那天是阴历正月三十日（阳历3月16日）。那天，从早晨就刮起了暴风雪。住在八道沟的小朋友们为送我一直跟到厚昌以南，走了30里地。他们说要给我做伴一直跟来了，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回去。

一经上路，我脑子里就出现了很多想法。要走的一千里地中，有500多里是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要只身越过那险峻的山峦，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从厚昌到江界路两旁的树林里，大白天也有猛兽出没。我在走那一千里路的过程中，吃了很多苦。尤其是，在走过直岭和狗岘岭（明文岭）时，确实吃了很大苦头。五佳山岭，我走了一整天，越过一道岭，又是一道岭，好像怎么走也走不完。走完五佳山岭，我脚都打了泡。到了岭下，幸亏有一位老人按住我，用火柴头给我治了脚上的泡。

我经过月滩，越过五佳山，以后又经过和平、黑水、江界、城干、前川、古仁、清云、熙川、香山、球场，到介川搭上火车，回到了万景台。

从介川到新安州铺的是窄轨，由英国制小型机车“米吉夏”拉着轻便列车运输。从新安州到平壤是和现在一样的宽轨铁路。当时，从介川到平壤的票价是1圆90钱。

我在走千里路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好人。有一次，因为脚疼得厉害，坐了一个农民的爬犁。当分手的时候，为了酬谢，我拿出了一

点钱。那个农民没收钱，反而用那钱给我买了饴糖。

最使我难忘的是江界客店老板。天很晚我才到江界，当我找到客店时，他到大门外高兴地迎了我。他个子较矮，留着分头，穿着一身朝鲜式袄裤，为人和蔼可亲。他说，他接到了我父亲的电报，正在等我。

这家有一位老奶奶称我父亲为“金先生”，她很尊敬我父亲。她见了我，说，四年前，你跟着你父亲去中江时，还挺小，现在长这么大了。她像见了亲孙子一样高兴。老奶奶用早就准备好的牛排骨熬了汤，还烤了鲱鱼，自家孩子一点也不给，只给我一个人吃。晚上，还给我盖了新缝的被子。这家主人对我竭尽了诚意。

第二天早晨，我按照父亲的嘱咐，给八道沟的父母打了电报。电报每个字要付3钱（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朝鲜货币单位为圆，100钱为1圆——译注），超过六个字，每字要多付1钱，所以我在电报用纸上写了“平安到达江界”六个字。

第二天，客店老板为了让我坐车去，到汽车站去了一趟。他跟我说，因为车出了故障，要等十来天，车票已经订好，你就算来到亲戚家，多住几天再走。我心里感谢他真诚照顾，可是，我对他说，我得快些赶路。他也就没再挽留，给我两双草鞋，还给我找了一架往狗岘岭方面去的牛车。

介川车站前面的“西鲜旅馆”老板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我在那个旅馆住下，就要了定价15钱的份儿饭。那时，旅馆的膳费是分级的，这个旅馆最便宜的份儿饭是15钱。老板却不管这些，给了我50钱一份

的。我说，没钱吃50钱一份的，他说，没关系，只管吃吧。

到了晚上，旅馆里给每个旅客发了褥子和两张毯子，收了50钱。我算了算自己带的钱，不够盖两张毯子的。于是，我只要了一张毯子。老板又说，别的顾客都铺褥子，盖两张毯子睡，怎么能叫你一个人那么睡，拿不出钱也不要紧，只管接着吧。

朝鲜人，虽然国家沦亡，变成了亡国奴，过着苦日子，但固有的人情味和世代相传的美好风俗仍然没变。在本世纪初，我国曾经有很多空手旅行的人。人们对来到自家或自己村里的路客，就是不拿钱，也保证他有吃有住，这是朝鲜的风俗。这种风俗，西洋人都表示羡慕。我在走千里路的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朝鲜民族是善良的、很讲道德的民族。

“西鲜旅馆”老板、江界客店和中江客店老板都是受过我父亲的指导和影响的人。我在七岁那年去中江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感受：父亲无论到哪里都有志同道合的同志和知己。当我见到人们像亲骨肉一样接待和照顾我们一家人时，就想，父亲是什么时候同那么多的人建立了交情的呢？为了争取那么多的好同志，他该跋涉了多少路啊。

因为父亲到处都有知己，所以他虽然离开了家，身在他乡，也能从各方面得到他们的帮助。我也得到了很多帮助。

在走千里路时给我留下至今难忘的印象的是，四年前还点油灯的江界市，点上了亮堂堂的电灯。江界人因为装上了电灯挺高兴，可是我看到街头的风光日本味越来越浓，不禁感到凄楚。

让我回祖国时，父亲殷切教导的要熟悉朝鲜的真谛，在我心里深

深地扎下了根。我重温父亲的教导，注意观察了陷入厄运的祖国的景象。对我来说，那时走的千里路是使我了解祖国和我国人民的一个大学校。

离开八道沟后的第14天，即1923年3月29日，日暮时分，我终于走进了老家的院子。

正在下屋纺线的祖母，没来得及穿鞋就跑下院子来，一下子搂住了我。

“你是和谁一起来的？”

“坐什么车来的？”

“你爸爸、妈妈都好着吗？”

祖母没等我回答，就发出了一连串的问话。

在屋里编席子的祖父也跑出来了。

我回答说，是我一个人走来的，祖母好像不敢相信，说道：

“怎么，你真的是一个人来的？你爸爸真是比老虎还厉害呀!”她这样说着，直咂舌头。

那天晚上，全家聚在一起，通宵听我说话。

故乡的山川依然如故，使人感到亲切而美丽，可是村庄各个角落都显露着贫穷的痕迹，而且比过去更明显。

我在万景台住了几天，然后到外祖父当校监的彰德学校五年级插班，开始了在祖国的学习。从那时起，我就住在七谷姥姥家上学。

说实在的，那时姥姥家的情况是很难再添我这一张嘴的。由于康晋锡舅舅的事，姥姥家正经历一场苦难。自从舅舅被监禁，警察对这

家的监视和折腾变本加厉；狱中的舅舅健康状况很不好，全家都在伤心。日子过得也苦，每天吃稀粥或豆渣饭，勉强活命。二舅因为光靠种地实在无法维持生计，兼赶牛车，艰难度日。

可是，姥姥家的人在我面前，从不露出穷相，为了让我专心于学习，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特地为我腾出了内栋的一间上屋，在那里挂上了煤油灯，还铺上了席子。我的同学不分时辰，三三两两地来找我，他们也从不见怪。

彰德学校，是我外祖父和七谷一带的先觉们，乘着爱国文化启蒙运动的风潮，以恢复国权为目的建立的倾向较好的私立学校。

旧韩国末期和“韩日合并”后，在我国，爱国的教育运动作为救国斗争的一环蓬勃地开展起来。先觉和爱国志士含着眼泪痛切地认识到，招致丧失国权的耻辱的根源在于国家的落后，深刻省悟到教育正是自强的基础和根本，不发展教育，就不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社会的近代化，并到处展开了办私立学校的运动。安昌浩、李东辉、李升薰、李商在、俞吉浚、南宫檍等爱国的启蒙运动者，站在了这个运动的前面。在各地组织起来的学会，也有力地促进了教育运动。

在席卷全国的教育文化运动的热潮中，诞生了数千个私立学校，给在封建的束缚中沉睡的这个国度的知识分子点燃了火种。就在这个时期，教授孔子和孟子学说的私塾，改变为教授新学问的学堂或义塾，向后代呼吁，要以爱国精神奋发起来。

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无一例外地以教育为独立运动的起点，为此倾注了所有财力和心血。金九[9]把恐怖行动作为独立运动的基本方

策，在背后操纵和不断制造如同李奉昌[10]、尹奉吉[11]的义举之类难以想象的事件，他初期也曾在黄海道一带从事教育活动。安重根也曾是在南浦地方办学教育后代的学者。

在西鲜地方开设的私立学校中，较出名的是安昌浩主管的平壤大成学校和李升薰以个人资金建立的定州五山学校。这些学校培养了很多有名的独立运动者和知识分子。

外祖父对我说，在彰德学校，如能培养出一名像安重根那样的人物，也是光荣的。他叫我热心学习，成为一个出色的爱国者。

我回答说，我虽不能成为像安重根那样有名的烈士，但决心成为一个为争取国家独立不惜牺牲自己的爱国者。

在西鲜地方的私立学校中，彰德学校是规模较大，而且是现代化的学校，学生有200多名。在当时来说，这个学校不算小。有了一个学校，就可以以它为中心，使周围的人民群众很快地得到启蒙。因此，平壤地方的人民和有志之士很重视彰德学校，从各方面毫不吝惜地给予了帮助。

白善行也曾把巨额资金捐献给彰德学校。世人很少称呼她的本名，常称她白寡妇,她是解放前在平壤因做了很多慈善事业而扬名的女人。她还不到20岁就成了寡妇，守节活到80岁，一文两文地积攒了钱，成了财主。由于她致富的方法独特，而且大胆，所以很早以前就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据说，今天的胜湖里水泥厂所属的石灰石矿区，曾经是归白善行所有的。据传说，她用廉价买下无人感兴趣的石头山，以几十倍于本钱的价格卖给了日本资本家，那就是今天的胜湖里水泥厂

所属的石灰石矿。

当人民对只凭一纸文件就把国土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逆臣怨声连天的时候，连算盘都不会打的普通女人，与锱铢必较的日本资本家谈生意，获得了巨额利润，人们听到这个风闻，就像听到打胜仗立武功的故事一样人心大快。

人们所以尊敬白善行，是因为她为社会做了很多有益的事业。她虽然家财万贯，并没有贪图富贵荣华，总是粗茶淡饭地过着朴素的生活，但她慷慨地把积攒了一辈子的钱献给社会。用那钱，修桥，盖公会堂。白善行修建的平壤公会堂，至今还照原样保留在练光亭前边。

我开始读书没几天，有一次，外祖父给我带来了五年级用的教科书。我接到一大包书，心情激动地一本一本翻看。但当我翻看到《国语读本》时，非常扫兴。那本写着《国语读本》的教科书，是日文书。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使我们民族“皇民化”，强迫我们使用日语。他们从强占初期就宣布，官署、法院、学校的公用语为日语，禁止使用朝鲜语。

我问外祖父，为什么要把日文书说成国语书。外祖父没有回答，只是叹气。

我用小刀把《国语读本》的“国”字给刮得不留一点痕迹，然后写上了“日”字。《国语读本》于是变成了《日语读本》。出于对日本的同化政策表示抗拒的心理，使我干出了这样的行动。

上了几天彰德学校，间或看到了在教室里、道路上或游戏场上说日语的孩子。有的孩子还教别的孩子说日语。孩子们不以此为耻，也

不以此为怪。他们可能认为国家沦亡，连朝鲜话也要消失掉了。

我见了那些拼命想学好日语的孩子，就对他们说，朝鲜人应该说朝鲜话。

我从八道沟回到祖国，后来到了七谷。那天，左邻右舍的人们聚到我姥姥家来想了解时局的变化。他们对我说，既然在满洲住了几年，中国话一定讲得挺好，要求我说几句给他们听听。彰德学校的孩子们也缠着要我教他们中国话。我每每拒绝他们，对他们说，我们有自己很好的语言，为什么要说外国话呢。

我回到祖国后，只讲过一次中国话。有一天，二舅叫我一起去城里逛逛。他总是忙着干活，轻易不去逛街，那天是特意为我腾出时间的。他说，你离开好久才回来，今天和我一起出去吃一顿午饭。就这样，他带我到平壤城里去了。我们在街上逛了一圈，然后为吃午饭，走进了西平壤的一家中国馆子。在现在的烽火山旅馆一带，那时曾有很多中国馆子。这里的老板们为了多拉顾客，多卖钱，站在门外，口喊“快请，快请”殷勤地争着迎接顾客。

我们走进去的那家馆子的老板，用不大通顺的朝鲜话问我们要用点什么。我为了让老板容易听懂，用中国话要了两盘发面饼。老板睁圆眼睛望着我，问我是不是中国学生。我告诉他，我不是中国学生，只是在满洲住了几年，学了点中国话，我就这样用中国话和老板交谈了几句。老板高兴地说，这样小的年纪怎么能说那么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还说，见了从满洲来的学生，不免想起老家来，他说着竟流了泪。

他给我们端来了发面饼，还给我们上了几样我们没有点的菜，劝

我们多吃。我们推让了半天，拗不过他，就把摆上来的饭菜都吃了。吃完后，拿出钱算帐，老板却连发面饼也没收钱。

在回家的路上，舅舅对我说，今天本是为了请你吃一顿带你进城的，可是，反倒沾了你的光。说着他大笑起来。这件事叫舅舅传扬得村里无人不晓。

按照我的希望，我编进了康良煜先生当级任老师的班级。我到七谷时，康良煜先生从崇实学校辍学，到彰德学校任教不久。他是因为交不上学费，中途辍学的，他对此深感遗憾。

康良煜家穷得厉害，以致他的夫人（宋石贞）离弃婆家，到娘家呆了一个时期。夫人的父母斥责说，你虽说没有仁德做不了一个贤妻，也不能因为受不了穷就离弃丈夫啊。朝鲜人，不像他们那样穷的能有几家！你以为出了嫁就要坐锦垫吃白米饭拌蜜汤吗？你二话别说，马上回去认错，并亲自把她送回婆家去了。从这里，不难想象康良煜先生的家穷到什么程度。

我们管先生的夫人叫“肃川阿姨”。她的老家是平安南道肃川。我到康良煜先生家去，“肃川阿姨”总是给我做豆渣饭吃。那时吃豆渣饭觉得别有风味。

刚解放时，有一次我去祝贺康良煜先生的生日，和夫人回忆了彰德学校时期的豆渣饭。我说：

“师母，现在我还不时地想起，在七谷时您给做的豆渣饭。那时，我吃得可香啦。20多年来，住在异国他乡，还未曾向您道谢，今天我要特地向您致谢。”

夫人说："那时穷得连一顿米饭都没能端上饭桌，净做豆渣饭给你吃，还要道谢，真叫我不好意思。你说豆渣饭好吃，又能好到哪儿去。"她说着流了泪。她说，彰德学校时期未能好生招待将军，今天要弥补一下。说着摆出了她亲手做的各种菜肴。

有一年，她为祝贺我的生日，送来了亲手酿的"百花酒"。顾名思义，就是用一百种花酿的酒。由于这个酒名别有韵味，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但我不能轻松地饮用那杯酒，因为端起酒杯，我眼前就浮现起她过去连一顿米饭都吃不上、总是忍饥挨饿的情景。

我刻骨地体验了国家沦亡的民族的悲苦，对故乡的一草一木，一个谷穗，都比过去加倍地感到可贵。加上，康良煜先生不断地向学生灌输民族意识，因此，我无论在家庭或学校，经常受到爱国思想的熏陶。

那时，康老师为给学生注入爱国思想，常组织野游和修学旅行（修学旅行指学校组织的以参观学习为目的的旅行——译注）。那时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到黄海道正方山去的修学旅行。

解放后，康良煜先生曾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秘书长和共和国副主席，由于工作需要，常有机会和我接触。我们在一起感怀深切地回顾了彰德学校时期的修学旅行及当时我们参观的正方山成佛寺和南门楼。

在彰德学校时期的回忆中，另一件难忘的事是康良煜先生上的音乐课。音乐课曾是学生们欢迎的科目之一。康老师具有一副不亚于男高音歌唱家的嗓子。当他用那悦耳的嗓音唱起《前进歌》、《少年爱国

歌》时，全体学生都屏住呼吸欣赏。

回顾起来，先生通过教唱歌曲，给我们灌输了爱国情感。后来，我在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时期，有时还唱彰德学校时期学的歌子。那时学的歌的歌词和旋律至今还完整地记在脑子里。

我回到祖国看到人们的生活比从前更苦。

每年一到春播期，极贫的家庭的孩子们就上不了学。不仅农活忙，还因为断粮，要去挖野蒜、荠菜、旋花根来充饥。在集日，有的孩子把野菜拿去卖了换粮食，有的孩子在家替父母照看年幼的弟妹。穷家的孩子带的午饭也是小米、高粱、稗子做的饭。有不少孩子，因为连那种饭也没有，上学不带午饭。七谷和万景台，因为家境困难不能上学的孩子有的是。我看到因为家穷连学校门都不能进的孩子，实在感到心痛。我为那些孩子着想，放假时回到万景台开了个夜校。我把那些不能上学的孩子都叫到夜校来，叫他们认字。开始，用第一学年用的《朝鲜语读本》教我国文字。后来，增加了科目，教历史、地理、算数、唱歌。这是在我的一生中，最初的简单的启蒙活动。

我和同学们一道常去城里，了解到平壤市民的生活情况和万景台、七谷的人们差不了多少。当时平壤有10万人口，其中能舒舒坦坦地过活的只有为数不多的日本人和美国人。美国人盘踞在平壤风景最美的新阳里一带作威作福；日本人则把平壤最繁华的本町和黄金町一带变成他们的居民区，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美国人住的“洋村”和日本人住的地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砖房、商店、礼拜堂，而普通江一带和磅带街，与日俱增的是贫民村。

如今，普通江畔修起了千里马大街、庆兴大街、烽火大街等现代化的大街，盖起了人民文化宫、平壤体育馆、滑冰馆、苍光院、高楼住宅之类巨大的建筑，再也看不出它旧时的面貌了。可是，在我上彰德学校的当时，却是用草帘当门，用七拼八凑的木板子盖的窝棚一个挨一个地挤在这里。

我回国那年，平壤地方还蔓延传染病，市民遭受了难忍的痛苦。雪上加霜，那年还发了洪水，弄得整个城市遭受了难以言状的苦难。《东亚日报》在报道那年的洪水灾情时说，数达平壤市内总户数一半的一万多户人家被水淹。

现在，普通江广场后面，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105层的柳京饭店。过去，我们的爷爷和奶奶们在那里住在多么简陋的窝棚里，过着多么艰难的生活，恐怕现在新的一代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

那时，我目睹这种现实，渴望建设一个能使劳动人民过上好日子的社会，更加憎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地主和资本家。

在我上彰德学校的时候，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日本的极右分子毫无根据地捏造说，朝鲜人要借这次地震掀起暴动，并以此为借口调动军队屠杀了数千名朝鲜同胞。这个消息传到了七谷，激起了学生的愤怒。这个事件给了我很大的刺激。它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日本人嘴上高呼“一视同仁”、“日鲜融合”，实际上，把朝鲜人看得牛马不如。

从那以后，我见了日本警察骑的自行车也不放过它。在木板上多钉上几个钉子埋在路上，叫那些自行车的内胎个个都撒气。

我们创作的音乐游戏《13个家》也反映了憎恨日本帝国主义、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音乐游戏《13个家》，是由13名学生上台表演的舞蹈。他们各自拿着一枚用硬纸壳做成的各道的地图，边唱歌，边把地图贴上，拼成完整的朝鲜地图。

在1924年的秋季运动会上，我们搬出了这个音乐游戏，正表演的时候，警察出现在运动场上，大声喝斥，叫马上停止。那时，开个小小的运动会，也要事先得到警察机关的认可，即使他们认可了，还要由他们监场。

当时，我去找康良煜先生说，为热爱本国的山川唱歌，跳舞，有什么不对？不管日本鬼子怎么说，还是继续表演吧。康良煜先生和别的老师们一道谴责了警察蛮不讲理的行为，让学生们继续表演了《13个家》。

像我们这样的小学生都具有这样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反抗精神，何况大人呢。

我回到祖国的那年夏天，平壤的织袜厂工人举行了总罢工。那时，各家报纸都用很大篇幅报道了这个事件。

我听了这个消息后，心里想，日本虽然乞灵于骗人的“文化统治”，但早晚要碰上比三·一人民起义更大的反抗。

我这样度过了两年，在再过几个月就要在彰德学校毕业的时候，从外祖父那里听到了意外的消息:父亲再次被日本帝国主义警察逮捕。我感到天像要塌下来一样。烈火般的愤怒和敌忾燃遍我的全身。七谷和万景台的大人们脸色全变了，都在注视着我。

我决心，誓死为父亲、为我们一家、为朝鲜民族报仇雪恨，准备上路。

听我说要到八道沟去，姥姥家的人说，要去，也要毕了业再去。万景台的祖父也从各方面说服我，再过几个月，学校毕业了，天气也暖和了，等那时再走。

我不能那么做。我想，父亲遭到了不幸，我怎么能坦然地在这里念书？要早日去帮助带着年幼的弟弟受苦的母亲，我已长这么大，到哪里还能白赔了我的血本吗！

祖父看出我的决心难移，便改变了态度，让我照自己的决心做，说，父亲被禁锢，现在该你挺身而出了。

第二天，我离开了老家，家里的长辈们送我上路。那天，祖父、祖母哭泣，叔叔哭了，全家人都哭了。

送我到平壤车站的小舅舅（康昌锡）哭得很厉害。在七谷一起上学的康允范哭得也很悲切。

在彰德学校的同学当中，康允范是和我最亲密的。他也没有别的志趣相投的好友，所以常找我来玩。我们俩常常一同到城里去。

列车快开动时，康允范递给了我饭包儿和一个信封。他说："你我分手不知何时才能再会，写了几句惜别的话，你上了车再打开看吧。"

我照他的话，列车启动后，打开了信封。里面有一封短信和3圆钱。我看着信和钱，深深地感动了。如不以友情为重，哪能送这样的礼。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孩子要弄到3圆钱，不是一件容易事，实在难能可贵。我说要替父亲报仇，上了路，实际上我的盘缠是成问题的。是

康允范从窘境中解救了我。看来，他为凑那些钱费了不少劲。刚解放时，他来找我，当时我对他提到20年前接到那钱时的感激之情。他吐露真情说，那时费了很大劲才弄到那些钱。说实在的，财主家的百万金也不能和那3圆钱相比。蕴含在那3圆钱里的友情是拿什么也估量不了的。钱财里不会出友情，但只要有了友情，不止是钱，无论什么都能得到。

康允范那时对我说，将军为光复祖国，在山里进行了斗争，可是他自己没做出什么事。我对他说，那就从现在起，让我们把力量联合起来，建设新国家。现在，在建国事业中最成问题的是缺乏干部，能不能把建设学校的一部分工作担起来。他爽快地答应下来。没过多久，他在赵村建起了一个学校，让我为那个学校起个名。我就给起了三兴中学这个名。三兴，就是智、德、体三项都兴旺的意思，也就是说，渊博的知识、高尚的品德和健全的体魄齐备。

后来，康允范负责建设综合大学的工作，而且干得很好。如今，建设一个大学已不成为大问题，可是那时，资金、材料都缺，建筑技工也缺，简直是困难重重。他在工作中碰上难题，就来找我，晚上睡在我家，和我一起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康允范是送我走上光复祖国之路的难忘的同志，又是至友。我至今还记着当年他在平壤车站噙着泪送我的情景。那时他写给我的字条的内容是这样的：

成柱，要和你分手，难忍惜别之泪。今日别离，何时才能再会？你我相隔万里，也不要忘记彰德学校的时节，要惦着咱们的故乡，要

念着咱们的祖国啊。

我被这样的友情和道义鼓舞着越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险山峻岭。我在离开万景台后的第13天傍晚，到了葡坪。我走到渡口，不忍立刻渡过鸭绿江去，在江堤上徘徊。我想要迈开步子渡到八道沟去，可是身后的祖国山河却牵住了我的心。我眼前清楚地浮现了我走出家门时祖父和祖母泪水模糊的面容，他们跟着我走出柴门，又抚摸我的手，又给我掩上衣襟，又望着风雪为我担心。想起了他们，我很难挪动脚步。我觉得，只要越过江堤，渡过江去，泪水就会像泉涌一样淌下来，使我无法忍住。

在寒风凛冽的两国境界，回顾呻吟挣扎的祖国山河，使我难以遏止要重新跑回可爱的故乡、心爱的老家去的冲动。

我此次在祖国度过的岁月虽然只有两年，却学到和体验了很多东西。其中，最可贵的是，我深刻地认识了我国人民是什么样的人民。我国人民是既朴素、勤劳，又勇敢、坚毅的人民。他们是在任何困难和考验之中都不屈服的顽强的人民，他们讲礼貌，富有人情，但对不义现象是坚决反对、毫不妥协的。民族改良主义者打着研政会的招牌搞反动的“自治”运动，但是，包括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的广大人民群众以浴血斗争抗拒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从他们的形象中深切地感受了任何力量也不能损坏的民族尊严和要求独立的钢铁般的意志。从那时起，我就认为，我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并有了只要把这样的人民很好地组织和动员起来，就完全能够光复祖国的信心。

我看到在“文化统治”的幕后与日俱增的军队、警察、监狱，看

到不断地劫掠祖国财富的货车和货轮，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是我国人民自由和尊严的最凶恶的扼杀者，是把难以忍受的贫困和饥饿强加给我国人民的恶毒的剥削者、掠夺者。

令人窒息的祖国的现实，使我更坚定了这样的信念：朝鲜民族只有通过斗争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才能在独立了的祖国过幸福生活。要早日光复祖国，把那里的一切永远变成我们的、朝鲜的，这一愿望在我心中燃烧。

我避开警察的视线，朝葡坪渡口下方走去，在有浅滩的地方往冰封的鸭绿江迈出了沉重的脚步。只要渡过这百尺左右的江面，就可以到八道沟市街，我家就在那江岸街上。可是，我的脚步是这样沉重，简直没法挪动。心里不禁想到我这次告别祖国，何时才能再渡过这条江来。我转回身，在江堤上拣起了一个石头攥在手里。我很想把可以作祖国的标志，使我回忆起祖国的任何东西带去珍藏起来。

那天，我在鸭绿江畔体验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心情。正因为那天在我的心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当我胜利回到祖国后，在国内爱国者们举行的欢迎我的宴会上，我首先讲了渡过鸭绿江去时的心情。

我缓步过江时，低声唱起了不知是谁作的《鸭绿江之歌》：

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
是我渡过鸭绿江的日子。
年年都有这一天，
不达目的誓不回还。

碧绿的鸭绿江水啊，祖国山河啊！
我重返家乡的日子究竟是哪一天？
只因有毕生难忘的志愿，
不光复祖国誓不回还。

我怀着满腔悲愤，一次又一次地回顾祖国的山河。

朝鲜哟，朝鲜哟，我要离开你了。我虽然离开你一时也活不成，但为了把你夺回，我才渡过鸭绿江去。渡过了鸭绿江就是人家的国土。就是到了那里，我怎能把你忘记，朝鲜哟，你要等待我。

我想着这样的心事，重新唱起了《鸭绿江之歌》。

我一边唱着那支歌，一边想：我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踏上这块土地呢？重新回到我生长的、有祖先的坟墓的这块土地的那一天，究竟什么时候到来呢？这么一想，我小小的心里也禁不住悲伤。那时，我想着祖国悲惨的状况，悲壮地发誓，朝鲜不独立，誓不回来。

六　我的母亲

我走到八道沟的街口，天已黑下来。在千里路途上，我的心一直焦灼不安，走到自家门口，更加紧张起来。

然而出乎意料，母亲的表情相当沉着安详。母亲高兴地伸出双臂紧紧地抱着我说，一千里地的路，你一个人走了个来回，到底是男子汉不同一般哪。我还一次都没走过呢。

我把家乡的消息简单地讲了讲，就问父亲怎么样了。母亲压低声音说了一句“没事儿了”，就没再说什么。

我从母亲的神色中看出，父亲虽已脱险，但危险还在紧追着他，因此母亲十分小心地提防着周围的耳目。

我把用省下来的盘费买来的果点分给弟弟们，心里想，今晚一定要同母亲和弟弟倾诉别后的心怀。

可是，母亲给我做了晚饭之后却说，这个地方敌人的监视很严，你要马上离开这里。她不告诉我父亲在什么地方，只说，你父亲已经安然无事地走了，你也该走了。一向慈祥和蔼的母亲，唯独这一天，根本不问我的意愿和想法，也不让我这个冒着严寒千里迢迢只身归来的、而且是分别了两年的儿子在家里过一夜，就打发我走。我听了，惘然若失，默默地站着发呆。母亲还要我带着弟弟们一起走，我才勉

强开口问母亲你怎么办。母亲回答说：

“我要等你叔叔从新坡回来。他一回来，我就把这里的家什收拾收拾，还要办点后事。你们只管快点走吧。”

母亲接着叮嘱我，要悄悄地上路，别让人察觉；要到临江去找名叫卢京斗的人。说完，母亲就去找宋“工头”，托他套一架马爬犁送孩子们走。

宋“工头”爽快地答应了。他的本名叫宋秉彻，因为他有一种像工头那样好装模作样的习气，所以八道沟的人们都喜欢叫他宋工头，而不叫他的本名。

我们托这位宋“工头”的帮助，坐上马爬犁，离开八道沟，走向了临江。

我一辈子干革命，经历过无数次的悲欢离合，但像这次这样特异的离别，只经历了这么一次。

我从万景台启程，走了将近15天才走到了家，可是还没有卸下行装，就连夜上了路。当时，我在路上对母亲想了很多。

我的母亲生性温柔；我的父亲是干革命的人，性格刚强而严厉。因此，我从母亲那里得到了更多的温暖爱护。

两年前当我为了上学读书回祖国的时候，母亲是那么舍不得放我走。这表现了她是一位富有人情的母亲。住在万景台的祖母曾说过我的父亲是个比老虎还厉害的人。当时，正因为身旁有这么厉害的父亲，我的母亲才没敢怎么样。但是我却感觉到了母亲在无言中流下的眼泪。

照我母亲的品性，即使我不是她的儿子，而是别人家的刚13岁的

孩子，走了一千里路，天黑时来到了我家门口，她也一定会硬把他带进家里，给他热饭吃，让他睡一夜的。

有一年春天，有个左腿和脖颈上长了疮、病情严重的孩子，趴在他伯父的背上，从江对岸的厚昌来到了我家。他是个可怜的孩子，他的父母不和，离了婚，他只好寄居在伯父家里。

我的父亲诊察了一下病情后，对我的母亲说，这孩子的大腿要动手术，动手术后不能走动，治病期间要让他住在我们家里。母亲一口答应说：“这还用说吗！”动了手术后，要天天给孩子换药，贴上蜂蜜加面粉和苏打和好的药。每次换药，母亲就给父亲当助手，亲手洗净恶臭肮脏的疮口，可她从来没有皱过脸。

靠我母亲的精心护理，过了好些天，那孩子治好了病，要回家去了。

那天，那孩子的伯父来领他回去，临走时拿出一张一圆钱的钞票交给我的父亲说：“要是治病钱，拿出几百两银子我也不会心疼的，可我是个穷汉子，只有一份心意，望先生把这当治病钱收下，买瓶酒……”说到这，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我的母亲在旁见此光景，说道：“都是穷人，还谈什么治病钱啊，您说的太见外了。我倒是没能给这病孩子吃的更好一点，心里过意不去呢。”

可是，那孩子的伯父百般恳求，硬是要我们收下。若是有钱人家这样还好说，可他是到山里搂点儿干松针拿去卖，才勉强凑了点钱治病的人，这样的人拿出一圆钱求我们收下，我的父母怎能不为难呢。

父亲回头望着我的母亲，为难地说，要是不收，就等于无视人家的心意，你说该怎么办。母亲回答说："人家的诚意嘛，应该收下。"她当即拿着那笔钱上街去扯了五尺细白布，回来交给那孩子说，快到端阳节了，拿回家去做件衣裳穿吧。那时候，一尺细白布卖35钱，而我母亲买了五尺。这就是说，我母亲在病人交的一圆钱上又补贴了75钱。

我的母亲，虽然过着穷日子，但是对于钱，从来不贪心，更没有自己的小算盘。

"人所以活不长，不是因为没有钱，是因为命短。钱这个东西，聚散无常，有来有去嘛。"

这就是我母亲的人生哲学。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心地善良，温厚慈祥的人。

我的父亲有时遇上不顺心的事，偶尔嗔怪她几句，她也从不回嘴，只道歉说："是我的不对。""下回改吧。"有时我们淘气淘得过火，弄脏了衣服，或者毁坏了什么，或者大声吵嚷，致使祖母嗔怪我母亲怎么不训一声孩子，我的母亲也只回答说："小孩子们做错了，骂他们有啥用啊。"

老实说，我母亲是因为侍候搞革命的丈夫，才没有说的，若是单从一个普通妇女的角度来看，我母亲的一生可以说是难以承受的苦难与艰险的一生。我的母亲没有享受过多少夫妻团圆的生活。因为我父亲经常在外搞独立运动，这自然是难免的。只有在父亲到江东当教员的时候，才过了年把团圆日子。此外，搬到八道沟以后，也许又过了

一两年团圆的家庭生活。

由于父亲被捕坐牢，出狱后不是卧病就是躲避警察的监视在外奔波，父亲去世后我又出去闹革命，经常不在家，因而我的母亲一直没有过过全家团聚的生活，而是忧心忡忡地度过了一生。

住在万景台的时候，我的母亲作为有12口人的大家庭的长孙媳妇，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侍候丈夫，侍奉公婆自不用说，就是打扫屋里屋外，刷锅洗碗，洗烫缝补，纺纱织布，样样都由她做，忙得直不起腰来。白天，还要下地干活，连个抬头望一下太阳的空闲都没有。在封建观念还很强、繁文缛礼又严格的当时，要当好一个大家庭的长孙媳妇，是非常不容易的。偶尔做一顿干饭，母亲只能摊到锅巴，熬了粥，也只能喝到最稀的一碗。

我母亲实在劳累痛苦的时候，就和我的叔母一起上礼拜堂去。

松山（现在军事大学的校址）原先有过一座长老教的礼拜堂。南里及其附近一带有过不少信基督教的人。他们想，活在世上既然不能过像个人样的生活，就去好好听耶稣的教诲，死后好到“天堂”去。

大人们去礼拜堂，孩子们也跟着去看做礼拜。为了吸引人增加信徒，礼拜堂有时给孩子们分发糖块儿和笔记本。孩子们尝到了这个甜头，一到星期天就成群结队地拥向松山去。

起初，我也动了好奇心，跟着小朋友们一道去过几次。可是，那个肃穆的宗教仪式和牧师的单调的说教，不合我们童年的心理，令人感到厌烦，以后就没怎么去。

某个星期天，我一面吃着奶奶给做的加豆麦芽糖，一面向父亲说：

“爸爸，今天我不去礼拜堂啦，看他们做礼拜，没有意思。”

父亲叫我这个还不懂事的小孩子坐下来，说道：

“去不去礼拜堂，随你便。实际上，礼拜堂那个地方什么也没有，你不去也好。不要相信耶稣，要更相信自己的国家，更相信自己国家的人。同时，你要想法为国家做大事。”

从那以后，我就不大爱去礼拜堂了。在七谷念书的时候，尽管校方对不去礼拜堂的学生管得很严，我还是一次也没去。我觉得耶稣的福音同我国人民遭受的悲痛，距离太大了。耶稣的教义中也有很多人道主义的东西，但对我这个为民族的命运深深苦恼的少年来说，召唤人们去救国的历史的呼声，在耳边震响得更加迫切。

论思想，我父亲也是无神论者。但是我父亲是教神学的崇实中学出身，因此他有很多教徒朋友，我也跟着接触了很多教徒。有的人问我，在成长时是否受到了基督教的很大影响。我没有受过宗教的影响，可是从人际关系上得到了基督教徒的许多帮助，同时也给了他们许多思想上的影响。

我认为，祈望天下人都过上和平又和睦的生活的基督教精神和我的主张人类过自主生活的思想是并不矛盾的。

只有母亲上礼拜堂去的时候，我才上松山去。

母亲虽然上礼拜堂去，但她不信耶稣。

有一天，我悄悄地问过母亲：

“妈妈，您上礼拜堂，真地相信有‘上帝’吗？”

母亲微笑着摇了摇头，说：

“我上礼拜堂，不是因为那里有什么东西。死后上‘天堂’还有什么用啊！我是因为太累了，才到那里去歇一会儿。”

我听了，感到母亲很可怜，我倒对她的感情更深了。

在礼拜堂做祷告时，我的母亲累得常常打盹，直到牧师说一句什么，大家都随后叫一声“阿门”站起来的时候，才醒过来。有时睏得人们都喊过了“阿门”，她还醒不过来。这时候我就悄悄地摇晃她，告诉她祷告已经完了。

有一天晚上，我跟小朋友们一起路过万景台后山上的丧具房。丧具房，是保管殡葬用具的小棚子。我们小时候都非常怕这个丧具房。

那天，我们走过那个丧具房的时候，有个孩子突然喊了一声：“哎呀，魔鬼出来啦！”我们都以为真的有鬼出来了，吓得拼命地跑，连鞋子都跑掉了也不知道。

这天夜里，大家都怕得不敢回家，就在朋友家里睡了。第二天早晨才回家，鞋子也找回来了。

我回到家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就对我说：

“走那种地方，要唱着歌走。你一唱歌，什么鬼都不敢出来啦。”

我想，母亲是以为走夜路时一唱歌就能驱除恐惧心，才这么教我的。从这以后，每次路过那个丧具房时，我就唱着歌走过去。

平时如此温柔敦厚的母亲，在敌人面前，却正颜厉色，大义凛然，不容侵犯。

在烽火里，日寇警察逮捕了我父亲后，过了几个小时，又返回来闯进我家进行搜查，要查找秘密文件。这时候，母亲怒不可遏，霍地

亲手打开衣柜，抓起几件衣物，边撕边掷向鬼子，怒斥道："搜就搜吧！"鬼子们吓得气焰顿消，灰溜溜地走掉了。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位妇女。

我们离开八道沟的那天夜里，鸭绿江上风雪大作，特别寒冷。

狂风呼啸，好似要一口吞掉整个森林，猛兽嗥叫，令人毛骨悚然。这一切充斥着深夜的黑暗，更加刺痛了我心中亡国的创伤。

我坐在马爬犁上紧紧搂抱着怕得瑟瑟发抖的两个弟弟，奔驰在黑暗的两国之界河——鸭绿江的冰面上，心中想道：革命的道路实在艰险，母亲的爱护深切难得。

我们三兄弟蒙着棉被还冷得直哆嗦。因为是漆黑的深夜，两个小弟弟直叫着害怕，紧紧地偎在我的怀里。

我们在叫做吾仇俳的朝鲜一边的岸上住了一宿，第二天走到了临江。

原来，卢京斗是我们早已面熟的客栈老板，过去我们住在临江的时候，他出面给我们找了一间住房，还经常来找我父亲谈论过国家命运。他对待我们三兄弟如对待贵客，十分亲切热情。

他家有两栋共七间房，我们就住在最清静的第二间屋子里。隔着厨房，对面有三间客房，经常有很多客人。从满洲经临江去朝鲜的人，从朝鲜经临江去满洲的人，大都到这客栈住几天再走。这个客栈也就是独立运动者的住宿处。

卢京斗是反日思想很强的民族主义者，他生性温和、耿直，又很倔强。他开客栈，用收入的一部分资助独立运动者。他靠卖饭勉强过

日子，可以说他也是靠自己的劳动营生的人。他是怎么到临江落户的，我不大清楚。当时听人们说，为了筹措独立运动资金，他曾参加过偷运钨矿石的工作。不幸被发觉，便跑到丹东一带隐蔽了一阵，待到那个案件没人过问了，才找到这个更安全的藏身处所临江来落了户。

他是平安南道大同郡古平面下里人。下里，同我的故乡南里只隔一道顺和江。听说，卢京斗本是一个老实勤奋的庄稼汉，自从结识我父亲以后，就不再老蹲在家里，而常常出外东奔西走，说是搞独立运动。这样，家里人都讨厌他，说他不正经务农，像个卖货郎似地到处逛荡。他在家乡时每天顺和江一退潮，就蹚过江到南里来见我父亲。也许是因为有这种关系吧，他待我们很好，供吃供住，真诚地保护我们。

对我和我们一家来说，卢京斗是一位大恩人。我们在他的客栈住了将近一个月，他为侍候我们，几乎荡尽了全部家产，可他从没有流露过不悦的神色，总是笑脸待我们。有一次，他还拿钱让我给住在抚松的父亲打了长途电话。托他的福，我生平头一次打了电话。当时，我父亲很想听到我们每个孩子的嗓音，所以我们三兄弟和母亲轮流地都跟父亲通了话。

在约好的一天，我的母亲跟亨权叔一道来到了临江。她一到客栈，就要我们上街去逛逛，把我们带到街上，走进了一家中国饭馆。她给我们每人要了一盘饺子后，就开始问我们这一段时间的情况。

起初，我以为母亲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寄居人家近一个月的孩子们饱餐一顿，才带我们到饭馆来的，所以，也没有多想，就跟着来了。

可是经她这一问，我才明白过来，母亲带我们出来，更主要的是为了了解我们在临江时的情况。

有没有可疑的人到客栈来找过你们？你们到别人家去玩过没有？都有哪些人知道你们住在卢京斗的家里？问明了后，母亲一再叮嘱我们说，不要到外面乱讲你们是金亨稷的儿子，在搬到新地方以前，要事事留心，不要有一点疏忽。

到了临江，母亲仍然为我们担心，没有睡过一次安稳觉。深更半夜一有风吹草动，她都霍地坐起来，屏声静气，警觉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如此害怕有什么祸殃临到孩子们的头上，时刻放不下心的母亲，那天叫我们连夜赶往临江的时候，是什么力量使她采取了那么断然的态度呢？

我想，这就是真正的母爱，是革命的爱。

我想，在这世界上，再没有比母亲的爱更温暖、更真诚而始终不渝的爱。就是打你骂你也不使你觉得疼，这就是母亲的爱；只要是为了儿女，上天摘星星也在所不辞的，就是母亲的爱。这个爱，不要任何报酬。

当年母亲的音容笑貌，至今还不时地出现在我的梦中。

七 遗 产

我们住在八道沟的时候，时常到我家来的黄某，在我父亲的生平中留下了很大的痕迹。在厚昌从日本警察的魔爪中救出了我父亲的，就是这位黄某。

为了同国内的革命组织取得联系，父亲过江来到葡坪，在当秘密交通站用的冷面铺附近，被埋伏的日寇警察逮捕。当时，我家后面有一家客栈，老板名叫孙世心。就是这个人给敌人告了密。这以前，他三天两头地来我家，紧挨在我父亲身边，讨好地叫着“金先生，金先生”，恭维我父亲。那时候，我父亲还不知道他是个敌人的坐探。

朝鲜总督府警务局为了破获地下组织，一面把我父亲被捕的消息作为绝密，严密地封锁起来，一面把几个高级官员急忙派到平安北道警察部，对我父亲的案件进行调查。葡坪警察官驻在所则受命由警长秋岛和一名警士押送我父亲，途经厚昌警察署火速押送到新义州的道警察部去。他们之所以把刚逮捕的我父亲急忙押送到新义州去，是因为他们害怕活动在鸭绿江沿岸的独立军把我父亲抢走。

父亲被拘留在葡坪警察官驻在所的拘留所时，警察根本不准我们家属去探监，所以我们还不知道敌人已经决定把我父亲押往新义州去。

黄某跑来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们。

“大嫂，您不要太着急。我豁出来把家产都变卖了，也一定请个律师替金先生辩护，等法院做了判决，我再回来。如果家里有酒，拿几瓶给我。”

他把几瓶烈酒和几条干明太鱼装在网兜里，悄悄地跟在我父亲的后面走了。

那两个押送警察一大早动身，走到烟浦里客店时已到中午了。他们吵着肚子饿，走进客店要了饭。这时，跟到烟浦里的黄某走进客店，看了一会儿动静之后，从网兜里拿出酒瓶要请那两个警察一起喝一盅。

警察起初不理他，借口他们执行公务押送犯人，拒绝喝酒。可是他们经不起黄某一再的劝诱，终于夸着“你的大大的好人”，开始一杯接一杯地喝起来了。

黄某又对他们说，也该让犯人吃一顿饭，那才好押送。他这样连哄带捧，终于说服他们给我父亲解开了一只手铐。黄某也喝了很多酒，但他是喝不醉的，他是海量。

秋岛和他的部下朝鲜人警察终于醉倒，开始打呼噜了。

我父亲趁机在黄某的帮助下解开手铐，逃出客店，爬上了对面的尖顶峰。当他们快爬到峰顶时，开始下起了雪。

不久，秋岛他们醒过来，慌忙追击，连连开枪。因为他们追得很紧，我的父亲和黄某在尖顶峰跑散了。从此以后就一直没有再见到他。

解放后，为了找这位黄某，向各地做了寻人的布置。在危难的时候，那样奋不顾身地豁出性命帮助过我父亲的人，不知怎么回事，遇

到了好世道，反而不容易寻到了。

黄某是我父亲的挚友，是替我父亲上断头台也在所不辞的好同志。

假若没有黄某这些好同志的帮助，我的父亲是逃不出那种险境的。我父亲的朋友们说我父亲有天赐的同志福（指人缘——译注），是很恰当的。我的父亲为国为民舍生忘死，同众多的独立运动者休戚与共，他的身边自然就有许多群众，有许多革命同志和至交契友。

在祖国解放战争的暂时撤退时期，我从李克鲁先生那里听到了我父亲脱险的详细经过。

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初秋，为了推进各地的实物税上缴工作，共和国政府把好多名内阁成员作为全权代表派到了各地。当时任不管部长的李克鲁先生也被派到了当时的平安北道一带。

他刚完成任务，战略撤退就开始了，我也迁到了江界地区。有一天，他到内阁汇报工作，同我谈话时突然提到了烟浦里的客店。他说，他在厚昌郡结束了工作以后，去江界时带着郡公安署长到烟浦里看了我父亲脱险的那个客店。他说，那幢房子还完好地保存着。江界和厚昌，当时是属于平安北道的。

李克鲁先生是在南朝鲜和海外度过了大半生，解放后建国前夕才来到北半部的人。从这样的人那里听到有关烟浦里客店的事，的确是令人惊异的稀罕事。如果像现在这样，我父亲的事迹已广为人知的时候提到这件事，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当时，提起烟浦里的客店，几乎没有人知道。在这样的时候听到他谈起这件事，我是不能不感到稀奇的。

我掩饰不住好奇地问李克鲁先生：

“李先生，你怎么会知道我父亲的历史？”

“我早在20年前就已经听到了金亨稷先生的名声。在吉林，有个好心肠的人给我详细地介绍了金将军您家的历史。这场战争一结束，我就想写一部令尊的传记。可是，我才疏笔秃，正在犹豫!”

李克鲁先生平素寡言少语，温文尔雅，而这一天，他抑制不住兴奋，说了很多话。

我们走出嘈杂的内阁办公室，漫步在清静的秃鲁江（将子江）边，又谈了一个多小时。

把我父亲的事迹讲给李克鲁先生听的人，是黄贵轩的父亲黄白河。当时，李克鲁先生作为新干会代表团的一员被派到满洲地方。这个代表团的任务，是开展救济工作，救济在五·三〇暴动和八·一暴动中受害的朝鲜同胞。新干会的领导看到暴动中受害的人很多，便派代表团到满洲地方去准备对受害群众进行救济工作。

当时，李克鲁先生在沈阳遇见了崔一泉。他劝李克鲁先生到吉林去一定要见见黄白河。

李克鲁先生一到吉林就去访问黄白河，得到了他对救济工作的帮助，也听到了我父亲的事迹。从此，李克鲁先生才知道了烟浦里就在厚昌郡，厚昌郡又是与我父亲的主要革命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地方。

新干会派李先生作为代表去满洲地方，是因为他有着在这一带多年开展教育工作的经历。李克鲁先生曾在奶头山当过独立军部队的训练都监，在抚松的白山学校和桓仁县的东昌学校当过教员。因此，李

先生到满洲去时在这一带听到我父亲的事迹，是十分可能的。

“郡公安署长还不知道那个客店的事情。所以我批评了他几句，说这是厚昌郡的耻辱。我还吩咐他说，你这个公安署长要负责好好保护那个客店的房子。”

李先生还担心地说，后一代人不知道先烈的斗争历史，就会变成不肖之子孙，可是看起来，我们的干部好像并不认真地进行这个传统教育。

在我们这个成立只有两年的年轻的共和国处在决定生死存亡的岔路口上经历着严峻考验的时刻，听到李先生要捍卫革命传统的话语，我说不出有多么感激。我不禁感到一股热流冲击着我，仿佛那些在光复祖国的斗争中牺牲的先烈的英灵，一下子全飞到我们的眼前，大声地激励我们，要打好仗，取得胜利，捍卫祖国到底。

当有人吵嚷着朝鲜快完蛋了的时候，李克鲁先生关于烟浦里的讲述，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我的父亲同黄某跑散后，在山里奔波了一整天，在离烟浦里客店不远的柞树岭发现了一个窑洞，便请主人帮忙。在互通姓名的时候，父亲了解到这家主人也是全州金氏，和我们是本家。

窑洞的主人金老大爷说，在这样的深山沟里遇到同姓同宗的革命家，是大喜事。他以一片好心，真诚地帮助了我父亲。他把我的父亲藏在窑洞附近的谷草垛里。就在这个谷草垛里，父亲的脚、膝盖和下半身都受了冻伤。在这个冷风刺骨的谷草垛里，父亲蜷缩着身子一动不动地熬过了几天，终于得了不治之症。

金老大爷送饭团和烧土豆，尽心尽意地保护了我的父亲。

秋岛为我父亲的脱逃受到了上司的严厉责罚。平安北道警察部在从厚昌到竹田里的鸭绿江流域布下水泄不通的警戒网，搜索了好几天。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柞树岭上那堆谷草垛。我想，当时我的父亲对情况判断得很准确，隐蔽处也选得十分得当。

在这几天里，金老大爷不时地到鸭绿江边去留心察看江水封冻情况，并把利用长木杆子渡江的方法教给了我父亲。因为那时江面上结的冰还不厚，不能贸然下水。

我的父亲照金老大爷教的方法，先把长木杆子放在冰面上，用手推着木杆子一步步匍匐前进，终于安全地过了江。只要手里把着木杆子，即使掉在水里也不至于丧命，是个很巧妙的渡江方法。但是，就在这次过江的时候，父亲再次受了冻伤。这次冻伤，竟成了一年后父亲于抚松病逝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我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地渡过鸭绿江后，在某个村里养了几天伤，然后由孔荣和朴振荣陪着，去了抚松。孔荣和朴振荣是张哲镐指挥的正义府所属独立军驻抚松部队的队员。

我的父亲经吴东振的介绍同孔荣结识的经过，已在前面谈过。孔荣是碧潼郡人，是从在碧潼独立青年团做工作、在碧坡别营当武装队员的时候起，就受我父亲领导的好青年。他同我父亲是莫逆之交。他每到我家来，直叫着“成柱”、“成柱”，对我十分爱护。在他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成了我们的同志和战友以前，我也一直叫他叔叔。我的父亲去世后，他虽然住在万里河，却隔一个星期凑点粮食和烧柴来我

家慰问我的母亲。他的夫人也挖一大筐野菜顶在头上，跟丈夫一起赶来看望。孔荣为缅怀我的父亲，居丧有好长一段时间。

父亲同他们两人去抚松，在漫江境内竟被土匪截住，又吃了一番苦。当时是土匪四起，到处为非作歹的时候。各地军阀为争权夺势而拔刀厮杀的混乱不安定的局势，造出了大量的土匪。那些失去了活路的社会最下层的人们当中，也有很多人走上了这条路。加上，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削弱反日力量，渗透到土匪集团里，暗中操纵其上层分子，或者另行豢养土匪团。这些土匪，成群结伙，四处窜扰，打家劫舍，烧杀掳掠，劫持行人，索取绑票，一不遂心，就割耳朵，砍脑袋，无恶不作，极其残忍。因此，保护我父亲的那两个人，是不能不十分紧张的。

尽管我的父亲说明了他是医生，但那些凶顽无知的土匪根本不想放他走，说你是医生，定会有很多钱。我父亲对他们说：我一个看病的先生，靠给人看病勉强糊口，能有什么钱。要是你们谁有病，还是让我看看吧，我能给他治好的。求你们放我走吧，我绝不会向官厅告发你们。如此这般，哄他们，求他们，他们还是不听。

事已至此，别无他法。孔荣趁他们吃过晚饭抽大烟，有些麻痹的时候，吹灭了油灯，先送我父亲和朴振荣逃了出去，然后使出拳术，把十多个土匪全打翻在地，逃出了匪巢。这确实是使人联想到一出武戏的场面。

对孔荣在这次脱险中所表现的忘我精神，我父亲印象极深，回忆过多次。孔荣是一个为同志敢于舍生忘死，不惜自我牺牲的好战士。

过了几天，我的父亲在抚松见到了张哲镐。前几年他还不过是一个测量员，而今已当上了军人，而且在指挥着独立军的一个中队。他看到我父亲满脸病容，十分伤心，劝我父亲在他们准备的住处静心休养，直至康复。别人也都这样劝我父亲。

老实说，那时候我的父亲再不好好调养，是很难支持下去的。这一点，父亲自己也不会不知道。那正是一冬中最冷的时候。然而我的父亲来不及给自己敷一次药，就走上了北上的征途。张哲镐中队长一直陪他到目的地。

这次，我父亲去的是桦甸县和吉林市。他所以不顾身上的冻伤而匆匆去这些地方，是为了实现各个独立运动团体的合并，结成一个单一的战线，并促进反日爱国力量的团结。在当时，建立政党的问题，在独立运动者中间也提到日程上来了。

随着思想的进步和革命信念的加深，政党政治的实行就成为时代的趋势，迅速地推广到了世界的政治界。不论是资产阶级政客，还是共产主义者，都朝向了政党政治。以十月革命为转折点，亚洲的许多国家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这意味着东方也随着新思潮的传播而迎来了政党政治的时代。1921年，在我国的邻邦中国，也成立了共产党。

在这种背景的推动下，朝鲜的先觉者们也积极推进了创建一个能够从政治上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的组织的工作。

可以说，要实行政党政治，就要具备其前提条件，即，要提出并发展可以做它的指导方针和基础的思想和信念，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可能实行政党政治。

在我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出现并领导了民族解放运动，但它来不及建立自己的政党就开始凋敝了。新的共产主义思潮开始出现在民族解放斗争的舞台上，取代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新一代的先觉者们已深刻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再也不能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了，在他们中间信仰共产主义的队伍有了迅速的扩大。民族主义营垒里的许多先进分子，也掉转方向，投入了共产主义运动。

宽甸会议提出的改变运动方向的方针，并没有停滞在宣布上，而是依靠先觉者的努力，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开始进入了付诸实践的阶段。最先开始贯彻宽甸会议方针的人，是吴东振。宽甸会议以后，在吴东振指挥的独立军部队里出现了许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表示赞同的人。对于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新的力量，日本帝国主义称作是“第三势力”。

20世纪20年代中期，也就是我的父亲逃出日寇警察的魔爪，经过抚松到了吉林市的时候，正是在民族运动内部主张改变方向的革新派和反对改变方向的保守派的分化过程得到促进的时期。

我的父亲在洞察这一大趋势的基础上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能够实现改变方向这一思想的政治组织诞生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直到那个时期，朝鲜人在满洲地区开展的民族运动，主要是在恢复国权的思想指导下，以直接开展武装活动的形式和以教育、民生问题为中心开展自治活动的形式进行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能够从政治上领导这一运动的组织。从这种实际出发，我的父亲同活动在吉林

一带的属于革新系统的民族主义者们一道，开始了建立一个能够对分散在满洲各地的所有军事团体和自治团体进行政治领导的新的组织的筹备工作。

它的第一步工作，便是根据我父亲的建议，于吉林牛马巷举行的会议。这个会议，是1925年初在吉林市北山山脚下的朴起伯（朴一波的父亲）家召开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梁起铎、玄河竹、吴东振、张哲镐、金史宪、高远岩、郭钟大等独立运动的元老和中坚人士。

他们一致肯定了建立一个能够统一领导独立运动的政治团体的必要性，并全场一致地通过了关于在最近的将来建立某种单一政党的决议。会议还讨论了与建党有关的各项原则问题。

据李宽麟的回忆，会议上议论最多的是党的名称问题。党的名称要定为朝鲜革命党还是高丽革命党，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半天，最后认为，党的名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根据他们的活动目的正确规定党的任务和纲领，于是决定把党的名称定为高丽革命党，然后进入了对纲领的讨论。

过了一年，曾参加过这次会议的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们同来自国内的天道教革新派代表、衡平社代表、来自滨海省的代表一起举行联席会议，创建了以“消灭现今私有财产制度，废除现有国家组织，根据共产主义制度，建立世界统一的国家”为宗旨的高丽革命党。当时，我的父亲因病未能出席这次会议。

我的父亲游览了北山公园和江南公园，会见了新安屯青年团体的干部之后，回到抚松给我们打来电话，叫我们离开临江到他那里去。

我们离开临江走了一段路，迎面碰上了张哲镐中队长派来的两个头戴孝帽的独立军队员。他们戴孝帽，是一种伪装，为的是不引起敌特的怀疑。我们坐上他们带来的马爬犁，奔向抚松。

我的父亲亲自到离抚松约有40里地的大营来接我们。我一见到虽还带着病容却笑容满面的父亲，千万种忧虑顿时烟消云散。我拉着两个弟弟的手快步迎上前去。

我还没来得及行礼请安，两个弟弟早扑到父亲的怀里，一股脑儿吐出了憋了两个多月的心里话。

父亲听任他们缠着撒娇，眼光却一直没有离开我：

“到底是祖国的水土好啊！我把你送回祖国后，一直没有睡好觉，可是你不觉间已经长这么大了！”父亲非常高兴。

这天夜里，我们全家欢聚一堂，畅叙别后的情怀，直到天亮。黄某救父亲脱险、全州金氏老大爷的保护、孔荣在漫江匪巢里的壮举，都是在这天夜里听父亲讲的。

我谈了在祖国的见闻和感受之后，向父亲表示了我的决心：不争取朝鲜独立，就不再渡过鸭绿江去。父亲满意地望了我一会儿，赞许地说，是朝鲜的儿子，就应当这样。他接着语重心长地嘱咐说，你不要以为从彰德学校出来熟悉朝鲜的学习就结束了，到了新的地方，要更加努力学习，熟悉祖国、熟悉自己的民族。

几天后，我入了抚松第一小学，是插班生。在这个学校里，跟我最要好的朋友是名叫张蔚华的中国少年。他家在抚松一带不是数第二就是数第三的大富豪。他家里光是家丁就有几十个人。抚松县东岗的

人参圃几乎都是他家的。每年一入秋，就挖出人参，驮在骡背上到外地去卖。这时候，他家的家丁就沿途排队护送，其队列远伸到10里开外。张蔚华的父亲虽然是有名的大富豪，但也是个憎恨帝国主义、热爱祖国的有良心的人士。张蔚华也一样。

我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得到他们的帮助，摆脱了多次的危险。

在朝鲜人学生当中，跟我关系密切的是高在凤、高在龙、高在林、高在洙等人。

我的父亲以抚松为中心开展革命活动的时候，中国的反动军阀倒向亲日一边，从各方面阻挠朝鲜爱国者的活动，形势变得极为不利。加上，由于在平壤和葡坪受到的两次野蛮的拷打和严重的冻伤，父亲的健康状况也很不好。尽管这样，我的父亲丝毫没有放松过革命斗争。

小南门街的我家门楣上，挂出了写有“抚林医院”四个字的新牌子。其实，我父亲的病情不允许他给人治病，而是需要自己接受治疗。但是他又要上路了。

当时，大家都劝他不要去。张哲镐、孔荣、朴振荣等驻抚松的独立运动者都劝阻他，我和亨权叔也劝他。连我的母亲，只要是我父亲做的事情，都默默地无条件地给予支持的母亲，这一次也破例地挽留他，恳求他不要走。

父亲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心，终于离开了抚松。

原来，活动在奶头山一带的独立军部队上层分子非但没有实现行动统一，反而分成几个派，互相倾轧，争权夺利，致使部队处于瓦解的危险之中。父亲听到这一情况，深感不安，耽不下去了。

张哲镐派一个人陪我父亲去安图。陪同人准备了路上吃的五六升小米和一小罐大酱，装在背囊里背上，还掖着一把斧子和一支手枪，上路了。距目的地有几百里地的路程，须要穿过杳无人烟的森林地带。后来听说，他们穿过这人迹罕至的密林，吃了很多苦。天一黑，就在露天烧一堆篝火，背靠树干打盹。那时候，我的父亲咳嗽很厉害，弄得那个陪同人很焦急，片刻也放不下心。

父亲从安图回来以后，仍然咳嗽得很厉害。没过几天，他又拖着病身，为弄到一张开设白山学校的许可证，东奔西走，忙碌起来。

白山学校是个历史很久的学校，这是在国内大力开展办私立学校运动的时候，住在抚松地区的朝鲜流亡者和先觉者们同农民一道办起来的。

最初的白山学校，规模不大，同我父亲念过书的万景台顺和书堂不相上下，跟现在农村住宅的两间屋子一般大。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白山学校，也因为经费不足，不得不停办了好长时间。

我们搬到抚松去的时候，正是恢复白山学校的运动积极开展的时候。因为军阀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不给学校发许可证，我的父亲不知费了多少心血。

我的父亲不管到哪里，首先关心教育工作，在他所到之处都办起了学校。

在举行建校典礼的前夕，我的父亲同张哲镐一道，大车上拉着木工厂制造的桌子椅子，来到了白山学校。我的父亲虽然挂着“抚林医

院”的牌子给人看病，但他的心一直放在办学的工作上。他作为白山学校的名誉校长，虽然不亲自讲课，却亲自检查教学内容和学校后援工作，还常常到学校去给学生讲话，辅导学生的课外活动。

白山学校用的《国语读本》，是我父亲亲自编写的。开设了白山学校之后，我父亲去过一次柳河县三源浦，回来就跟朴起伯（朴凡祚）一道编写这本教科书。我父亲编写的教科书，由那些有志之士拿到三源浦印成书分发给满洲各地。三源浦有一个属于正义府的印刷所，用石版印书，质量相当好。满洲各地的朝鲜人学校，都用这个印刷所印的教科书讲课。

我的父亲在抚松，专门讨论教育问题的会议就开了多次。还把得力的人派到安图、桦甸、敦化、长白等地，让他们在凡是有朝鲜人居住的地方都开办学校和夜校。长白县十八道沟得英村的育英学校也是这个时候开办的。后来的朝鲜革命军队员和“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员李济宇和抗日战士姜炖，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白山学校的工作走上了轨道之后，父亲又开始奔走在满洲各地，做独立运动者的工作。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独立运动的统一团结。当时正是创建一个能够贯彻改变运动方向这条路线的统一政党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所以，作为建党的基础，实现独立运动队伍的团结，就成了谁也不能忽视的最迫切的时代课题。为完成这一时代的课题，我的父亲毫无保留地献出了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

在当时，分散在中国东北三省的各个不同系统的大小独立运动团体，都分别合并到三个府里，出现了正义府、新民府、参议府并存的

新局面。然而，这三个府也进行派系斗争，都争着要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因而受到了民众的指责。

在这种形势下，父亲认为，实现统一团结，是当前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1925年8月在抚松，同国内外的朝鲜国民会代表、武装团体的代表一起，讨论了实现独立运动队伍统一团结的对策，并组织了民族团体联合促进会。

当时我父亲的意图，可能是要通过这个促进会的工作，尽早建立统一政党。这个时期，父亲真是争分夺秒地加紧工作，天天处理比平时多几倍的工作。当时，父亲好像早已预感到自己的来日已经不多了似的。

没过多久，父亲病情加重，开始躺下了。

到1926年春天，父亲病情恶化，卧床不起了。

听到我父亲病重的消息，从各地来家探病的人络绎不绝。我每天放学回家来，就看见我家廊台上有五六双眼生的鞋子。人们都带着滋补的名药来慰问我的父亲。就是最贫穷的人，也至少带来一根人参。但是，父亲的病已经严重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了，再好的药也不灵验了。春姑娘歌唱着万象更新的季节，给地上万物的生命带来了浓郁的乳汁，然而她也未能使我的父亲，万人所祈求和渴望康复的我父亲苏醒。

我也没有心思上学了。有一天早晨，我上学时对父亲放不下心，半路上返了回来。

父亲见我回来，厉声问我：“你为什么不上学？”

我无话回答，只是长叹了一声。

父亲又说："去吧。一个男子汉这样，做不了大事……"他硬逼着我上学去了。

有一天，吴东振和张哲镐从吉林市来我家探望我的父亲。吴东振谈他的来意说，根据抚松会议的方针，为了实现反日爱国力量的团结，从各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可是事与愿违，没有多大成绩，非常苦恼，所以这次前来，一是讨论工作，二是看望我父亲。接着他气愤地骂开了那些专事分裂的人。

张哲镐是火暴性格，禁不住愤怒地说，同那些顽固不化的家伙干脆来个诀别，一刀两断算了。

我的父亲关切地听着他们两人的话，双手拉住他们每人的一只手，说道："不，不能这样做。就是吃力，也一定要实现联合。在联合起来，拿起枪杆子打敌人以前，是不能取得独立的。"

他们回去后，父亲谈到从李氏王朝时期沿袭下来的党争，慨叹说，过去，由于党争，才招致了国家的沦亡，如今号称搞独立运动的人，还不醒悟过来，仍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中专事派系斗争，实在令人担忧。他接着告诫说，不根除派系斗争，就不能争取国家的独立，也不能实现文明和开化；派系斗争是削弱国力的根源，是引进外部势力的媒介；外部势力侵入，国家就必然灭亡；你们的一代，必须从根本上消除派系斗争，实现团结，唤醒民众。

我放学回来护理父亲的时候，他就让我坐在他身边，给我讲许多问题。讲的主要是他的一生中的体验，其中有很多是很有教益的。

父亲的谈话中，我至今不能忘记的是关于搞革命的人应有的三大

思想准备的讲话。他说：

“干革命的人，无论到哪里，都要作好三大思想准备。就是说，要有被饿死、打死和冻死的思想准备。要作好这样的思想准备，不要抛弃当初的远大抱负。”

父亲的这些话，我都铭刻在心灵深处。

父亲对于朋友和友情所讲的话，也是很有教益的。他说：

“一个人不应该忘掉困难时结交的朋友。人们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话有很深的含义。能够同生死共患难的挚友，实际上比亲兄弟还亲。”

这天，父亲对于朋友和友情问题谈了很长时间。

他对我说：你爸爸开始革命斗争，是从结交同志着手的；有的人从筹措资金、购买六轮子手枪开始搞独立运动，而你爸爸，不论到什么地方，总是首先物色好同志；好同志，既不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从地下冒出来，必须自己去找，像淘金挖宝那样下功夫寻找，下功夫培养；正是为了这个，你爸爸一辈子不怕磨破脚掌，跑遍了朝鲜和满洲原野；你妈妈也是为这个才不顾自己受苦受累，侍候客人；只要你真心为国为民，就完全能够结交好同志，关键在于你的意志和心地；即使没有钱，只要志同道合，就能成为同志，花百万黄金也买不到的友情，有时只用一口锅巴水或一颗烧土豆就能获得的道理，就在这里；你爸爸既不是有钱人，也不是有权势的人，但有很多好朋友；如果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财富的话，那么，可以说你爸爸拥有财富中的最大财富；只要是为了同志，你爸爸从没吝惜过一切，正因为这样，同志们

也都豁出性命保护你爸爸；我所以能够战胜千辛万苦，献身于光复运动直至今天，就是因为同志们给了我无私的帮助。……

父亲躺在病床上说，他最怀念的是同志们，并且一再地嘱咐我要结交大量的好同志。

“只有肯为同志牺牲自己的人，才能得到好同志。”

当年父亲讲给我的这些话，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几个月来，我的母亲废寝忘食，精心护理同病魔搏斗的父亲。她的至诚，是天下任何人都不可企及，不可替代的。然而她的超人的至诚也未能挽救我父亲的生命。

1926年6月5日，我的父亲在离乡几千里的异国他乡的矮檐陋室里，含着亡国恨，与世长辞。

“我们在辞别故乡时说过，争取独立之后一同回去，可是看来我不能回去了。国家独立后，你带着成柱回去吧。我壮志未酬，便要离世，实在放不下心啊。我把成柱托给你。我本想供成柱念完中学的，可是看来不可能了。如果你能做到，即使喝粥，也一定要设法供成柱念完中学呀。至于他的弟弟们，就要看成柱了。”

那天，父亲对我母亲讲的遗嘱是这样开头的。父亲把自己经常带在身上的两支手枪拿出来交给我的母亲，嘱咐说：

“这两支枪，我死后若被发现，会出麻烦，你把它埋藏在地里，等成柱长大走上了斗争道路，再起出来交给他。”

父亲接着对我们三兄弟作了最后的教导：

“我没有达到目的就要走了。可是我相信你们。你们始终不要忘

记你们的身体是属于国家和民族的。你们就是粉身碎骨，也一定要光复祖国。”

我放声恸哭。父亲的逝世，让我埋在心中的亡国的悲愤一下子爆发了。

我的父亲，为了祖国，一辈子忍受切肤削骨之苦，直至逝世。他屡遭酷刑，身受冻伤，以致酿成不治之症，但他毫不屈服，挺身深入民众，走访同志。他筋疲力竭，饥肠辘辘时，宁愿折根树枝当拐棍，抓一把雪当饭吞，也不回头，不犹豫，径直前进。

我的父亲，在他的一生中从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党派，从没有追求任何权势，一心一意为光复祖国，为劳动人民的幸福，献身奋斗。他在生活上一无所求，一清如水。偶尔有了钱，很想给孩子们买一块糖吃，也忍着把钱一分一分地积攒下来，买一架风琴赠给学校。他一向先公后私，在想到自己以前先为同胞着想，想到家庭以前先为祖国着想，全心全意，为光复祖国，顶风冒雨，奔走不息。他作为一个人，过得廉洁，作为革命家，过得清白。

我从没有听到父亲谈过家庭生活。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我从父亲那里承继了很多财富，但是在物质和金钱方面，我是一无承继的。今天陈列在我旧居里的农具和家具，都是我祖父留下的，没有一件是我父亲留下的。

“志远”的思想、三大思想准备、争取同志的思想、两支手枪，这便是父亲留给我的全部遗产。这是要我忍受极大痛苦，作出极大牺牲的遗产。对我来说，这是再宝贵不过的遗产。

我父亲的葬礼，是社会葬。出殡的那一天，小南门街人山人海。从南北满洲各地、间岛和国内，一向跟随我父亲，仰慕我父亲的同志、朋友、弟子和昔日的病人接踵而至，不计其数。抚松县长也带着金箔香纸，前来在我父亲的灵前烧香叩头，流着眼泪吊唁。

我父亲的墓地设在离小南门街有十里地的头道松花江边的阳地村。这是我父亲生前常来常往的地方。父亲常常同这里的乡亲叙谈，给他们看病，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我想，我的父亲在阴间也会愿意同他生前相处如一家的人们在一起的。

这天，从小南门街到阳地村的十里路，哭声不绝，泪流成河。独立运动者们抬着灵柩还放声恸哭。

抚松地方的朝鲜妇女，从出殡之日就在头发上扎一根白布条，表示哀悼有15天之久。

我就这样失去了父亲。在一个瞬间，我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导师，失去了领导人。对我来说，父亲是给了我以生命的至亲骨肉，同时又是从我小时候起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和领导人。父亲的逝世，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无可弥补的损失，使我心若旷野，空无一物。

我有时只身走到江边，遥望着祖国的天空，情不自禁地悲泣流泪。

回想起来，父亲对我的感情是格外深厚的。从我刚刚开始懂事的时候起，父亲就认真直率地给我讲国家和民族的将来命运。无比的严厉，无限的深挚，这就是我父亲的爱。从此，父亲的这种爱和引导，我再也得不到也期望不到了。

扶我从悲叹的泪海中站起来的，是父亲留给我的不同一般的遗产——“志远”、三大思想准备、争取同志和两支手枪。

在那还茫无头绪，不知所措和暗淡渺茫的悲哀中，我从父亲的遗产中获得了力量，开始摸出了我应走的道路。

第二章

难忘的桦甸

一　华成义塾
二　幻 灭
三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
四　向往新的活动舞台
五　独立军的女杰李宽麟

时期　1926.7～1926.12

一　华成义塾

葬礼结束后，父亲的朋友们在抚松住了几天，商量了我的前途问题。

我带着他们的保证书和介绍信离开抚松，是在1926年6月中旬。

当时正是我国发生六·一〇示威斗争之后不久。六·一〇示威斗争，是由在三·一人民起义后新近登上民族解放斗争舞台的共产主义者发动的群众性反日示威斗争。

在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由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方面，三·一人民起义起到了转折点的作用，这是世人共知的事实。先觉们通过三·一人民起义痛切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再也不能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了。在他们中间向往新思潮的趋势迅速高涨，依靠他们的活动，马克思列宁主义迅速地传播开来。

发生了三·一人民起义的第二年，汉城出现了称为劳动共济会的工人组织，紧接着陆续出现了农民组织、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群众组织。

在这些组织的领导下，从本世纪20年代初起蓬勃开展了维护无产群众的权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群众斗争。1921年，釜山的码头工人举行了总罢工。从那以后，在汉城、平壤、仁川等工业中

心和其他许多地方接连发生了工人罢工。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农民反对日本人地主和朝鲜人恶霸地主的佃农斗争席卷了载宁那茂里平原和岩泰岛，青年学生反对殖民奴化教育、要求学园自由的同盟罢课此起彼伏。

日本帝国主义者用“文化统治”的画皮掩盖“武断统治”的刀枪，把几个亲日派收进“中枢院”，他们一面用这种方法假装鼓励朝鲜人参与政治，一面在“畅达民意”的幌子下，允许用朝鲜文字出版几种报刊，然后大肆宣扬什么福祉时代到来了。但是，我们民族没有受他们的骗，而继续进行了反对侵略者的斗争。

工人运动等群众运动的发展趋势，要求有一个统一领导这些群众运动的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量；反映这一历史要求，于1925年4月在汉城成立了朝鲜共产党。当时，在欧洲许多国家也出现了工人阶级的政党。

朝鲜共产党由于没有切合实际的指导思想、队伍没有得到统一、未能深深扎根于群众中等根本性的局限性，未能充分起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用。但它的成立，是说明新旧思潮的交替和民族解放斗争的质的变化的有意义的事件，它推动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等群众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共产主义者们为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新的反日示威作了准备。

正在这时，李氏王朝的最后一代王纯宗去世了。他的死亡大大激起了朝鲜民族的反日情绪。朝鲜人听到这个讣告，都穿上丧服，不论男女老少个个放声大哭。亡国后，纯宗还作为末代王象征着李氏王朝，

而现在连这个象征也不存在了，因此，积蓄胸中的亡国悲愤爆发为痛哭。学生们奏着乐唱的歌使群众更加悲伤。

别了，昌德宫，
愿你永存不衰！
我要去北邙山，
那冷清寂寞的地方。
这一去，
何时能再来？
两千万白衣同胞哟，
愿你无限繁荣！

这一痛哭声，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像炸弹爆炸一样的冲击。

无论什么地方，一发现朝鲜人聚在一起痛哭，日本骑警队就立刻出动，用刀枪和棍棒野蛮地驱散。连小学生也遭到无情的棍棒殴打。他们是要朝鲜人亡国了也不要悲伤，国王死了也不许哭，不许张嘴说话。这就是把“武断统治”换成“文化统治”的总督政治的真面目。

敌人惨无人道的镇压暴行，等于火上浇油更加激起了我国人民激昂的反日情绪。

共产主义者们计划利用人民群众的反日气势，在纯宗葬礼那天举行全国性的反日示威斗争，秘密进行准备工作。

可是，混进示威斗争筹备委员会的宗派分子竟然向日本帝国主义

泄漏了这一秘密。因此，反日示威的准备遭到了残酷镇压。

但是，爱国人民并没有停止示威斗争的准备。

6月10日，纯宗的灵柩经过钟路时，数万名汉城市民高呼“朝鲜独立万岁!”、“日本军队滚出去!”、“朝鲜独立运动者们团结起来!”等口号,举行了群众性的示威。“文化统治”七年来积蓄胸中的怨恨和郁忿，终于爆发成“独立万岁”的喊声。

连12岁左右的普通学校的学生也列队参加了示威游行。示威群众同全副武装的敌军警展开激烈的搏斗，进行了勇敢的斗争。

六·一〇独立万岁示威斗争，由于宗派分子的破坏活动，没能经得住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镇压而失败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事大思想，是使三·一人民起义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而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宗派行为，则是葬送了六·一〇独立万岁示威斗争的基本祸根。在领导这一斗争中，火曜派站在自己一派的立场上进行了组织工作，而汉城派则与此相对立，进行了破坏活动。

以六·一〇独立万岁示威斗争为发端，朝鲜共产党领导班子的主要人物大部分都被逮捕。

通过六·一〇独立万岁事件，“文化统治”的欺骗性和狡猾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这一运动，我国人民显示了无论遇到任何逆境都一定要光复祖国、保持民族尊严的不屈的意志和斗争气概。

假如共产主义者们丢掉派别观念，统一地组织和指挥这一斗争，那么，六·一〇独立万岁运动就会扩大和发展成为全民族的斗争，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以更大的打击。

六·一〇独立万岁运动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不克服宗派，就不能取得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

当时,我按自己的想法对六·一〇独立万岁运动的结果作过分析。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一斗争的组织者们为什么照样沿用了三·一运动当时的和平方法。

养兵千日，用兵一朝，要想发动群众参加一场斗争，就要对群众进行充分的教育，并把他们组织起来，给予很好的训练。

可是，组织和领导了六·一〇独立万岁运动的人们，却在没有事先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使数万名赤手空拳的群众冲向持枪的军警,其结果就不能不是悲惨的。

一想到每次发动反日运动都要付出无数牺牲并遭到失败，我就气得连觉都睡不着。这种失败使我热血沸腾，更加坚定了我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的意志。

我怀着这种思想和激情，决心有意义地过好华成义塾时代，以不辜负父亲的遗训、母亲的愿望和民众的期望。

华成义塾是以培养独立军干部为目的而于1925年初建立的，是正义府属下的二年制军事政治学校。

独立运动者和爱国启蒙活动家们认为，民族复兴的出路在于培养实力，便在建立一般学校的同时，还积极努力建立以培养军事人材为目的的武官学校。在他们的努力下，在满洲各地建立了新兴讲习所（柳河县）、十里坪士官学校（汪清县）、小沙河训练所（安图县）、华成义塾（桦甸县）等许多武官学校。

在设立武官学校的活动中，梁起铎、李始荣、吴东振、李范奭、金奎植、金佐镇等独立运动的重要人物起了中心作用。

华成义塾的招生对象是正义府下属中队中选拔的现役军人。上面往下分配招生人数，下面就从中队选拔优秀青年保送。他们学完二年的课程，就按成绩授予新的职位派回原中队。除独立军外，由个别人士介绍入学的青年也有，但很少。所以，有志的年轻人心里都想上这个学校。

现在，我在华成义塾时的同学已几乎没有了，我已不能和他们一起回忆当年了。

父亲生前，我没有怎么为自己的前途问题和家庭生计操心。可是，父亲逝世后，对我的前途问题、家计方面的各种复杂问题，我自然也就不能不关心了。

即使是在由于父亲的逝世给我带来悲伤和苦恼而处于茫然自失状态时，我也仍然抱着千方百计继承父亲的遗志，把一生献给独立运动的心愿，抱着只要情况允许，即使给母亲增加些负担也一定要升学的抱负，对自己的前途问题深思熟虑了。

父亲临终留下遗言说，要送我念中学。但我家的情况，使我虽然很想升学，但不好开口说。如果我升学，就要由母亲单独一人承担交学费这一沉重负担，可是靠母亲给人洗衣、做针线得到的微不足道的收入，是无法维持贫寒的家计和每月为我交学费的。

父亲一去世，当助手的亨权叔也就立即失去了职业。父亲留下的药房也没有多少药了。

正在这样的时候，父亲的朋友们劝我上华成义塾。父亲临终给母亲留下的遗言中有我的升学问题。当我升学时，要给父亲的朋友们写信，取得他们的帮助，这是父亲对母亲和叔叔的最后嘱托。

母亲遵照这一嘱托，给许多人写了信。在没有人情相助就连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刻薄的世道上，母亲虽然觉得不好意思，但也只好这样做了。这样，我的前途问题就不能不在父亲的葬礼结束后成为留在抚松的独立运动者们的一个议题了。

吴东振对我说，已经给崔东昨先生寄去了介绍信，你就到华成义塾去吧，到华成义塾去学军事，会符合你的抱负；光在口头上说，是不能争取独立的，这不是你父亲的意志吗？你毕业后的前途问题，由我们来负责照料，你就到义塾去努力学习吧。

看来，父亲的朋友们是想把我培养成将来接他们班的后备人材的。独立军领导人们对培养后备人材予以关注，重视培养人材，是很好的事情。

我愉快地接受了吴东振的建议。独立运动者们那么体贴地为我的前途操心，这种真诚心意使我真心感谢。他们要把我保送到武官学校去、培养成独立运动人材的意图，同我要把一生献给祖国解放事业的意愿也是相符合的。只有通过军事较量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只有懂军事才能站到独立运动的前列，这就是当时我的看法。这回能实现这一愿望的途径展现在眼前了。

我把华成义塾看作是走向反日独立斗争舞台的捷径，抱着轻松的心情加紧作去桦甸的准备。

外国的某政客曾问过我，主席，您是共产主义者，怎么入了民族主义者办的军事学校了呢？我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

我入华成义塾是在我还没有开始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我的世界观还没有达到把马列主义完全作为自己的信念的那种成熟阶段。到那时为止，如果说我学过关于共产主义的知识，那也不过是在抚松读过《社会主义大义》和《列宁的生平》等小册子，不过是据风闻得知实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兴苏联的发展面貌，便无限憧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而已。

我的周围民族主义者比共产主义者更多；我每次在不同地方念过的许多学校的老师们，鼓吹民族主义思想的要比鼓吹共产主义思想的多。我们处在命运注定要被新思潮所取代的、但不可无视其影响力的、具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民族主义的包围之中。

义塾有很多英俊有为的青年，它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又不收学费，这使我下定了到桦甸去的决心。当年，我抱着没有能力交学费也一定要升学的愿望和要继承父亲的遗志走光复祖国的道路的抱负，因此，对于我来说，不能设想比这更好的教育环境和条件。

老实说，当时我对华成义塾的教育抱着很大的期待。我抱着满意的心情想着，接受两年的义塾教育，就不仅能学完中学课程，还能多学一门军事。

可是真地离开家门上了路，就情不自禁地一步一回头了。回头望望埋有父亲遗骨的阳地村，望望远远地送我远行的母亲和弟弟，不由得心情散乱，脚步也觉得沉重了。

想到母亲带着年幼的弟弟们受苦，我实在放心不下。在像抚松那样的小城市，母亲要靠自己一人的力量维持家庭生活，这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是不容易的。

上路的人不要回头看，我反复咀嚼着母亲这段话，定了定心。

从抚松到桦甸，旱路有300里左右。有钱人可以坐有篷的翰林车不费力地往来，可是我盘费不充足，不可能享受那种福。

桦甸坐落在离松花江和辉发河汇合处五六十里地的地方，是吉林省管辖的一座山城，在南满还是数得着的独立运动中心之一。

当我上路时，抚松的一位独立运动者担心地对我说，华成义塾很穷，你会受苦的。独立军的经济情况都很困难，所以华成义塾的食宿条件也不会太好，可是对我来说，这种困难是不成问题的。我是从小就穿粗布衣，吃稀粥长大的，我心想，华成义塾再穷，也不会比万景台我的家更穷吧。

我心里稍感不安的是：我年纪小，又没有军人经历，华成义塾会怎样对待我。不过，桦甸有金时雨，华成义塾又有父亲的朋友康济河等人，这使我心里有了依靠。

我一到桦甸首先就按照母亲的吩咐去找金时雨。他是正义府所属桦甸总管所的总管。总管所是一个为辖区朝鲜人的生活提供方便的自治性机构。抚松、磐石、宽甸、旺清门、三源浦等地也有这样的总管所。

金时雨是住在慈城郡的时候就和我父亲有联系的独立运动者。三·一人民起义后，他在中国临江、丹东一带活动，于1924年迁移到

桦甸。他在桦甸城里开办了一所碾米厂，一面筹措独立运动资金，一面致力于群众启蒙活动。

南大街的永丰碾米厂，就是他办的。他一面执行总管职务，一面经营这所碾米厂，用挣来的钱给独立军提供口粮，还从财政上支援华成义塾和附近的朝鲜人模范小学。

我在临江的时候就很钦佩金总管的北方人的豪放气质和刚直性情，非常喜欢他，尊敬他。金总管也像对待自己的亲儿子或侄子那样真诚地体贴我。

金时雨夫妻正在院子里收拾鸡窝，看到我来了，就发出欢快声，高兴地迎接我。他们家院子里鸡很多，几乎每迈一步都要碰上鸡。

我由金时雨引路去找华成义塾。

金时雨披上散发着碾米业者特有的米糠味的衣服，把我带到华成义塾。

华成义塾坐落在辉发河畔。透过刺榆林可以看见满洲各地到处可见的坡度大的草屋顶和青砖砌的黑糊糊的墙。校舍后面，隔着操场坐落着宿舍。

校舍和宿舍都比我想象的简陋得多。可是，校舍简陋些又算得了什么呢？虽然校舍简陋，只要能学到很多好东西就行。就这样我把惋惜之情压下去了。

操场还是宽阔平整的。

我迈着步子，怀着期待和好奇的心情注意地观察了华成义塾的全貌。

我想起了我家住在八道沟的时候，有一年在寒冷的冬天吴东振皮帽子也没戴，到我们家来跟我父亲商量建立华成义塾的问题。

我作为新生来到这个义塾观看校舍，心情十分激动，不能平静。

中年的塾长在他的房间里迎接了我，他就是义山崔东旿先生。他身材短小，前额宽广，给人以良好的印象。

义山先生是世称33人的三·一人民起义主导人之一的天道教三世教主孙秉熙的门生。他从孙秉熙办的讲习所毕业后回到家乡义州开私塾，教育天道教徒的子弟，以此开始了独立运动。他也参加过三·一运动，后来流亡中国，建立了天道教宗理院，在流亡同胞中开展爱国的传教活动。

塾长说，他没能参加我父亲的葬礼，是平生的遗憾，表示非常痛心。他和总管回忆我父亲，谈了很长时间。

那天崔东旿先生对我所作的训诫，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成柱来我们义塾，正是时候。独立运动迎来了需要英才的新时期。洪范图、柳麟锡式的蛮干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要战胜日本鬼子的新式战法和新式武装，就需要有我们自己的新式战法和新式武装。这个问题要由谁来解决呢？正应该由像成柱这样的新一代来负责解决呀！……”

塾长先生另外还说了很多足以为训的话。他再三强调说食宿条件不太好，并鼓励我，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要展望朝鲜独立的未来，忍受下来。最初的印象就使我觉得他是一位性情温和、具有惊人辩才的人。

那天，金时雨家张罗我吃晚饭。饭菜虽然简单，但可以看出主人夫妻的真诚，我跟属于父亲一代的人对坐在饭桌前，心里无限感慨。

圆饭桌一角还放着一瓶米酒。我以为金时雨为了饭前喝一杯而拿出来的，可是没想到他斟了一杯递给我。

这太使我不好意思了，我急忙摇了摇双手。我生来第一次受到大人的待遇，使我手足无措。父亲葬礼时，张哲镐看到我太悲伤了，就敬我一杯酒，但这不过是我作为丧主受到的待遇而已。

可是，金时雨却完全把我当作大人来对待。他对我说话把阶称也提高了一级。

“听说你要来，我就更想念你父亲啦。所以我叫老伴准备了一瓶酒。你父亲来桦甸，每次都在这饭桌上喝我敬的酒。今天，你就替你父亲接这杯酒吧。从现在起，你不就是家长了吗？”

总管这样说着，亲热地向我伸出了酒杯，可是我无法轻易接过那酒杯。虽然是不足一握的小小酒杯，但是它有着无法估量的分量。

在金时雨把我当作成人对待的席上，我感觉到了应当为祖国和民族像大人那样处事的严肃使命感。

他把自己的寝室兼书房的屋子腾给了我。他斩钉截铁地说，已和塾长先生说好了，不要住宿舍，就住在我家里。

他说，金亨稷先生临终前给我写信，嘱托我好好照顾你，所以我有义务遵守这一嘱托。

无论在抚松还是在桦甸，我父亲的朋友们都对我充满诚意。我想，他们是为了信守同我父亲的情义而这样做的。当时，就这种诚意和情

义，我想了很多。这一情义包含着父亲一代人希望新一代为祖国的独立而独当一面的殷切期望。这个期望，使我感到自己作为朝鲜的儿子、新的一代的重大责任。我下定决心，把父亲的遗训铭刻在心，搞好学习和训练，不辜负民众的期望。

从第二天起，我就在华成义塾开始了生疏的军官学校生活。崔东旿先生把我带到教室。学员们看到我，都觉得新奇，来了个小独立军。看来，他们好像把我看作在哪个中队跑过腿的孩子兵。

在40多名学员中，看不到一个像我这样年纪小的学员。大部分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人，其中还有长了黑茸茸的胡子的孩子他爹。都是些我的兄辈、叔辈的学员。

塾长一介绍，学员们一齐鼓起掌来。

我到老师指定的靠窗的前排桌位坐下来。

我旁边的学员叫朴且石，是从一中队来的。每次开始上课，他就把嘴贴在我耳边简短地告诉我，进教室的老师的经历和个性特点。

朴且石给我介绍的他最尊敬的教员是军事教官李雄。李雄是正义府的军事委员，据说他念过黄埔军官学校。当时，只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大家都认为是了不起的人物，推崇备至。他说，李雄的父亲在汉城经营一家大药房，父亲给他寄来很多人参吃，缺点是有点官僚气，可是他博学多闻，多才多艺，很受学员尊敬。

朴且石介绍说，华成义塾讲授朝鲜历史、朝鲜地理、生物、数学、体育、军事学、世界革命史等课，还找一块纸给我写了义塾的作息时间。

我同后来在进行武装斗争时给我心上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的朴且石的关系，就是这样结成的。后来他走上了邪路，可是在华成义塾的时候，他和我就像亲骨肉一样亲密无间。

那天下午，原属六中队的崔昌杰带着十多名同学到金时雨家来见我。看来，他们对我的初次印象很好。因为我年纪那么小就入了学，他们好像起了好奇心，想跟我交谈交谈。

崔昌杰头上有个很大的伤疤。宽宽的前额，浓黑的眉毛，真像个男子汉。身材高大魁梧，长得挺好看，要是头上没有伤疤，就可以被称为美男子。他的言谈举止有一种吸引人心的洒脱感。初见面，他就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听说成柱只有14岁，可是看起来比年纪早熟得多。你小小年纪怎么过独立军生活的，又怎么入了华成义塾？”

这是崔昌杰的第一个提问。他好像见了长期在一个屋顶下生活和建立了友情的十年知己一样，嘴边始终挂着微笑，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的脸。

我简单地照实回答了他想知道的问题。

一听说我是金亨稷的大儿子,他们就以惊喜和羡慕的目光看着我，更亲热地对待我，他们想知道我所体验的祖国的现实，从各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

稍后，我向崔昌杰问了他在独立军时的生活。

他首先谈了头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他掺和着笑话，谈得有声有色，真是一个诙谐的人。他说话的特点是总把自己放在第三人称的地

位上。本应该说“我这样做了”、“我受骗了”，可是他偏说“崔昌杰这样做了”、“崔昌杰受骗了”，引得对话对方不由得发笑。

“那是崔昌杰在梁世凤手下当兵时的事情。有一次押送在开原抓住的一个密探，途中在一个旅店歇脚，那懒散无比的崔昌杰竟然放着密探，打起盹儿来，走了几十里路累了嘛。那个密探就趁机解开绳索，用斧头在崔昌杰的头上敲了一下，溜之大吉了。幸亏那家伙没打中要害。崔昌杰头上的‘勋章’就有这么个令人寒心的历史哪。人要是精神松懈，就会像崔昌杰一样了。”

我跟他开怀畅谈一两个钟头，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我在青年时代结交了千百个朋友，可是像崔昌杰这样把自己放在第三人称的地位上说话说得有声有色的诙谐的人，还是头一次见到。

后来，通过生活，我更具体地了解到他的经历。他的父亲在抚顺开了一家小小的旅馆。他希望儿子帮他经营旅馆，可是崔昌杰却说要争取祖国独立，离家参加了军队。他在独立军的时候，他的祖母多次去三源浦，想让孙子回心转意，可是，崔昌杰每次都没有答应，他对祖母说，国家都亡了，怎么能守着自家旅馆不动呢。

除了崔昌杰、金利甲、桂永春、李济宇、朴根源、康炳善、金园宇外，我还认识了许多立志参加反日运动从南满和国内各地来到华成义塾的青年。

每天一到下午，他们就来金时雨家找我谈话。那么多的朋友都来找我，我又感激，又惊奇。就这样，我从开始就同比我大5～10岁以上的年长者结交了。这就是我在青年学生运动和地下革命活动时期的战

友中有很多年长者的原因。

我在华成义塾读书的头几天就了解到，义塾的经济状况比抚松的独立运动者说的更为艰难。在华成义塾，可以算作财产的，只有旧桌椅和几件体育器材。

但是我的抱负仍然远大。虽然校舍狭窄，黑乎乎的破陋不堪，但在这腐朽的草屋顶下成长的青年们多么可靠啊!华成义塾虽然没有钱，但拥有许多英俊有为的青年，在这一点上，它可以说是富翁了。

这比什么都使我高兴。

二　幻　灭

我很快就熟悉了华成义塾的生活。学了两周，觉得功课也不怎么难。

义塾的学员最感头痛的科目是数学。有一天上数学课，老师出了一道较长的四则题，先被叫到的几个学员都没能解答，可是我并不费力地解答了。他们都表示惊叹。这也难怪，他们在独立军里生活，多年脱离正规教育了嘛。

从那以后，我为数学课，着实受了折磨。不愿动脑筋的胡子青年们作数学作业，每次都来缠我。

也许可以说是其代价吧，他们给我谈了自己的各种体验。其中很多是值得一听的。

在进行体力负担大的军事训练时，他们也为了帮助我，从各方面尽了心意。

在这过程中，我们就成了肝胆相照的亲密朋友。我本想，作为一个最小的新生不给年纪大的同学添麻烦就算万幸了。可是无论在学习上或训练上，我都不落于他人之后。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分你我，善于和同学们打成一片，所以他们也不顾年龄的差距，都跟我亲近了。

这样，我所处的环境还可以说是很好的。

可是，过不多久，华成义塾的教育逐渐不合我的意了。虽然是父亲的朋友建立的学校，又是同父亲有过联系的人主管的学校，但从这里我发现了前一代人留下的思想和方法的残迹。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在义塾的教育中没有那种综合并批判地分析总结这一运动的理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领导民族主义运动已有几十年，可是他们连可以成为这一运动的指针和教训的论文和教科书也没有很好地写出来。来到华成义塾的独立军重要人物和爱国志士们也只是徒然地敲打讲台，空喊独立。怎样组织革命力量，怎样动员群众，如何实现独立运动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他们却没有方法，有关武装斗争的条令和战术也不完善。朝鲜历史课是以王朝史为主的，世界革命史主要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史。

华成义塾教的是民族主义思想和旧韩国味浓厚的旧式军事操练。

深深沾染了民族主义思想的老师们，虽然在口头上大谈反日和民族解放，但他们主张的斗争方法是落后的。学校当局常常邀请有战斗经验的独立军队员来给我们讲他们的武功。通过这一活动鼓吹的是安重根、张仁焕、姜宇奎、李在明、罗锡畴等烈士们所用过的个人恐怖方法。

学员们常常表示不满说：说是培养独立军干部的军官学校，却连实弹射击用的子弹都没有，总是拿着木枪进行训练，这样怎么能赶走日本鬼子呢。

有一次，有个学员问军事教官，什么时候我们也能用上新式枪呢？教官显得非常为难，支支吾吾地说，现在独立军干部们正在为筹措军费来向美国、法国等国家购买武器而进行着积极的活动，所以很快就

会得到解决。连几支枪都弄不到，而寄希望于几万里外的西欧国家。

每当上军事训练课腿上拴着砂袋跑的时候，我总是想，这样搞能打败日本鬼子吗？

过去，全琫准的成千上万名东学军在牛金峙抵挡不住1 000名日军而溃散。当时，日本军是用新式枪武装起来的。东学军在人数上处于优势，只要每100个东学军消灭一个敌人，就能攻克公州，一直冲到汉城。可是因为武器恶劣、军威不振，而遭到了惨败。

义兵的武装也不比东学军好多少。义兵们也曾有若干新式枪，但数量有限，而大部分成员都使用刀枪或火绳枪。我想，历史家们把义兵斗争说成是火绳枪同三八式步枪的较量，也是由此而来的。要用每打一枪都要用手点火的火绳枪来对付每分钟可打10发以上的三八式步枪，该需要体验多少悲惨和痛苦，作多么艰苦的战斗，是不难想象的。

当火绳枪的性能还是秘密、只有义兵知道的时候，日本军队听到火绳枪的枪声就吓得逃跑，可是他们知道了火绳枪的性能之后，就不仅不怕它，而且藐视它了，这个战斗的结果会怎么样呢？据说，通晓两班道德和戒律的儒生出身的义兵们，在战场上还戴着大冠、穿着绊手绊脚的道袍打仗。

日本军队用大炮和机关枪屠戮这些义兵。

现在日本的兵力比那时又强大得无法相比了，可我们却搞腿上拴着砂袋跑的训练，这样难道能打败系列式地生产坦克、大炮、军舰、飞机等现代化武器和重型装备的帝国主义的强大军队吗？

最使我失望的是华成义塾的落后思想。

学校当局一意孤行地走民族主义的道路，而排斥其他一切思想，所以，学员们自然也就追随这个潮流了。

华成义塾里还有迷恋于王朝政治或对美国式民主抱有幻想的青年。

这种倾向，在世界革命史课的课堂讨论中表现得尤为严重。老师指名发言的学员们照本宣科地重复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冗长地谈资本主义的发展。

他们的这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使我非常不满。华成义塾的政治课根本没有考察朝鲜独立和朝鲜民众这一活生生的现实。只是机械地讲授教科书和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并让学员背诵。

我认为讨论要就实践问题、有关朝鲜的未来问题进行才对，便问刚才发言的学员，我国独立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

那个学员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说，我们民族之所以被日本鬼子霸占了祖国，是因为别的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我国封建统治者们却在吟风弄月，虚度光阴；为了不使这种历史重演，也应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

有的学员主张，应当重建封建王朝。

没有一个学员主张应当建立民主社会，或建立劳动人民做主人的社会。当时是民族解放运动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可是他们好像根本不考虑这种时代潮流。

还有些学员则袖手坐在那里说，独立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到那时候再说，现在还没有独立，谈论什么资本主义还是王朝复辟，是无聊的。

我听着这些发言，更痛切地感到华成义塾实施的民族主义教育是落后于时代的。要复辟封建王朝也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好，都是落后于时代的想法，想到这里，我心里难受得很。

我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说，我国不能像欧洲国家那样搞资产阶级革命，但也不能恢复陈腐的封建统治机构。我接着说：

资本主义也好，封建社会也好，都是有钱人剥削劳动群众、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的社会。独立后，不能在朝鲜建立这样的不公正的社会；光看机械文明的发展，而不去看资本主义的毛病，是错误的；要复辟封建王朝的主张，也是毫无道理的。有谁还会迷恋于把国家出卖给外来势力的王朝政治呢？国王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呢？除了对百姓敲骨吸髓，对敢于直言不讳的忠臣砍头、流放之外，还有什么呢？

实现了朝鲜的独立后，我们应当在祖国土地上建立起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让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过上幸福生活的那种社会。……

很多学员对我的主张表示同感。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万民平等的富强社会，还有谁会反对呢！

下课后，崔昌杰也紧紧握住我的手，支持我说，你作了很好的发言。他显得心里很痛快，他说，你没说出一个共产主义这个字眼，却很巧妙地灌输了共产主义思想。

华成义塾的局限性，如实地说明了民族主义运动本身的局限性。我通过华成义塾看到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全貌。

到了这个时期，独立军也委靡不振，一味争夺势力。20年代前半期还常常在国内和鸭绿江沿岸进行实际的军事活动，现在已几乎不再

进行这种军事活动了，只是在辖区内到处转游，征集军费。

曾自称“代表朝鲜民族的全国性政府”的临时政府人士，分成了“自治派”、“独立派”等派别，激烈地争夺权柄。临时政府的头领频频更换，也是因为这个。有时甚至在一年中改换两次内阁。

临时政府的要员们不从曾在巴黎和会上由于美国等协约国代表的恶毒阻挠活动，《朝鲜独立请愿书》未能列入会议议程的事实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却损害民族的尊严，继续进行卑鄙的“请愿”活动。

当“美国国会议员东洋视察团”经上海到汉城时，甚至还指使在国内的亲美事大主义者向美国国会议员赠送人参、银制品等各种昂贵的物品。

这样的临时政府也由于财政困难，到了20年代中叶就连招牌也很难维持，最后就只好依赖于蒋介石的重庆政府，苟延残喘。

政治上动摇性大的资产阶级出身的民族运动领导人当中，有不少人被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吓破了胆，向敌人投降，变节了。他们从“爱国志士”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民族改良主义者，走上了阻挠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

日本帝国主义标榜“文化统治”，说什么朝鲜人如果希望国家独立，就不要在政治上反对日本的统治，而要同它合作，努力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获得自治权，提高文化，发展经济，改良民族性。

和盘接受了这一说教的正是资产阶级出身的民族运动领导人。他们披上“民族改良”、“培养实力”的外衣，叫嚷什么教育和产业的“振兴”、个人的“自我修养”、“阶级合作”、“大同团结”和“民族自治”。

这种改良主义的歪风也刮进了华成义塾。

金时雨家的上屋经常有很多青年来找我谈政治问题，挺热闹。当时正是我热心读金时雨书房里的马列主义书的时候，所以话题就自然倾向于政治问题了。

我在抚松时也读过《列宁的生平》、《社会主义大义》等几本书，可是到了桦甸就读了更多的书。从前是只停留在了解书的内容上，可是到华成义塾以后，读书时就经常把经典著作中的革命原理同朝鲜的现实结合起来考虑了。在朝鲜革命的实践问题上，我想知道的不只一两件。

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可是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在光复祖国的斗争中，应该把哪些人规定为敌人，同哪些阶级携起手来呢？国家独立后，应该经过哪种途径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解答，拿起书来，就顽强地读下去，直到出现类似的问题为止。特别是遇到有关殖民地问题的论述，就反复读10遍20遍。因此，同学们来找我，也就有很多话题了。

我们谈得最多的是有关新思潮和苏联的事情。听这种话的时候，学员们各自都想象着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世界，久久不想离开。他们说，这比主张复辟王朝、资本主义、民族改良的理论有意思得多。那些得过且过的学员们也逐渐产生了对新事物的向往。

但在学校里是不能随便谈关于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故事的，因为学校当局禁止。

在我的心里对华成义塾的期望开始淡薄了。

三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

落后于时代的华成义塾，使我产生了不能再沿袭旧方式的想法。我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单凭几支步枪和人数不多的武装团，渡过鸭绿江去杀死几个日寇警察，募集一点军款，用这种斗争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祖国独立的。

我下定了要用新的方法开拓光复祖国的道路的决心。在必须走新的道路这一点上，我的朋友们也都有共同的看法。

然而持有这种看法的同学却没有几个。大多数同学还不能痛快地接受新的思想，有的采取戒备的态度，有的加以排斥。

华成义塾不准学生随便阅读共产主义书籍。

当我上学带上《共产党宣言》时，有的同学就来捅捅我的腰，悄悄地告诉我这样的书要在家里看。学校当局最为戒备和警惕的是赤色书籍，他们威胁说，如有违禁者，根据其情节轻重甚至可以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

而我却说，怕学校管制，连想看的书也不看，怎么能做大事？并主张只要认为是讲真理的书，即使被开除也要看。

《共产党宣言》是从金时雨家的书斋里带来的。他家里有很多共产主义书籍。可以说，金时雨的书斋反映了当时民族解放运动从民族

主义运动转到共产主义运动的时代面貌和金时雨要追随这种时代趋势的立场。

华成义塾当局不准看这种书，当然引起了我的不满。义塾的戒律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了我们为新思想所陶醉而愿意深入研究的积极热情。我无视当局的要求，继续热心研读共产主义书籍。当时，愿意读这种书的学生急剧增加，借书的人多到几乎要排队等候了。因此，我们定出借书顺序和阅读时间，要求读后按时还书。信仰新思潮的学友之间隐然相约成规的这个读书纪律，大多数青年都遵守得很好。只有愣头青桂永春常常违反这一纪律，不大遵守读书时间，选择读书场所也不谨慎。有一次他一个人把《共产党宣言》揣了十多天。我们叫他快让给别的同学看，他却要求再看两天，说有几处需要摘录。

第二天，桂永春偷偷溜出宿舍，没有上学。上午课结束，到了午饭时间，他也不露面。我们在辉发河畔的草丛里找到了他，看见他趴在草地上聚精会神地在读那本书。

我小声地对他说，醉心于读书是好事情，但不要旷课，还要注意选好读书的时间和地点。

他答应以后要多加注意，但是第二天上历史课的时候，他又偷看这本书，结果被老师发现，书也被没收了。书被送到塾长先生手里，惹出了大祸。

学校当局查明这本书是我从金时雨的书斋里借来的，便派历史教师找我和总管大闹了一场。

这位老师对金时雨说，身为总管，应对华成义塾的工作多给予帮

助，然而你看到学生读左翼书籍也不加阻拦，这事做得可不像个总管，今后要好好管束学生，不让他们再读这类书。他还威胁我说，成柱也要多加注意。

我对学校当局的这种做法，不能不表示愤慨。

“一个人要具有高尚的人格，不是应当吸取多方面的知识吗？我们是正应当吸取新事物的青年，学校当局为什么要剥夺我们研究世界公认的先进思想的权利呢？现在连普通书店里也都出售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凡是识字的人都看这些书，唯独华成义塾不准看，这是为什么呢？我真无法理解。”

我向金时雨这样吐露了对华成义塾的不满。

金时雨长叹了一声，才坦白地说，这是正义府的措施，是学校当局的方针，凭自己的力量，是无可奈何的。

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标准是他的思想，同样，衡量教育的价值和学校的价值的标准也是思想。然而华成义塾当局却妄图用不符合时代趋势的陈旧思想来阻挡新的思潮。

通过这一事件，同学们知道了校内有一群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生。当局拿这一事件大肆叫嚷要开除学籍，严加处分，可是这种威胁反而带来了激发进步青年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好奇心和向往的结果。

自从发生了这一事件后，向我借左翼书籍的学生急剧地增加了。

我从这些青年中挑出我认为能与我们志同道合、生死与共的人，开始同他们一一交谈。

我父亲生前常说，要结交好朋友，多争取同志。我时刻记着父亲

的教诲：不管有多么正确崇高的目的，若没有能够同生共死的同志，就无法实现宏愿大志。

我接触了许多同学，其中有一中队来的同学李某。他聪明，成绩优异，性格和品德也都很好，颇受同学们的爱戴，然而奇怪的是他的思想却很保守。

在讲世界革命史的课堂上，他第一个提出了要恢复王朝的主张。

我同他是一种见了面只打一声招呼说一两句话的关系。但是从我们同朝鲜人模范小学的高等班同学们赛过一场足球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亲密，能够互诉衷情了。那天球赛时，他当前锋，不慎与对方运动员相撞，把腿撞伤了。

我就住到他的宿舍里，护理了他十多天。在这过程中，我们成了知心朋友。

他说，他在世界革命史课堂上提出要恢复王朝，是荒唐的；像成柱你说的那样，我们的国家独立后应当朝着劳动人民吃好穿好、过好日子的那种社会走，这才是对的。他还说，要是早日赶走日本鬼子，咱们也过上好日子，该多好啊！

我问他说，你认为，凭现在华成义塾教的军事操练，能打败日本鬼子吗？有些人说日本是世界五大强国之一，单靠那个没有一支像样的步枪的独立军，能战胜这个强敌吗？

他说，要同敌人打，就要锻炼身体，练好枪法，除此而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再说，不仿效长期搞独立运动的人的方式，还能有什么别的招数吗？

我对他说，不对，用那种方式是不能争得独立的。现在我们为探索新的方法，正在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共产主义思想进行诽谤和中伤，顽固的民族主义者排斥社会主义。我们这些工人农民的子弟只听有钱人说社会主义不好，就不去了解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盲目地跟着说共产主义不好，是不对的。要做一个真正的独立运动者和爱国者，就应当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似乎有所同感，沉思了一阵后，问我能不能给他借这样的书。

我答应等他伤好了一定借给他看，并鼓励他先把伤养好，早日恢复健康。

向往新思想的潮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击了华成义塾。除了追随民族主义的几个顽固的学生以外，绝大多数的学生都信仰先进思想。

我常常在进步的青年学生中组织发表读书心得的集会。这种集会有时在金时雨家举行，有时也在塾监康济河家和辉发河边举行。

在总管金时雨的书斋里集会时，他总是为我们费心，绝不让客人和家人进书斋。有时，他坐在土廊台上装做干什么杂活，为我们望风。每当这时候，我从他的默默无言的举动中感觉到了他的火热的情意和热情的支持。

我们把集会的场所定在康济河家，固然是因为他的儿子康炳善是我的好朋友，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本人是我父亲的朋友，思想倾向很好。

康济河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但他不排斥共产主义。我到他家去的时候，他还向我宣传共产主义。他说，我们已经老了，不行了，你们

不管用什么方法，即使用共产主义的方法，也一定要取得胜利。这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他家里还有不少共产主义书籍。

现在回顾起来，我觉得当时我们就朝鲜革命的实践问题进行的讨论，是相当有水平的。通过这种讨论，青年们统一了对朝鲜革命的看法和立场。

有一天，我们聚在金时雨家进行这种讨论时，那个曾得到我护理的李同学，拄着双拐杖来找我借那本书。他说，别的同学都在走新的道路，只他一个人躺在宿舍里，快要变成一个落后分子了，所以来找我。这样，他也跟我们走上了同一条道路。

对资本家来说，发财致富是他们特殊的乐趣，而对我来说，结交同志争取同志是最大的乐趣。拾到一块黄金时的高兴怎能同争取到一名同志时的喜悦相比呢？我争取同志的努力，就是这样在华成义塾开始迈出了第一步。从这个时候起，我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争取同志的事业。

当我的周围集结了许多好同志的时候，我开始苦苦地思索应当怎样把他们有组织地团结起来，大干一番事业。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大家。记得那是在9月末的一个集会上。

那天我好像对建立组织的必要性讲了很多。要解放祖国，建设劳苦民众过好日子的社会，就需要走艰险漫长的道路。只要我们壮大队伍，坚决顽强地浴血奋战，就能取得胜利。要建立一个组织，把群众团结在它的周围，提高他们的觉悟，依靠他们的力量去光复祖国。我大致讲了这样的话，大家都很高兴，要求尽快建立这样的组织。

我对他们说，要建立一个组织，就要再作一些准备，要更多地吸收能够与我们抱着同一条思想、共同奋斗的同志。

会上还确定了可以吸收到组织里来的培养对象，并作了分工，指定谁负责教育谁，等等。

然而，有几个同学却表示忧虑说：如果我们建立新的组织，不是会形成又一个派系吗？

我对他们说，我们要建立的组织是新型的革命组织，是与那些民族主义者和所谓共产主义者的派别截然不同的。它不是搞派别斗争的组织，而是搞革命的组织。我们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革命，斗争再斗争，我们会为此而感到满意的。……

我们经过一段筹备期，在当时中国的国庆“双十节”那天举行成立组织的预备会议，讨论了组织的名称、性质、斗争纲领和活动准则，一个星期后，即1926年10月17日，在金时雨家正式成立了组织。

会议是在没有讲坛的简陋的火炕上进行的，气氛十分肃穆，房间里充满了朝气和热情，当时的情景，时过6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历历在目，不能忘怀。

那天，同学们都很兴奋，我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站到成立组织的会场上，不知为什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已故的父亲，想起了朝鲜国民会。为了建立朝鲜国民会，我父亲多年来跋涉几万里路，集结了分散在各地的同志。国民会成立后，他为实现其宗旨，殚精竭虑，献出了一生，把未竟的事业留给了我们。

在实现父亲要我们即使粉身碎骨也一定要光复祖国的遗嘱的道路

上，我们终于取得了第一个成果。一想到这一点，我不禁心潮澎湃，热泪夺眶而出。

我们建立的这一组织的纲领，也包含着我父亲的思想。

那天，许多青年慷慨激昂地发了言，他们的面容如今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崔昌杰、金利甲、李济宇、康炳善、金园宇、朴根源……以及后来叛变了的李钟洛和朴且石，当时都发出了战斗的誓言：愿意为革命不惜献出自己的血和肉。

那天发言的人既有口才好的，也有不善于讲话的，但他们的发言都很好。我也发表了在当时是够长的一篇讲话。

我在会议上建议，要把我们建立的组织称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简称为“ㅌ・ㄷ”。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是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一代青年，在反帝、独立、自主的旗帜下，为实现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在历史的阵痛期中建立起来的纯洁的、新型的政治生命体。

我们虽以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的成立了这一同盟，但为了不致于使民族主义者怀疑我们的组织是一个极左的组织，才把组织的名称定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当时，我们就是如此重视同民族主义者的关系。

会上一致通过了要把组织的名称定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建议。

我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斗争纲领也一致通过了。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要打倒所有帝国主义的组织，因此它的口号也是十分豪壮的。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当前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朝鲜的解放和独立；最终目的是，在朝鲜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进而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建设共产主义。

为了实现这一纲领，我们还制定了活动方针。

会上给所有与会的青年发了油印的同盟章程。

会上，崔昌杰推荐我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负责人。

我们手拉着手，抱成一团，跑到辉发河畔，纵情地唱歌，也庄严地宣誓：在为祖国为民族的革命道路上，要同生死，共患难。

那天，我一夜没睡。因为过于激动和兴奋，根本无法入眠。老实说，那时候我们好像得到了全世界一样，沉浸在无限的激动和喜悦之中。那些亿万富翁坐在黄金堆上的喜悦，怎能比得上我们当时的喜悦啊！

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有许多亮出大牌子的组织。而我们的组织是刚成立的，规模也不能同那些组织相比，许多人还不知道世上有一个“打倒帝国主义同盟”这样的组织。

尽管如此，我们建立这个同盟后，都沉浸在狂欢的氛围中，这是因为我们感到自豪，因为我们建立的组织是与从前的组织截然不同的新型的共产主义革命组织。

这个同盟既不是从某一派系分离出来的，其成员也不是从某个宗派集团或亡命团体脱离出来的，他们都是像白纸一样清白纯洁的新一代。“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血液里没有任何杂质。

这个同盟的成员，一个个都是不可等闲视之的人物。作演说，写论文，作词作曲，唱歌跳舞，击拳舞刀，不管哪一项，让他们做什么

他们就能做什么，都是英气勃勃、精明能干的栋梁之材。用现代话来说，他们都是“以一当百”、“以一当千”的青年。正是这样的青年抱成一团要去开辟新的道路，其气势自然是直冲云霄的。

每当我们开拓的革命事业碰到困难时，“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员们一个个变成开路先锋，炸开了通路。他们作为朝鲜革命的核心部队，在所到之处都起到了先导作用。金赫、车光秀、崔昌杰、金利甲、康炳善、李济宇等“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许许多多成员，一直在斗争的最前列英勇奋战，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不过，也有个别与此相反的人。他们很好地迈出了第一步，但是在革命斗争愈益深入发展的时候，却背弃“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堕入了背叛的深渊。一想起这种人，我就不胜遗憾。

如今，在“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同我携手工作过的人，一个也不在了，憧憬着独立的祖国和无产大众的社会，不惜赴汤蹈火，进行了英勇战斗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许多儿女，没有看到美好的新社会，在青春正茂的华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们献出的青春奠定了我们党和革命的基础。

我们党的历史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看作是党的根基，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立视为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和朝鲜革命的新的出发点和渊源。从这个根基上产生了我们党的纲领，定出了我们党的建设和活动的原则，培育了创建我们党的骨干。自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建立以后，我国革命以自主性原则为基础迈出了新的步伐。

解放后，崔一泉（崔衡宇）在《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中，以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与金日成》为题，叙述了我们当年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和它的气概。

多年以后，当革命军成立，祖国光复会诞生并高呼两千万人民总动员起来的时候，当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像卫星一样团结在这个队伍周围的革命全盛期到来的时候，我都感慨万端地回忆起我们在桦甸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的日日夜夜。

四　向往新的活动舞台

华成义塾缺乏学校经费，遇到了很大困难。

义塾的学生还不到100名，但是，从当时独立军的情况来看，就连保障这些学生的给养也是不容易的。

主管义塾的正义府，无力提供足够的经费。正义府设有行政、军事和民事三个机构，用老百姓以一点一滴积下来的钱捐的军款勉强维持这个相当于一个国家机构的大框架，所以它不可能慷慨地提供义塾的经费。

华成义塾当局为了解决经费的困难，组织学生定期进行学校经费募捐工作。学生们以20名为一组，先回各自的中队去拿武器，然后走遍正义府管辖的地区，募集捐款。每期两个月，到期就同另一个组换班。

这样募集的捐款，没过几个月就用光了，所以又上吉林去向正义府伸手要钱。

有一次，崔东旿塾长为解决准备过冬的经费，派一名塾监到正义府总部去了。可是这位塾监空手回来，大骂三中队长是个大坏蛋，说他窃取准备给华成义塾的钱，全部为自己的婚礼花掉了。他挥霍无度，一连几天大摆酒席，请全村人来吃，没吃完，又请邻村的人来吃。

我听了，气愤不已。

正义府金库里的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老百姓为了光复祖国，省吃俭用，一点一滴地积攒下来，作为军费捐献的。我国人民，如果没有钱，就是打草鞋去卖几分钱，也一定要把军费交出来才安心。

看来，三中队长根本不把这些放在心里。他身为中队长，竟敢作出如此卑鄙的诈骗行为，可见他利令智昏到了何等程度。

负有手持武器与敌人展开血战使命的一个指挥官，竟如此肆无忌惮地进行贪污，这是一个说明独立军上层集团正在蜕化变质的证据。

“乙巳条约”后，有个义兵长听到崔益铉指挥的淳昌义兵败北的消息，集结几百名义兵，在全罗道一带开展了积极的活动。但当这个义兵长听到自己的部下有掳掠百姓财物的行为时，便大失所望，长叹不已，最后解散了部队，进山遁世隐居去了。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知道，这个义兵长把侵害百姓的行为当作多么大的耻辱和罪恶。

而三中队长的恶行，只能看作是侵害人民的罪行。

我在临江的时候，曾见过有几个独立军队员渡江到朝鲜去，抢来了农民的一头牛，受到人们非难的事。那几个队员所属部队的指挥官来到我家，受到了我父亲的严厉指责。

当时，独立军为募集军费，到他们管辖的朝鲜人居住区去的时候，那个居住区的负责人就给每一家摊派任务，指定哪一家出多少钱、哪一家交多少粮，居民就照此交钱出粮，以作军费。对贫苦农民来说，这是个很大的负担。

然而，独立军闭眼不看这种情况，想尽办法收取更多的钱。他们各自划定自己的管辖区，还拼命地扩大管辖范围。有的独立军部队，

甚至拦路抢劫友邻武装团成员募捐来的资金。

大小武装团成员都竞争式地搜刮人民的钱财。他们把老百姓看作是纯粹的纳税人，看作是供他们花钱、吃饭、住宿的侍从。

他们的这种行径，与过去封建社会的官僚是毫无二致的。

朝鲜的封建统治者头戴玉冠，高坐宫阙，专事炮制榨取人民血汗的新税法，残酷地盘剥老百姓。

封建政府建设景福宫花费了大量资金，他们为了填补这笔钱，甚至定出了门税（通行税）。如果他们用这样搜刮来的资金去盖一所大学或办一座工厂，后世人也许会谢他们一声。

华成义塾的进步青年们看到中队长如此腐化堕落，一个个慨然长叹说，独立军也快要完蛋了。然而，他们也只是加以非难和慨叹罢了。如果是现在这样光明的世道，军民就会大造舆论，把他告到法院去，或者交给群众审判，狠狠整治他的。但是，那时候没有什么法律，军纪又松弛，没有办法整治他。

正义府虽有主管民事的机构，但它有名无实，只把交不出军费的百姓抓去打屁股，对中队长这种人的违法行为却装聋作哑，只当不知道。他们的法律，留了一个专供上层人物通行的狗洞。

我决心借这一事件，给独立军和所有独立运动者狠狠地敲一下警钟。可是，这个警钟怎样敲才好呢？

崔昌杰主张马上选出学生代表去找独立军部队，从一中队到六中队，向每个中队提出抗议。

有些同学提议，要写文章登在正义府发行的《大东民报》这样的

报刊上，揭露独立军的官僚行为。能这样，当然好，但问题是，与三中队长不相上下的正义府总部，以及其他中队长和报刊编辑人员，会不会允许登这种内容的文章。

我提议说，不要用没有把握的方法去拖延时间，而要写一份声讨书发到独立军各中队去声讨他们。同学们都支持这个意见，并让我写声讨书。

这份声讨书，是“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后，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第一次批判。

因为是头一次写声讨书，总觉得没有全部反映出想要说的话，但同学们都说写得好，便送给金时雨，要他转给正义府的通信员。此后，声讨书经通信员的手很快就送到各中队去了。

声讨书一发出去，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用军费办婚礼的当事人自不用说，连不容任何人触犯其自尊心、非难其正义府的吴东振，也从声讨书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第二年初，我在吉林上学时，吴东振向我提起那篇声讨书。他说，当时他在六中队，同那些聚在那里的中队长和小队长一起看了那篇声讨书。他说：

“我看了声讨书之后，严厉地追究了三中队长的问题。本想撤他中队长的职。就是这号人，给我们独立军丢尽了脸。”

吴东振虚心承认独立军上层人物正在蜕化变质，他为无法挽回而感到痛心和焦虑。

吴东振亲眼目睹和亲身感觉到独立军在堕落变质，却束手无策，

只好袖手旁观的时候，他是怎样抑制了自己火爆性格的呢？

我听了吴东振的话，认识到独立军的腐败不仅是我们年轻一代为之苦恼的事，而且也是有良心的民族主义者感到苦恼的事。

然而，用一张声讨书来防止独立军在政治、道德上的堕落，是根本不可能的。

独立军在走着越来越不能自拔的毁灭道路。代表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主义军队——独立军，不会有别的命运。

在粗暴地对待群众，加重人民群众经济负担方面，华成义塾的学生也和独立军相差无几。他们去参加募捐工作，就走遍管辖区各地，竞相搜刮人民的财产和粮食。

对那些不大愿意捐献的人家，他们百般刁难，骂他们缺乏爱国心，无视独立军，硬逼他们交出东西，如果实在没有可交的，就是猪或鸡之类也好，非交出东西不可。

在学校里，他们还挑剔伙食，说什么尽给小米饭吃啦，副食又如何如何啦，大发牢骚。有一天，某个学生在宿舍食堂吃晚饭，看到小米饭和白菜干熬的汤，就发牢骚说，为什么伙食这么差，最后竟和食堂舍监黄世一吵起嘴来了。黄世一舍监工作做得非常认真。但是，学生们只要伙食质量稍差一点，就骂舍监不会办事。

解放后，我在义州见到当时做郡人委副委员长工作的黄世一，一起回忆过华成义塾时期的事情。那时他笑着说，他吸取华成义塾时期的教训，下到里去从不挑剔伙食。

我在华成义塾时想到，那些嫌小米饭不好吃的人，毕业后参加独

立军仍会挑剔伙食的，这种人最后必然会变成为富不仁、官迷心窍的卑鄙龌龊的人。

问题是这种人两年后就要成为军官，去指挥独立军的中队和小队。他们连吃小米饭都挑三拣四，还会有不怕饿死的决心吗？对这样的军队，还有什么可期待的呢？

对以独立军运动为中心的整个民族主义运动所感到的失望和对华成义塾的教育所感到的幻灭，在我心中越来越加深。华成义塾不能满足我的期望，我也无法满足华成义塾的期望。华成义塾不能变成我所期望的那种学校，同样，我也不能成为华成义塾所希望的那种学生。我对华成义塾的不满和华成义塾对我的不满，成了正比例。

我越倾心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思想，就越脱离华成义塾的教育；与华成义塾的教育脱离得越远，就越陷入无法解脱的苦闷世界。我想到，我脱离华成义塾，是不是意味着我背弃保送我到这里来的那些人的信任，违背把我的将来委托给他们的我父亲的心意？吴东振跑几百里路来参加我父亲的葬礼，安慰我，还给我盘费送我上义塾；当我到了义塾时，金时雨、崔东旿、康济河先生还给我斟酒表示欢迎。我想到他们，心里确实感到内疚。

要想对这些人恪守信义，我就应当忍住自己的不满，热心接受华成义塾的教育。只要我忍气吞声，学完两年后分配到中队去，和和气气地过上独立军的生活，就能在这些人面前保住我的体面。再说，也没有因为过独立军的生活而不能研究新思潮，不能扩大“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基础的道理。

但是，为了体面而同自己认为保守的义塾教育虚与委蛇，对付着过日子，是不可想象的。我不愿意用这种方法同旧教育进行妥协。

那么怎么办？是回家去把叔父的药房接过来照料家务呢，还是到沈阳、哈尔滨或吉林这样的大城市去升学？

我经过这样错综复杂的苦思冥想，终于决定退出华成义塾，到吉林市去念中学。我之所以离开桦甸，选定吉林市为我命运的又一个停车站，是因为这个城市在满洲地区是一个汇集很多朝鲜反日独立运动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重要政治中心。正因为如此，朝鲜人称吉林市为“第二上海”。在中国关内，上海是朝鲜革命者的集结地。

我要冲出桦甸这个狭窄的天地，走向广阔的舞台，把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立迈出了第一步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更高的水平上积极开展起来。这就是我在华成义塾辍学的主要原因。

我在华成义塾学了半年后辍学到吉林市去，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果断的决定。如果说还有第二次果断的决定，那就是南湖头会议后组建一个新师时，烧毁“民生团”档案的事情。

我现在也认为，那时我果断地退出华成义塾，到吉林市去深入到青年学生中去，是做得对的。如果我没有及时离开华成义塾，而在那狭窄的圈子里泡蘑菇，那么，那以后推动朝鲜革命急剧高涨的所有进程，就必然会被相应地推迟很长时间。

我一说要退学，要到吉林市去，“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员都表示惊疑。我对他们说“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既成立，就应当把这个组织扩大到各地，广泛宣传它的宗旨。蹲在华成义塾里，什么事也做不成。上

这种学校，也不会有多大意义。我走了以后，你们也要找好机会，到独立军部队或别的有利的地方去，扩大“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组织，深入到群众中去。大家都是组织的一员，无论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要受组织的统一领导。我还和几个同学约好日后在吉林市会面。

就我退出华成义塾的问题，我已经和金时雨谈过。

“这件事我准备回家后也讨论讨论，我到华成义塾来学了一段时间，觉得不怎么如意，……我虽然没有钱，可是很想到吉林市去上中学。您看，怎么办好？”

我这么坦率地一说，总管显出十分遗憾的样子，但他并不反对在义塾退学。

“你有这种想法，我就和朋友们商量后给你介绍吧。人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牛车嘛。你既然不喜欢华成义塾这个牛车，就该坐你自己的牛车嘛。”

在我到华成义塾来时，比谁都高兴、比谁都热情欢迎我的金时雨，居然这样大方地表示理解，我顿时感到心里轻松多了。他还说，你辍学要走，也要向崔东昨塾长依礼告别，别叫他感到遗憾；回家见了母亲后上吉林市去的时候，一定要来见我。

说服金时雨，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然而，与崔东昨塾长的告别却伴随了令人感到难忍的痛苦。一开始，先生很生气，对我谈了半天心中的不悦。后来他愤慨地说，男子汉理应矢志不渝，而你却要中途退学，像话吗？你说你辍学是因为义塾的教育不合你的意，那么我问你，在这动乱的岁月里，哪里有投万

人所好的学校？他吵了一通，索性背向着我，朝窗口转过身去了。

他朝窗外飘雪的天空呆呆地望了一阵，说道：

“成柱！如果这是像你这样有才华的人所不喜欢的学校，那我也要退出这个义塾了。”

先生的这句像炸弹爆炸一般的话，使我不知如何是好，只是默默无言地站着没动。我心想，对学校的教育如何如何，我当面讲了我的看法，这对塾长先生是不是太苛刻了？

片刻后，崔东昨先生镇静下来，走到我身边，把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肩上，说：

“只要是争取朝鲜独立的主义，不管它是民族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我不计较了。不管怎么样，你可一定要成功啊。”

先生走到操场，还用很长时间给我讲了许多对生活有教益的话。雪花不住地飘落在先生的头上和肩上。

从那以后，我每当想起塾长先生在大雪纷飞的那天给我送行的情景时，就深深地后悔那天的过失：没给先生抖落他肩上越积越厚的雪花。

30年后，我和崔东昨先生在平壤邂逅相遇，十分激动。我是首相，先生是旅北促进和平统一协议会的干部，但我们这次重逢，毕竟还是导师和弟子之间的重逢。在桦甸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在这块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取得了胜利的大地上，开出了社会主义之花。

“说到底，那时候，成柱首相还是对的。”

先生微笑着叫出了我儿时的名字，这顿时使我回忆的双翼追溯着几十年前的岁月，飞到了华成义塾雪花飘落的操场。

这位在曲折波动的政治生活中度过了一生的年迈导师，用这既无任何说明又无任何注释的短短一句话，结束了30年前同我的对话。

对我中途退出华成义塾，我母亲也表示支持。母亲刚听到我退学时，变得极为严肃，但听到我辍学的理由，就放下了心。

“你总在为学费操心。一个人，要是因为没有钱而委靡不振，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学费，我无论如何一定供给你，你要一心扑上去实现你的大志。你既然决心走新的道路，就应该迈开大步走。”

母亲的话，对怀着新的抱负回到抚松来的我，给了很大的鼓舞。

我回到抚松，看到许多我小学时期的同学，因家境困难，未能升学，蹲在家里，不知道朝哪个方向走。我决心帮助他们觉醒起来，引导他们走革命的道路。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不久，我有决心让它的根子向四面八方伸展，所以我总要做些什么工作，不做点什么就耽不住。

我为了用先进思想教育少年儿童，引导他们走革命道路，组织抚松及其附近的爱国少年建立了新日少年同盟。那是1926年12月15日。新日少年同盟，名副其实，是为迎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的新日，迎来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光明的新日而奋斗的共产主义少年组织。

新日少年同盟的成立，是扩大“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活动范围的重要契机。少年同盟提出的口号是豪壮的。那时候，我们提出了为争取朝鲜的解放和独立而斗争的口号，提出了为实现这一口号，学习先进思想，向广大群众积极宣传和解释先进思想等当前的任务。

我为完成新日少年同盟的任务，制定了组织原则、工作体制和盟

员的生活准则，并领导了他们的同盟生活，直到我上吉林市去为止。

1926年12月26日，我根据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和新日少年同盟的经验，帮助母亲成立了反日妇女会。

父亲逝世后，我母亲积极开展了革命斗争。那时候，我母亲不仅在抚松县城内，而且走遍附近农村的广大地区，到处建立夜校，教朝鲜妇女学好我国文字，用革命思想教育她们。

我在抚松逗留一段时间后去吉林市时，照事先的约定，去桦甸拜见了金时雨。

金时雨说，金史宪先生是我父亲的至交，他给他写了一封信，是要他设法帮我入学的介绍信。这是我同金时雨的最后一次见面。

金时雨是我难忘的人中印象最深的一个人。他沉默寡言，但为祖国的独立做了许多工作。从群众启蒙工作和后代教育工作起，直到购买武器，筹备资金，做国内工作人员的向导，传递秘密文件和资料，以及合并武装团体，保障其行动统一的工作，没有他不参与的。

他不仅积极帮助过我父亲的工作，而且也诚心诚意地帮助了我的工作。我们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时候，他在外面为我们望风，又比谁都更为我们同盟的成立而高兴。

金时雨和我分手后继续经营永丰碾米厂，给独立军提供粮食，积极进行对朝鲜人学生的后援工作。在中国打国内战争的时候，他身为革命后援会委员长，为保护朝鲜人的生命财产免受日本军队和蒋介石军队的侵害，在桦甸一带受了很多苦。

1958年，金时雨回到了祖国。他一辈子为民族做了那么多的工作，

却从未讲过。所以，我也无从知道他的去向。

他在前川身患重病，临终几天前，才对自己的孩子们讲了他同我父亲的关系和他同我的关系。

他儿子听了十分吃惊，还责怪父亲说，跟将军有这般深厚的关系，为什么一次也不去拜见将军？将军见到父亲该多么高兴；今天将军正在前川地方进行现场指导，现在还不晚，如果父亲实在不能走，该请将军到我们家里来。

当时，我确实在前川郡进行现场指导。

金时雨听了儿子的话，反而责备说：

“临死前，我讲这些往事，不是为了让你们得到什么好处，而是为了让你们知道我家的家史，让你们也同样好好拥戴将军。将军国事繁忙，我们一刻钟也不能耽误他的时间。”

老人生性耿直，老实忠厚。如果他听了儿子的话，他就能见到我，我也能见到他的。可是我们没见到面，太遗憾了。这是我终生未能补救的一桩事。

我每当想起华成义塾和“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的往事时，就回忆起金时雨。离开金时雨，就谈不上我的桦甸时期。我们在桦甸普及新思想，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日日夜夜，是令人难忘的。就在那些日子里，默默无言地给了我最大帮助的正是他金时雨。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战无不胜的强大队伍，是因为有了金时雨这样忠厚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

我心怀着人民的期望，怀着远大的抱负和决心，奔向了吉林市。

五　独立军的女杰李宽麟

我在华成义塾辍学，回到抚松一看，来到我家的独立运动者不像从前那样多了。

同日夜人迹不绝的过去相比，家景确实寂寞冷清了。

抚松给我留下的印象中不能忘怀的还有李宽麟。我父亲去世后，她就住在我家。吴东振打发她来我家时嘱咐说，宽麟得过金先生的很大帮助，决不要忘记这些恩德，现在要到抚松去好好照顾成柱的母亲。李宽麟担任南满妇女教育联合会的工作，同时为我母亲做伴。

李宽麟本来就是胆大无畏，明朗快活的姑娘。她文武双全，又清秀俊美，浩气凛然，恐怕当时在朝鲜再没有第二个像她这样的女杰了。

那时，封建观念很强，妇女外出也得把脸遮住。可是，李宽麟女扮男装，骑马走在大街上，过往行人无不惊异地望着她，好像看一个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

我回家没过几天，发现李宽麟不像从前那样生气勃勃了。

她听到我退出了华成义塾，大为惊讶。她知道这所军官学校不是谁都能去的，有些人想去也去不了。可是我自动退学，怎么会不使她吃惊呢？

当她听了我辍学的理由和始末，才说我做得对，支持我去吉林市

的决心。但她还是掩饰不住怅然之色。

看来，我否定民族主义系统的学校，并从思想上同它诀别的行动，给了她一定的冲击。感受性强的李宽麟分明是从我生活上的变化中更清楚地看到了独立军的结局和民族主义的末路。我母亲说，她比以前有很大变化，近来更是少言寡语了。

起初，我以为这也许是待字闺女中常有的那种苦闷。当时她已经有28岁。在那一到十四五岁就上头出嫁的早婚时代，听说姑娘有28岁，都摇头说太老不能娶。像李宽麟这样超过了婚龄的老处女，为自己的终身大事而苦闷，完全是可能的。

因为她常有发呆的现象，有一天我问她最近为什么脸色憔悴阴郁。

李宽麟长吁一口气，回答说，那是因为年岁越来越大，诸事却没有一个称心的。成柱的父亲活着的时候，一天走一二百里也不觉得累，可是你父亲去世后，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起劲，带在身上的手枪也快要生锈了。在这种情况下，又没有可依托的主心骨，这不是糟糕吗？我看，独立军怎么也做不了大事。现在独立军的情况可糟了。顶头的老爷们不知在想什么，光摆架子，也不上班；那些还能打仗的大汉，沉迷于过小家庭的日子；年轻小伙子只追逐女孩子……几天前，有个英勇善战的小伙子娶了媳妇，就退出独立军，上间岛去了。一个个看着风头夹着尾巴溜走。男大娶妻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娶了老婆就放下枪，谁来争取朝鲜独立？我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这样不顾自己的体面。

我这才明白了她苦闷忧郁的原因。她一个姑娘家，为了祖国的独立，把终身大事都置之脑后了，而那些年富力强的男子汉却扔掉枪支

去找个人的安乐窝，她怎么能不愤慨呢！

当那些喝过点墨水的姑娘们，被开化运动卷起的熏风所陶醉，到处卖弄新女性的风韵的时候，李宽麟腰佩六轮子，活动在鸭绿江两岸，与日寇军警展开了浴血奋战。

我想，在我国历史上女扮男装，腰佩手枪，作为职业军人与外寇奋战的实例是罕见的。我在这部回忆录中特辟一个专题回顾李宽麟的生涯，正是因为我很重视这一点。在男尊女卑的旧观念根深蒂固的我国，女人佩着手枪上战场，是不可想象的。

过去，我国妇女反抗外寇的方法是按时代的不同而不同的。但是，从这些差别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种反抗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带着以封建儒教的贞操观为基础的消极形式表现出来的。

每当外寇来犯、屠杀掳掠我国人民时，妇女们就进到深山或寺庙去躲避，以免受辱身之耻，来不及躲藏的妇女则以自戕反抗敌人。壬辰倭乱时，载入国史的烈女比忠臣多30倍以上，可见我国妇女的节操是多么坚贞。

据说，崔益铉在对马岛绝食殉国，其夫人服丧三年而后自尽。

从人伦之道来看，此举可视作为国尽忠、为夫守节的最高尚的道义。

不过，这里有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都这样寻死，由谁来消灭敌人，保卫祖国呢？

随着国家的近代化，我国妇女的思想方法和人生观也发生了变化。曾用躲藏、自尽等消极的方法反抗敌人的我国妇女，开始同男子一道，

敢于在军警的刀枪面前挺身而出，参加反日示威，向敌人官署投掷炸弹。

然而，身为女独立军，手持武器，在异国土地上进行十多年武装斗争的，恐怕只有李宽麟一人。

李宽麟面目俊秀，无论到哪里，她都为甩不掉许多追求她的男子而苦恼。论容貌、学识和家庭环境，她都有很好的条件，或者当个学校教师，或者找个如意的丈夫，过上不次于别人的富裕生活，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她把自己的青春视如草芥，不惜献给了独立运动。

她父亲属于在朔州自耕的中产阶层，家里有好几町步的土地和山林，还有10间大草房。宽麟12岁那年，她母亲去世，两年后，她父亲续弦，竟娶了个16岁的姑娘。

李宽麟不愿把这个比自己才大两岁的女人叫母亲。而她父亲是老封建，女儿长到15岁，就不想送她上学念书，一心想找个适当的女婿把她嫁出去。

李宽麟看别的孩子上学念书，心里羡慕不已，经常缠着父亲让她上学念书，但她父亲一直置若罔闻。她对父亲深感不满，15岁那年便逃出了自己的家。

她趁父亲外出的机会，悄悄来到鸭绿江边，把衣服和鞋子脱在冰窟窿旁边，径直跑到义州去了。她到那里求得一家远亲的帮助，入了养实学校。她逍遥自在地学了半年多，到了秋天才给父亲去信，要求提供学费。

她父亲以为女儿投江自尽了，一直在泪水中度日，忽然接到女儿

的信，又惊又喜，立刻赶到了义州。他见了女儿，说他再也不阻拦女儿上学念书了，叫她有什么需要，尽管随时来信。

从此，李宽麟再不为学费操心，专心学习。她学习成绩优异，学校保送她到平壤女子高等普通学校技艺科学习。

她在这里学习了一两年，逐渐懂得了人情世故，又经我父亲的介绍，加入了朝鲜国民会，从此，她作为一名堂堂的革命组织成员，参加了地下活动。就在这个时候，她从我父亲处学到了“志远”的思想。她在平壤女子高等普通学校、崇实中学、崇义女校和光成高等普通学校的学生中，秘密地进行了吸收同志的工作。

有时，她以远足为名，到万景台的我们家来，跟我父亲谈工作，也帮我母亲做些活。当时，虽然交通还不方便，但万景台风光秀丽，崇实中学、光成高等普通学校等各校的许多学生，一到春天，就带着午饭到万景台来野游。

在平壤爆发三·一人民起义的时候，李宽麟一直站在游行队伍的前列英勇奋战。示威受挫时，她就跑回宿舍喘口气，再出来高呼着万岁鼓舞学生。当起义失败，敌人开始大肆逮捕示威主谋时，她就回到家乡专门从事独立运动。她下定决心，在结束亡国命运以前，决不再安然坐在教室里学习。起初，她在吴东振组织的广济青年团做总务工作。

李宽麟早在转移到满洲以前，就因在家乡用手枪击毙了两名日本警官，把他们扔进了鸭绿江的冰窟窿，轰动了天下。

她加入独立军后，有一次回到国内进行募集资金的工作，不料被

警察盯住，要来搜查她。而她顶在头上的包裹里藏有手枪，情况十分危急。

警察要她把包裹打开。她装作打开包裹，飞快地掏出手枪，把警察拉到树林里去处决了。

她经常到国内去募集捐款，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一次，她受吴东振之命，到平安南道一带进行募捐工作。她完成任务后，同国内组织的一个同志在回总部的路上，在三道湾过夜的时候，附近的另一个武装团成员赶来胁迫他们把钱交出来。当时他们俩带着几百圆钱。那几个武装团成员亮出手枪放着空炮逼他们交钱。同行的男子吓得乖乖地交出了身上的钱，可是李宽麟不仅没有交出一文钱，还大声喝斥他们，把这帮人都赶跑了。

我们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时候，游击队里有过许多女将军，但是那个时候朝鲜还没出现过李宽麟这样的女子。她一个在中学时期只学过刺绣和裁缝的学生出身的女人，竟如此大胆勇敢。《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报纸也都曾大书特书过李宽麟的事迹。

李宽麟又是刚强有气节、坚贞不屈的女子。

三·一人民起义后，南满一带积极开展了独立运动团体的合并工作。但是，各个团体都搞本位主义，无视别的派系，各持己见，争执不下，因而合并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关于合并问题的商议，每次都以毫无意义的争吵和摩擦结束，没有任何收获。

我父亲为了解决合并运动面临的这种困难，决定吸收独立运动的元老们进行这项工作，并把准备吸收的头一个对象定为梁起铎。当时，

梁起铎住在汉城，处在敌人的监视之下。因而要把他带到南满洲去，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父亲经过慎重考虑，认定李宽麟是可以胜任这项工作的好手，便派她带着自己给梁起铎的信，到汉城去了。

梁起铎在民族主义者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他诞生在平壤的一个汉学家家庭里，从早通过爱国的新闻活动和教育活动，为培养人民群众的反日独立思想，付出了很大力量。梁起铎在朝鲜第一个编纂《韩英词典》，领导了对日本的国债偿还运动，因而出了名。他因“一〇五人事件”曾坐过几年牢，还参与过新民会、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国务委员）和高丽革命党（委员长）等组织。他和吴东振一道组建了正义府。

正因为他有这样的资历，凡是独立运动者，不分其所属关系，都很尊敬他。

李宽麟到汉城后被便衣警察逮捕，关进了钟路警察署拘留所。敌人每天给她施加毒刑：鼻孔里灌辣椒水，用竹签扎手指尖，反绑着两臂倒吊着打，有时把她打翻在地板上，往她脸上放一块木板，跳上去使劲往下跺脚，拳打脚踢更是家常便饭。每次动刑，都逼她说出从哪儿来，是从中国来还是从俄罗斯来，来此有何目的，等等。最后竟用碱性强的草木灰捏成团，贴在她两腿上，再泼上石油，点上火，威胁她要把她烧死。

尽管这样，李宽麟依然毫不屈服，说自己是没有职业的流浪漂泊的女子，来汉城是想找个有钱人家当个针娘或保姆，根本没有犯什么罪，为什么随便抓来，叫人这样活受罪。

李宽麟这样坚持，什么也不招认，敌人无可奈何，一个月后就把她放了。

她伤痕累累，根本无法动弹，但她还是带着梁起铎回到了兴京。

李宽麟一回到兴京就躺倒了,残酷肉刑的后果终于使她卧病不起。尽管同事们竭诚护理她，但病情总不见好转，便请了一位老医生来诊治。老医生诊过脉后，却下了极荒唐的诊断，说她有胎气。也许这是那个老医生想戏弄一下这个有名的美女，故意跟她开的一场无聊的玩笑吧。

李宽麟气得喘不过气来，厉声问他是什么意思。那个老医生又说她怀孕了。

医生还没把话说完,李宽麟就举起枕在头下的木枕头向他掷过去，大声呵斥说：

“你这老东西，我一个青年女子不出嫁，拿起武器参加独立运动跟敌人作战，你有什么不舒心的，来戏弄我，拿我开心？你毁我的声誉，有什么好处？我看你敢不敢再说一遍!”

老医生吓得魂飞魄散，连鞋都顾不得穿就跑掉了。

正因为李宽麟有这样的气质，我父亲也常常把重要的任务交给她去完成。只要是我父亲交代的任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她都坚决执行。让她到平壤去，她就到平壤去；叫她去汉城，她就去汉城；有急件派她去联络，她就去联络；叫她去做妇女启蒙工作，她就去做妇女启蒙工作。

我父亲回国内做工作的时候，李宽麟总是作为随行人员陪着他，

担任警卫，辅佐他的工作。她所走过的路，有几千几万里。她走遍了义州、朔州、楚山、江界、碧潼、会宁等北部国境一带和间岛地区，还踏遍了顺安、江东、殷栗、载宁、海州等朝鲜西部地区以及庆尚道等地，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她的足迹。

当时，李宽麟是我国第一个转战于白头山的姑娘。

她在人生的黄金时代，应在万人最热烈的祝福中度过的青春时代，却在异国他乡忍受着霜打雨淋，熬过了一个女子难以熬过的戎马生涯。

如此满腔爱国热忱，手持双枪，在多灾多难的大地上纵横驰骋，转战南北的李宽麟，为着日趋衰落的独立运动而伤心苦恼，我看了也委实感到痛心。

她看到我准备上吉林市去，就说她也准备到吉林市去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她未能实践这一诺言。

我在吉林市上学时，曾在孙贞道家里见过她两三次，那时候她要求我给她讲当前的时局，于是我花了很长时间给她讲了我国革命的前途。她说我们的做法很合她的意。然而她未能跳出正义府的屋檐。她是一个虽然赞同共产主义，却未能付诸行动的民族主义左派。

我看着李宽麟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凋敝而苦恼，心中禁不住难过。在民族主义营垒里，有许多像李宽麟一样公而忘私、献身于独立运动的爱国志士。然而因为没有正确的领导者，李宽麟这样大胆无畏、坚贞不屈的女子，也为找不准正确的方向而苦恼徘徊。当时是“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刚迈出了第一步的时候，所以她还未能汇合到我们的运动里来。

我父亲生前那般爱护和信赖且一手培育的李宽麟，今天因没有可依托的主心骨而痛苦烦恼。我看着她的情景，不禁为我国民族解放运动没有一个能够把朝鲜所有爱国力量都统一和团结起来引向胜利的得力领导力量而痛苦慨叹。

李宽麟的苦恼使我心里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使我更坚定了我们新一代必须为革命更加奋发起来的决心。我决心，一定要为李宽麟这样因为没有正确的方向舵而苦恼徘徊的爱国者，早日开拓能够让千万人赞同的新道路，开创一个所有渴望祖国独立的人都汇合到一个洪流里来奋斗的革命的新时代。

我怀着这样的雄心壮志，加快了去吉林市的准备工作。

我在吉林市最后一次见到了李宽麟，此后的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寻找她。

我们在东满建立游击队开展活动的时候，队伍里就有许多20来岁的女同志。我每当看到她们同男子一样，以豪迈的气概和顽强的斗志，为民族解放史谱写新篇章的英勇行动，就回想起独立军的女杰李宽麟。我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无从知道她的去向，我为她难过，也为她着急。我通过各种渠道打听过她，可是根本无法了解到她的去向和命运。

祖国解放后，我还到她的家乡朔州去找过她，可是仍没有找到她。

到了70年代初，我们终于打听到了她的去向。党史研究所的同志们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终于打听到她仍住在中国，还有她亲生的一双儿女。

同李宽麟并肩战斗过的人们当中，孔荣、朴振荣等受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影响、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同我们一起开拓了新的道路。他们都不愧为革命者，为革命壮烈牺牲了。但是，李宽麟却因为没有遇到引导她走向正确道路的好领导，不得已地在中途停止了斗争。

吴东振活着的时候，李宽麟为了贯彻宽甸会议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方针，费了不少心，走了不少路。我去吉林市的那年（1927年）夏天，李宽麟同张哲镐等独立军队员们进入奶头山，搭起草棚，种了土豆，同时进行了群众启蒙工作。当时，吴东振好像有过这样的打算，要把奶头山变成独立军的一个活动基地。

但是，吴东振被捕后，这些活动也都付之东流了。在民族主义左派势力中，最倾向于共产主义潮流的人是吴东振，可是他这个大柱子一倒下，就没有为实现宽甸会议方针挺身而出的人了。正义府里虽有一些同情共产主义的人，但他们都是些无能为力的人。

“三府”合并成国民府后，民族主义上层集团急剧地走向了反动的道路，出现了连共产主义这个词都不准提的局面。国民府的领导人甚至不惜作出对同情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左派人士向日寇警察告密以至暗杀的叛逆行为。

李宽麟也受到国民府恐怖分子不断的追击和胁迫，不得不四处躲藏，想找一个隐身处所，最后嫁给了一个中国人，被埋没到家庭里去了。正如始料所不及，结婚成家也未能遂她的愿。

李宽麟曾经像一颗启明星一样出现在凄风苦雨的满洲荒野，到处

打击敌人，使敌人胆战心惊，吸引过世人耳目，被誉为“独立军中一朵花”、“万绿丛中一点红”。然而这样的一朵花，却无可奈何地枯萎了。

打个比喻说，她是个乘着民族主义这只小木船走上了漫长航路的独立运动者。她的这只木船，要闯过重重困难和考验的反日独立斗争这个茫茫大海上的惊涛骇浪，力气太小了。乘上这只小木船，根本划不到祖国光复这个目的地。

许许多多的人乘上这只船开始了航行，但是大多数的人没有走到彼岸，就在中途下了船。他们下船后却装作忧国志士，尸位素餐，只图一身的安逸，混过了岁月。从前以民族的“代表”自居的那些上层人士当中，有的变成了贩卖白膏药的小市民，有的躲入深山当了和尚。

没有变节，只埋没在家里或搞生意的人，还算好一些。同李宽麟一道走过一段民族主义航路的独立运动者中，也有背叛祖国和民族、沦为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人。

李宽麟和我们分手后在异国他乡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前几年才回到了祖国。

她说，自从她知道了我就是那个她在独立军时那样崇拜过的金亨稷先生的儿子成柱以后，想回祖国的心就更加迫切了。她心想，既是成柱领导着国家，那么金亨稷先生要建设万民平等的社会的理想肯定会得到实现，这个社会她非亲眼看看不可。在那寒风呼啸的满洲原野上，每当枕着胳膊躺在地上望着夜空上的星星时，就想起自己生长的故乡山河，不知淌过多少眼泪。她死也要死在这块祖国的疆土上。

然而，李宽麟要下定归国的决心，却是经过了多年别人无从知道

的苦恼。

她有两个儿女和几个孙儿孙女。她一个已到人生晚期的老年人，要把这些亲爱的骨肉都留在很难再返回去的异国他乡，自己只身一人回祖国来，确实是很难下定决心的。

但是，李宽麟还是毅然决然地下定了纵然和那些亲骨肉永别、也要回到祖国来的决心。这的确是非李宽麟这样有胆力的女子就不敢想象的果断的决心。她如果不是在年富力强的时候为祖国献出自己宝贵青春的人，恐怕是不能下这种决心的。

只有为祖国哭泣过，欢喜过，为祖国流过血，献出了全部身心的人，才能从心灵深处领会到祖国有多么宝贵。

我看到把亲生骨肉都留在国外，白发苍苍地单身回到祖国来的李宽麟，对她火一样炽热的祖国爱和崇高圣洁的人生观深感钦佩。

在抚松分手时才20多岁正当芳年的李宽麟，变成一个80高龄的白发老人出现在我面前时，已根本看不出她那曾经为众人所钟情的红颜美貌了。

当我苦苦寻找的杳如黄鹤的李宽麟，头上披着白霜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想着那使我们分离了半个多世纪的无情岁月，心中不由得产生了惆怅之感。

我们在平壤市中心风光优美的地方给李宽麟盖了一处住房，考虑到她的高龄，还给她派了厨师和医生。那所房子离她在姑娘时节上过的女子高等普通学校旧址不远，是金正日同志体察到李宽麟的心情，特意选择这个地方盖的。金正日同志还到她家去，根据老人的兴趣和

爱好，指定了家具的位置，查看了照明和供暖情况。

李宽麟虽然年老，行动不便，却亲手在院子里翻一块地种上了玉米。她说我在小时候是喜欢吃玉米的，她要亲手种出玉米来送给我吃。尽管已经流逝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可她还记着我小时候的口味。她在抚松的时候，一到夏天就常买回老玉米来，在后院里烤好了给我和弟弟们吃过。

她去世后，我们考虑到她在年轻时为祖国和民族建树的功绩，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把她的遗体安葬在爱国烈士陵园里。

真正热爱祖国和民族的人，无论他住在地球的任何一隅，必然都回到有着祖先的坟墓、自己所生长的热土热乡来，即使是从不同的起点出发的，也总有一天会这样聚在一起畅叙旧怀的。

第三章

吉林时代

时期　1927.1～1930.5

一　先进思想的探索

我在家待了一个月左右，过了年，第二年一月中旬离开了抚松。抵达吉林市时是在行人熙来攘往的中午时分。每次问路，都掏出记有父亲亲友地址的小本子，用冻僵的手翻，我觉得这样很麻烦，便预先把我要找的街名和门牌号码都记在脑子里了。这个古老的大城市的繁华景象，好像一开始就对一直生活在寂静、冷清的农村的我施加压力。

我走出收票口后仍抑制不住兴奋，久久站在那里望着招呼我进入新生活的新天地的活跃景象。

那天我所看到的街景中印象最深的是街上卖水的多。连过路的行人也忿忿地嘀咕：这个以水都著称，有个时期被称为浮桥的城市，现在却缺饮用的水，只有卖水的行业兴旺，吉林这个城市的生活只能越来越不好过了。喝口水也要打打算盘，我心头从开始就感到这种城市生活的重压，但我以抵抗这种重压的心情，挺起胸膛，迈开大步走向街心。

从吉林站沿着向北山方向伸展的岔路街走了一段就看见了把城市分成城里和城外的城墙，也看见了城门，城门上的匾额写有“朝阳门”字样。朝阳门近处有新开门。吉林除了朝阳门和新开门外，还有巴虎门、临江门、福绥门、德胜门、北极门等一共10个城门。每个城门都

有张作相的兵把守。由于风化作用这里那里坍塌的古色苍然的城墙，令人感到这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

吉林是我第一次来的生疏的地方，却没有一点陌生之感。也许是因为我很早就想来而且又有父亲的很多朋友在这里的缘故吧。我的小本子里记着十几个我应该去问候的父亲的朋友和亲友的地址。吴东振、张哲镐、孙贞道、金史宪、玄默观（玄益哲）、高远岩、朴起伯、黄白河等人都是父亲在吉林的朋友，是我应该去见的人。

我把探访的第一个对象选定为吴东振，去找在岔路街和商埠街之间的他家。老实说，当时我心里暗自有些紧张。父亲的朋友们特意介绍我入了华成义塾，可我却中途退了学，吴司令会不会高兴呢？

可是，吴东振和从前一样很高兴地迎接了我。我向他谈了我从华成义塾退学来到吉林的经过。他没说什么，只是表情严肃地点了点头。稍后他说：

“看到你突然出现在吉林，我不由得想起了你父亲。你父亲也是像你这样突然从崇实中学退学的。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惋惜。可是后来我就认为你父亲下的决心是对的了。不管怎么说六个月就退了义塾来到吉林，这个果断性是惊人的。如果吉林符合你的理想，你就在这里挖你的井吧。”

这就是那天听了我来吉林的经过后，吴东振说的全部的话。这不愧是吴东振的豁达的思想方法，我心里很感激。

他惋惜地说，你既然来吉林念书，就把母亲和弟弟都带来在这里定居才好呢。他在去抚松参加我父亲葬礼时也曾多次劝我母亲搬到金

先生的朋友多的吉林去。母亲对他的好意表示感谢，却没有离开抚松。她想，我父亲虽然去世了，可是他的坟墓在阳地村，怎么能轻易就搬到吉林去呢。

那天，吴东振给我介绍了他的秘书崔一泉。吴东振多次夸过他的秘书，所以我也对崔一泉有一定的了解。他是在正义府中以文才著名的人物。自这一天会晤之后，我和崔一泉建立了特殊的同志关系。

那天下午，吴东振把我带到三丰客栈介绍给独立运动者们。在他们中有金时雨给我写介绍信、让我去见的金史宪，还有正义府警护队长张哲镐。三丰客栈就是三丰旅馆，中国把旅馆也叫做客栈。这个旅馆里，除金史宪、张哲镐外还有很多不知名的独立运动者留宿。

三丰旅馆和太丰合碾米厂是独立运动者在吉林的两大据点，住宿所兼联络点。

来自朝鲜的移民也大多利用三丰旅馆。

这个旅馆的主人是孙贞道牧师的同乡。他原来住在平安南道甑山，后来听孙牧师的劝说来吉林开了三丰旅馆。虽然招牌是旅馆，但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宿舍或公共礼堂。

三丰旅馆离日本领事馆只有100米左右。日本领事馆可以说是吉林地区侦探活动的总部。密探和警察那么费尽心机搜寻的反日独立运动者们时常出入这个等于在日本领事馆门口的旅馆，有人觉得不太适宜。可是，独立运动者们却说“灯下黑”，频繁地出入这个旅馆。说也奇怪，真地没发生过一次爱国者在三丰旅馆被逮捕的不幸事件。所以，我们建立了组织后，也常常利用这个旅馆。

金史宪看了金时雨的介绍信之后对我说，他熟悉的叫金刚的朝鲜人在吉林毓文中学当教师，入这个学校怎么样。这是市内新兴社会界办的私立学校，是个倾向性好的学校。这在社会上已广为人知。这是因为《吉长日报》多次登了关于这个学校的报道。《吉长日报》早在1921年就介绍毓文中学说，惨淡经营，成绩优异，博得社会各界赞助。

由于围绕着资金问题和校长滥用职权问题发生的纠纷，毓文中学的校长频频换人。我到吉林时，正是李光汉代替南京金陵大学毕业的张荫轩当校长不久。

校长四次易人，可见毓文中学是多么重视正义和法度的。毓文中学的这种革新性的校风吸引了我。

第二天，金史宪把我介绍给金刚先生。金刚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我由他带领去见了李光汉校长。李光汉属于中国民族主义左派，是周恩来总理的中学同窗，是从小就受到周总理的影响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我知道周总理和李光汉校长的关系，是在几十年后的事情。有一次，我同前来我国访问的周总理谈话，回忆青年时代谈到给了我很多帮助的中国人时，提到了李光汉校长的名字。周总理听了非常高兴，说他是他在天津南开大学附中念书时的同学。

那天，李光汉校长问我学校毕业后准备做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愿意把一生献给光复祖国的事业。他赞许地说，这个抱负很好。

也许是因为谈话坦率的缘故吧，他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让我不经过一年级，而在二年级插班学习。

我在进行青年学生运动和地下活动时期，多次得到这位老师的帮

助。他明知我因为革命工作常常缺席，却装作不知道，并且从各方面保护我，不许被军阀当局收买的反动教员随便触动我。军阀和领事馆警察要来抓我，他先通知我快逃。因为校长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所以有许多思想家能够在他属下站住脚进行活动。

在毓文中学办好入学手续回来，吴东振夫妇劝我，直到学校毕业就住在他们家，不要住学校宿舍。这从当时我的处境来说，确实是一种幸运。

我念书要靠母亲供给学费，可是母亲身体病弱。母亲不分春夏秋冬常年给人家洗衣，做针线，每月给我寄来三块来钱。这些钱交了学费、笔记本和教科书钱，就连一双鞋都难买了。

因为处境如此，我不得不接受了父亲的朋友们的劝告和好意。我到吉林，起初住在吴东振家上学，他被捕后在张哲镐家住了一年左右，然后在玄默观家住了几个月，后来又在接替吴东振任正义府司令的李雄家住了一些时候。

当时在吉林的名士大都是和我父亲有亲密关系的人，他们从各方面照顾我，爱护我。我常常访问他们的家，在这过程中认识了很多独立军干部和独立运动领导者，见到了来往吉林的许多各色各样的人。

当时，正义府的干部们几乎都定居在吉林。正义府建立了行政、财务、司法、军务、学务、外交、检查、监督等庞大的中央机构和地方机关，甚至向辖区内的朝鲜同胞征收税金，俨然是个独立国家。为保护这一庞大的机构，正义府还拥有由150多名军人组成的常备的中央护卫队。

吉林市是中国的一个省城，和奉天、长春、哈尔滨一样是满洲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

吉林督军署由张作霖的堂弟张作相当头子，他不大顺从日本人。如有日本人向他告状说，某某是共产党、某某是坏人，他就拒绝他们的要求说，你们用不着管。他之所以这样做，与其说是因为他有什么政治见解，倒不如说因为他无知，自尊心却又强。他的这种特点给革命者和社会运动者提供了有利条件。

迁居满洲地区的朝鲜人大部分都住在吉林省。

由于这种情况，很多被日本军警追赶的朝鲜独立运动者和共产主义者聚集在吉林了。因此，这个城市自然就成了朝鲜人的政治活动舞台及其中心。“东三省的排日策源地是吉林”，日本人的这一评语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20年代后半期，吉林是朝鲜民族主义运动在满洲的基本势力——正义府、参议府、新民府的首脑的集结处。独立运动者们办报、办学校等多在桦甸、兴京、龙井等地，而其首脑们聚在一起进行活动的地方是吉林。

ＭＬ派、火曜派、汉上派等宗派分子各自为扩大本派势力而疯狂活动的地方也正是吉林。共产主义运动者中自命不凡的所谓名人也几乎都出入吉林。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宗派分子、流亡者等各种各样的人都聚集在这里。

向往新事物、探求真理的青年学生也来这个城市。

一句话，可以说吉林是形形色色的思想潮流的汇集处。我就是在

这里举起共产主义旗帜开展革命活动的。

当我来到吉林的时候，已有“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几个成员按照在桦甸的约定，先期来到这个城市进了文光中学等学校和机务段、码头等单位。

他们听到我出现在吉林的消息，马上跑到吴东振司令家来了。他们对吉林市的印象是“东西贵、水贵、柴贵，但书多是个好处。”

我开玩笑说，书多的话，同饥饿的痛苦也可以妥协。不过这也是我的真情实意。

对毓文中学，他们也有良好的印象。他们说，教职员中虽然也有国民党右派，但绝大多数的教师，不是共产党系统的就是三民主义崇拜者。

听他们这么说，我的心也踏实了。

据后来判明，尚钺先生和马骏先生也都是共产党员。

我们决心要在新的地方努力学习革命的真理，为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尽一切力量进行斗争。

留在桦甸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员们，也为了找活动舞台分赴抚松县、磐石县、兴京县、柳河县、安图县、长春县、伊通县等满洲一带朝鲜人居住区。他们当中也有回原中队重新戴上独立军帽子的。

在像吉林那样复杂的城市里，靠为数不多的骨干分子，为了让千百万人倾听我们的呼声，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而斗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我们都充满了坚定的决心：各自都成为火种，唤起周围的

十人百人，再由那十人百人燃烧起千人万人的心，以变革世界。

我在吉林的活动是从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列主义开始的。我来吉林的时候就决心更积极更深入地进行在桦甸开始的对马列主义的探求。吉林的社会政治空气，使我更加坚定了要进一步深入钻研新思潮的决心。我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比做学校的功课还热心。

当时中国正处于大革命时期，大量翻译出版了苏联和日本发行的好书。北京还出了《翻译月刊》杂志，常常刊登青年学生感兴趣的进步文学作品。在抚松和桦甸看不到的书，在吉林就可以随意弄到。可是我没有可以买书的钱。现在说这些话，可能很难相信，可是那时我只在上学时才穿球鞋，一回家来就几乎都光着脚。

那时，牛马巷的图书馆一个月收一毛钱的阅览费，我每月都买那个阅读券，放学回家时到这个图书馆看几个小时书和报纸。这样，少花钱也能看各种出版物。

看到书店来了好书也没钱买的时候，我就鼓动有钱人家学生，让他买下书，然后借来看。有些有钱人家的学生，自己不看，为了装点门面，把书买来放在书架上。

当时，毓文中学的学校管理是采取民主方式的。图书主任由学生大会每半年选举一次。当选的图书主任有制定学校图书馆工作计划、购入书籍的权限。

我在毓文中学时先后两次被选为图书主任。我利用这个机会购置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

书多起来，这回时间又不够了。我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来读书费尽了心思。为了在争取到的时间内读更多的书并深入把握其本质，做出了努力。

我父亲在我小时候就使我养成了一种习惯，每看一本书，一定把书的中心内容和学习心得记下来。父亲使我养成的这种习惯起了很大作用。读书时掌握好中心内容，那么，无论多么错综复杂的内容也能明确地把握住，也能在短时间内读很多书。

我在中学时代通宵达旦地读书，并不只是因为有单纯的研究学问的趣味或探求心。我并不是为了做一名学者或飞黄腾达而热中于读书的。怎样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呢？又怎样才能消灭社会的不平等，让劳动人民过上好日子呢？我要从书里找到的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无论在什么地方，看什么书，我总是想找到这个答案。

不是把马列主义当作教条，而是作为实践的武器，不是从抽象的理论中，而是从朝鲜革命这一具体实践中去找真理的标准——我的这一立场，可以说是通过上述过程萌芽的。这个时期，我手不释卷地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雇佣劳动和资本》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解说这些著作的书。

在读政治书的同时，还读了很多革命的文学作品。当时我最感兴趣的是高尔基和鲁迅的作品。在抚松和八道沟的时候，读了《春香传》、《沈清传》、《李舜臣传》、《西游记》等很多反映古时生活的书，到了吉林以后就读了《母亲》、《铁流》、《祝福》、《阿 Q 正传》、《鸭绿江上》、《少年漂泊者》等很多革命的小说和描写当时生活的进步小说。

后来进行抗日武装斗争,遇到像艰难的行军那样艰苦考验的时候,我就回想起在吉林时读过的《铁流》等革命小说的内容，从中获得了力量和勇气。文学作品对人们的世界观的形成起重要的作用。所以，我每次同作家见面，就叫他们多写些革命的小说。现在，我们的作家也写了不少革命的巨著。

我们通过亲眼目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人民的悲惨生活处境，也提高了政治觉悟。

那时，从朝鲜去满洲的移民当中，经由吉林到别的地方去的也不少。我们随时向他们了解国内的惨状。

渡过了鸭绿江的移民，有的经过丹东，利用南满铁路到长春，再从那里利用东支铁路前往北满一带，有的利用吉长线经由吉林到附近腹地，有的由奉天利用奉海线，有的用吉会线前往敦化、额穆、宁安方面。

寒冷的冬天和早春时节，就可以在吉林车站和旅馆看到许多朝鲜移民。这些移民当中经历了什么样波折的人都有。

有一天，我和同学们一起到戏院看戏。戏演完，散场时，唱戏的女演员来找我们，说出她爱人的名字，问我们叫崔某的人是不是住在这里。她说的竟然是朝鲜话，这使我们大家着实吃了一惊，因为朝鲜不唱这种戏。

这个女演员名叫玉粉，庆尚道人。有一天她的父亲同邻居朋友喝酒，对朋友说，你老婆生了男孩儿就做我的女婿，我老婆生了女孩儿就做你的儿媳妇，要是两家都生了男孩儿或女孩儿，就叫他们结拜兄

弟或姊妹吧。他们两人就这么约定了。

不久后，一家生了男孩儿，另一家生了女孩儿。两家把一条丝绸手巾分成两块，各拿一块作为结亲的标志。

后来，为了谋生，两家先后都离开了家乡。生了儿子的那家来到吉林落户，那儿子长大上了文光中学。这家来到吉林后弄到一栋房子，还开了一个小小的碾米厂，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可是，生了女儿的那家到了丹东就没有盘费了，只好把女儿卖给了中国人。玉粉就这样挨打挨骂学唱戏，成了演员。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就想念起在家乡订了婚的男人了。她每到一个地方唱戏，都要偷偷地出去找朝鲜人探问那男人的去向。

那天，叫玉粉的女演员同念文光中学的未婚夫进行了戏剧性的重逢。

当玉粉说不再唱戏而要留在未婚夫身边时，那戏团老板娘就索取巨额的身价。玉粉只好下决心说，把自己分到的钱积攒几年，还了身价后一定回到吉林来。我们目睹这一情景，义愤填膺，怒火中烧。同学们骂那个光知道钱，而不近人情的戏团老板娘，是“像毒蛇一样的女人”。

几十万人聚在一起，满头大汗为生存而竞争的大城市生活，掩盖不住阶级社会的恶臭。

有个烈日当空的夏天，我和同学们从北山往回走的路上看到有个黄包车夫在路旁跟一个有钱人相争。看来，那有钱人车钱给得太少了。车夫央求说，现在是“三民主义”时代，也该照顾照顾“民生”问题

呀，再给几个钱吧。可是有钱人不仅没有再给点钱，反而说，你光知道“三民主义”，就不知道还有“五权宪法”？说着抡起文明棍儿就往车夫身上打。

我们学生怒不可遏，冲向那有钱人，逼他多拿钱。

通过这些体验，我们心里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和不满：世上为什么有坐黄包车的和拉黄包车的；为什么有些人住在有十二道大门的富丽堂皇的住宅里养尊处优，而有些人却变成乞丐流浪街头呢？

人们从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利害关系开始，逐步具有憎恨剥削阶级、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思想，进而抱着要建设新社会的觉悟，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样才可以说他树立了革命的世界观。

我也是通过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等革命书籍，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然后目睹社会现实，从中了解到很多不平等的现象，产生了憎恨剥削阶级和阶级社会的思想，最后抱着要改造和变革世界的决心走上了斗争道路的。

越广泛地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越深深地为之心醉，我就越想尽快把这一革命学说普及到青年学生中去。

我在毓文中学第一个结交的朋友是叫权泰硕的朝鲜学生。最初，毓文中学一共有四个朝鲜学生，其中有意搞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只有权泰硕和我，其余两个对政治运动漠不关心。他们只知道钱，一心想毕业后做生意。

我和权泰硕志向类似，对社会的看法也相似，所以一开始就志同道合了。在中国学生当中，叫章新民的学生跟我较亲近。他经常跟我

相处，常常就政治问题交换意见。我们的话题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社会的不平等、帝国主义的反动性、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的企图、国民党的背叛罪行等等。

直到那时，在吉林，马列主义还只是青年学生憧憬的对象。听说马克思是了不起的人，想了解了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他们抱着这种想法去翻翻经典著作；或者以为不懂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就要落后于形势。

我参考在桦甸取得的经验，吸收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首先在毓文中学组织了秘密读书组。秘密读书组的使命和目的，是用马列主义思想和理论牢牢地武装进步的青年学生。这个组织发展非常迅速，不久就扩展到文光中学、第一中学、第五中学、女子中学、师范学校等吉林市内许多学校。

随着读书组成员队伍的扩大，我们借了独立运动者经营的碾米厂的一间房子，让留吉学友会成员出面自行办了一个图书室。

现在到处都有图书馆，而且只要下决心，像人民大学习堂那样的大图书馆，也能盖得像宫殿一样。可是那时我们两手空空，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办图书室，可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要购买书籍，还要置备书架和桌椅，可是我们哪有钱呢！所以，每逢星期天就出去打零工，或到铁路工地去扛运枕木，或到江边去背运小石子，女学生也到碾米厂去筛选大米。用这样一分两分费力挣得的钱买了书。

还设了可以另行保管革命书籍的秘密书架。这样办好图书室之后，简短而又饶有风趣地写好书的介绍，贴在市内许多地方。这样一来，

学生们就开始争先恐后地找我们的图书室来了。

那时，我们为了吸引学生，图书室里还置备些恋爱小说。

青年们读恋爱小说感兴趣，来图书室的很多。我们用这种方式让他们对读书感兴趣，然后开始一点一点地提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学生们通过读社会科学方面的书逐步提高了觉悟，我们就从秘密书架上拿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革命的小说来给他们。

那时，我们还让青年学生读了《再生》、《无情》、《开拓者》等李光洙的小说。三·一运动前夕，李光洙在日本东京草拟过《二·八独立宣言书》，投身于独立运动，还写了很多进步作品。所以学生喜欢读他的小说。可是后来李光洙变节，没能写出有教育意义的作品，最后竟然写出了像《革命家的妻子》那样的反动作品。建立了抗日游击队之后，我率领部队去南满，在路过抚松暂时停留的机会读过这部小说。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在家养病，他的妻子跟常来他家给他治病的医专学生发生暧昧关系的丑恶生活，通篇贯穿着污辱共产党人、诋毁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

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我们常常在吉林教堂或北山公园开读书心得报告会。起初还有过谈恋爱小说内容的学生。这时，别的学生就大声喊不要谈那种无聊的东西。那些着迷于恋爱小说的学生，这样丢了一次脸，也就自动地去读革命小说了。

为了向青年学生和群众广泛宣传革命思想，我们还利用了“说书”的方式。

有一天，我嗓子疼，作热敷，没能上课。回家时路过北山，看到

许多人围坐在一个盲人周围，听他讲故事。

走近一看，那盲人掺杂着戏谑的话讲《三国志》的一段。他讲到诸葛亮用计一举冲垮敌阵的场面还击鼓助兴。讲到人们最感兴趣的地方就停下来，伸手向听众要钱。当时，中国人把这叫“说书”，是个吸引群众的好方法。

从那以后，我们也用这种方式宣传革命思想。

我们同学当中有个善于讲笑话、口才又好、很活跃的人。他是接受我们交给的任务，做宗教徒的工作的。他祷告，背圣经比牧师还强。我们就交给了他“说书”的任务，他做得比背圣经还好。他到串门的人多的人家或人多的公园去，有声有色地给人们讲内容好的小说，每次都受到了好评。盲人“说书”要收钱，他不收费。但他在最使人感兴趣的地方停下来，做一番鼓动演说，然后说愿听下回如何，请明天何时再来。第二天，到时候人们就会聚集在指定的场所听他讲完小说。

那时我通过书结交的人当中印象最深的是朴素心。

吉林的繁华大街有一个叫新文书社的大书店，我每周都要去几次。朴素心也是这个书店的老主顾。他每次都在卖社会科学书籍的柜台前踱来踱去，因此，我们两个就常常在柜台前碰上。他身体很瘦，但个子修长，颇有知识分子风度。

当我带着同学到书店去为学生图书馆买一大包书的时候，他就像选购自己的书一样帮助我们选书，说哪本书怎么样，哪本书一定要看等等。就这样通过书，我和朴素心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我住在东大滩上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也在我住的宿所跟我一同生活过。

朴素心原来住在汉城，后来来到吉林。他身体虚弱，无意搞共产主义运动，只是为报刊写些短小的文章。他写的文章可能刊登在《海潮新闻》或《朝鲜之光》等报刊上。他虽没怎么参与运动，但对宗派分子是非常轻蔑的。朴素心有主见，见识高，所以来往吉林的行行色色的运动者们各个都想争取他。

朴素心通宵达旦地读日文版的《资本论》。他是个出奇的读书迷，如果没钱了，即使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拿到当铺去当，也要买书来看。他不是那种读了几本通俗的入门书，就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的人，而是对马克思和列宁的主要著作几乎都通晓的人。

朴素心是给我介绍并解说了《资本论》的难忘的老师。和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一样，《资本论》也有不少难解的地方。因此，朴素心给我们上了《资本论》的解说课。理解经典著作，到底还是需要有入门书和有人引导。朴素心就起到了这种作用。他确实有渊博的知识。

有一次我问过他，马列主义经典作者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

朴素心把马列主义经典作者们在历史发展的许多阶段从不同侧面解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都背了下来，背了好长时间。从理论和知识上看，他可是足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大师的人。不过，朴素心也有不懂的，答不上的。

我曾问过他：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说，工人阶级的阶级解放是首要的，而民族解放是次要的；可是在我国，不是只有首先从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下获得解放，工人、农民才能获得阶级解放吗？这是当时我们同学纷纷议论的问题。

直到那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很少从理论上阐述工人阶级的阶级解放同民族解放的相互关系问题。关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有许多问题需要作出科学的阐明。

朴素心对我提出的问题作了很含糊的回答。

我又问，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说，宗主国的革命和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总是有机地联系起来的，但只强调了宗主国的革命胜利所具有的意义；这不就是说我国只有日本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取得胜利，才能获得独立吗？难道我们就得坐在那里束手等待他们取得胜利吗？

朴素心也没能回答这个问题。他以惊异的目光望了我许久。朴素心说，正如经典著作中写的那样，把工人阶级的阶级解放放在民族解放的前面，视宗主国工人阶级的斗争重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这是世界上公认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问题。

我不以为然地歪了歪头，他也显得十分焦急，坦率地说，他只是从学术上研究了马列主义，并没有把它同朝鲜的独立和在朝鲜的共产主义建设这一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考虑过。

我听了这话，心里感到遗憾。像他所说的那样，脱离实践，只作为一种学问研究共产主义学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当时，我和同学们在研究马列主义先进思想时，最大的苦衷是这一点：我们也应该像俄国人那样通过革命变革社会，解放祖国，可是朝鲜的情况和发生了十月革命的俄国的情况是不相同的。

在像落后的半封建国家朝鲜这样的殖民地国家，应该怎样进行无产革命；在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不得不离开祖国，在中国

土地上进行斗争的情况下，同中国等邻国的革命怎样取得联系；如何执行朝鲜革命所赋予的民族任务和世界革命所赋予的国际主义义务等复杂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我找到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解答，花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朴素心在探求马列主义的过程中，跟我非常亲近了，也被我们的革命志向深深地吸引住了。

他加入了反帝青年同盟和共青同盟，还同我们一起忘我地参加了青少年的教育和启蒙工作。一直埋没在书堆里的人，一经下定决心投入了实践，其热情是非凡的。

后来，为了治肺病，把他送到卡伦地区。

朴素心在离贾家屯五里来路的雾开河畔搭个草棚，自己做饭，过着寂寞的生活。

我在卡伦和五家子一带进行活动时，抽出时间去看望过他。朴素心见到我，表示非常高兴。我们敞怀叙旧，讨论了很多问题。

那时，朴素心第一次给我看了他爱人的照片。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我原以为他的爱人死亡或离婚了呢。只看照片就可以看出他爱人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有教养的新女性。

朴素心说不久前在汉城的爱人寄来了信。我问他为什么不把爱人接来？他说他爱人是个富翁的女儿。

我又问，当初结婚时你不知道她是富翁的女儿吗？

朴素心长叹一声说，是结婚后他的世界观变了。

我觉得这话很奇怪，又问他，你真地完全忘掉了爱人吗？

朴素心坦率地说，他一直以为忘掉了，可是最近接到她的来信后，就常常想起她。

于是我真心劝告他，如果爱妻子，就应该把她接来。我对他说，如果连自己的爱人都教育不好，那怎么能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呢，爱人在身边，对治病也会有好处。

朴素心虽答应这么做，却又叹了一口气。

“是成柱同志的劝告，我就要听。不过，我的人生已经日薄西山了，我的一生是失败的。”

他没有子女，又没有可以留给后代的财产或精神遗产。他说，本想献出一生研究马列主义，一定要写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书的，可是这个初衷不能实现了。他慨叹道，年轻力壮，生龙活虎的时候是因为不知真理而没有做到；而认识了真理，身体条件却又不允许。

听了朴素心的这番话，我也很焦急。朴素心对学问认真、勤勉，又有探求力。如果他不只埋没在书堆里，而更早些投身于实践，那么就会找到有助于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有价值的理论，也会建树实践方面的业绩的。理论出自实践，理论的正确性又通过实践得到验证。我们时刻不能忘记的实践，就是争取朝鲜的独立，为我国人民谋幸福。可惜，朴素心刚刚认识到这一真理就离开了我们。

后来朴素心把爱人从汉城接来，在她的护理下，继续写小论文和点滴感想，直到在卡伦去世。

古人说，“朝闻，夕死可矣。”可是像朴素心这样能做很多事情的

人，刚认识到真理就离开了人世，实在令人遗憾。

我在吉林住了三年多。在我的一生中，吉林确实可以说是在我的记忆中难以忘怀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吉林，我掌握了作为科学学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又靠这一学说的帮助，更深入地认识到了为朝鲜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的实践真理。

如果说我很快地认识到了新思潮的真谛，那是因为我生为亡国民族的儿子所具有的悲哀和愤怒的缘故。我们民族遭受的难以忍受的灾难和痛苦，使我早些懂事了。我把受难的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作为自己的命运接受下来。这使我有了巨大的民族使命感。

在吉林的时代，我确立了不可动摇的世界观，这成为我一生的思想精神食粮。

在吉林的积蓄和体验，使我将来能够构筑自主的革命思想的骨架了。

学习是革命者为自我修养而必经的基础工序，是在奠定为社会的进步与变革做出贡献所需基础方面一天也不能中断的脑力劳动。根据我在吉林的时候通过对先进思想的探求所吸取的教训，我今天也在强调，对干革命的人来说，学习是头等重要的任务。

二　尚钺先生

给我介绍了《资本论》的老师是朴素心，而给我介绍了高尔基的《母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的人是尚钺先生。尚钺先生是毓文中学的语文教师。

尚钺先生来毓文中学任教没过几天，我们听到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的新语文教师到任的消息，大家都等待着语文课。

不过，我们迎接新任教师，心里不免有些不安。担心如果新到任的语文教师是教育厅派来的特务，那该怎么办。教育厅派来的毓文中学教师当中有不少是被军阀当局收买的不良分子。

当时是张学良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开始在满洲土地上换上国民党旗帜还不久的时候。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已经把魔爪从沈阳伸到吉林。虽然国民党爪牙们还没能把毓文中学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但是革新思想强的该校教职员和学生的活动，时刻都处在军阀及其走狗的注视之中。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新教员到任了，所以，学生们自然就精神十分紧张地等待着语文课。

尚钺先生只一堂课就使学生们的担心云消雾散，深受我们的欢迎。他在一课时内把长达 120 回的《红楼梦》的庞大梗概全讲完了。提纲

挈领，又不断插入重要生活细节，讲得那么洗练，使我们一下子完全把握了这部小说的结构和一个家长制传统支配的贵族家庭的没落过程。

尚钺先生讲完课一走出教室，学生们就欢呼起来，说毓文中学来了个真正好老师。

《红楼梦》的内容，他谈得很多，可是对其作者却介绍得很少。

第二天，我找到在操场边上散步的尚钺先生，请他具体地介绍一下《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他说，上课时因为时间不够，作者的经历就省略了，你提出这个要求是可以理解的。接着详细地给我介绍了曹雪芹的生平和家史。

听完他的介绍后，我当场就向他提出了有关作者的出身与作品的阶级性质的相互关系的几个问题。

尚钺先生对这些问题也作了明快的解答。他首先说这是他个人的想法，然后才说，作者的出身影响作品的阶级性质，这倒是事实，但决定其性质的绝对因素并不是作者的出身，而是作者的世界观。他举曹雪芹作为例子。曹雪芹虽然生在一个受康熙皇帝特殊优遇的贵族家庭，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却能形象地反映处于衰亡期的封建中国的内幕和它灭亡的必然性，这是因为他的世界观是进步的。

那天，尚钺先生对我说：

“今天成柱同学来找我，做得很对。如有疑问或想知道的问题，就不要犹豫，马上就去请教师给予帮助。这是在科学研究中学生应采取的态度。不要受时间、场所的限制，要多提些问题。我喜欢多提问

题的学生。”

尚钺先生的这段要多提问题的话，吸引了我的心。本来我这个从小学时代起一直以多提问题而出名的学生，入了毓文中学以后仍提很多问题，使教师们感到厌烦。

尚钺先生说，他家有《红楼梦》，也有摘录了曹雪芹简历的资料集，想看的话，随时都可以来拿。就这样，我有幸作了尚钺先生的第一个客人。

我祖父常说，学生老是出入老师家是不可取的。不消说在私塾学着《童蒙预习》之类的书长大的老一代人物，就是所谓靠新式学问开明了的大人当中，也有很多和我祖父一样主张的人。学生如果常常窥见老师的生活内幕，就会不把老师看得神秘了。老师应该让学生把老师看得像既不吃饭又不小便的神仙一样，这样才能树立教师权威，为此，就要在师生之间隔一道屏风。这是我祖父的一贯主张。

祖父说，自从我父亲在私塾念书时就有了这种想法。

我父亲上的顺和书塾有个叫金志诚的老师，特别爱喝酒，都说他只要喝了酒，连纱帽掉了也不知道。他三天两头地叫当接长（等于现在的学生班长）的我父亲去替他打酒来。起初，我父亲还服服帖帖地听从了老师的嘱托。后来有一次我父亲看到那位老师酩酊大醉，在回家的路上倒在路旁水沟里，从那以后父亲就改变了想法。

有一天那位老师把一个大酒瓶递给我父亲，又要他去打酒。我父亲走出书塾大门后，把酒瓶在岩石上摔个粉碎，回来向老师说，被一只老虎追赶，被石头绊了一交，把酒瓶摔碎了。老师听了，无可奈何

地说，“嘿嘿，难道白头山的老虎来到了万景台！竟至亨稷对我撒谎的地步，可见我的熊相在你们眼里多么难看啊。叫你们去打酒，是我的错。”从那以后那位老师就戒了酒。

虽然老师和酒诀别了，可是他那倒在水沟里散发出酒臭的模样，深深地印在我父亲的脑海里。只有师生间隔一道屏风才能维持师道尊严，祖父的这一一贯主张，就是以这种事例为基础的。

尚钺先生还没有来得及设屏风，我就一下子跳进了尚未向任何人开放的先生的生活深处。

先生的书架上有几百本书。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丰富多彩的书架。尚钺先生可谓书的富翁。书架上还有很多英文的小说和传记文学作品。

我站在书架前，久久舍不得离开。把这书架里的知识全都掌握了，不就等于多念了一所大学吗，尚钺先生来毓文中学任教，对我来说也是个幸运啊，我边想着这些边信手取出书来看。过会儿，我问老师说：

“老师，您为置备这些书用了几年时间啊？”

尚钺先生嘴边挂着微笑，走近书架望着我的脸说：

“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

“要把这些书读完，您想需要多长时间呢？”

“勤则三年，懒则百年。”

“老师，如果我要限期三年把这些书都读完，那么您可以把书架对我开放吗？”

“可以，不过有个条件。”

“只要您肯借书给我看，什么条件我都可以接受。”

“不是别的，成柱将来一定要做一名作家，这就是条件。我很早就想培养一两个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做出贡献的作家后备力量，我想成柱是不是可以做其中的一人呢？”

“老师，您这样相信我，实在感激不尽。说实在的，我对文学课特别喜爱，对作家这个职业，也十分憧憬。祖国独立后也许选择文学的道路。可是老师，我们是被霸占了祖国的亡国民的子弟。我父亲为光复祖国奔走一生，在苦难中去世了。我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将来献身于独立斗争。这就是我最大的理想和抱负。解放民族的斗争，就将是我的职业。”

尚钺先生倚着书架，表情深沉地连连点头，然后靠近我，把手放在我肩上轻声说：

“好样的，成柱，如果你的理想是独立斗争，我就以你这个理想为条件，把我的书架统统向成柱开放!”

那天，我借了《红楼梦》回住所。

尚钺先生第二次借给我的书是蒋光慈的小说《鸭绿江上》和《少年漂泊者》。

我很感兴趣地读了这两部小说。特别是以叫李孟汉和云姑的朝鲜青年男女为主人公的小说《鸭绿江上》，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以后又借阅了高尔基的《母亲》。

我们这样通过书和文学建立了特殊的关系。

不管是什么书，凡是我要看的，尚钺先生都借给了我。如果我要的书，他的书架上没有，他还特意抽出时间到别处去给我弄来。我每

读完一本书，他就一定要我谈读后感，这就算借书的代价了。

我们还就高尔基的《仇敌》和鲁迅的《祝福》交换了意见。

在这过程中，我和尚钺先生就很自然地常常交谈对文学的看法。我们的谈话的焦点是文学的使命问题。我们就文学如何反映现实，如何推动社会发展的问题交换了很多意见。

尚钺先生说，文学是引导人类走向智慧的灯火。他经常说，机器推动生产的发展，文学则完成使用这种机器的人的人格。

尚钺先生以特别深厚的感情对待鲁迅和他的作品。他是鲁迅的文友，又是鲁迅领导的文学小组的一个成员。他在进行小组活动时写的短篇小说《斧背集》，得到鲁迅的好评。这篇小说写的是罗山地方的人民反对封建遗习的斗争。据尚钺先生的女儿尚晓援说，鲁迅读过《斧背集》之后，也表示过对这个作品的不满，说缺乏锐利性。

尚钺先生克服了早期创作中的不成熟，在30年代创作出像《预谋》那样在思想、艺术上洗练的作品，博得了读者大众的好评。这部长篇小说，由当时在云南省出版的杂志连载。在80年代，由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单行本出版了《预谋》。

除了《预谋》、《斧背集》外，尚钺先生还创作出长篇小说《矛》、《狗的问题》向读者献礼。他虽然从事教育事业，却一刻也没有中断作家的思考。起初他想引导我走文学道路，并不是偶然的。

我还从尚钺先生那里借阅了《陈独秀选集》。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是掌握过中国共产党的实权的人。

起初尚钺先生不大愿意借给我那本书。他说弄不好会从陈独秀的

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中受到不好的影响。他还说，他在北京大学念书之前，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作为文学系主任进行过活动，许多教职员和学生都曾为他是本大学出身而感到自豪。他说：

“老实说，有一个时期我也崇拜过陈独秀。我读着陈独秀编辑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和他的早期论文，不知不觉地被迷住了。可是现在我对陈独秀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

尚钺先生接着说，在五·四运动时期和共产党建党初期受到那么多人爱戴的陈独秀，之所以威信扫地，是因为他推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最严重地表现在对农民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上。斯大林早在 1926 年就指出，农民是中国反帝战线上的基本力量和工人阶级的最主要、最可靠的同盟军。但是，陈独秀却轻视农民。他怕农民同土豪出身的新军阀发生冲突，因而反对农民干预行政，反对农民的积极自卫。一句话，他企图限制农民斗争。

陈独秀的错误在于：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借口下，反对农村革命，害怕资产阶级退出革命战线。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反而招致了助长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后果。

这就是尚钺先生对陈独秀的看法。

正如他正确指出的，陈独秀的文章里包含着可能给革命带来莫大危害的投降主义因素。

我读完《陈独秀选集》后，为了交流对农民问题的看法，同尚钺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中谈到的是：农民问题在朝鲜革

命和中国革命中所占的地位的共同性是什么，差别是什么？列宁关于农民问题的战略中可以作参考的是什么，要使农民起到革命的主力军的作用，应该怎么办等问题。

我对他说，正如农业是天下之大本那样，农民不也应该看作是天下之大军吗？

尚钺先生对此表示同意，并说，轻视农民，就是轻视农业，轻视土地，因此，有着再好的宗旨的革命也难免失败。他说，陈独秀犯的错误，正是因为忘记了这个道理。

我通过这次谈话确信尚钺先生是共产主义者了。同时，尚钺先生也知道我是搞共青活动的人了。他的感受性和判断力是惊人的。

尚钺先生是在 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在家乡领导农民运动时被国民党反动军阀逮捕，在浙江省陆军监狱坐了一年多的牢，受尽了种种折磨。后来，在朝鲜人军医的帮助下获得保释，化名为谢仲武，来到满洲地方，由叫楚图南的人介绍到毓文中学来。

就农民问题交流了看法之后，我常常同尚钺先生谈论政治问题。当时在吉林的青年学生中政治论争开展得很活跃。中国处于大革命时期，朝鲜也处于群众运动高涨的时期，所以，可以引起论争的问题是不胜枚举的。

朝鲜青年中，李俊的方法对，还是安重根的方法对的问题，引起了激烈论争，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很多学生对安重根的斗争方法赋予了绝对的意义。

我问尚钺先生对安重根的斗争方法有什么看法。他说，当时安重

根的做法当然是爱国的，不过，斗争方法却是冒险主义的。他的这一回答，和我的想法相一致。我认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用处决大军阀的一两个走狗的恐怖方法是决不能取得胜利的，只有教育群众，使群众觉醒，把全体人民发动起来，才能达到目的。

我和尚钺先生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朝史及其在朝鲜的殖民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侵略企图和军阀的动向，朝中人民在反帝反侵略斗争中团结和合作的必要性等问题，也交换过意见。

当时，毓文中学的学生们就“国际联盟”对裁减军备的态度，议论纷纷。学生当中有不少人对“国际联盟”抱有幻想。因此，我写出了一篇以“国际联盟”拿裁军问题讨价还价为内容的论文。许多学生都支持了这篇论文。尚钺先生看了论文后，也说我的看法是对的。

尚钺先生来吉林后，同共产党的组织关系断了，但是他上了多次解说高尔基、鲁迅等进步作家作品的启蒙式的课。有一次，他接受秘密读书组成员的建议，以“反对帝国主义”为题，在学校图书室上了为期一周的特别课。听讲的学生们反映很好。

我把这些反映收集起来，鼓励尚钺先生。

尚钺先生由于他的思想的进步性、对后代教育的高度负责、对古今中外的文化与历史的渊博知识，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被军阀当局收买的反动教员们，对此感到非常不顺眼，进行卑鄙的活动，企图破坏尚钺先生的教师权威。受尚钺先生庇护和支持的学生，也成为他们陷害和嫉妒的对象。

一个姓冯的教员威胁李光汉校长，要他开除朝鲜学生；姓马的体

育主任企图造成反对我的舆论，说什么朝鲜学生敌视中国教员。

每当这时，尚钺先生都保护了我。

英语教员也敌视向往新思潮的学生。他是一个崇洋思想渗入了骨髓的人。他看不起东方人，以至说什么西洋人吃东西不出声，中国人却发出很大的声音，这是未开化的表现。他自己是中国人，却仿效西洋人。

就东方人的后进，他说了太多的卑鄙的话，大大伤害了我们的感情。于是，我们在食堂值班那天，特意做了汤面，请教师们到食堂吃。这天吃饭时间，因为大家都吃热汤面，食堂内一片呼噜呼噜的响声。那个英语教员也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吃汤面。学生们看着那教员用嘴吹着费力地吃面，哄堂大笑。英语教员看出学生们为了整自己，特意做了汤面，便红着脸溜出食堂去了。从那以后，他就不再说污辱东方人的话了。因为这位教员崇洋思想太严重，学生们都不愿意听英语课。

进入 1929 年，反动教员对尚钺先生的压力更加严重了。

有一次尚钺先生宣传，体育越大众化越好，这比以选手为主要好。这是针对选手们独占操场上的篮球场的现象说的。一群品质恶劣的选手为此感到不满，放学后成群地扑向由学校回住处的尚钺先生，企图施加暴行。

我把共青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发动起来，事先制止了这一暴行，把他们严厉地叱责了一顿赶走了。

“马体育主任，喽罗豢养得好啊，虫豸不如的东西!”尚钺先生冷冷地望着逃跑的那帮人慨叹道。

“老师，不必太震惊。这不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吗？我们要作好精神准备，今后会有比这更尖锐的冲突呢。”

我笑着这么一说，他也肯定了这话。

“你说得对，我们正在同军阀作斗争嘛!”

后来，尚钺先生为使被教育厅无理开除学籍的学生恢复学籍而斗争，因此被撤职离开了毓文中学。

我到长春和卡伦地方去指导群众组织的工作后，刚一回校，权泰硕就跑来给我转达了尚钺先生留下的信。

信的主要内容是：我在同军阀的斗争中失败，离开这里；可是将来我们一定会战胜军阀；成柱你决心一生做祖国和民众的真正儿子，为了你的这一信念，我无论到哪里，都衷心为成柱祝福。

这就是尚钺先生留给我的最后一段话。

在那以后我一次也没有见到尚钺先生。只是收到先生在1955年给我送来的文章《我与金日成元帅少年时代的一段历史关系》和1980年送来的《中国历史纲要》，才得知先生还在世。那时，我看了文章，回顾着和尚钺先生谈过朝鲜形势和满洲形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朝中人民的共同斗争的毓文中学时代，在心里向老师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每当中国的领导人来我国访问时，我都问他安否。可惜，同先生的会晤终于未能实现。在我来说，我没有尽到作为老弟子应尽的道义，应该这样说才对。国界，确实是个怪东西!

尚钺先生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授，于1982年不幸去世。

尚钺先生的大女儿尚佳兰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当研究员，于1989年访问了我国；1990年，三女儿尚晓援来我国见了我，她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我从他的两个女儿的面孔上找到了60年前离别的老师的面容时，心情无比高兴。难道因为民族不同，连感情也会变吗？人的感情是超越皮肤、语言和信仰的壁障的。如果毓文中学的校园在旁边的话，我就可以摘下满满一把在校园盛开的丁香花送给她们说："这是你们的父亲喜爱的花。尚钺先生和我常常在这花树下会面。"

尚钺先生离开吉林后，在哈尔滨、上海、北京、汉口、重庆、宁夏、延安等地忘我地从事过党务工作、教育工作、文化工作和写作。听说，有一个时期他还在满洲省党委当过秘书长。

他一直没有忘记我，一直对中国的亲密邻邦、我的祖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珍藏着国际主义的感情，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尚钺先生的遗骸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里。

一个人能有一辈子时刻缅怀的老师，那他无疑是幸福的人。那么，我可以说也是幸福的人了。

每当想念给我的青年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的尚钺先生的时候，我的心就走进了毓文中学的校园。

三　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

由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和秘密读书小组成员的努力，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有了迅速的传播，青年学生的思想意识随之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先进思想使他们逐渐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在历史和民族面前所承担的任务。

我们在继续进行青年学生意识化工作的同时，还吸收他们参加了各种组织。只有通过组织，才能更广泛地传播马列主义思想，才能更迅速地培养骨干力量。

我的革命活动，是从青年学生运动开始的。我们之所以从青年学生运动开始搞革命活动，并且那么重视青年学生运动，固然是因为我当时是个学生，但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个运动在实现工人、农民和广大群众的意识化和组织化的工作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

马列主义理论把青年学生运动的作用比做桥梁作用。换句话说，青年学生运动起着传播先进思想，唤醒群众，推动并引导群众投入革命运动的桥梁作用。我们也肯定这一理论。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我们对青年学生的作用的看法和立场，发生了质变。我们突破了从前那种认为革命的动力只是以工人、农民为主的旧观点，崭新地认定青年学生在革命斗争中是一支堂堂的主力。

这是为青年学生运动所走过来的历程所证实的。

在三·一人民起义、六·一〇独立万岁运动、光州学生事件[12]等解放前在我国反日爱国斗争中成为高峰的主要历史事件中，青年学生一向站在最前列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我们依靠青年的力量开拓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历史，也以青年学生为骨干，进行了历时 15 个春秋的抗日武装斗争。在今天的我国革命中，青年学生仍然起着突击队的作用。

在南朝鲜的革命中，也可以说它的主力是青年学生。四·一九起义[13]的催生婆是青年学生，光州人民抗争（1980 年）[14]的主角也是青年学生，打倒了“第五共和国”政权的六月抗争的旗手也是青年学生。

在中国人视为新民主主义运动的开端的五·四运动中，站在最先锋的也是青年学生，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

开辟人类从未走过的亘古未有的道路，不断创造新经验的朝鲜人民的丰富而漫长的斗争历史证明，从前那种认为青年学生还不配做一个阶层的理论，是不尽符合我国实际的。

本世纪 20 年代前半期的我国青年学生运动，有阶级立场和反帝立场不够坚定，没有深入群众的缺点。运动的上层领导，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运动的主力也偏重于启蒙活动。

我们为了使青年学生运动彻底防止重复这种缺点，稳妥地迈出第一步，做出了一切努力。

可是，当我们真地要建立组织，吸收青年学生参加的时候，就遇

到了错综复杂的问题。

在实现青年学生的组织化方面，我们最感到困难的问题是，在已经存在着民族主义者和宗派分子们建立的青年组织的情况下，该用什么方法，以何种形式，建立我们的青年组织。吉林市已建立的就有吉林青年会、朝鲜人旅吉学友会和少年会等多种组织。如果没有这些组织，还可以像在空地上盖房子一样毫无顾忌地把组织建立起来。但是在各个不同系统的组织已经建立起来进行青年学生工作的情况下，完全无视他们是不可能的。

我们经过慎重的讨论，决定采取这样的方法：在已有的组织中，对那些只有牌子没有活动的组织，不加理睬，把它重建起来；对那些尽管微弱却还在活动的组织，就不去动它，而要加以利用，进行改组。

我们在吉林建立的第一个组织是朝鲜人吉林少年会。当时，吉林有一个民族主义者建立的少年会，但它有名无实，吉林市内的朝鲜少年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组织。1927 年 4 月，我们在孙贞道的礼拜堂建立了一个叫做朝鲜人吉林少年会的合法组织。

我和金园宇、朴一波（朴宇天）一道主持了这个会议。会上，建立了这个少年会的组织部、宣传部、文体部等部门，还按学校和地区分别组织了班组。

这个时期的情景，当时的少年会宣传部负责人、吉林女子师范学校出身的黄贵轩会记得很清楚。

少年会吸收了工人、农民、中小工商业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子女等吉林市内的所有朝鲜少年。朝鲜人吉林少年会的目的是，用反日思想

教育少年，培养他们成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

朝鲜人吉林少年会在其纲领中提出的重要任务是，会员学习新的先进思想，并向广大群众广泛地进行宣传和解释。

是年 5 月，我们把朝鲜人旅吉学友会改组成了朝鲜人留吉学友会。

朝鲜人旅吉学友会，有不少会员，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它原来是来吉林读书的朝鲜青年学生，为谋求相互之间的亲密与和睦而组织的团体。民族主义者们做它的后盾。孙贞道也是这个旅吉学友会的顾问之一。

当我们要把旅吉学友会改组为留吉学友会的时候，有些人就强调朝鲜人旅吉学友会是民族主义者主持的纯粹的亲睦团体，凭这一点，就应当把它推倒。他们说，如果底子是民族主义的，那么，把别种性质的东西添得再多，也都会被民族主义所同化。这种主张的实质，是要打倒民族主义这个旧思潮。

当时，争取群众的竞争很激烈。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相对立，竞争似地争夺群众；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各个派系，也互相争夺群众，闹得十分混乱。今天汉城派掌握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领导，明天火曜派就组织一个汉阳青年会来与之作对；如果火曜派搞出了朝鲜工农总同盟，汉城派就弄出一个京城工农会来与之抗衡。这已成了一种邪风。宗派分子们为了牵制别的派系，甚至争先恐后地组织了恐怖团。

但是，我们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是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的。

如果我们按照宗派分子们的做法无视朝鲜人旅吉学友会，在吉林建立又一个新的青年组织，就会在同民族主义者的关系上出现复杂的

情况，就会分裂学生、青年的队伍。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我们决定加入朝鲜人旅吉学友会，继续维持其合法性，同时逐步把这个纯粹的亲睦团体改组为革命的组织。我当上了这个会的名誉会长。虽然我是共产主义者，但在表面上同民族主义者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没怎么引起中国军阀当局的注意。我在领导朝鲜人旅吉学友会的期间，对它进行了改组，把它改称为朝鲜人留吉学友会。

朝鲜人留吉学友会表面上是朝鲜青年学生谋求亲密和睦的团体，实际上是作为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的革命的学生组织进行活动的。把朝鲜人旅吉学友会改称为朝鲜人留吉学友会，把这个纯粹的亲睦团体改组为革命的组织，这是我们在青年学生运动中取得的宝贵经验。

自从我们建立的组织开始活动以来，吉林市内的空气就开始发生了变化。

首先，青少年学生每日的生活有了根本的变化。加入了少年会和留吉学友会的青少年，每天早晨分区举行早会；一到星期天，就集合市内全体会员排队上北山举行活动，也搞唱歌行军，还到北山山脚下的运动场举行体育比赛。

我们做青少年学生的工作，根据他们的爱好和觉悟水平，灵活运用了多种形式和方法。

加入少年会的学生中有不少是基督教徒的子女。他们受父母的宗教信仰影响很深，以致相信世界上真地存在着上帝。对他们，不管怎样说明没有上帝，信教是蠢事，也毫无效果。

有一天，我托在我们影响下的一位朝鲜人小学的女教师，请她带领信教的学生们到礼拜堂去，参加礼拜。

那位女教师，照我的吩咐把学生都带到礼拜堂去，让他们祷告上帝："全知全能之父上帝哟，我们饿了，请给我们米糕，给我们面包吃吧。"祷告了一整天，他们自然没有得到米糕或面包，肚子却饿得咕噜咕噜直响。

下一回，我就请那位女教师带领学生到收割过的麦地去拾麦穗。女教师真地带学生到麦地去了，而且捡了相当多的麦穗。然后把这些麦穗带回去磨成面，做了面包，分给了学生。学生们吃着面包，产生了与其祈求上帝，不如用劳动换取粮食的想法。

这个做法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在改造青少年的思想意识，消除陈腐习俗方面，却也是一个方法。

我们劝阻青少年上教堂去，不断地教育他们不要做迷信的俘虏，其目的并不在于要打倒宗教。青少年如果沉湎于迷信，绝对相信耶稣的教义，就会变成对革命毫无用处的软弱无力的人。因此，我们的目的是要防止他们落入这种地步。虽然没有当信徒就不能革命的道理，但是对青少年来说，他们还缺乏对世界的科学认识，有可能从宗教所包含的不抵抗主义因素中受到消极的影响。

到了吉林，我看见有些少年会员在街上走路还唱着赞美歌。宗教对青少年的影响已有如此之大。唱赞美歌，是不能向敌人的火力点冲锋的。对我们来说，更需要的是会唱决战之歌的战士，而不是唱赞美歌的宗教信徒。

因此，我们向青少年大力普及革命的歌曲。这样，那些曾经在走路时也唱赞美歌的青少年，不久以后，就开始唱着《少年爱国歌》、《朝鲜人吉林少年会歌》，在大街上昂首阔步地行进了。

自从组织了朝鲜人吉林少年会和朝鲜人留吉学友会以后，在我们进行的活动中，至今难忘的是，那年暑假办的国语讲习。我们让上中国小学的朝鲜少年和不懂我国文字的孩子们都参加了讲习。他们大部分是在满洲出生的。在满洲出生的孩子们，中国话比朝鲜话讲得好。

我们从那时就提出了“朝鲜人要熟悉朝鲜”这个口号。

桂永春、金园宇、朴素心轮班讲课。那时，我们没有专讲课的教师，组织里的骨干分子都是教师，也都是讲演者。

历时 20 天的讲习结束后，参加过讲习的少年，个个都能读儿童杂志了。

少年会和学友会按照青少年的兴趣和爱好，组织了龙潭山远足和江南公园野游，组织参观和踏勘文化遗迹，还组织了各种课外活动，如：报告会、讨论会、学习会、演讲大会、读书心得发表会及教唱歌曲、文艺演出等。

当时，我们常把江南公园和北山作为秘密活动的场所。江南公园是松花江上的一个岛子，像绫罗岛一样美丽。吉林的资本家们在这里种了很多树木，把它点缀得像植物园一般秀丽，叫人们买票入场，以此赚钱。那里的空地里还栽了落花生。我们在那里举行了很多次以野游为掩护的秘密会议。

北山是比江南公园更理想的秘密会议场所。在草木茂盛的夏季主

要利用江南公园；北山则不受季节的限制，不分四时都可以利用。北山是吉林游人最多的游园地。因此，北山及其周围是吉林市里服务行业最稠密的地方。伸向北山的路两旁，各类饮食店、糖果棚、玩具铺、烟阁子、杂货铺、茶馆、娱乐场等，鳞次栉比，还有专卖洋货的较大的京广洋货商。

北山游人多，不只因为那里风景美，而且还有药王庙等许多名胜古迹。药王庙是供药王的庙宇。

在吉林，每年 6 月 4 日到 6 日是庙会期，由省政府主持举行庆祝药王诞辰的官方制定的活动。一般市民自不必说，连有官有职的人也都来赶庙会。有庙会的三天，还宣布为假日。

在庙会期间，警察当局在北山脚下大路的东边，设临时派出所，架设电话，山上还部署了警察班，以维持工商界的秩序，还为药王庙、关帝庙、娘娘庙的香火不致引起山火，严加戒备。在这三天庙会期间，马车夫和人力车夫能挣到十倍于平日的钱。

做买卖的人，都把这三天庙会当作赚钱的好机会，而这个城市的志士和先觉们，则打着省立通俗讲习所的牌子，把庙会当作对群众进行启蒙的社会教育的讲坛。职业各不相同的启蒙活动家，到处挥着拳头高谈阔论，他们讲的主题更是名目繁多，爱国、道德、守法、美感、实业、体育、卫生，等等，这五花八门的热闹场面，除了北山，哪里也看不到。

我们也夹在这乱纷纷的人群里，把先进思想灌输给群众，有时还进行秘密会议。药王庙的地下室，差不多成了我们专用的会议室，因

为我们把那个庙的和尚争取过来了。

我在吉林上学时，作过很多次讲演。有时，还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讨论会上去作演说。吴东振、李铎等正义府的领导人，每逢国耻日（8 月 29 日）、3 月 1 日和檀君诞生日（10 月 3 日）等主要纪念日，就召集市内的侨胞和青少年学生，举行讲演会或讨论会。

留吉学友会成员当中，常常就李俊的方法对还是安重根的方法对这个问题发生争论。因为争论了多次也毫无结果，我们在旅吉学友会改组为留吉学友会的那年夏天，又把市内的朝鲜学生都召集在孙贞道的礼拜堂，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通过那次讨论会，吉林的青少年大大提高了觉悟。他们第一次认识到恐怖行动成不了事；请愿，更不行；以为大国会给予帮助的想法，也是妄想。他们一致认为，为了争取朝鲜独立，必须探讨出一条新的前进道路。

当时在吉林进行的讨论会和读书心得发表会上，常常讨论与朝鲜革命实践有关的问题。

我们把每年 5 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定为“少年会日”，在这天开运动会，让吉林市内的朝鲜青少年及其家长、志士和独立运动者都来参加，从而创造了团结的气氛。青少年团结起来后，就动员他们参加教育群众的启蒙活动。连那些十岁左右的少年会员，都在假期到江东、六大门、新安屯、大荒沟等近郊农村去，一面帮农民干活，一面做启蒙工作。

在派系斗争很严重的吉林，我们把那些百人有百种想法的青少年，变成了有同一种想法的青少年，这的确是可贵的成就，难得的体验。

由于朝鲜人吉林少年会、朝鲜人留吉学友会、马克思列宁主义读书小组的积极活动，以“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员为核心的新一代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成长。

驻吉林的日本总领事也看出了这一点，开始注意我们的活动。总领事对在吉林一带出现的新的革命力量迅速扩大一事，不胜惊讶，在呈报本国外务大臣的正式文件中敲了警钟，说这个队伍组织力很强，有成为一支可怕力量的危险，必须特别加以注意。

日本帝国主义不害怕内部四分五裂的朝鲜共产党的宗派集团，也不怎么害怕缺乏实践能力、对群众的渗透力微弱的民族主义势力，而对我们这支队伍的存在，非常害怕。因为我们与派系斗争隔绝，不对任何人察颜观色，深入人民群众，以独立自主的方法开辟革命道路。

吉林出现了新的运动的消息不仅传到满洲各地，还传到国内和中国关内去了。这个消息主要是由到吉林读书的留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传扬出去的。

为了汇合到我们的运动中来，有很多青年从国内、日本、滨海省和满洲各地来到了吉林。来找我们的青年，情况千差万别，有与独立军有关系的，有到日本勤工俭学的，有与白党打过仗的，有在黄埔军官学校毕业以后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有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到处辗转的，也有列宁的崇拜者、孙文的崇拜者、卢梭的崇拜者，等等，他们的政见、组织关系、生活经历各不相同。金赫、车光秀、金俊、蔡洙恒、安鹏等，也都是在那个时期来找我们的。

我们一方面教育他们，把他们吸收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中来，

另一方面，把组织扩大到市内各个学校去。

在这过程中，我们想到应该有一个比“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更大的阵容，能吸收更多的人的组织。出于这种必要，1927 年 8 月 27 日，我们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改组为反帝青年同盟；第二天，又以“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精髓分子为基础，创立了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反帝青年同盟照样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口号，并继承了它的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的非法青年组织。它主要由朝鲜青年组成，但也吸收了一些反帝立场坚决的中国青年。

反帝青年同盟对把反日青年大众团结到革命队伍中来，并为巩固反日斗争的群众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个组织渗透到文光中学、吉林第一中学、吉林第五中学、吉林师范学校、吉林女子中学、吉林法政大学等有朝鲜学生的市内所有学校。这个组织还在江东、新安屯等吉林近郊的农村地区以及柳河县、桦甸县、兴京县一带扎下了根。凡是有朝鲜青年的地方，都有这个组织。

不久，反帝青年同盟用油印机印了宣传材料。

那时，我们为了团结更多的青年，一到星期六，放学后就到近郊的农村去。星期六放学后出发，办完事，星期天下午就回来。

我们之所以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改组为反帝青年同盟，并紧接着创立共产主义青年同盟，是因为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在吉林和抚松一带，吸收青年学生参加的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群众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个能够对所有这些组织进行统一

领导和管辖的组织。

建立一个新的青年先锋组织，是当时青年运动发展的合乎规律的要求。

那时，我同所有这些组织都有关系，所以通过我一个人的活动，建立了各个组织相互间的联系。崔昌杰、金园宇、桂永春等人，也都是以青年共产主义者个人的名义，同各个学生青年组织建立了关系的。

从当时的形势看，建立新的先锋组织也是个迫切的问题。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准备侵略满洲。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对朝鲜人民加强暴力镇压，一面在满洲同反动军阀相勾结，为扼杀朝中人民的反日气势，疯狂活动。

朝鲜青年到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军阀，奋起开展斗争。这种情况，迫切地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先锋组织，能够有组织地团结并统一地掌握青年学生，熟练地领导他们进行斗争。

从青年运动由于腐朽的民族主义者和宗派分子争夺领导权而濒临四分五裂的情况来看，也需要一个先锋组织，以拯救青年，摆脱分裂的危机，从而正确地引导他们走统一团结的道路。这是落在新一代共产主义者身上的刻不容缓的时代的任务。

当时，中国东北地方，非法的青年组织有满洲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团，合法的青年组织有南满洲青年总同盟、北满洲青年总同盟、东满洲青年总同盟、吉林青年同盟、吉会青年同盟、三角洲青年同盟等许多团体。

因为各个派系的宗派分子都去拉拢这些青年团体，又有各个不

同势力的民族主义者，竞争式地把手伸向这些团体，连属于那些团体的人，都弄不清自己所属的团体到底是共产主义的，还是民族主义的。青年学生就这样分成了许多派系。有的学生受着ＭＬ派或火曜派的影响，有的同样是民族主义者的子弟，却还要根据他们的父亲所属的团体，分为正义府一边的、参议府一边的、新民府一边的，其中还要分成保守派和革新派。由于见解和所属团体各不相同，他们总是处在反目不和的状态中。

要改变青年运动的分裂状态，使青年们摆脱民族主义势力和宗派分子的影响，引导他们走上真正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就必须建立新的先锋组织。

坦率地说，如果那时朝鲜共产党多少能起到自己的作用，就用不着我们为这些问题费心了。存在着以共产主义为宗旨的党，还有很多青年组织，然而却一点也得不到他们的帮助，哪里还有比这更令人焦虑和痛心的事呢！

朝鲜革命，由于本身的特殊性，内含着复杂的问题，步步都有障碍和困难横在面前。

同宗派分子的关系、同民族主义者的关系、同中国人民的关系、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都经常出现复杂的情况。加上，在满洲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受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军阀的双重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熟练地领导革命，就必须有一个能够承担这个任务的久经考验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指导理论。

在为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而斗争的过程中，许多优

秀的青年共产主义者成长起来了。他们是不搞派系斗争，不懂得事大主义，没有政权野心，没有染上污垢的新型的青年共产主义者，是能够为我国青年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开辟新的道路的真正的核心。

在桦甸和吉林探讨新思潮，同“打倒帝国主义同盟”一道闯过斗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具备了与朝鲜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一定的指导理论。

我决定成立一个体现这种指导理论的先锋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并着手制定它的纲领和章程。

纲领特别强调地指出，共青同盟以同朝鲜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的理论为指导，彻底反对宗派。

我们基于这样的准备工作，于1927年8月28日，在北山公园的药王庙地下室，举行了成立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崔昌杰、金园宇、桂永春、金赫、车光秀、许律、朴素心、朴根源、韩英爱等反帝青年同盟骨干和青年共产主义者。

我作了报告，报告内容已印成小册子公布于世。

那天，也像成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那样，我们全体都挎着臂膀，合唱了《国际歌》。

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是以反帝青年同盟的核心分子为骨干，由各革命组织里经过锻炼和考验的青年组成的，为反帝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非法的青年组织。

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是朝鲜青年共产主义者的先锋队，是组织和领导各阶层群众团体的先锋组织。

成立了共青同盟以后，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保证队伍的纯洁性，加

强队伍在组织思想上的统一和团结。在当时宪兵、警察、特务的蠢动和反动分子、宗派分子的危害活动猖獗的情况下，不解决这个问题，是无法保存组织的。

共青同盟十分重视对盟员的思想教育，为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和领导能力，对学习倾注了很大力量。当时，在盟员中间，就“关于帝国主义”、“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朝鲜革命的当前斗争任务”等问题深入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我们非常重视共青盟员的组织生活。当时，共青同盟每月进行一次个性检讨会，检讨共青盟员的生活。共青盟员通过组织生活得到了锻炼，共青同盟成长为组织性和纪律性很强的集体。

我们给共青盟员分配各种任务，如：指导下属组织、对青年学生和群众进行启蒙工作、进行农村的革命化等，从而使他们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地得到锻炼。

同时，选拔那些在革命组织中得到锻炼的优秀青年，不断扩充共青同盟的队伍。这样，共青同盟在很短的时间内，不仅发展到吉林市及其近郊，还发展到敦化、兴京、桦甸、抚松、安图、磐石、长春、哈尔滨等满洲广大地区和朝鲜北部一带以及国内腹地。共青同盟在朝鲜革命中起到了先锋队的作用。党领导群众组织，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是属于常识的问题。但是在我国，因为党未能起到应起的作用，共青同盟就把应由党来做的工作也承担起来，一面领导自己属下的青少年组织，一面还领导了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和妇女组织。

我们成立了共青同盟后，没有宣扬，悄悄地渗透到群众中去了。

即使无人承认，只要对革命、对人民有利的工作，我们就做。这就是我们的立场，我们的主张。当别人为夺取领导权，打着“正统派”的牌子到处宣扬的时候，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同他们追求虚荣的境界划清界限，沿着革命的道路一步又一步地走向前方。

共青同盟在促进青年群众有组织的团结，培养骨干，加强我国革命的主体力量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青年共产主义者建立新型党组织的活动，并为早日实现建党工作，起到了中枢的决定性作用。1930 年夏成立的第一个党组织的成员，大多数是由共青同盟培养的堪称先锋的青年战士。

前不久，我们把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成立日——8 月 28 日定为青年节。

四　为了扩大组织

我们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和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后，逐渐向广阔的地区扩大了活动场地。为了扩大组织，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骨干陆续离开了吉林。

当时，我虽然是学生，还是经常到许多地方去。甚至经常来往于离吉林有几百里地的地方，开辟新的活动舞台。星期六，坐晚车去蛟河、卡伦、孤榆树等地，第二天坐晚车返回来，如遇到不得已的情况，也有缺课的时候。对我的缺课，除了李光汉校长和尚钺先生之外，大多数教师都感到奇怪，甚至还有人猜想，我因为没有父亲，家境又贫寒，所以才去外地挣学费的。

我是个学生，所以不能不受到许多约束和限制。既要听课，又要参加课外学习，还要挤出时间去做各组织的工作，所以我总感到时间不够用。

只有假期，才能不受时间的限制，自由地进行活动。我们在平时作好准备，一放假就到各地去进行组建组织的活动和群众启蒙工作。

深入人民群众，这在国内也成了一种社会风潮。到了假期，就有很多学生到农民中间去进行启蒙活动。我在华成义塾的那年夏天，在国内，由《朝鲜日报》社组织那些放假回乡的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编成启蒙

队，为他们办了讲习，然后派到各地农村去，用报社编的朝鲜语教本，做扫除文盲的工作。

留学日本的学生，到了假期，也回到祖国，组织留学生巡回讲演队，巡回全国各地，进行启蒙工作。天道教和基督教青年会也深入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振兴工作。

然而，由于总督府把一切旨在启发民族意识的国民运动都视为对他们的殖民政策的反抗，加以彻底镇压，并由于这个运动的领导者们在思想上的局限性，国内学生的启蒙运动没能发展到使群众革命化、组织化的阶段，而停留于克服民族落后状态的纯粹的改良主义运动。到了本世纪 30 年代中叶，连这类运动也进入了低潮。

从他们在农村进行的活动内容可以看得出，那种运动是纯粹的改良主义运动。他们的活动的重心是扫除文盲和对农村生活环境进行卫生改造。基督教青年会成员们进行的活动中，甚至有改善烹调法运动、清洁使用水井运动、养鸡法、养蚕法以及当局颁发的证明书、申请书的用法，总之，包括了介绍和引导农村居民走向近代生活的各种文化启蒙问题。

我们利用日本帝国主义还不能直接到这里来进行镇压的有利条件，把农村启蒙活动同群众的组织化、革命化活动密切结合起来，并为使之升级为一个积极的政治斗争形式，倾注了很大力量。我们进行群众工作的方向是，以爱国主义教育、革命教育、反帝教育、阶级教育为主线，使人们意识化，并把他们团结到各种群众组织里来。

我们所以全力以赴地实现群众革命化，是因为我们摆脱了从前把

群众只看作愚昧无知的启蒙对象的思想方法，而树立了认为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导师，是推动革命的基本动力这样一个观点，并认为这是绝对的。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观点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的。

“深入人民群众!”

这一口号，从那时起就成了贯穿在我整个一生中的座右铭。

我是从深入人民群众开始革命活动的，今天仍然是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继续着革命工作；并且正以深入人民群众来作一生的总结。假如我忽略过接触人民群众哪怕只有一刻钟，忘却过人民的存在哪怕只有一个瞬间，那么，我在十几岁时就已形成的对人民的纯洁、真诚的热爱就不会保持到今天，我就不会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服务员了。

每当想到人民的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得到无限发扬的我们今天的社会，我就要感谢吉林时节，感谢它让我开始搭上了驶向人民的列车。

我们真正地深入人民群众，是从 1927 年的寒假开始的。

对富人家的学生来说，寒假是名副其实的享受。在这一冬里，他们在家躺着看爱情小说，或者坐火车到长春、哈尔滨、北京那样的大城市去游逛。到了春节，吃佳肴，放鞭炮，痛快地玩。本来，中国人就有从阴历正月初一到二月二，一直玩一个月的习俗。他们称二月二为龙抬头，把正月里杀的猪全吃完，才算过完了节。

可是，我们既不能像他们那样去游逛，也不能阔阔气气地过年节。我们一心想的是怎样利用假期，为革命多做工作。一放假，我就带着演艺队员到长春去，从那里回来，马上又到抚松去了。朴且石和桂永

春也和我同行，约定在我家过一冬。那年寒假，我们过得很紧张。

我一到家，就被新日少年同盟的盟员们围住了。他们毫无保留地向我谈了同盟工作碰到的困难。

听了同盟委员长的话，确实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为了给他们解决困难，费了很长时间做新日少年同盟盟员的工作。教给同盟干部以演艺宣传队的活动方法、社会活动方法、群众工作方法、同盟内部工作方法，还经常参加他们的政治讨论会和个性检讨会。

整顿好少年同盟的工作后，我们以抚松地方的青年骨干组织了白山青年同盟。为了表现它是白头山周围青年的组织，才起了白山青年同盟这个名称，实际上，它是反帝青年同盟的同种异体。我们所以没有把它的名称定为白山反帝青年同盟，而定为白山青年同盟，是为了把组织伪装起来，混淆敌人的耳目。白山青年同盟伪装成受民族主义影响的团体，进行了合法活动。

我们把白山青年同盟盟员调动起来，在清洼子和周围的农村办起了夜校。

在青年组织增多，队伍日见扩大的情况下，我想到必须有一个能够给广大青年和群众以精神食粮的报纸。办报的工作是白手起家的。按照我们的希望，很想一次印个一百来份报，可是我们没有油印机，也没有纸张。抚松虽然有一个中国人办的小印刷所，但从我们编报的内容来看，是不能委托那个印刷所来印的。我左思右想，决定用手写出报纸，便动员新日少年同盟积极分子和白山青年同盟骨干来搞这项工作。写一百份报，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1928 年 1 月 15 日，我们终于拿出了题名《新日》的报纸创刊号。

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道那时是哪里来的精力写了那么多的字，真有点难以置信。我至今还常常怀恋那个时候的朝气和青春。那时候，我们为能把自己完全献给革命，而感到无上的幸福。

没有梦想、胆力和热情，没有魄力、斗志和浪漫的青春，就不是青春。年轻时，应该提出很高的理想，并为实现这个理想，不畏千辛万苦地进行顽强的斗争。具有清新的思想、健壮体魄的青年献出血汗培植和收获的所有果实，都将成为祖国的宝贵财富；对创造了这些财富的主人公，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人上了年纪，常怀恋自己的青年时代，是因为青年时代是人的一生中能工作得最多的时期。能做大量工作的时期是最幸福的。

后来，我从父亲的至友那里，好不容易地弄到了油印机，用它印出了《新日》报。

在 1927 年的寒假活动中大放异彩的是演艺宣传队的活动。参加抚松演艺宣传队的有新日少年同盟和白山青年同盟的盟员以及妇女会员。这个演艺宣传队在抚松及其附近的农村部落，进行了约一个月的巡回演出。我们一面搞巡回演出，一面在所到之处组建组织，进行群众启蒙工作。

《血喷万国会》、《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女儿来信》这些话剧都是那年冬天，我们在抚松创作并演出的剧目。

演艺宣传队在巡回演出之前，在抚松市内搞了几天演出活动，这时，军阀当局毫无理由地把我抓去关进了监狱。原来，有几个老封建

因为我们演出的节目不合他们的口味，秘密地向军阀当局告了我一状。

那时，小学时期的同学张蔚华为了争取我的释放，做了很大努力。他说服自己的父亲，让他对军阀当局施加压力，不许他们搜查我的家。

张蔚华的父亲多次到我家治病，和我父亲叙谈很融洽，成了至友。他虽然是个巨富，却是很有良心的人。我父亲在抚松倡议恢复白山学校，为得不到当局的许可而焦急的时候，是他出面交涉才办妥的。

因为有张蔚华的父亲这样有权有势的人施加压力，又没有抓到我什么把柄，军阀当局也就拿我没有办法了。

那时，住在抚松的朝鲜人集体地拥到军阀当局，提出抗议，要求他们释放我，是我母亲发动组织动员了群众的。有志的中国人也对军阀当局的做法提出非难，要求他们释放我。军阀当局无可奈何，不久就把我放了。

我一走出警察署，立刻就带领演艺宣传队到富水河村去了。在那里一连演出了三天。连邻村的人都来看我们的演出。这样，演艺宣传队的消息就传遍了周围的村落。

杜集洞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便来邀请演艺宣传队到他们村去。我们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

在杜集洞的演出，盛况空前，群众纷纷要求我们多停留几天，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延长停留时间。

第一场演出结束时，新日少年同盟委员长跑到后台来告诉我，村里长老在找我。

一位神采奕奕的半老人，口衔旱烟袋，在我们刚演出过的那家院子的篱笆外面等着我。老人从浓浓的长眉底下仔细地端详着我。那位把我带到这个村里来的青年人靠到我身旁，小声告诉我“这是车千里老人。”

我一听到是车千里，就马上向他鞠了一躬。

“老大爷，请原谅我没能先去拜见。听说您到邻村串门去了，未能先来向您请安。”

“我是去串门来着，听说来了演艺队，就急忙赶回来了。听说你是金亨稷先生的公子，这话属实吗？”

“是的。”

“有你这样的儿子，金先生在九泉之下也能放心了。这样好的演艺，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看到。”

老人待我十分有礼，倒使我慌了神。

“老大爷，请不要这样，对着一个儿辈，请别这样。”

这天，老人把我邀到他家去了。我在和老人同行时，问他：

“老大爷，恕我冒昧。听说，您一天能走千里路，是真的吗？”

“嚯，你也听到了这个风闻。我在盛年时，千里不敢说，五百里是走过的。”

我听了他的回答，心想，车千里老人真是名不虚传，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独立运动者。人们在他的姓氏后面加了“千里”这个外号，是有缘因的。由于“千里”这个名，满洲地方的朝鲜人都把他看作是传奇式的人物。

我父亲在生前也曾提到他走路的本事是令人佩服的。父亲说，千里这个外号是从他在江界地方进行义兵活动时开始叫起来的。

车千里来到满洲后，入了参议府的所部，作为沈龙俊的部下进行活动。据说，参议府归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所辖时，最坚决反对这一点的就是车千里。不甘心独立军团体被纳入临时政府范围的正义府的几个人对他极口赞扬。正义府的领导班子多为军人出身，他们把文官为主的临时政府看得无足轻重，这种倾向在正义府成为主流。

那天，车千里老人给我讲了许多很有教益的话。他十分慨叹地说，朝鲜民族本来是完全可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作为堂堂的独立国的人民发展下去的，只因为封建统治集团腐败无能，才招致了国家的沦亡。他说，要搞独立运动，光说话不行，要手持武器去尽可能多消灭日本鬼子。他还说，日本帝国主义者非常狡猾，必须提高警惕。接着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你听说过京城火柴厂倒闭的故事吗？本来，那个厂出的'猴牌'火柴是很出名的。火柴好使，加上那牌号又特别，很招人喜欢。商标上画的一只猴子，肩上扛着一根桃树枝。日本鬼子到朝鲜来，开了个红头火柴厂，可是因为有猴牌火柴，赚不了钱。他们挖空心思终于谋划出一个诡计。他们一下子买进几万盒猴牌火柴拿到一个无人岛去，把火柴头弄湿烘干，然后再拿到市场去卖。结果，买了那些火柴的人因为火柴不起火，都去买日本鬼子的红头火柴了。京城火柴厂终于破产，商标也卖给了日本鬼子的会社。日本鬼子就是这种贼痞子。"

这事是否属实无从考证，但对了解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却是价值

万金的趣闻。

老人说，他在身强力壮时，敌人用五连发打五发子弹，他用火绳枪就能打三发，可是现在老了不能打仗了，只能蹲在家里发呆，闷得难受。

他说我们这天演的歌舞《丹心绳》非常好，并十分慨叹地说，过去义兵活动没能搞出名堂来，就是因为没有把力量拧成一股绳；独立军使不上劲，被日本鬼子撵来撵去，也是因为各行其是没有戮力同心的缘故。

“朝鲜人，就是只有三个人，也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他很激动地说道。

车千里老人的话都是对的。若没有痛切地体验了团结就是胜利，分裂就是灭亡的道理，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

老人握着我的手说，他已经老了，怕不能为朝鲜独立而战了，只盼新的年轻一代奋力斗争了。我听着他的嘱托，深感自己作为朝鲜的儿子肩负着一种崇高的使命，决心搞好革命斗争，不辜负人民的殷切期望。那天晚上，车千里老人说的话，使我感受很深。朝鲜人，就是只有三个人，也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老人的这句话，在日后的斗争中给了我们很大的教益。

带着演艺宣传队深入到群众中去，不仅能够启发群众，还能够从群众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们的老师是人民，今天是这样，过去也一直是这样。

正因为如此，我每当同我们的干部见面的时候，都恳切地叫他们

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我总是强调说，深入人民群众，就如同吃补药，不深入人民群众，就如同吃毒药。深入人民群众，也才能碰到像车千里那样的老人。人民群众中，既有哲学，又有文学，也有政治经济学。

后来听说，车千里老人在参议府当警卫队长的时候，被自己的上司沈龙俊暗杀了。

我听到这令人悲痛的消息,悲愤感慨地重温了车千里老人说的话：朝鲜人，就是只有三个人，也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如果参议府的头头们按照车老人的座右铭同心同德抱成一团的话，是不会产生这种令人痛心的不幸事件的。

我们在杜集洞过了那年的阴历年。

过了春节后，我让演艺队员回抚松，我则同桂永春、朴且石一道到安图去了。安图县有一个只住着朝鲜人的内岛山村。这个村是世称苍穹之下第一村的白头山脚下的山村，是一个密林中的山间僻壤。内岛山，是因它犹如树林中的岛子而得名。中国人，因为山的模样像奶头，叫它奶头山。

朝鲜的独立运动者很早以前就出入这个山村。独立军的百战老将洪范图和崔明禄曾有一个时期住在这个村落里。

我们早已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员李济宇派到奶头山去，要他把那一带的青年团结到组织里来，就是因为打算将来在白头山周围建立一个大革命基地。

李济宇（李宇）是黄海道人。他父亲在长白时就和我父亲取得联系，进行了独立运动。因为有这样的关系，李济宇自然就和我携起手

来了。

我们在桦甸分手后重新见面，是我在抚松成立白山青年同盟的时候。那时，我和他商量过在奶头山村组织白山青年同盟支部的问题。当时李济宇半开玩笑地说，不要老给他派任务，应当来一趟帮帮忙。

从抚松到奶头山有 300 多里地。从中国那边看，它是满洲土地上的最后一个村落，从朝鲜这边看，是白头山这一头的第一个村庄。这个奶头山周围一百里地是没有人烟的。

我们在傍晚时分到达村庄，李济宇把我们带到了当高丽医的崔氏人家。

据这家人说，张哲镐曾在我们住下的屋子住过两次，李宽麟也来住过。我一想到这父亲来过、父亲的朋友们来开辟过的地方，今天我们又来扶着革命的犁杖垦荒，心里不由得产生了肃然之感。

我们在奶头山村落住了几天，明白了李济宇要我们务必来一趟的内情。奶头山是个外来人很难站住脚跟的地方。

村里主要住着姓崔、姓金和姓赵的人家。他们不同外地人交往，三姓人家做三角亲。崔家女儿嫁给金家儿子，金家女儿由赵家儿子娶，赵家女儿做崔家的儿媳。在一块不大的地方，这么做起亲来，不久全村都结成了姻亲关系，人人互相称呼“大哥”、“大伯”、“亲家”。

这个村的人几乎都信天佛教。天佛教徒们根据 99 位仙女由天上降到白头山天池沐浴过的传说，在那里盖了一座有 99 个房间的称“登德宫”的寺庙，一年两次到这里来祈祷。天佛教徒还在村里盖了个“天佛寺”，隔十天或一个星期去祈祷一次。

我们到奶头山的第二天，正巧是天佛教徒到寺庙去祈祷的日子。那天，李济宇领着我们到寺庙附近看了一下，的确很热闹。教徒们不论男女，都像高句丽人似地把头发盘在头上，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敲锣打鼓，加上钹声和木鱼声，那咚咚哐、咚咚哐的声音显得挺庄严。据说，“登德宫”这个名也是由此而来的。

李济宇说，奶头山这一带，就是这个天佛教叫人伤脑筋。他是从宗教是鸦片这一单纯的观念出发，讨厌这个天佛教的。我在抚松听李济宇说的时候，也是和他一样想的。但是到这里看了天佛教徒们举行仪式的那种认真的表情和雄伟的登德宫，就觉得对这个问题有必要再进一步考虑了。

那天，我由姓崔的人带领，同李济宇一道去见了天佛教教主张斗范。

张斗范曾在独立军打过仗，后来看到独立军没有希望，便丢掉枪支来到奶头山，向白头山之精气祈祷，让倭寇遭天罚，让朝鲜民族享天福，并以此为信仰，创立了天佛教。

我在和教主谈话的时候，视线总是离不开吊在天棚上的黍穗。因为我在崔家也看到了一模一样的吊在天棚上的黍穗。我问李济宇，是不是做种子用的，他便没有好气地说那是供佛用的。

这里没有水田，因此，这里的人们用黄米代替白米来上供，所以家家都在房柱或天棚上吊挂着黍穗。他们即使在断了粮，接不上顿时，也绝不去动它。只在到白头山寺庙供佛时，才把它放在臼里捣，再用簸箕簸好，用木匙挑出碎粒、草籽、黍籽、草芥，把颗粒一般大的拢

在一起用高丽纸包起来，用干净的泉水做饭上供。

“就为那个该死的天佛教，奶头山的人都变成了疯子。看来，马克思说的宗教是鸦片那句话，是名言中的名言。用新的思想改造这样的宗教徒，是有必要的、有可能的吗？”

李济宇坦白地发着牢骚说：有时恨不得点一把火烧掉那个把奶头山人们的灵魂都给摄了去的“登德宫”。

我批评他的观点太狭隘。

“宗教是鸦片，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我当然不想否定。可是，如果认为这句名言不论任何情况都可以用得上，那就不对了。祈求天佛让日本遭天罚，让朝鲜民族享天福，这样的天佛教，你能随便给它扣上鸦片这个帽子吗？我认为天佛教是爱国的宗教，这个教的信徒都是爱国者。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是，把这些爱国者团结成一股力量。”

我和李济宇坐在一起真挚地交换了意见,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要去打倒天佛教，而要积极地支持他们的反日情绪。于是，我就在这里逗留十来天，对这个村的人做工作。我对他们说只靠信教是不能光复祖国的。天佛教徒们很容易地接受了我的意见。

那年冬天，奶头山的人们待我们非常诚恳。奶头山人们的主食是土豆。掺上扁豆做的土豆饭别有风味。桂永春开玩笑说，吃了土豆掺扁豆的饭，放屁放得炕都要震塌了。

如果那时我们没有到奶头山去了解情况，坐在吉林只听李济宇的报告或口传的风闻作出判断，那么，对天佛教就不会有好印象。因为到奶头山亲眼看到了“登德宫”、做祈祷的教徒们真挚的表情、家家户

户房梁上吊挂的黍穗，才对天佛教及其教徒作了公正的判断。

要具备人民的作风和符合人民利益的人民的思想方法，决不是可以坐在书桌上做到的，更不是可以用空谈来解决的。那是只有通过与人民的直接的接触，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直接去体察人们的声音、呼吸、眼神、表情、语气、手势、姿态的过程才能形成的。

我们先进行了唤醒村民觉悟的政治工作，然后在这个村落组织了白山青年同盟支部，还组成了少年探险队。

我回吉林后，由我们亨权叔负责白山青年同盟的工作，他同李济宇一道在德水、德沟、寺洞、药水洞、任水洞、地阳溪等长白一带和新坡、普天、惠山、甲山、三水等国内许多地方建立了白山青年同盟的支部。

同盟组织把白山青年同盟长白地区负责人的任务交给了李济宇。他出色地担起了这个重任。亨权叔和李济宇在白头山一带的革命化过程中经受了很多考验。由于他们先前作出的功绩，日后我们在这里进行革命斗争时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援。

假期本是放下书本休息的时期，而我在那年寒假，却学到了很多在书本上找不到的东西。

寒假后，我们回到吉林总结了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半年来的工作，并提出了建立更多的群众组织，分别吸收各阶层青年和群众的任务。

为了执行这项任务，金赫、车光秀、崔昌杰、桂永春、金园宇等共青同盟的骨干分别到兴京县、柳河县、长春县、伊通县、怀德县一

带和国内去了。他们到那些地方，迅速地扩大了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和各种群众组织。

我留在吉林，做在新安屯组织农民同盟的工作。把农民团结到组织里来，是培养他们成为革命动力的工作。特别是，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我国，争取农民的问题是决定革命胜败的关键性问题。

我们到江东村去组织了农民同盟，也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支部和妇女会，接着在卡伦和大荒沟也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支部。

在蛟河地方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支部。我和旅新青年会组织部长姜明根相识后，同蛟河的青年建立了关系。姜明根可能是从张哲镐那里听到了许多我的事。蛟河曾是张哲镐的中间站。他来往于吉林和抚松之间，每次都到姜明根的家歇脚，把吉林青年学生运动的情况告诉他，回到吉林，就把蛟河的消息详细地告诉我们。就这样，姜明根知道了我们，而我也开始关注蛟河的青年运动了。就在这时候，姜明根专程来吉林见我。

那时，我是住在东大滩的张哲镐家上学的。姜明根比我大十多岁，可是他一口一个“先生”地叫我，十分坦诚地摆出他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焦急地呼吁我帮助他。这使我不由得产生了对他的同情。想到他从远隔 180 里地的蛟河专程来到吉林找我这个还不过是一个普通中学生的人谈工作，我对他这种革命者的热情不能不感到佩服。

当时，蛟河以拉法山为界，西北边有旅新青年会，东南边则有拉法青年会。蛟河一带的朝鲜青年大都分别参加了这两个青年团体。

青年们起初是怀着很大的抱负参加组织的，但看到民族主义运动

的头头们只埋头于争权夺利，搜刮军费，毫无作为，逐渐对他们的行径感到了幻灭。

同时，对那些只就“普罗列塔利亚革命”和“领导权”夸夸其谈的赶时髦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感到了愕然。

我完全理解姜明根说他简直弄不清该何去何从的心情。

我向姜明根介绍了吉林一带青年学生运动的情况和我们的工作经验。我还对他说，回到蛟河后要为组织反帝青年同盟支部作好准备。他回去时，我还给了他几本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

我虽然尽心尽意地给他讲了许多问题，但他走后，对蛟河的情况总觉得放不下心。于是我终于越过老一岭到蛟河去了。那大概是 1928 年的春天。

姜明根见我来，非常高兴，说他正想再跑一趟吉林呢。他说，在吉林的时候，觉得不会再有什么困难，可是回来一开始工作，就又碰到了不少难题。

蛟河的农村青年，首先对怎样建立组织的问题，就持有各不相同的意见。有的说，旅新青年会是民族主义者的组织，应当马上退出那个组织，由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另建一个反帝青年同盟，有的则说，干脆把旅新青年会解散了事。

对吸收哪些人参加组织的问题，他们也没有正确的见解，说这个人是“敌对分子”，那个人是“动摇分子”，都不能吸收。他们就是这样把还过得去的青年都事先排除在吸收对象之外了。

那天，我在客房里枕着木枕和他们躺在一起，对他们说，要建立

组织，就要多争取群众，哪怕多一个人也好。为此就不要把人们分成这一边的和那一边的，重要的是要孜孜不倦地进行教育和说服。

我对他们说，要设法让青年不受民族主义者和宗派分子的影响，要加强旅新青年会和拉法青年会中的先进青年骨干的作用。我还同他们一一讨论了今后他们要做的工作。

然后，选拔五名旅新青年会的青年骨干，建立了反帝青年同盟蛟河支部。

从那以后，我常到蛟河地方去做反帝青年同盟盟员的工作。

我开始把东满青总的青年也吸收到我们的组织里来。当时，到龙井勤工俭学的朝鲜青年几乎都加入了东满青总。他们受着火曜派的影响。

这个团体的组织部长、东兴中学学生金俊看了我们在吉林发刊的杂志和小册子后，找我来了。

那时，我通过金俊具体地掌握了龙井一带青年运动的情况。

金俊自从来过吉林后，和我们保持着联系，到大成中学、东兴中学、恩真中学等龙井市内各学校的青年中去，宣传了我们的思想。我们通过他们，对间岛地方以及会宁、钟城等六邑之内的青年进行了先进思想的教育。

这个时期，我对工人的工作也予以关注。

当时，吉林有火电厂、铁路机务段、火柴厂、纺织厂、碾米厂等大小工厂，为数不少，但没有一个像样的工人组织。只有一个 1927 年春组织的以帮助朝鲜工人就业谋生为目的的汗诚会。

我们对一个原在吉林火电厂做工，后来到农村来的青年进行了教育，吸收他参加了反帝青年同盟，然后让他重新回到吉林火电厂去做工。他到吉林火电厂站住脚，集结了进步的工人。从此，我们有了立脚点。

我们发动留吉学友会成员，以松花江码头为中心开办了工人夜校，在三·一人民起义纪念日、五·一节、国耻日，还到他们那里去做讲演，举行文艺演出。在做了这种准备工作的基础上，于 1928 年 8 月，组织了反日劳动组合。由反帝青年同盟的骨干分子做这个组织的负责人。

我们一直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工作对象，积极地进行使他们意识化、组织化的工作。而如今把我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工人阶级中去，把工人吸收到组织里来，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通过以朝鲜工人为主组织起来的这个反日劳动组合，掌握了合法团体汗诚会的活动。汗诚会的政治倾向渐趋鲜明。后来，汗诚会为帮助元山工人总罢工，募捐支援了元山劳动联合会；1930 年夏，朝鲜发生洪灾时，它又同各朝鲜人团体联合组织救济会，为灾民募捐；在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工程的斗争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通过把吉林和蛟河一带为中心的在民族主义者和宗派分子影响下的青年团体改组为革命组织的过程，积累了很多好经验。

革命者的生命，可以说是从深入群众开始，离开群众就要告终。

我想，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华成义塾时节是我的青年学生运动开始的时期，而组织和扩大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

的吉林毓文中学时期，是越出学生的圈子深入到工人、农民等各阶层群众中去，到处播下革命火种的我的青年运动的全盛期。

这个时期，人们把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及其影响，称为“吉林之风”。

五　团结的示威

随着组织的建立和扩大，我们进入了开展实际斗争的阶段。

1928 年夏吉林毓文中学举行的罢课，就是这一斗争的序幕。

直到那时，在毓文中学，财政、食堂和图书馆等学校行政管理方面的一切问题，都按着进步教师和学生的民主意志，解决得很顺利。我们在校内的活动，不受多大限制，进行得较自由。这是毓文中学的学生协同学校教务委员会通过斗争取得的成果。

那些听从军阀当局摆布的反动教员，不甘心接受教职员和学生共同努力树立的民主秩序，妄图破坏这个秩序，企图按着他们的意志任意处理学校行政管理方面所遇到的问题。

由教育厅派到毓文中学来的教员当中，有一些嗅觉敏锐的军阀走卒。教务主任、训育主任、体育主任等反动教员，都是被特务机关收买的爪牙。他们唆使追随军阀政府的地主官僚家庭出身的保守的学生和不良青年，随时侦探学生的思想倾向和革命组织的活动。

1928 年夏，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校内举行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运动，谴责和抗议他们强盗式的第二次出兵山东和在济南的屠杀暴行。

日本出兵山东，是一个重大事件，世称那是田中对华外交政策的试金石。

日本首次出兵山东，是 1927 年 5 月田中义一组阁之后。当时，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正在追击张作霖的奉天军，向山东半岛一带进兵。田中内阁为了保护他们豢养的张作霖的奉军免受北伐军的大进攻，就以保护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为名，首先向青岛派去了驻旅顺的 2000 名日军，接着又从日本本土调来数达 2000 名的增援部队，派往山东地区。

由于日本的首次出兵，北伐受阻，蒋介石答应保障山东地区日本移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日本军才于同年秋从山东地区撤兵。

1928 年春北伐革命重新开始，日本的田中法西斯内阁又决定第二次出兵，调动天津驻军和本土的熊本师团 5000 名兵力派往山东，占据山东半岛的铁路沿线地区，占领了青岛和济南。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也在济南同时入城，结果，两国军队发生了武装冲突。

在济南，日本占领军野蛮地屠杀了大批中国人。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员也被日军杀害。

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地区的厚颜无耻的三次出兵，在朝中人民中间激起了强烈的排日情绪。在日本国内，也掀起了反对出兵的强大运动，谴责田中内阁外交政策的怒吼声日见高涨。

日本出兵山东地区的最终目的，在于把满洲和华北地区从中国割裂出来，变为他们的殖民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需要有一个支撑点。而这个支撑点，正是张作霖。日本人心里算计，只要很好地豢养张作霖并给他作后盾，满洲就可以易如反掌地弄到手。在济南响起的枪声，是一个危险信号，预告在中国将会发生野蛮的大屠杀，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当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制造派兵的口实，毫不犹豫

地自己动手杀害日本移民的时候，中华民族预感到了日本将会把一种不可想象的灾难强加在他们身上。

我们接连举行报告会、演讲会、声讨大会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国民党的叛国行为，鼓起了学生群众的斗争气势。

反动教员则把它说成是共产主义宣传，当作镇压学生的借口。他们突然袭击图书馆，没收进步书刊拿到校长那里，好像抓住了重要线索似的，向李光汉校长施加压力，要他开除朝鲜学生。他们说，朝鲜学生不是共产主义主动分子就是“日本间谍”，并且都敌视中国教师，若留着这些朝鲜学生，校内不得安宁，无法继续上课。右翼学生也跟他们一唱一和，肆意破坏校内建立的民主秩序，侮辱进步学生，诽谤和中伤校长和进步教师。

尚钺老师是他们的头一个攻击目标。

如果对反动教员和他们操纵的那些学生的无礼行径放任不管，我们就无法安心研究学问，更不能开展青年运动。因此，为了依靠组织的力量赶走反动教员、维护校内的民主秩序，我们动员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成员举行了罢课。

我们举行罢课，提出了下列要求：

第一，改善对学生的待遇；

第二，保证讲授学生要求的科目；

第三，停止对进步教师和校长施加压力。

进步的教师也向省公署施加压力，说，如不接受学生的要求，将借助社会各界的力量。要求罢免反动教师的传单和檄文，张贴于市内

各处，甚至飞进了反动教师的宿舍和省公署。

毓文中学的罢课日趋高涨，市内其他学校也都有响应的趋势，都向省公署施加压力。

省公署看到罢课风潮有可能波及全市，才迫不得已地罢免了训育主任等反动教师，接受了学生的要求。

这是我们发动群众斗争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通过这一过程，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心：只要瞧准目标，搞好组织动员群众的工作，斗争就必定取得胜利。

我们举行罢课取得了首次胜利，也取得了经验，得到了锻炼。

通过这次罢课，青年学生更信赖我们，更靠近我们了。

我们总结了这次罢课取得的成果，并为了组织和发动气势冲天的青年学生开展规模更大、更积极的反日斗争，进行了准备。

为了侵略满洲，日本帝国主义从很早以前就加紧进行了准备，到这个时候，它的阴谋活动就更加露骨了。

1928 年 5 月，日本关东军司令村冈以对付中国关内局势的变化为名，调第 40 混成旅团进驻奉天（今天的沈阳），并策划把军司令部也迁到奉天去。紧接着，在奉天入口即在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交叉处的一座铁桥制造列车爆炸事件，杀害了从北京回奉天的张作霖。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为了侵略满洲制造借口的蓄谋已久的有计划的准备工作。

如果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满洲，那么，以中国东北地区为斗争舞台的我们的活动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当时，满洲还属于中国，日本帝国主义无法对满洲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独立运动者恣意妄为，但是满

洲一旦被他们侵占，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经过三次出兵山东压制了蒋介石，把侵略魔爪深深插进了中国大陆。这时候它一方面大力促进侵略满洲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加快为早日完成作为军事侵略准备工作的一环早就着手了的吉会线铁路敷设工程的速度。吉会线，是把满洲的一个省会吉林市同朝鲜的北部边境城市会宁连成一条线的铁路。

日本早从明治时代就有即使用强制手法也一定要敷设吉林——会宁铁路的野心。日本帝国主义对这条铁路赋予巨大的战略意义。

田中内阁开过所谓“东方会议”之后，在呈报日皇的奏折中谈到敷设吉会线铁路等满蒙铁路的意义时指出，这些铁路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钥匙。

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里，自始至终贯串着他要称霸世界的野心和妄想，和在欧洲首次高喊称霸世界的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是一个论调。举世皆知，这个奏折指出，当前日本的首要国策是侵略满蒙，为此而必要的先决条件即杠杆，就是加快敷设包括吉会线在内的满蒙五条铁路。

田中在奏折中暗示，如果敷设了吉林——会宁铁路等满蒙五条铁路，就能得到连结全满洲和朝鲜的大轮环线和直达北满洲的直达线，可以把兵力和所需战略物资送往任何一个地点，又可以镇压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

老奸巨猾的日本谋士们认为，如果敷设了吉会线，就能经敦贺——清津——会宁——吉林输送军队和物资，可以大大缩短运输线和机动

时间。

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敷设吉会线铁路宣布为国策，不顾种种艰难曲折，花费长达26年的时间，终于把这条铁路敷设完成，其理由就在于此。

日本帝国主义者凭借他们同腐败无能的清朝末期的官僚缔结的不合理的条约，在满洲各地任意行使铁路敷设权。中国的广大人民和青年学生认为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侵犯，一致奋起展开群众性斗争，坚决反对关于输入外国资本建设铁路的协定，并要求立即撤消这种协定。

但是，反动军阀非但对人民的正当要求不加理会，反而一面策划强行建设敦（化）图（们）线，一面妄图隆重地举行原定于1928年11月1日举行的吉（林）敦（化）线铁路通车典礼，以便取得国民的欢心。

要想阻止吉会线铁路敷设工程，需要开展英勇果敢的实力斗争。这一斗争，对敌人来说，将是宣告朝中人民决不容许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的警钟；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将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的抗战信号。

为了组织反对敷设吉会线的群众性反日斗争，我们于1928年10月上旬，在北山公园药王庙地下室召开了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各组织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

在会议上，我们就斗争口号、斗争方法、行动方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做了具体的分工。对游行示威时打的横幅标语、声讨书及传单的内容，也做了具体的讨论。

我们从反对敷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必须成为朝中两国人民共同的

斗争这一立场出发，决定用朝中两国文字写传单、声讨书和横幅标语等所有宣传品。到街上讲话也要用两国语言。

会议还决定，在这一斗争期间尽量发动市内各校的学生自治会、留吉学友会、少年会等合法组织，而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等非法组织的成员则要尽量少出头露面。

开过北山会议后，我们废寝忘食地东奔西走，做示威游行的准备。

当时，宣传队的韩英爱做了很多工作。

韩英爱是吉林女中的学生，她早在留吉学友会时就通过文艺演出和读书心得发表会接受了我们的影响，后来成长为共青盟员。她生性文静寡言，平常很少引人注意，人们觉察不到她是否在场。但是，只要是有助于革命的事情，不管是累活还是脏活，她都做。演艺队演出节目时，她自愿扮演别人都不愿意扮演的角色，读书会缺乏教材时，她主动把长达几百页的书用油印机印出来分给大家。为示威斗争做准备工作时，她几乎没合过眼。她把油印机拿到别人家的库房里，带领几名少年会会员印出了几万份檄文和传单。在街头上，她用朝中两国语言向几百名听众发表演讲。因为她讲话慷慨激昂，感人肺腑，被大家誉为女雄辩家。

我所以能够以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负责人的身份到中国青年学生中去进行工作，是因为我早就在吉林树起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我们开始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会还没有建立，因此吉林市里也还没有多少共青团员。

我在负责搞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工作的同时，还做过中国系统

的共青团工作。因为我负责共青团工作，自然有许多中国青年接近我们。吉林师范学校共青团小组负责人曹亚范、负责做敦化地区共青团工作的陈翰章，也都是跟我取得联系开展共青团工作的。

我们在为示威斗争加紧准备的时候，收到了铁路当局准备在1928年11月1日举行吉敦铁路通车典礼的情报。于是我们决定比原订计划提前几天举行示威，为的是在举起反对敷设吉会线铁路的火炬的同时，还要破坏吉敦铁路通车典礼的举行。

1928年10月26日，天还没亮，宣传队就在吉林市的每条街巷散发了传单，张贴了檄文。由两三个人组成的各少年会监视组，天刚亮也都跑去占了指定的位置。

这天早晨，市内各校的学生按约定的时间，同时在各校的院子里举行集会，宣读了反对敷设吉会线铁路的声讨书后，接着进入了示威游行。霎时，几千名学生挤满了条条大街。示威队伍高举着许多用朝中两种文字写的标语，朝文写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敷设吉会线铁路!”，中文写的是“打倒日帝”、“打倒卖国贼”、“收回吉会铁路”。示威队伍走过几条街，向新开门外省议会的大院行进。几百名军队和警察挡住了示威队伍。

示威队伍跟军警对峙，喊着口号，等待我们的指示。

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让示威队伍继续前进。

为了保护示威群众，调来了由工人、郊区农民和学生组成的纠察队。

纠察队打头，示威群众都挎着臂膀，拨开军警的刀枪，继续向前

挺进。队伍在省议会的大院里举行集会，我在会上向几千名群众讲话，号召朝中青年学生团结起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敷设吉会线铁路坚决斗争！

集会结束，群情激昂，队伍向新市街日本领事馆进发。这是一条因为日本领事馆的警察凶横残暴，很少有人来往的地方。示威群众拥到日本领事馆前面，高呼反日口号，群情更加高昂。示威队伍接着向大马路、北京路、重庆路、尚仪街行进。

日本帝国主义的铁道会社在这次吉林的示威斗争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决定无限期推迟吉敦铁路通车典礼；日本商人都逃离商行躲进了日本领事馆。南满铁道会社开的东洋医院的窗玻璃全被打碎了。

示威斗争，日趋高涨。

学生们编成许多个小组，在市内十多个地方设讲坛，从早到晚，轮流向群众讲话，号召反对敷设吉会线铁路。

吉林掀起的反日斗争，遍及满洲各地。长春的青年学生和市民与我们的斗争相呼应，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六条大铁路的口号，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还袭击了吉长铁路局局长的公馆。

在哈尔滨和天津，尽管有许多人牺牲，仍然一直展开殊死的斗争声援我们。延吉地方的朝鲜同胞也奋起投入了斗争，国内的各家报纸也连日报道了我们的斗争消息。

当示威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又大力开展了排斥日货的斗争。群众从日本商店搬出贴有日本商标的日货堆在大街上放火烧掉，有的商品则成批地拉去投进了松花江。

反对敷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和排斥日货的斗争相结合起来，发展成了大规模的、全面的反日斗争，而且越来越高涨。日本帝国主义为之惊惶失措，唆使反动军阀向示威群众开枪，犯下了野蛮罪行。

直到那时，我们对反动军阀采取了尽量牵制的立场，可是反动军阀当局既已倒向日本帝国主义一边，出面镇压我们，我们也就不能保持原来的立场了。我们提出“打倒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反动军阀”的口号，结合为死难者举行的葬礼，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斗争。这一天，有许多市民也汇合到示威队伍中来，成了空前大规模的示威斗争。

我们的斗争持续了40多天。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扭转局面，急忙召来了当时在奉天的张作相，可是吉林督军署的怀柔伎俩是挫败不了群众高昂的斗争气势的。

反对敷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极大的打击。尤其使他们惊恐的是朝中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

民族主义者和那些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丢魂失魄、只顾逃命的人，看到我们反对敷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在那以前，民族主义者们一直把我们青年学生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可是，他们看到我们这些十几、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作出了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大事，开始改变对我们的看法了。从此，他们承认民族解放斗争舞台上已经出现了与旧一代人截然不同的新一代，再也不能忽视我们了。

我们通过反对敷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再次清楚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也更加确信，只要善于组织群众，就能使他们发挥任何敌人的刀枪都征服不了的无比坚强的力量。

我对群众力量的信念，进一步坚定了。经过这一斗争，我们发动群众的领导方法更完善了。在这一场实际斗争中，我也受到了锻炼，各组织也壮大起来。

六　安昌浩的长篇时局讲演

1927年2月,旅居吉林的全体朝鲜同胞沉浸在空前热烈的欢迎气氛里，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的要人、独立运动的元老安昌浩，经北京来到了吉林。

侨居吉林的同胞们像迎接一位国家元首一样隆重地迎接了安昌浩。我们也唱着《去国歌》，由衷地向他表示了欢迎。《去国歌》是安昌浩亡命国外辞别祖国时亲手作的歌。这支歌开头是“走了走了，我要走了，丢下你，我要走了”，最后一句是“我走了，不要难过，我亲爱的韩半岛啊。”在“韩日合并”后，这支歌在青年学生当中很流行。因为亡命国外的人们爱唱这支歌，曾有一时被称为《亡命者之歌》。

朝鲜人都喜欢这支《去国歌》，同样对这支歌的作者安昌浩也非常尊敬和崇拜。对于安昌浩的品德和能力，有许多人用一句话作出评价说，是“总统之材”，而这也不算太夸大。那些不把临时政府放在眼里的独立军团体的头头们，惟独对安昌浩另眼看待，推崇他为“独立运动的前辈”。

众所周知，连熟知安昌浩身价的伊藤博文也曾想笼络他，向他表示，只要他支持日本的政策，就可以帮他组织岛山(安昌浩的号)内阁。

平安南道江西地区，如今作为千里马运动的发祥地、作为大安工作体系和青山里精神、青山里方法的诞生地闻名于世，而在日寇统治时期，则是因为出现了岛山安昌浩这样著名的独立运动者而广为世人知晓。因为安昌浩生于江西，西部朝鲜的人大都以此为荣，称他是自己的同乡。

安昌浩认为，我国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是因为我们民族的素质低劣。因此他建立了共立协会、新民会、青年学友会、大韩人国民总会、兴士团等独立运动团体，开设了渐进学校、大成学校、太极书馆等文教机构，创办了《独立新闻》，为民族的启蒙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独立运动的元老中，有位号南岗名李升薰的著名教育家。一提起李升薰，人们自然都联想到五山学校。

五山学校，是由他创办，并由他个人出资经营的出名的私立学校。

李升薰由于教育后代有功，隆熙皇帝[15]曾召见他。在最近400年的历史中，西部朝鲜出身的平民从未有人谒见过皇帝，而李升薰破天荒第一次晋谒皇帝，他的名声该有多高，是可以想见的。

如此德高望重的李升薰，曾经为赚钱致富的欲望所驱使，做了行商，贩卖黄铜器皿。后来，真的成了巨富，置上了价值50万圆以上的不动产。

这位大财主，有一日到平壤听了安昌浩力主独立救国的基础是通过教育培养实力的演说，佩服至极。他剪掉发髻，回乡从事教育运动。安昌浩充满爱国、爱民族的热情的雄辩，给这位大贸易商的人生观带来了大转变。

这是说明安昌浩作为民族运动的先驱对人的感化和影响之大的一个事例。

《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在祖国发行的各家报纸，都大书特书地报道了安昌浩到吉林的消息。

青年学生到安昌浩下榻的三丰旅馆，邀请安昌浩为吉林的朝鲜学生作一次讲演。独立运动者们也络绎不绝地拜访安昌浩，请他出面发表讲话。

安昌浩爽快地答应了他们。

独立运动者们通过各种渠道传布消息，说安昌浩在某日某时某地发表关于时局的长篇讲演，并且在商埠街、岔路街、通天街、河南街、北大街、牛马巷等市内的各条大街都张贴了巨大广告。

旅居吉林的同胞见了这个广告，都兴奋不已，甚至见面打招呼也说："听说安昌浩先生到吉林来了？"

在他发表讲演的前一天晚上，我同吴东振谈论安昌浩，谈了很长时间。

松岩吴东振在异国他乡同阔别了17年的大成学校时期的恩师安昌浩邂逅，其感怀自然不同一般，十分激动。他回顾往日，谈到他考大成学校师范科的时候，安昌浩是如何当面考核他的，他被录取后安昌浩又是怎样爱护他的。吴东振还唱了安昌浩先生作的青年学生之歌，怀着崇敬之情谈到了安昌浩为培养后代的独立精神倾注了多少心血。特别是对安昌浩的辩才，他谈的很多很生动。

对于安昌浩的辩才，我父亲在世时也谈过几次。在万景台的时候，

我就听父亲讲过，知道安昌浩争取独立的活动是从雄辩开始的，离开了雄辩的口才，就谈不上安昌浩的名声。

我心想，人们说安昌浩一发表演讲，连一般家庭妇女也都为他那娓娓动听的口才，为他所描绘的理想村所感动，不惜把手指上的戒指、头上的簪子都拿出来捐献，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他的演讲那么动人心弦的秘诀何在？要是他这样的大人物，不住在美国或上海，而住在这吉林该多好。

“国家独立后，如果我有权选举总统的话，我要第一个推举安昌浩当总统。”

这是那天晚上吴东振跟我说的话。这话更加强了我对安昌浩要发表的时局讲演的期待和好奇心。

安昌浩在朝阳门外的大东工厂，为义士罗锡畴举行了追悼会之后，发表了演讲。

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三个府的代表、原在市内的独立运动者、头面人物和青年学生，几乎都前来听他演讲了。全场座无虚席，许多人只好靠墙站着听。

安昌浩以《朝鲜民族运动的未来》为题作了演讲。的确名不虚传，他讲话口若悬河，出口成章，一开始就引起了听众的赞叹。他穿插着自己对古今内外历史的渊博知识，慷慨激昂地道出了他对朝鲜民族的出路所持的主张。场内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然而他的讲话内容，却是有问题的。

安昌浩阐述了他的“民族人格完成论”和建设理想村的理论。他

的“民族人格完成论”是由“人格自我革新论”、“民族经济确立运动论”这两个部分构成的。

所谓“人格自我革新论”，是说我们的民族之所以落后，国家之所以沦为日寇的殖民地，是因为我们民族的人格和修养低劣，因此人人都应当不断地自我陶冶，提高人格，以达到生活正直、干活诚实、相处和睦。

听安昌浩的主张，觉得它同托尔斯泰在“自我完成论”中表现的思想方法和甘地认为人不自我改造和锻炼就不能得自由的看法有相似之处。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时出现预告世界性大经济危机即将到来的征兆，使人们为之而惊恐不安。同时，极端法西斯化的帝国主义猖狂肆虐，用刀枪和绞索残酷地扼杀着人们的自主性。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用钢铁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的威力面前丧魂失魄，噤若寒蝉。他们在这种时代空气中找到的精神避难处，就是不抵抗主义。不抵抗主义，是革命意志薄弱的人被帝国主义的攻势吓破了胆而仓皇找到的最后一个安身之所。他们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志对抗反革命势力，所以只能落到主张不抵抗的地步。

在我国，不抵抗主义以改良主义的形式出现。在三·一人民起义以后，民族主义运动的部分领导人脱离以积极的抗争推翻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革命立场，把振兴教育的运动和振兴民族产业的运动当做最大的民族运动旗帜，蓬勃地开展了提高我国人民的精神素质和经

济生活水平的培养民族实力运动。形成民族运动中心领导集团的近代知识分子，想用提倡使用土产品、扶植民族企业的方法拯救民族于经济上的毁灭。他们提出“靠我的东西过我的日子!”的口号，为了开辟一条经济自给自足的道路，展开了泛国民物产奖励运动。

这一运动的领导人曹晚植，作为专用土产品的象征，一辈子只穿用土布缝制的朝鲜袄裤和朝鲜长袍，他的名片用的也是国产的纸，脚上穿的也是朝鲜鞋，从没穿过外国鞋。

李光洙的《民族改造论》，为散布民族改良主义起了很大作用。读了这篇论文，就能很容易地看出改良主义的本质及其危害性。

我读了李光洙的《民族改造论》后，最感到不快的是，他把朝鲜民族视为劣等民族的论调。我对我国是后进国家这一点倒是想过，但从未把我们的民族看作劣等民族。

朝鲜民族是制造了世界最初的铁甲船和金属活字的文明、智慧的民族，是为东方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可以引以自豪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对开拓日本的文化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我们民族不容外来敌人侵犯的坚强的自卫精神，曾为亚洲各国所称誉；像白纸一样洁净无瑕的我国人民的道德品质，是世界人民都为之赞叹的。

我国人民的习惯和风俗里，当然不是没有缺陷的，但它毕竟是部分的、次要的，而不是本质的。绝不能拿次要的东西给民族性下定论。

李光洙在《民族改造论》中说，朝鲜人因为具有“劣等的民族性”，才招致了国家的沦亡。其实，招致朝鲜亡国的不是落后的民族性，而是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

李光洙慨叹朝鲜民族“劣等”的论调，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论调一脉相通。日本人一开口就诽谤我们民族是“劣等民族”。他们说，因为朝鲜民族是“劣等”民族，需要由日本加以“保护”、“领导”、“管制”。

李光洙的《民族改造论》，是他呈献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一纸公开转向书。他呈上这纸转向书所得到的报酬，就是他这个一度参加过独立运动的人没有受到任何制裁，若无其事地盘腿坐在总督府鼻子底下，放手写恋爱小说。

作为小说作家的李光洙，最初很受读者的爱戴。群众爱戴他，是因为他写出了符合读者脾胃的进步作品。他写了不少风格新颖的小说，堪称我国现代小说的开拓者。

然而，由于他抛出了《民族改造论》，群众对他的爱戴开始出现了裂痕。从他的小说中可以窥见的改良主义在这篇论文中现出了形体完整的真面目。

把民族运动引向改良主义方向的近代知识分子，甚至试图用国债偿还运动中募来的钱创办一所由朝鲜人主持的民立大学。然而，朝鲜总督府没有认可建立这种民立大学，认为这种学校有可能变成培养独立运动人材的温床。

非暴力的物产奖励运动，也碰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朝鲜人只用本国产品，而不用日本强制推销的商品，总督府是万万不会默许的。他们从这一运动一开始就认为它是排斥日货的反日运动，狠毒地进行了阻挠。

打着培养实力招牌开展的改良主义运动，思想上标榜的是爱国爱

民族，方法上却是一种以非暴力为前提的、保守而消极的抵抗运动。试图在总督府许可的限度内培养民族的经济实力，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这实际上是一种妄想。日本绝不会允许将会埋葬它的朝鲜民族产业发展起来，这是最起码的常识，然而，改良主义者们却认为只要创办企业，多用国产品，就能为民族打开一条活路。对这种想法应该作什么样的说明呢！

滚落到改良主义泥坑的民族运动者们，没有正视或不敢正视帝国主义的本性。他们从武力抗争掉转方向，转入了和平的文化运动，这意味着斗争方法上的后退。那是以同殖民主义者和平共处或妥协作为前提的运动。无论是和平共处还是妥协，都必然产生变质现象。实际上，那些改良主义者当中有不少人后来背离了民族运动的队伍，或者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做了走卒。

安昌浩的实力培养论（一名“准备论”），实际上是自强论的变种，是民族改良主义者们所依据的理论上的支撑点。

他甚至说朝鲜民族是世界上精神修养最差的民族，只有开化到美国人或英国人那种程度，才能建设自主独立国家。

我看会场里的空气，好像听众大都对他的主张表示共鸣。有的人为他的演讲所感动，甚至流下了眼泪。当然，他的每句话里都充满着爱国热情。

可是,我从他的演讲中发现了可能削弱人民群众斗争意志的因素，感到很失望。总的来说，他的主张里确实有几点令人生疑的问题。

安昌浩主张，各人都要加强自我修养，提高品格，借此培养民族

的实力。对这一点我也有同感。但是，他认为我们的民族是世界上精神素质最低的民族这种见解和他主张培养实力的改良主义的方法论，我是绝对不能同意的。培养实力，毕竟是推进独立斗争的一个过程，它不能取代整个革命。

但是，安昌浩却想用培养实力来取代独立斗争。即使培养了实力，独立斗争也不会自行发展的，可是安昌浩只谈培养实力，而不谈应当如何组织和发动民族的力量并引向最后胜利。特别是对于民族解放斗争的基本形式——武装斗争，更是只字未提。

其次，他说要在满洲振兴产业，作为争取独立的基础。这也是有问题的。对于一个丧失了国权的民族，有谁会提供贷款让你建设水电站？在整个国土被日本帝国主义霸占的情况下，就算列强给你提供了贷款，你能在外国领土上建设发电站，安心种稻子发展农业吗？再说，日本帝国主义会放任不管，让朝鲜人这么做吗？

我听着他的演讲，实在忍不下去了，便把质问安昌浩的几个问题写在纸上递上去了。

——你说，应当振兴产业和教育来培养朝鲜民族的实力。请问，在整个国家被日本帝国主义吞掉的情况下，这是可能的吗？

——你说我们民族的精神修养很低。请问，你指的是哪一点？

——你说的列强指的是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难道我们应该仿效他们吗？再说，依靠他们的“援助”，能取得独立吗？

经坐在前排的学生和演讲会主持人的手，纸条递到了安昌浩手里。我虽然忍不住反抗心理，断然提出了书面质问，但是当主持人以不安的

神色回头朝我们学生这一面注视的时候，我的心绪也不免有些翻腾。我有些担忧，如果演讲人为我的质问而受到刺激，感到不快，是不是会让崇拜他的独立运动者和好几百名听众感到失望？如果安昌浩的演讲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为举办这次演讲尽了极大诚意的吴东振，也会为我这个提出书面质问的人感到难过的。

当然，这不是我所希望的。我给安昌浩提出书面质问，是希望他看了我的质问后，哪怕片刻也好，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的主张，不要把那些违背民族自尊心和自主精神的有害思想继续灌输给听众。同时，我还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殷切愿望，希望听到这位被尊为独立运动大前辈的人讲他还没来得及谈的关于独立运动的新的方针和策略。

可是，出乎我的预料，情况变得严重了。

安昌浩看了一会儿纸条，又向主持人问了几句什么。事后我听孙贞道说，那天安昌浩问的是认不认识纸条上署名的金成柱。

安昌浩傲气十足，滔滔不绝，扣人心弦的讲话，突然消沉下去，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他突然打住高屋建瓴般的讲话，敷衍了几句，就仓皇地走下了讲台。

看来，他碰到这个质问，变得很严肃。我只是为了让他受点刺激，才提出了质问的，可是他既不反驳也不做解释，就在中途抛弃了讲话，自动地退下来了。

听众大失所望，对他突如其来的消沉气馁，抱着疑惑拥向了门口。

就在这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的事情。吉林督军署派几百名宪兵、警察，突然闯入会场，逮捕了300多人。演讲人安昌浩自不用说，连玄

默观、金履大、李宽麟等许多独立运动者也都被抓到警察厅关起来了。

指挥这次大逮捕的是朝鲜总督府警务局的国友。安昌浩来到吉林时，国友也同时来到奉天，同中国当地宪兵司令杨宇霆见了面，告诉他有几百名朝鲜共产主义者汇聚在吉林，请求杨宇霆把他们都逮捕起来移交给他们。

根据杨宇霆的命令，吉林督军署的警察、宪兵，在国友的操纵下一面搜查朝鲜人的住宅，一面闯进大东工厂进行了空前的大逮捕。

尽管安昌浩的讲演有些问题，但对敌人逮捕他和几百名朝鲜人的暴行，我们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愤慨。尤其是，我刚提出书面质问，演讲就被中断，紧接着安昌浩又被逮捕，所以，我觉得引起这一连串连锁反应的责任好像就在于我提出了那纸书面质问。这种想法使我感到很痛苦。

当时，统治中国东北地区的军阀张作霖，通过《三矢协定》与日本勾结起来，残酷地镇压朝鲜共产主义者和反日独立运动者。这个《三矢协定》是以根除满洲地区朝鲜民族解放斗争为目的的恶毒的协定。

根据这个协定，甚至给逮捕朝鲜人爱国者有功的走狗发了奖金。有一些中国反动官吏为了领奖，甚至进行诬告。

他们在大东工厂的大逮捕，也是军阀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唆使下干出的反动的镇压暴行。

我们立即召开“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员的会议，认真讨论了争取释放被捕人员的对策。紧接着，又去找独立运动者商讨营救办法。然而，他们早已吓昏了头，提不出什么办法来。

我们主张，大家紧密团结起来，给吉林督军署施加压力，就能营救安昌浩先生以及其他所有被捕人员。我们再三强调，发动群众的力量，是最有威力的办法。

独立运动者们却说，你们这些赤手空拳的人，有什么办法能够说服蛮不讲理的督军署？与其群众出面闹事，还不如给他们送钱行贿。他们又一次表现了不相信群众力量的陈腐观点。

我耐心地说服他们，只要把群众的力量团结起来，就能办到用钱办不到的事。接着，在孙贞道主持的吉林礼拜堂举行了市内的独立运动者、知名人士和青年学生参加的群众集会。在会上，我向大家说明了督军署同日寇相勾结,大量逮捕朝鲜爱国者和无辜朝鲜同胞的经过，然后告诉大家说，他们会以几文钱为代价，把逮捕的人全部移交给日本警察，很明显，朝鲜的爱国者们就必将遭到残酷的刑罚，因此，爱国家爱同胞的朝鲜人，都要同心同德地团结起来，奋起开展群众运动，营救被捕的爱国者。

我们开展争取释放安昌浩的运动，有不少人就摇头晃脑地表示无法理解。持这种看法的，不仅有民族主义者，而且还有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甚至在我们影响之下的青年学生当中也不乏其人。他们心想，对安昌浩的理论提出了书面质问的人，这回为什么又如此费尽心机地要去营救他呢？

我说服他们说，我们反对的是安昌浩的思想，并不反对安昌浩这个人；安昌浩是朝鲜人，又是为争取朝鲜独立而斗争的爱国志士，我们怎能不去营救他呢！当时，我是把受苦受难的朝鲜民族应当同心协

力、有难同当的大义名分放在首位的。

我对安昌浩的演讲提出质问，予以反驳，是因为我希望他抛弃事大主义的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改良主义立场，更加积极地献身于光复祖国的神圣斗争。我们跟民族主义者进行思想斗争，其目的并不在于打倒他们，而在于启发他们，在反日旗帜之下，尽量争取多团结一个人。

我们开过群众集会之后，在吉林市内各地，往墙上和电线杆上张贴了许多传单和檄文。上面写着“中国警察毫无根据地逮捕朝鲜同胞关在监狱里进行迫害”、“中国的官署不要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当！”、“尽快释放关在监狱的朝鲜同胞！”。

我们还给各家中国报社投稿，大造舆论。吉林市的青少年和群众每天拥到督军署去大声要求立即释放被监禁的人，有时还在督军署前面举行示威。为了阻止反动军阀把逮捕的朝鲜独立运动者移交给日本人，我们做出了一切努力。

在群众的压力下，吉林督军署终于在二十几天后释放了安昌浩和其他所有被捕人员。安昌浩的获释，是我们经过紧张的斗争取得的胜利。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为了看望恢复了自由的安昌浩，我们到独立运动者他们那里去了。我暗自希望安昌浩对我们提出书面质问的心情多少有所理解。

但是，安昌浩一出狱就急忙离开了吉林。我无从知道他是怀着何种心情回上海去的。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振作起精神，怀着新的心情离开吉林的。在那以后，他没有玷污爱国者这一崇高称号，经受了一切考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证实了我的推测。

安昌浩离开吉林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过了十多年，我们在白头山一带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安昌浩被日寇逮捕，后因狱中得的病，不幸去世。

我听到这个噩耗，想到他为民族的启蒙和团结献出了一生，却没有看到国家独立的一天，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禁不住十分难过。然而，我同安昌浩的异乎寻常的关系，并没有就此完全断绝。虽然安昌浩已经与世长辞了，但他的妹妹安信好解放后任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和我们一起工作。

解放后，我胜利地回到祖国，通过在国内活动的爱国志士，了解到安昌浩的妹妹住在南浦一带。于是我把寻找安信好的任务交给了当时作为派遣员在南浦地区工作的金京锡同志。过了几天，由南浦送来了已找到安信好的报告。我给金京锡同志打电话问了安信好的情况，金京锡只回答说，她成天抱着《圣经》不放，看来像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女人。

我对金京锡同志说，她是一位著名爱国烈士的妹妹，她信教也会有爱国心，要给她以党的影响，好好引导她。

金京锡同志答应了，但显得不大情愿似的。当时还是对所有宗教徒一律另眼看待的时候，所以我几次三番地强调不要这样对待宗教徒，但疏远宗教徒的倾向却依然存在，很不容易克服。

过了几个月，金京锡同志告诉我好消息说，安信好已经入党，把党证夹在《圣经》里带着，为建设新祖国忘我奋斗。

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想，安昌浩的爱国魂并没有完全埋入地下。

每当看到安信好为祖国、为人民忠心耿耿地做工作的情景时，我心里就禁不住想起安昌浩，十分感慨地缅怀他作为独立运动人士度过的坎坷不平的一生和他为民族付出的劳苦。

毕生以反共为信念的金九,在举行南北联席会议时来到了北半部。他一见到安信好，就大为惊讶。看来，他完全没有想到，共产主义者们会让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的大人物的妹妹负起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这样的重任。安信好本是他年轻时的爱人、未婚妻。

我们对安信好的信任，也就是对安昌浩的信任。这又是我们超越思想和信仰的区别，在民族这个范围里，对以爱祖国爱民族为宗旨结成了血肉关系的所有独立运动的老前辈表示的礼节和敬意。

七　三府合并

总的来说，20世纪2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促进反日爱国力量联合起来形成单一战线的时期。真正为民族前途着想的先觉和爱国志士，都确信独立的基础在于反日力量的统一和团结，并为之而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我国三·一人民起义的影响下，随着新思想的传播而迅速组成的许多工人运动团体，到本世纪20年代中期合并成了朝鲜工农总同盟，团结反日爱国力量的工作在民族主义营垒里也有了发展。

当建立民族的唯一政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1927年成立了共产主义阵营和民族主义营垒的联合战线机构——新干会，其属下集结了几万名会员。

合并反日爱国力量的运动，在成为独立运动策源地的满洲地区也积极开展起来。从“韩日合并”以后，在满洲地区像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无数小规模的独立运动团体，经多次离合聚散，到1925年基本上分成正义府、新民府和参议府三个府，分别独立地开展了活动。

然而，这三个府各自划出自己的管辖区，与其他团体既不联系也不合作，像中世纪的小公国那样形成鼎立之势，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

的攻势面前，陷入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境地。由于珲春事件、兴京事件、古马岭事件等日军接连不断的大屠杀和“三矢协定”的缔结，满洲地区的独立军团体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日军在凤梧洞战斗和青山里战斗中惨遭失败后，为牵制独立军的武装活动，继续增强自己的兵力，推行死一名日军就杀十名朝鲜人的惨无人道的心理杀戮战，把正在成长的独立军推入了被动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热中于争夺霸权的各府领导人，为扭转独立军面临的困难局面，不能不考虑独立运动团体的合并问题了。

从三个府诞生的初期起，独立运动的先觉们就深刻地认识到合并的必要性，为实现这三个府的合并，从各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当时，这三个府互相诋毁和仇视，把精力无谓地消耗在扩大各自管辖区的竞争上。这种争夺霸权的纷争，有时还导致了令人痛心的冲突和流血惨案。

1925年夏天，我曾亲眼看到，在我父亲的主持下，三府领导人在抚松举行大规模的会议，认真讨论了实现合并的途径。会议开了十天，换了三个地方：抚松、万里河和阳地村。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成立了民族团体联合促进会。

参加民族团体联合促进会的人士，加紧进行了建立民族单一政党的筹备工作，并在同各派领导人的不断联系下，举行多次会议，讨论旅满朝鲜同胞的自治问题和合并革命战线的问题。

在不断转移会场的过程中，还发生过像小说一样的“王八事件”。

那时，金东三、崔东旿、玄默观、沈龙俊、林炳茂、金墩、李渊、

宋相夏等三个府的领导人，正聚在新安屯开合并会议。新安屯位于吉长铁路西南约30里地左右的地方，和吉林、兴京、桦甸一样，是在满洲屈指可数的政治运动的策源地之一。

日本领事馆的警察探悉到举行三府合并会议的秘密以后，把五名密探扮作老百姓派到现场。这些密探来到靠近新安屯的东坰水沟村，装作抓乌龟，刺探三府合并会议的消息。但他们被村里的青年发现了，全被处决了。青年们用一条绳子把他们捆在一起扔进松花江水葬了。

驻吉林的日本领事馆警察向中国警务厅通报了这件事情的始末，并借口朝鲜人杀害了日本良民，强迫警务厅要对案件现场和新安屯进行共同调查。这个情报通过警务厅翻译吴仁华传给了三府合并会议的代表们。代表们宣布休会，撤离了新安屯。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王八事件”。在中国话里，王八是乌龟的俗称。

旨在合并独立运动团体的三府会议，一直伴随着重重困难和迂回曲折。害怕三府合作的日寇，死死地进行跟踪和破坏活动，这是第一个困难，再一个比这更大的困难，是各团体内部发生的各派系之间的对立。正义府分裂成促成会派和协议会派；新民府有军政派和民政派相互对立；参议府则分成支持促成会派和支持协议会派。他们互相勾心斗角，争吵不休。金东三、李青天、李钟乾等促成会派从正义府脱离出来；以金佐镇、黄学洙为头目的军政派也与新民府决裂。

吉林市是三府合并会议开得最多的地方。

吉林尚仪街有一座朝鲜人经营的叫复兴泰的碾米厂。住吉林的独立运动者们把这座碾米厂的办公室用作寝室兼办公室。来自南满、北

满和东满的独立运动者，也都把这个地方当成熟铺子，经常到这里来聚会。因此，复兴泰没有一天是清静的。

就在这里，三府合并会议开了一年又一年。

复兴泰碾米厂位于来往毓文中学的路口上，所以我有机会经常接触来参加会议的代表。

这座碾米厂的主人是憧憬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是给人碾米，收点碾米费来维持生计的小企业家。

有一天，我走进了碾米厂，有几位认识我的老人，把我介绍给金佐镇、金东三、沈龙俊等三府合并会议的代表，说我是金亨稷先生的儿子。然后开玩笑地附带说了一句："他的思想可和我们不一样啊！"

我笑着说："您这样说，可就难为我了。诸位先生也是要争取朝鲜独立的，我也是要争取朝鲜独立的，思想怎么会不同呢？"我这么一说，他们就提出根据说，看你们搞的好像是社会主义运动嘛！

这是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再好不过的机会。于是我对他们说："目前，青年们搞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世界趋势，青年都向往共产主义。别人都搞共产主义，为什么朝鲜青年就不该搞呢？要是我们看不到新的，老是抱着旧的不放，朝鲜的将来会是怎么样呢？先生们都是我们的先生，我们是新的一代，先生们如果不理解我们青年的心情，就有点困难啦！"他们听罢，说道："不论你搞的是什么，我们不会管你的。不管怎样，你们也不会来打倒我们吧！"

我很有礼貌地问他们，先生们凭什么说我们青年会去打倒你们呢？

类似这样的事情，后来也有过几次。

我在来来往往的路上有时进去看看他们，但总是听不到三府合并的消息。独立军的领导人把会拖得真叫人心烦。

我在同三府领导人接触的过程中，了解到他们的生活，真是暮气沉沉，枯燥无味。

前面谈过，吉林城外朝阳门附近有个打出三丰栈牌子的客栈。每当三府合并会议休会的时候，独立军的领导干部就凑到那里，进行牵制别的派系的秘密会议。

这座客栈附近有孙贞道主持的礼拜堂，是我们用来教育群众的场所。所以，一到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我自然就能看到聚在三丰栈里的独立军上层人物的生活情况了。

他们住的房间里常放着一张光油油的棋盘，这是店老板怕他们闲得无聊，特意给他们置备的。独立军老头子们在这里不是成天磨牙，就是攻呀挡呀地喊叫着下棋，以消磨时间。

旅店老板为侍候这些独立军头子，几乎把老本都掏出来了。他们一来住店，就从太丰合碾米厂拿最好的米来给他们做饭，顿顿给他们吃肉、鱼和豆腐等菜。他们天天通宵达旦地下棋，夜餐还要吃荞麦冷面。

听老板的女儿说，他们吃这些都不拿钱。每晚，她还给他们跑腿，打酒买烟，弄得连觉也没法睡好。有一次，她对自己的母亲说：“妈，咱家老这样给他们吃喝，过不上三个月，家底就要朝天，变成叫花子了。”她母亲却责备说：“他们都是为光复祖国打仗的大人物，咱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等作好了准备，他们会去打仗的。你可再别说那种话啦。”

然而，独立军的指挥员们别说什么打仗，就连武器都归拢到一块藏在仓库里，成天无所事事，白吃闲饭。当我们去找他们时，他们却打开像帐本一类的东西，装出在做工作的样子。他们不愿让年轻人看出他们是游手好闲的懒汉。

有时，他们用拳头或木枕敲着桌子，污言秽语地互相谩骂。争论的主要焦点是三府合并后应由哪一派掌握实权的问题。他们都炫耀自己的一派活动历史长，功劳大，管辖区广，群众多等等，极力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一到晚上，却又摆上酒席大吃大喝，耍酒疯，直到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才起床。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到太丰合碾米厂去，遇见了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的财政部长，同他进行了一场争论。

他带几个同僚来吉林参加三府合并会议已有好几个月了。他经常接触青年，喜欢同年轻人开玩笑，言谈中也有不少进步的味道，所以我们见到他，都称他先生，也毫不掩饰地对他说出我们的心里话。

那天，我们跟他闲聊时，对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批评了几句。我们几个青年人围着他坐在一起，对他发起攻击：你们目无国家和民族，不顾百姓死活，来到外国还争吵不休，都想着争夺一个好地位，这样还敢谈什么爱国吗？即使你们在这里当上了官，充其量也不过是可以到农村去对几家农民指手画脚，逼缴军款罢了。你们争夺这样的权力有什么必要呢？

财政部长听了我们正当的忠告，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最后竟勃然大怒，说我们侮辱他的人格。

“你们敢反对我？好啊，你们都是好汉，而我们都是孬种。既然如此，你我都把脸丢个干净吧！”

他一边大叫大嚷，一边哗啦哗啦地脱衣裳，声称要赤身裸体上街乱跑，给朝鲜人丢丑。他的意思是，既然自己受了侮辱，就该给民族抹黑，好给自己解恨。

我见过许多人，可从未见过这种人。身为临时政府的财政部长，看其行为，竟是一个地道的无赖、流氓。要是他真地跑到碾米厂的墙外去，那可就糟了。财政部长丢脸，也就等于我们丢脸，等于给朝鲜人丢脸。于是，我们好说歹说，好不容易才劝他安静下来，给他穿上了衣服。

那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都说，再不要和这种人来往了。受点批评，就要赤身裸体跑大街的人，搞独立运动，还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呢？若是穿开裆裤的孩子，还情有可原，可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竟干出这种丑事，岂能称之为政治家？

这个人给临时政府丢尽了脸。当时，满洲地区本来就有许多人不正眼看待临时政府。他们厌恶临时政府专事派系斗争，厌恶它搞乞求外交，厌恶它募集军费，挥霍无度，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临时政府征收人头税和救国义务金还嫌不够，竟发行公债，也不惜作出卖官鬻爵的勾当，到处去找那些有钱人，发给他们“任命状”，任命某某为某道观察使，某某为某郡郡守，某某为某面面长，然后按职位征收相应的金钱。

民族主义者不合不并，继续搞派系斗争，日本帝国主义者则趁机

派走狗打进他们内部，轻而易举地捉拿反日独立运动者。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吴东振的被捕。日寇警察派自己的走狗金宗源去对吴东振说，朝鲜的大金矿老板崔昌学已在长春，只要跟他好好交涉，就能解决一大笔独立运动资金。他们这样把吴东振诱骗到长春附近的兴隆山车站，逮捕了他。

我听到这个消息，悲愤难忍，好几天连饭都吃不下。

真是祸不单行。此后不久，吴东振的儿子吴京天在吉林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发生了火灾，不幸被烧死了。我冲进火场把他背了出来，但未能把他救活。吴东振的夫人，因丈夫被抓去坐牢，儿子又遭了不幸，悲伤过度，竟至精神失常，不管我们怎样安慰怎样照料她，都无济于事，终于含冤离开了人世。

当吴东振在狱中抱着宁死不屈的决心坚持斗争的时候，那些独立运动的上层人物却以三府合并为名，天天聚在一起，不是喝酒就是吵嘴，为争权夺利消磨时间。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当然很不舒服。

从吴东振的逮捕中尝到了甜头的日寇警察，更加张牙舞爪地要捕捉更多的反日运动者。而三府领导人却还没有清醒过来，仍在那里空话连篇，争论不休。

有一天，不知刮起了什么风，三府的领导者们都把沙子装在裤筒里，在碾米厂围墙内跑来跑去地练跑步。我看到这情景，非常难受。正当日寇对满洲的侵略迫在眼前，祖国的命运愈加暗淡无望的时候，这些声称为朝鲜的独立而战的人，却在搞这套玩艺儿，实在太不像话。

我忍无可忍，恳切地对他们说，我们原以为，吴东振司令被捕以

后，先生们一定会大有所悟的。日本鬼子正在不择手段，一个个地逮捕有名的反日运动者，处以刑罚，而先生们仍聚在这里只顾开会，难道这是对的吗？我们青年学生衷心希望你们早日实现三府合并，使南满、北满和东满的所有独立运动者都能通力合作，所有朝鲜人都能紧密团结起来。

然而，三府领导人仍然继续争吵，继续高谈阔论，白白地消磨着时光。

当时我心中的焦躁和不安是难以形容的。所谓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都热中于派系斗争，拥有一定武装力量的民族主义者也落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能不使人焦躁不安呢！

我想来想去，决心再次给民族主义者以更大的刺激，写了一出讽刺民族主义者争权夺利的话剧。这就是一直流传到今天的《三人一党》。

排演就绪，我去邀请了三府领导人。我对他们说，诸位先生都忙于开会，非常辛苦，我们特意为先生们准备了一出话剧，请都去观看，也顺便解除疲劳。他们都很高兴，都到孙贞道的礼拜堂来了。

演出先表演了几个歌舞节目，最后把这出话剧搬上了舞台。

开始，那些老头子都很高兴，说这出剧很有意思。但当他们看到剧中三个人争夺一个座位的时候，觉察到这是讽刺他们的，就都变得面红耳赤，一边往外溜，一边说："坏小子们，竟敢侮辱我们？那个成柱变坏啦。"

第二天早晨，我们去找他们，我若无其事地问：

"先生们昨晚为什么没有看完就走了？戏剧要看到最后才有意

思，不是吗？”

那些老头子大发雷霆，问我昨晚都骂了他们什么。

我向他们照实说了我们的心里话：

“先生们，有什么可生气的呢？先生们老那么争吵，我们看着也挺着急难受，才演了这么一出戏。昨晚演的戏反映了我们青年人的想法，先生们也该了解了解青年人都在向往什么，群众都在要求什么。”

他们听了我们十分中肯的话，受到了激励。他们说，为了不再让他们青年人看笑话，也该搞出一点什么名堂来了。

此后，三个府总算在形式上以国民府的名义实现了合并。这是由正义府的残留派、新民府的民政派和参议府的沈龙俊派联合而成的半拉子合并。

正义府的脱离派、参议府的促成会支持派、新民府的军政派则另组织一个叫作临时革新议会的团体，与国民府并立。

各派的领导人虽然凑到国民府的房檐下去了，却都背对着背，各做各的梦。

民族主义营垒里的保守势力就是这样排斥新思潮，专事派系斗争，最后宣告了自己的衰亡。他们之所以不肯上战场同日本帝国主义拼斗，而专事派系斗争和扯皮吵架，虚度光阴，是因为他们没有依靠朝鲜民族自己的力量去光复祖国的坚定决心。

历史终于提出了要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让新一代接替老一代的不容推迟的任务。我们认为，能够承担起这一任务的主人公，就是青年共产主义者。

八　车光秀找到的路

每当我忆及在吉林的时代,就有许多难忘的面容浮现到我的眼前。这些面容中，车光秀一向占在前列。

我第一次见他，是1927年春天。

最先给我介绍车光秀的是崔昌杰。华成义塾停办后，崔昌杰在正义府的一个据点——柳河县三源浦——当独立军。

有一天，崔昌杰突然派交通员给我送来一张纸条，告诉我不久将有一个名叫车光秀的人去吉林，要我和他见一面，还说他自己也将很快到吉林来。

过了几天，我在基督教青年会馆发表演讲，走出来的时候，一个微歪着头，戴着眼镜的青年突然走到我面前，没头没脑地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崔昌杰的人。我回答说认识，他二话不说，就先伸手握住了我的手。这个人就是车光秀。

这天，车光秀跟我谈话，总让我多讲，自己尽量少说，因而我们之间的谈话可以说用的是他问我答的方式。

谈过话，他也不说一声到哪里去，站起来就走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待人态度生硬，不好接近。

过了几天，崔昌杰真地来到了吉林。吉林有正义府的领导班子，

他们的中央护卫队的营房就在新开门外。崔昌杰所在的中队有事要跟中央护卫队联系，他就借此机会来吉林找到了我。

我把跟车光秀的谈话内容和他第一次给我的印象，都告诉了崔昌杰，也谈到了车光秀还不肯开诚相见的情况。

崔昌杰说，他初次跟车光秀相见，也留下了同样的印象，但是一经熟悉，就看出了他是一块真金。

有一天，崔昌杰所属中队的中队长收到一份情报，说柳树河子学校里有个教员在宣传共产主义。

中队长立即下令去逮捕他。

那时候，独立军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共产主义者视为异己分子，因此崔昌杰担心车光秀会受到独立军队员的欺负，便派去了受过自己影响的队员，还一再叮咛他们对人不要粗暴。

那几个队员到了柳树河子，在车光秀寄宿的家里吃了晚饭。看样子那顿晚饭十分寒碜，把小米干饭一泡在水里，就浮起了米虫和米糠。那几个习惯于到处受优待的独立军队员，立即大发脾气，骂饭菜不好，骂房东对待独立军的态度太不像话。

这时，车光秀出面保护房东说：

“这家房东已经好几天没见过一粒粮食，只用野菜充饥。今天你们独立军大人来了，他们特意到地主家去借了点小米来给你们做饭，尽了他们的心意。要问罪，就该向地主问罪，是他给借的赖米嘛。房东是尽心尽意地给你们做饭的，他们还有什么罪啊！”

车光秀这么一说，那些脸红脖子粗地大发脾气的独立军队员，都

无话可说，闭上了嘴。因为他说的句句有理，无可挑剔。

那几个起初大骂房东连独立军都不认得的队员，后来被车光秀的为人所感动，非但没逮捕他，反而回队向中队长报告说，车光秀不是共产党，是个了不起的爱国者。

崔昌杰说，他跟车光秀见过几次面，认为是一个值得结交的人。崔昌杰生性就有一种脾气，他一旦认为是好人，就永远对他真诚相待，关心备至。

我心想，车光秀既然被崔昌杰看上，那他定是好人无疑。

崔昌杰回部队以后，过了一个星期左右，车光秀突然来找我。他说，这几天，他闻遍了吉林的空气，接着没头没脑地突然问我，你打算怎么处理同民族主义者结成同盟的问题。

当时，因为蒋介石背叛了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就同民族主义者结盟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几乎成了一个辨别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试金石。我想，正因为这样，车光秀才一见到我就问我对同民族主义者结盟问题的看法。老实说，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当时的中国革命出现了复杂的情况。

蒋介石叛变以前，中国革命处在蓬勃发展的高潮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成了推动革命前进的强大动力。

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起，中国革命以革命战争的方式，朝着在全国推翻反动统治的方向发展。从1926年夏天起，国民革命军打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肃清封建势力的旗帜，开始北伐，迅速地控制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省份，连续占领了长江流域的主要城

市，给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占据着华北地区的张作霖反动军阀以很大的压力。

上海的工人经过三次英勇的起义，掌握了这座城市，武汉和九江的人民为北伐革命的胜利所鼓舞，收复了英帝国主义占据的租界；工人举行总罢工，响应北伐军进军，农民则同工人一道，冒着生命危险，大批地参加了北伐战争。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破坏了国共合作，背叛了革命。他为了独揽革命的领导权，施展阴险的伎俩，开始把共产主义者赶出国民党领导机关和政府机关，并为了取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援，积极推进幕后交涉。

车光秀十分愤慨地说，如果蒋介石没有叛变，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很大的发展，那么，同民族主义者合作的问题，也不会变得像现在这样很尖锐。

当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北伐革命提到日程上的时候，蒋介石就开始实行军事独裁,走上了对共产党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的道路。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从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赶出了周恩来等所有共产党员；1927年3月，用武力强行解散支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和九江市党部；3月31日，又在重庆袭击群众大会会场，屠杀了大批市民。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野蛮地大肆屠杀革命群众，犯下了滔天大罪，血腥的屠杀一直蔓延到各个地方。

以这一事件为分界线，中国革命进入了暂时的低潮。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有的人甚至提出极左的主张说，应从中国革命的这种现实中吸取教训，共产主义者不要同民族主义者合作。

看来，这一切都给了车光秀以刺激。

为了光复祖国，朝鲜共产主义者应同民族主义者合作，这是我们从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起就一贯坚持的立场。

这天，我对车光秀说，在朝鲜，虽然有一部分堕落的民族主义者屈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脚下，宣扬什么“自治”和民族改良主义，但是有良心的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依然在国内和国外不屈不挠地为争取朝鲜的独立而进行着斗争，他们从不屈节；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殖民统治下，饱受苦难的朝鲜民族主义者，具有强烈的反日情绪，因此，同这样的民族主义者和民族资本家，我们是应当携手合作的。

关于同民族主义者结盟问题的这种见解，是以对民族主义的我们的独特的解释为基础的。当时也和现在一样，我们认为民族主义是第一个出现在民族解放斗争舞台上的爱国思潮。

本来，民族主义是作为维护民族利益的先进思想出现的。

在日趋没落的王朝政治的深渊中，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外来势力强迫开放门户，国家经受痛苦，命运危在旦夕之时，点起开化的灯火，高呼着“自主独立”、“保国安民”、“斥洋斥倭”,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可以说就是民族主义。当民族的主权遭到外来势力的残酷践踏，国土变成列强争夺利权的角逐场的时候，出现了维护民族利益的思潮，并成为群众的指导思想，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现象。

因为新兴资产阶级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引导了民族运动，就认为

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这种见解不能认为是公正的。

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时期，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民族主义反映了民族共同的利益。

后来，资本主义得到发展，资产阶级成了反动的统治阶级，民族主义也就随之变成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工具。因此，真心维护民族利益的真正的民族主义，和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工具代表其利害关系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任何时候都必须区别对待。如果对这两者等量齐观，就会在革命实践中犯严重的错误。

我们反对和警惕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但对真正的民族主义，我们是支持和欢迎的。这是因为，形成真正的民族主义的基础的思想感情是爱国。爱国心是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共同的思想感情，是能够使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在为民族的同一条轨道上和解、团结和合作的最大公约数。爱国家爱民族，是把共产主义同真正的民族主义连结起来的大动脉，是引导真正的民族主义走联共道路的原动力。

过去，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在爱国家爱民族的旗帜下，在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收复被外敌霸占的国土的斗争中，立下了不少功绩。

今天，在北方和南方存在着互不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思想的分裂状况下，我们仍抱着能够统一祖国的坚定信念，为其实现而进行顽强的斗争，是因为我们从共产主义者和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所共有的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感情中看到了能够实现民族和解大业的绝对源泉。

在单一民族国家的我国，真正的民族主义就是爱国主义，这是一

个不可改变的原理。从这一原理出发，我一向重视同爱国的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的合作与团结，认为这是我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

这是我从进行青年学生运动的时候起直到今天，一辈子坚持不渝的观点和立场。

那天，我见到车光秀的时候也强调说，必须区别对待真正的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车光秀听完我的话，一把握住我的手，激动地叫了一声“成柱”。

我并不认为，因为我的理论高深精湛，才说服了车光秀，而是因为我根据朝鲜的具体实际判断一切问题，不讲空话，坚持重视革命实践的立场和思想方法，引起了车光秀的共鸣。从此，车光秀开始敞开了自己的心怀，一下子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在此以前，主要是我谈，他只问，只听，现在不同了，我不问他，他也主动谈心里话。

我们开诚相见，交上了朋友，我这才知道车光秀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比我大七岁，到日本念过大学。写文章，作报告，他都很擅长。他心地无比善良，在青年人中很受欢迎。他又是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专家。他和朴素心就马克思主义问题进行争论，十分激烈，互不相让。火曜派的头头金灿一碰见车光秀，就挫了锐气，不敢造次。就马克思主义问题进行争论，金灿始终敌不过车光秀。车光秀曾把金灿当作神乎其神的共产党大人物，可是见了几次面以后，他对待金灿就像对待一个中学生那样随便。有一次我们让车光秀跟汉上派的头面人物申日镕进行争论，结果申日镕也不是他的对手。

车光秀有个特点，他的头总是轻微地向左歪着。这是他小时候脖

子上长了疮，痛得老把头歪向一边养成的习惯。

车光秀是平安北道人，从小就很聪明，村里的人都夸他。他十几岁就到日本工读。他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向往共产主义，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在他摄取新的思想，艰苦工读的时候，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低潮期。刚建立不久的日本共产党，由于1923年6月对党领导核心的第一次大逮捕和关东大震灾时的白色恐怖，大大削弱了，后来由于隐藏在党领导班子里的机会主义分子的阴谋活动，终于被解散。车光秀觉得，坐在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日本，去摸索什么斗争方向，翻阅马克思的著作，都是无聊的事情。于是他回到了汉城。他在汉城见到了一些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可是，他看到同是信仰马列主义的人，却搞出了那么多的派别和系统，十分错综复杂，他简直理不出头绪来了。他为了辨别各派的主张，摸索自己该走的路，开始下功夫研究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派别关系。然而，他好像走进了迷宫，一无所获。

三人一党，五人一派，派系不计其数。各派针锋相对，纷争十分尖锐，而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实际上却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车光秀说，他在国内时，在宗派分子的阴谋活动中觉得最卑鄙龌龊的是洛阳馆事件。所谓洛阳馆事件，其经过如下：火曜派和北风会派两派人，在名叫洛阳馆的饭馆聚会的时候，对这两派的结合心怀嫉恨的汉城派，突然袭击会场，施加暴行，打伤了几个人。那些挨打受了重伤的人，向日寇的法院起诉，对汉城派的加害人提出了刑事诉讼。没过几天，北风会派又对汉城派施加暴行，打伤了他们。这么一来，

汉城派受了重伤的人，又向日寇法院起诉，对北风会派的加害人提出刑事诉讼。

这类派系斗争愈演愈烈，竟至发展到各派竞相组织恐怖团与对方较量的地步。

车光秀目睹这种情景，日夜长吁短叹，慨叹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竟堕落到了这种地步。他想了想，最后认为，满洲与苏联毗邻，到了那里也许能找到一条渠道同共产国际接上关系，进而可以找到一条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应走的新道路。他抱着这样的一线希望，离开汉城来到了满洲。

他一到满洲，就碰上了政友会宣言。

宗派分子们在这篇政友会宣言中竭力主张说，为了从派系斗争中拯救共产主义运动，应停止互相攻击，进行公开讨论，开展理论斗争，从而给群众指明真正的前进道路。

如果按照政友会宣言的主张公开进行论战，那么，从中得利的肯定不是朝鲜共产主义运动，而是日寇的特高警察。

朝鲜共产党成立后，火曜派同汉城派闹对立，专事派系斗争，他们为了显示火曜派势力强大，曾在报上公开了正在筹备中的民众运动者大会的72名筹备委员名单。这是利令智昏，只顾争夺领导权的宗派分子们把共产党干部的名单全部送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公开告密书。日寇就靠这个名单大肆逮捕了共产党干部，结果，火曜派的主要人物几乎都被关进了监狱。

如果忘记这一教训，照宗派分子的主张再次开展公开论战的话，

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那是不言而喻的。

熟悉日本内情的车光秀，谴责政友会宣言说，它是曾在日本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过的机会主义思潮——“福本主义”的翻版。

福本曾主张说，为了重建党，应通过“理论斗争”，先辨别具有纯正革命思想的人和不具有纯正思想的人，然后只吸收思想纯正的人。他的这一主张，是分裂主义的和宗派主义的主张，它给日本工人运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政友会宣言不但原封不动地搬用了福本的理论，而且连它的文字都毫厘不差地抄袭过来。对这样的宣言，车光秀吐了一口唾沫，就背转了身。

他对宗派分子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于是去了柳河。他决心到乡下去当个教师，给孩子们灌输民族的正气，无声无息地了却一生。后来，他偶然碰见了崔昌杰，并且经过他的介绍，来到了吉林。

车光秀坦白地说，他在异国土地上的凄风苦雨中漂泊的时候，一直如饥似渴地盼望着出现一位领导者，给他以力量和希望，给他指出正确的斗争路线。

他讲完了自己的经历，激动地说道：

“成柱！咱们能不能在相互信任、相互爱护中搞共产主义运动啊？就在没有宗派、没有领导权争夺战的环境里……”

车光秀的这一呼声，正是他在远离祖国几万里的异国他乡颠沛流离，彷徨摸索，最终找到了革命道路所作出的总结，所得到的教益。

我也很激动，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新一代人，不要学宗派分子

走分裂道路，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沿着革命的康庄大道勇往直前。

车光秀还坦率地谈了他在听崔昌杰介绍我的时候产生的想法。他说，当他听到我在吉林搞学生运动的时候，曾经心不在焉地想过，区区一个中学生能懂得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搞共产主义运动又能搞出个什么样子呢？于是他打定主意要到吉林来找我试探一下。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也难怪我当初把这个豪爽热情、平易近人的愣头青当成了一个枯燥呆板的人。

没过多久，车光秀就成了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一员。

这年夏天，我派车光秀到新安屯去。新安屯，位于吉长公路以西不远的地方，是朝鲜的爱国志士建成的理想村，是在满洲的朝鲜人居住区中为数不多的政治运动策源地之一。如果把这个村庄革命化了，就能开辟深入农民群众的第一个渠道。我想把这个任务交给车光秀。

我叫车光秀到新安屯去工作的时候，他很吃惊，半开玩笑地问我，他好不容易接上了组织关系，刚从乡下上来，怎么又叫他下乡？别人在汉城啦、东京啦、上海啦这样的大城市里搞运动还嫌不过瘾，甚至跑到共产国际去掀风起浪，而他却要到巴掌大的农村去，还能搞出什么名堂？可见他虽然反对旧工作方法，却还没有完全克服旧的观念。

我给他作了解释，大致是这样讲的：

认为在大城市里才能搞革命，是不对的；不论是城市或农村，哪里有人民，我们就应该到哪里去工作；农民在我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到满洲来的朝鲜人，也大都住在农村里；不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就不能唤起人民群众投入光复祖国的伟大事业，也不能设想共产主义运

动在我国取得胜利；我念完了学校，也准备到农村去工作；认为跟共产国际来来往往才能树立共产主义者的名分，这也是不正确的思想方法；共产主义者所以尊重共产国际，是因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是带有国际性质的，是因为工人阶级只有加强国际团结，才能粉碎国际上联合在一起的资本的锁链；只要为完成自己所承担的民族义务和国际义务真诚地进行斗争，就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也能使我们渴望已久的光复祖国的那一天早日到来；目前搞运动的人，都在往上走，从农村到城镇，从城镇到汉城，再从汉城到共产国际，……他们认为，只有往上走才能跻身于群英之列，也才能得到承认；然而，要为无产阶级搞革命的人，脱离群众，老是往上头走，这行吗？我们要往下走，下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去。

“不要往上走，要往下走。”

车光秀神色严肃地自言自语道，然后沉思了好半天，突然用拳头啪地一声敲着桌子喊道：“妙！是一个奇妙的发现！”

由于车光秀的出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核心力量更加壮大了，我们的队伍也有了能够同朝鲜共产党上层大人物们比高低的响当当的理论家了。

从这时起，车光秀跟我们休戚与共，并肩战斗了三年多。他为开展青年学生运动，促进群众革命化，为抗日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做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新安屯、江东、蛟河、孤榆树、卡伦、五家子、柳河等地方的革命化，都离不开他的名字。

最初，他参加了实现吉林附近朝鲜人村庄革命化的工作，接着以

吉林为轴心，在南满的柳河、中部满洲的卡伦、孤榆树、五家子等朝鲜人居住地，同金园宇、桂永春、张蔚华、朴根源、李钟洛、朴且石等人开展了团结青年群众的工作，最后一个时期在安图一带参加了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工作。

他的群众观点很强，不论到哪里，很快就能同群众打成一片。他生性落落大度，潇洒豪放，知识渊博，又能说会道，群众都喜欢他、尊敬他。他讲授的社会科学课，在三光学校（孤榆树）学生中最受欢迎，他们总是抱着很大的期望和兴趣盼他来讲课。他为青年学生和农民群众，作过很多讲演，也普及了很多歌曲。

他在白信汉的追悼仪式上作的悼词是很有名的。

车光秀最常去的地方是新安屯。他在新安屯吉兴学校曾当过一段时期的教员。他住在学监家里，用革命思想教育村里的农民、青年和妇女，把他们团结到反帝青年同盟、农民同盟、妇女会、少年会等组织里来，推进了全村的革命化。

新安屯原是在民族主义者和宗派分子影响下的地方。那些宗派分子们不时地到村里来，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论”呀，这个论呀那个论呀，尽扯一些荒谬的怪论，所以封建保守的老年人和大人们，一说起“社会主义”，就摇头表示反对。

正因为这样，车光秀开始也很难站住脚。他借了一间人家的上房，把墙裱糊好，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当作乡亲们来闲谈的地方，常常邀请一两名有文化的老年人事先作些准备，然后让他们在老年人中间进行宣传。

村里的好些老年人一到晚上就别着长烟袋到车光秀修好的房里来闲聊。这时候，由车光秀事先安排好的老人就开始天南地北地讲一些有趣的故事，然后缀上一句说：“现在是个坏世道，要改变这种世道，就要先打倒地主。”用这种方式天天宣传几句革命道理。

车光秀就是这样先教育老年人，然后开办夜校，有时还给大家讲话，也跟大家一起唱歌跳舞，使村子变得热气腾腾，很有生气。于是村里的人们开始说，要是像车光秀先生搞的这种社会主义，他们是不会反对的，并且开始积极参加革命工作。

车光秀在新安屯站住了脚以后，星期六一放学，我就找他去。

那时候，为了摆脱敌人的监视，我们一到吉林郊外，就钻进高粱地或玉米地里，脱下学生服，换上农民服装。

我到新安屯去，听取他的工作经验，也帮他做些工作。

在这过程中，我对车光秀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也对我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我们通过车光秀积极推进新安屯革命化的时候，有一天，车光秀来到吉林把我拉到北山公园。我们在树荫下找了个位置坐下以后，车光秀告诉我，有个叫许律的人很值得重视。据他说，许律在龙井上东兴中学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前不久他来吉林准备上法政大学，可是因为供不上学费，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车光秀所以关心许律，是因为考虑到了许律的背景。据他说，派许律到吉林来的是金灿。而这个金灿，是当时车光秀还很崇拜的一个人。

我听了很吃惊。

就金灿而言，他是我国初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人物。第一次建立共产党时，他是宣传部的负责人，第二次建立共产党时，他又起了主导作用。后来发现有被捕的危险，他就躲到了上海，组织了朝鲜共产党上海部。他是火曜派的代表人物，是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实际组织者。

他把自己影响下的青年派到吉林来，是因为他看上了我们。我们在吉林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积极开展青年学生运动的消息一传开，他也开始把视线转向了我们。他看到我们的力量日益壮大起来，就想派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来给我们灌注他们的思想。

金灿本人也到吉林来接触过许多青年学生。他还作过几次报告，我也听过。听说“马克思主义大师”要作报告，我就同车光秀一道去了他下榻的大东门外李琴川的家。可是他讲的是对革命实践有害的鬼话，令我们大失所望。

那天，金灿说他们的一派是朝鲜革命的“正统派”，并对别的派别大肆攻击和诋毁。他还荒唐地主张，朝鲜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所以革命的动力只能是工人和贫雇农，其他一切非无产阶级分子都不能成为革命的动力。

那天，我听着金灿的报告，深刻地认识到，他的主张是给人民群众造成混乱，对革命实践有极大破坏作用的危险的诡辩，不同这种诡辩作斗争，我们就不能走正确的共产主义道路。

车光秀说，他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后悔自己过去不知道金灿是这

种人，盲目地崇拜过他。

当时，宗派分子们为扩大自己一派的势力，到处向青年们伸出了自己的手。

ＭＬ派的安光泉穿着白色朝鲜长袍来到吉林，摆出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派头，企图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曾当过ＭＬ系共产党的第一书记，非常高傲。吉林有很多人崇拜他是“马克思主义大师”。

车光秀说安光泉是著名的理论家，我就想得到有助于我们活动的理论，去见了他两次。他也和金灿一样，讲话讲得很漂亮。

他讲话，一开始大家都表示赞叹。但是，没多大一会儿，大家的表情就变了。安光泉发出了无视群众运动的妄言。他说，只要借助于共产国际或大国的力量，不搞群众运动也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朝鲜这样的小国没有必要进行群众斗争去白白流血，而应当依靠大国的力量实现国家的独立。真是荒唐极了，简直是一种要盖空中楼阁的荒谬绝伦的诡辩。

我看这个人也像金灿一样，是个空谈家。于是我冲他说，先生讲的话简直无法理解。

我问他说，先生瞧不起群众斗争，那么为什么要建立共产党，搞共产主义运动？你到吉林来，大声号召人们投入革命斗争，又是为什么呢？我接着反驳他说，不提高群众的觉悟，不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而只靠共产党领导层的几个人，是不能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不相信本国人民，只想依靠别人的力量来取得独立，是一种妄想。

安光泉装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哈哈大笑着，说我们水平太低，

不是他谈话的对手，要想理解他的道理，还需要多尝一尝酸甜苦辣的滋味。

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理睬他。

当时，宗派分子们有的提出左倾机会主义的理论，说什么“朝鲜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要在满洲朝鲜人居住区先建设社会主义”;有的则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主张“因为朝鲜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目标是争取民族解放，因此应当由民族资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

在宗派分子当中，有的说，在朝鲜这样政治条件不利的特殊情况下，搞思想运动还可以，搞政治运动却不行；有的主张，“先独立，后革命”；还有的提出“反对资本主义，完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这样极端的口号，搅乱了群众的头脑。

我和车光秀还同申日镕这样的人进行过理论斗争。

我们见过许多宗派分子，他们都是赶时髦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沾染了名利思想和小资产阶级英雄主义思想，都是顽固不化的事大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

这天，我对车光秀说，金灿名声再大，也是个闹惯了宗派的人，因此不要对他抱什么幻想；我们看一个人，不管他是谁，不要先看他的名声、资历和地位，而要先看他的思想，看他对革命的立场和对人民的观点。

车光秀说，他是考虑到我们刚刚迈出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步，觉得同金灿这样的大人物携手合作，比起跟他闹对立，更有利于我们，

所以才这样做的，但以后就不再这样了。并且表示要和许律马上断绝关系。

他这样一改变态度，我也不能不更加慎重了。

如果许律是浸透了宗派恶习的人，就应当立即同他断绝一切关系；如果他是一时失足的人，就应该教育他，同他携手前进。我们决定直接跟许律见见面。

有一天，由车光秀带路，我们去了许律住的江东村。离开吉林，过了松花江桥，向敦化方向走一段路，就能望到龙潭山。江东村就在这个山脚下。我们决定在这村里建立反帝青年同盟组织，教育群众，把村子变成一个像新安屯一样革命化的村庄。

我们见了许律，人很踏实诚恳，无论从哪方面看，放任他滚到宗派的泥坑里去，是令人可惜的。

我让车光秀好好帮助他走上正路，我也常常到江东村去从各方面帮助他。

许律没有辜负我们的信任。他本是来替宗派分子拉拢我们的，但他反过来反对宗派分子，与金灿断绝了关系。我们在江东村终于建立了革命组织，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全村的革命化，许律也被培养成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骨干分子，反帝青年同盟和共青同盟的领导成员。

九　旺清门的教训

1929年秋，国民府在兴京县旺清门召开了东满青总和南满青总合并的大会，这个大会叫做南满青总大会。

国民府的领导人们说，根据三府合作已实现的客观条件，青年运动也应该克服分散性，保证统一的领导；便倡议召开两个青年团体合并的大会，计划在大会期间成立一个叫做朝鲜青年同盟的单一组织。他们企图通过大会防止渗入青年组织的新思潮的影响，把满洲一带的所有朝鲜青年团体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们同东满青总和南满青总等青年组织毫无关系，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本来可以不参加这个大会。但是，不能把大会只交给国民府的人。南满青总和东满青总受到不少宗派分子的影响，内部很复杂。弄不好，大会反而有使青年运动更加分裂的危险。

我们认为，有必要主动地参加大会，防止青年的分裂，给青年团体代表以积极的影响。

我决定以白山青年同盟代表的身分参加南满青总大会，便同金史宪一道离开了吉林。

金史宪本是去旺清门参加朝鲜革命党会议的。他还包了我的盘费。朝鲜革命党是国民府成立后，由独立军根据其宪章建立的政党。民族主

义者们说，国民府是自治行政机关，而朝鲜革命党是领导和监督整个民族主义营垒的民族唯一党，但实际上它只是国民府的一个变种。

我原想径直到旺清门去，可是又很想看看金赫、车光秀、崔昌杰等同志，于是先到他们进行活动的柳河县去了。

他们在柳河一带不断扩大反帝青年同盟组织，工作开展得非常活跃。

那时，车光秀在孤山子东盛学校里设了一个特别班，培养共产主义者。表面上称为特别班，而内部名称是社会科学研究会。这个研究会里成立了反帝青年同盟支部。

他们不仅在孤山子，而且在南满的许多农村办了这种形式的研究会，教育了许多青年，建立了共青同盟组织和反帝青年同盟组织。

我到现场去看过后才知道，在柳河进行活动的同志们做了比他们给我打的报告多得多的工作。

在柳河办完事，正要动身前往旺清门，车光秀追上来要跟我一起去。他说，国民府的上层人物正怀着歹毒的心秘密监视着同情共产主义的青年，让我单独一个人去，他放心不下。

我们到达旺清门的时候，吉林青年同盟、吉会青年同盟、三角洲青年同盟等许多青年组织的代表已先期到达了。

我一到旺清门就去看望玄默观。

国民府成立后，玄默观就不住在吉林，搬到旺清门来了。他一见到我就托付我说，国民府本部对成柱寄予很大的期望，要我在这次大会上好好地干出一番成绩来。他还叫我在会议期间不要住到别人家里

去，要住在他家里，讨论讨论青年运动的未来。

我很感谢他的心意，但我谢绝了他的邀请，住到我母亲家的远亲康弘乐家里去了，因为玄默观的家有大会筹备成员们进进出出，不是我住的地方。

康弘乐是属于民族主义左派的知识分子，在化兴中学任教。化兴中学和东满的大成中学一样，是独立军进行民族主义思想教育的学校。

不过，无论他们怎样进行民族主义教育，从那里出来的却都是共产主义者。招牌是民族主义，内容却是共产主义。

康弘乐的妻子名叫吴信爱，是个容貌俊美的现代型妇女。她唱歌唱得很好，南满地区的各组织不叫她的名字，都叫她绰号“黄莺”。

在大会前夕，国民府召开来自各地区的青年组织代表参加的预备会议，选出了大会筹备委员会成员。崔峰等我们的几个同志被选进了这个委员会。我们在华成义塾念书的时候就认识崔峰。当时他是南满青总的干部，在各朝鲜人居住区作了很多演说。还到华成义塾来作过讲演，受到了欢迎。他是一个有理论水平、又有事业心的聪明人。后来，他跟我们亲密相处，投到共产主义一边来了。

我也被选为筹备委员。筹备委员会成员们经过认真讨论，拟订了任何人都能接受的大会决议草案。其他的文件也都按照我们的意图准备好了。

我到达旺清门的第二天，就开始做青年代表的工作。第一项工作，便是在化兴中学操场上举行青年集会。目的是利用许多青年组织的代表聚在一起的机会，互相认识认识，并给他们以良好的影响。如果不

预先说好，他们就有可能在思想上被国民府的领导人所笼络。在这个集会上，我强调说，朝鲜青年运动要实现真正的统一，就要从思想上团结起来，这一团结必须以新的先进思想为基础。看来，这个讲话内容马上就让国民府的领导人们知道了。我通过金利甲得知他们正在神经过敏地注视着我的行动。离开柳河时车光秀所表示出来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金利甲是"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第一批成员，他在华成义塾停办后，住在离旺清门不太远的未婚妻全京淑家里，从事实现那一带革命化的工作。他有魄力，有胆量，做事大刀阔斧，干得很出色。在挥舞着"反共"旗帜的民族主义者的活动区域里，给人们灌输共产主义思想，的确是不容易的。

金利甲是为了列席大会来旺清门的。我在化兴中学讲话的第二天，他来找我说，在全京淑家准备了晚饭，请我去畅叙旧情。其实他请我是为了把国民府的动向告诉我。

金利甲说，国民府的人正在阴谋把大会筹委会成员全部逮捕起来。他劝我，在国民府动手之前尽快躲避为好。他还说，看情况，如果实在困难，他也准备连夜离开旺清门。据他说，玄默观在有国民府的干部都聚在一起的场所宣布，成柱也和他们思想不同，应该断然处置。

但是，我不想预先躲避。我心想，我没有做有害于国民府的事，他们还敢抓我吗？因为我搞共产主义宣传，玄默观就说我有问题，这也是讲不通的。我进行共产主义运动，是吉林的民族主义者都知道的。玄默观曾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当然也是猜测得到的。而现在却

要逮捕我，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并不主张打倒国民府，我们只号召所有朝鲜青年在新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难道这也能成为迫害我们的理由吗？

我打定主意，如有必要，就同国民府干部们进行谈判。我刚回到康弘乐家，吴信爱不知从哪里回来，告诉我一个不祥的消息。她说，国民府的军队已经逮捕了崔峰等几个大会筹委会成员。她还说，我也是他们缉捕的对象之一，最好尽快躲避。

我听了她的话，禁不住怒火中烧。我们从到达旺清门的第一天起就为了使南满青总大会成为一个同民族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的重要契机，费尽了心血。大会决议草案也是按这个方针拟订的。

但是，国民府的上层人物却以恐怖活动来回答我们的诚意。

我决心去找在国民府负责青年工作的高而虚进行谈判。车光秀也听到国民府胡作非为的消息，带着几个反帝青年同盟盟员跑到康弘乐家来了。

他们认为，大会筹委会成员是国民府袭击的对象，应该先离开旺清门。

但是，不能因为有危险，就躲避起来。

我想，现在已经不能通过大会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剩下的方法是同国民府的恐怖分子进行谈判，申明我们的正义立场。要同民族主义者合作，那么早晚总该跟他们开诚布公地谈一谈。虽然气氛是杀气腾腾的，但可以说现在就是一个好机会。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志，也一定要同他们见面，而且一定要由我去。

我说服了同志们，把后事托给车光秀，就去找高而虚。

高而虚是在国民府的保守派中倾向最不好的人，又是民族主义营垒中以“理论家”著称的人。我一进屋，他慌得手足无措。看来，他没想到我会找上门来。

我单刀直入地质问高而虚，为什么逮捕了崔峰等大会筹委会成员。高而虚却佯装不知，还说他也正在探寻他们的去向。

高而虚表里不一的态度，使我更加无法抑制愤怒，但我还是沉住气，想说服他。我追问道：

国民府为了统一青年运动而召开了会议，可是还没听青年们在会上的发言，只看了决议草案就吓得逮捕代表，这是一种过于急躁的、只顾私利的做法；你们说因为大会文件不如意才逮捕了委员，你们说说哪一点不如意，这是草案，有不如意的地方，可以改，你们是主办人，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就应该找青年们来商量才对，却把无辜的人抓起来，这样怎么能让青年放心地吸取新思潮，又怎么能让青年成长为坚强的反日战士呢？

高而虚又撒谎说，只是因为青年们有点过激，使他感到遗憾罢了，至于逮捕一事，实在毫无所知。

我向高而虚抗议道：

你也在汉城搞过学生运动，还为躲避日本警察的逮捕，打过逃往苏联的主意，所以你不会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思潮，它在世界上传播得多么广泛；现在凡是投身革命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理解共产主义，我也是这样。我上过独立运动者建立的华成义塾，来吉林后又

在独立军领导人的家里住了三年，像我这样的人也不是搞民族主义运动，而是搞起共产主义运动了；我们青年信仰新思潮，是因为他们坚信，共产主义思想指引的道路，才是早日光复祖国的道路，才是给我们民族的未来带来幸福的道路；你们也是为祖国的独立而斗争的人，可你们不仅不帮助这些为祖国和民族的未来而奔走的青年，反而要逮捕他们，这说得通吗？

我接着对他恳切地说，不应该迫害向往新思潮的青年，应该同他们携起手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开展共同的斗争。

实际上，如果除开了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那么南满青总本身就不可能存在了。

高而虚冷笑一声说，国民府宁肯抛弃南满青总，也不能把它交给共产党。

我问他为什么。他举出ＭＬ系的宗派分子在磐石县搞过一个叫棍棒团的恐怖组织曾经袭击过民族主义者的事例，讥讽地说，怎么能同这种人携起手来呢？

我们也知道，1929年夏，ＭＬ派的几个人在三源浦为了打倒民族主义者，向中国的国民党军阀的警察诬告过朝鲜独立运动者要发动叛乱的事。

ＭＬ系的宗派分子甚至对我们这些主张同民族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的人，也看不顺眼，竟然干出了派棍棒团袭击反帝青年同盟干部的暴行。柳河一带的反帝青年同盟盟员，之所以要在崔昌杰领导的武装小组的保护下进行活动，也是因为有这个棍棒团的威胁。

我再次说服高而虚说，我们是跟那些宗派分子根本不同的青年。我强调说，他们不仅同民族主义者斗，而且也同我们斗，他们自己也形成派别互相不断地斗，不能把这样的败类同我们相提并论！

但是，高而虚总是不肯接受我的真诚的说服。

我警告他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挫折青年们的气势，你们就将在历史上留下洗刷不掉的罪恶；你们也许能压制几个人的肉体，可是，向往共产主义的青年群众的思想是抑制不住的；好，你们想杀我，就杀吧，对于死，我是早有思想准备的。

我以为说了这么些话，他们是会受到一些冲击的，可是国民府的领导人们却越来越顽固地采取对抗的态度，当夜就向驻扎旺清门的独立军下达紧急令，开始了逮捕活动。

为了防止流血，我赶紧让车光秀回三源浦去了。国民府的头领们有可能向我们在柳河的同志下毒手。我让那些来参加南满青总大会的共青同盟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也连夜离开旺清门。我向同志们说，国民府召集南满青总大会，谋害进步青年，因此我们要退出大会，对于他们的恐怖行为，则要用发表声讨书的方法诉诸于天下。

南满青总大会就这样流产了。我也决心离开旺清门。

同志们建议，要到崔昌杰活动的柳河县三源浦去写好声讨书寄送满洲各地，由我们自己召开大会。不过三源浦独立军势力较强，到那里去是危险的。

到三源浦去呢，还是到陵街去？我踌躇了一阵，决心到陵街去决定今后的活动方针。打算到陵街去缓口气，再到吉林去。如果那里的

情况也不妙，就到抚松去领导群众组织，直到国民府的恐怖旋风平息为止。

那天晚上我回到康弘乐家,对他说:“我要是在这儿睡,就会被捕。我要到陵街去，麻烦你给张罗点路费吧!”

康弘乐长叹了一口气，担心地说:

“你路又不熟，怎么跑啊？”

“沿大路跑80里路就行，你放心吧。”

我还对他说，我到了陵街，那里有文光中学毕业的组织成员，能坚持一段时间。康弘乐夫妇这才放心，给我包了打尖的饭和几块饴糖板。

我所说的文光中学毕业的组织成员，指的是申永根。他在陵街的韩兴学校当校长。

第二天快到中午时分，我到了陵街。

韩兴学校高等科的女生们尽心尽意地接待了我。申永根的恋人安信英是反帝青年同盟盟员，原在江东进行活动，现在在韩兴学校工作。她和同志们一起做了绿豆凉粉和冷汤，为我准备了丰盛的午饭。这顿午饭吃得很香，至今还深深地留在记忆里。

我吃过饭，不顾疲劳，了解韩兴学校办校情况，听着听着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我通宵走了80里路，确实精疲力尽了。后来听说，那天申永根怕惊醒我，不敢敲上课的钟，把在外边玩耍的学生一个一个用手势招呼进来上课。

我在陵街逗留期间听到，国民府终于杀害了他们逮捕的大会筹委

会成员。他们在旺清门槐帽地沟的山沟里杀害了崔峰、李泰熙、池云山、李蒙烈、李光先、赵熙渊等六个只有二十一二岁的前途无量的青年。

崔峰等六名青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谴责了国民府的罪行："我们早有思想准备，要为劳动群众而牺牲，但是死在你们手里，太冤枉了！"他们高唱着《革命歌》，高呼着"革命胜利万岁！"的口号倒下了。

此后，国民府的恐怖分子们还策划过，要把这六名青年的家属也全都抓去杀害。高而虚连那位把他的杀人诡计告诉给我的吴信爱，也拉去残酷地杀害了。

我们在陵街噙着泪水写了向全世界控告国民府领导集团罪行的声讨书。这个声讨书在崔昌杰活动的三源浦油印发表，并发给各地革命组织，举行了声讨大会。

我们在声讨书中，谴责了国民府只凭青年群众的先锋战士是共产主义青年这一点就加以杀害的罪行；揭露了所谓国民府只不过是几个反革命分子的营利场和谋杀场，是和屠杀中国工人和农民的蒋介石的走卒一样的逆贼集团。

这一声讨书发表后，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与国民府之间形成了全面对立的局面。国民府的恐怖分子只要见到我们系统的青年，就不问情由地加以"讨伐"。那时，许许多多英俊有为的人牺牲在他们的手里。

因此，对国民府的怨恨就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里了。

旺清门事件后，我抑止不住心中的痛苦，好多天没有睡着觉。为光复祖国踏上了革命征途的人，却被同一民族的人杀害，这使我气愤，

感到冤枉。

我们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一直谋求和民族主义者进行共同斗争。当我们了解到安昌浩的思想是改良主义的时候，对他的思想方法进行了批判；但是当他被捕的时候，我们又毫不踌躇地进行了营救他的斗争。当三府合并会议由于争夺领导权的派别斗争而迟迟没有进展的时候，我们本着希望爱国力量实现团结的心情，借艺术的力量给民族主义者敲响了警钟；当独立运动团体合并成国民府的时候，我们又为之而高兴，表示了欢迎。

但是，国民府的领导人们却不理睬我们的诚意，以野蛮的屠杀对待了我们。

那时我在陵街再一次清晰地回想起了车千里老人的一段话：“朝鲜人，就是只有三个人，也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

独立运动者中也有过不少主张团结的人。群众期望所有爱国者不分主义、团体和信仰，互相携起手来，同心协力，投入反日抗战。

但是，国民府的恐怖分子却残酷地践踏了民众的这一期望。

每当回忆起旺清门的惨案，就禁不住怒火中烧。每当回顾那次悲剧时，我就想，在我们民族内部绝不能重演那样残酷而无意义的杀戮。如果高而虚、玄默观还在世，我相信他们也会这么想。在感情上跟我那么亲密，只因为思想不同而没能走同一条道路的玄默观，后来在长沙被恐怖分子杀害了。他自己最后也成了恐怖活动的牺牲品。

玄默观的女儿玄淑子，解放后随临时政府的人士回国，在汉城半岛饭店给她母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现在可能保存在党史研究所。

他的子女现在在祖国的北方过着幸福的生活。

朝鲜的民族解放斗争史证明，共产主义者走的道路才是爱国爱民族的道路，共产主义者才是最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真正的、坚贞的爱国者。

今天，在国土被分割，外部势力的干涉严重的情况下，每当迫切地感到民族团结是第一生命时，我就想起旺清门的悲剧！

十　在铁窗里

“吉林的风暴”席卷了满洲许多地区，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动军阀，逐渐觉察到我们的存在了。蓬勃开展的青年学生运动以及中东铁路事件和南满青总大会事件，把有关我们的消息散布到了许多地方，敌人随之看出了搅乱吉林空气的肇事人是青年学生，于是开始了对我们的追查。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侵略满洲，到处安插密探，严密监视朝鲜人的一举一动，同时唆使中国的反动军阀，大肆逮捕、监禁共产主义者和反日独立运动者。吉林的形势变得非常险恶，我们在前进道路上遇到了难关。

看到形势险恶起来，那些在吉林市内混日子的宗派分子就向龙井、磐石、敦化等地逃跑，独立运动者们有的加入中国国籍逃往中国关内，有的躲到旺清门等地去了。1929年秋的吉林，已不再是反日运动者云集的朝鲜海外政治运动中心了。

正在这样的时候，吉林第五中学的学生们在读书会上的无谓的大声议论，给敌人提供了线索，我们的同志就开始被捕了。我刚从旺清门回来，为收拾事态而奔走，也被反动军阀当局逮捕了。原来，五中的学生把连毓文中学的共青组织也都供出来了。

警察们扬言，他们对学生运动领导人已经一网打尽。他们天天对我们进行残酷的严刑拷打。他们企图查清我们进行斗争的情况，破获我们在吉林市内的密如蛛网的组织及其背后势力。

我们约好，除了承认读过一些左翼书籍外，别的什么也不说。我们对审讯我们的刽子手抗辩道，学生看书，有什么不对；我读的是书店里卖的，要问罪，就该先问当局的罪，是当局许可出版和出售那些书的呀。我们就这样坚持下去。

有一天，我正受拧手指头的刑，曾任华成义塾塾长的崔东旿先生忽然从旁边一块隔板后面探出头望了我一眼就不见了。这事太出乎意外了，起初我怀疑自己的眼睛，以为也许是一种错觉。

但是，一点不错，确实是我上华成义塾时的塾长崔东旿先生。我心想，敌人甚至把我华成义塾时代的老师也叫到审讯室来，可见敌人对我的调查已经到了相当的深度。

崔东旿先生的出现，使我想得很多，很复杂。

崔东旿先生的中国话讲得很好，又精于外交工作，所以担任了国民府的外交委员长。先生为了协调同国民党反动军阀当局的关系，主要留住吉林，同青年学生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如果他向反动军阀当局照实说出我们的真实情况，那么，我们要尽可能减轻案情的努力就会化为泡影。尤其是我们在中东铁路事件中为维护苏联而斗争的情况，哪怕暴露出一点点，也绝不会顺利过关的。

在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操纵下，中国国民党政府和奉系军阀，到了20年代末背信弃义，顽固地进行了反苏活

动。广州人民起义失败后，蒋介石政府枪杀了苏联驻广州领事，断绝了同苏联的外交关系。反苏是蒋介石向帝国主义列强献媚求其保护和支持的王牌。

军阀的嘴里常常迸出“反对赤色帝国主义”的口号。他们巧妙地利用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掩盖帝国主义的侵略真相，顽固地鼓吹反苏思想。

连那些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也被军阀的宣传所欺骗，恣意喊出“占领乌拉尔山，占据贝加尔湖”、“要在贝加尔湖饮马”等好战的、挑衅性的狂言，觊觎苏联领土。

军阀利用这种情绪，作为反苏挑衅的第一个回合，攻占了中东铁路。本来该铁路的财产和设备，由中苏两国根据协定各占一半，通过叫做理事会的管理机构共同经营这条铁路。军阀却调动兵力占领无线电信局和管理局，完全夺取了铁路，单方面地取消了苏方的股份。掌握了中东铁路之后，立刻越过边界，从三个方向向苏联发动了进攻。于是，苏联军队和中国反动军阀军队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

当时，冯庸大学和东北大学的一些右翼学生，在反动派的唆使下，甚至武装起来，反对苏联。

我们为了制止国民党政府和反动军阀的反苏活动，发动共青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开展斗争，维护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有些没有觉悟的中国青年疏远我们，说我们是坏人，是帮助“侵犯”中华民族利益的人。实在叫我们为难。

我们在市内各处散发传单，揭露军阀反苏活动的本质，还深入到

中国人中间去开展宣传工作，说明十月革命后苏联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给中国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援助，而中国军阀军队夺取中东铁路，进攻苏联，是不可容许的背信弃义行为，其目的在于捞取政治资本去换取帝国主义的借款。

为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的宣传所骗，敌视过苏联的人，听了我们的宣传后认清了对苏进攻的危险性和本质，改变了态度和立场，反对进攻苏联了。

我们同中国的进步青年一道，对那些要拿起武器进攻苏联的冯庸大学学生，也给了沉重的打击。

在中东铁路事件中我们所进行的斗争，是从政治上维护苏联的国际主义斗争。当时，我们把地球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看作希望的灯塔，并认为为维护它而斗争，是共产主义者的神圣义务。

通过我们围绕着中东铁路事件进行的斗争，中国人民认清了军阀的真面目，认清了帝国主义者从背后不断唆使军阀进行反苏活动的真实意图。朝中人民通过中东铁路事件大大觉醒了。

当时，国民党军阀对拥护苏联的人是毫不留情的。

崔东旿先生来过后，审讯者们仍然把我只当一个读书会案子的主犯来对待。看来，军阀当局是为了核实我的身分，查明我与苏联有无联系，搞过什么运动，才传讯了崔东旿先生的。但是，崔东旿先生好像没有说什么对我不利的话。

不久，我们被押到了吉林监狱。吉林监狱是一个十字形的建筑，走廊从中央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伸展，走廊两旁是牢房，看守坐在中

央监视四方。

我被囚的是北边走廊右侧第二个牢房。这个牢房朝北，长年见不到阳光，霉臭刺鼻，冬天满墙白霜，整天不化。我们被押到这个监狱是在秋天，可是牢房里冷得和冬天一样。军阀当局对待囚犯，民族歧视非常严重。看守们使用“高丽棒子”、“朝鲜亡国奴”等污辱性的话，还给朝鲜学生戴上拴了重铁块的脚镣。

在伙食方面和利用监狱里微不足道的医疗设施方面，军阀当局对待我们朝鲜学生也有差别，不同于对待中国政治犯。

我决心在狱中继续坚持斗争。

对干革命的人来说，监狱可以说是一个斗争场所。如果把监狱单纯地看作监禁罪犯的地方，那就会陷于被动，什么也干不了；可是如果把监狱看成是世界的一部分，那么，在那狭窄的空间里也能为革命做些有益的事情。

我振作起精神，开始摸索斗争方法。我首先想设法同外界取得联系，尽快重建遭到破坏的组织，使它进行活动，并决心同军阀当局进行斗争，争取早日出狱。

要在狱中开展斗争，成问题的是如何同外界取得联系。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教育看守，使他成为我们的同情者。

我争取看守的意图，意外地顺利实现了。当时，监狱当局要修缮牢房，让我们临时同一般罪犯住一个牢房。监狱当局的这一措施，反而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有一天，和我在一个牢房里的中国罪犯，忽然得了重感冒，躺倒

了。他是在对一个富翁家行劫时被捕的，此人举止非常粗暴。

我搬到一般罪犯的牢房那天，那个被称“戆头儿”的罪犯盘腿坐在上首，不由分说地要我们拿出钱或吃的来请客。他喝令我们说，初来这个牢房，不管是谁，都得守这个规矩，你们也要遵守。这是个凶狠残暴的人。

我反驳他说，我们在审讯室受了几天折磨才来这里，哪里有什么钱，有什么吃的？说到请客，按道理，不是应该由你们这些长期坐牢的人来请吗？

那“戆头儿”理屈词穷，哑口无言，只是脸上红一阵青一阵地盯着我。

他平时就这样像暴君一样专横跋扈，所以当他发高烧，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的时候，牢房里的人都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谁也不去亲近他，护理他。

我把我入狱时孙贞道家送来的被子给他盖上，还把看守喊来，叫他到监狱医院去拿药来。

这个姓李的看守平时就看不惯那个行动粗暴、不近人情的罪犯，现在看到一个朝鲜人像对待亲骨肉一样照顾中国犯人，感到惊讶。在我们的精心护理下，那个病号很快就痊愈了。从那以后，他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连看守都不好惹的怪僻残暴的罪犯，竟然在我这个中学生面前变乖了。李看守感到十分惊奇，也不再那么随随便便地待我了。

李看守在吉林监狱的看守中，是个比较温和、有民族良心的人。

外面的组织成员通知我说，李看守出身微贱，为了挣碗饭吃才当了看守。我从各方面了解了李看守，最后决心争取他，尽可能多找机会跟他谈话。在这过程中，我了解到：他弟弟快要订婚了，可是彩礼还没有准备好，他正为这事发愁。我利用同志们来探监的机会，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并采取措施，发动组织给他解决了困难。

几天后李看守来找我，感谢我给他张罗了彩礼。然后问我说，监狱当局说你是共产主义者，这是真的吗？

我回答说我是共产主义者。他很激动地说，这该怎么理解呢？人们说共产主义者都是“胡匪”，难道像你这样善良的人还能抢人家的东西吗？如果你是真的共产主义者，那么，给共产主义者扣上“胡匪”的帽子，是不妥当的。

于是我对他说，共产主义者是为建设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都过上好日子的社会而斗争的人；我们朝鲜的共产主义者是为了从朝鲜土地上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而斗争的人；有钱有势的人骂共产主义者是“胡匪”，是因为共产主义者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土豪和卖国贼飞扬跋扈的腐败的社会。

李看守连连点头说，因为自己无知，才受了当局虚伪宣传的骗，以后就不再听信那套话了。

从那以后，李看守每次交班回家时都来看我。我托他跟别的牢房作什么联络，他也爽快地答应。不久后，我还可以通过他同外头取得联系。从此，我的狱中生活就比较自由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看守都像李看守那样善意对待我们的。有一个像

毒蛇一样的看守长，他从窗洞向牢房里面窥视，成心找茬儿折磨囚犯。

吉林监狱一共有三个看守长，大家对这个看守长的反映最不好。他值班的时候，囚犯连打哈欠都不敢随便。

有一天，我们决心整他一下，让他改变态度。我们在狱中商量让谁去办这件事。这时，有个叫黄秀田的中国学生自告奋勇地要承担这件事，他是在吉林五中念三年级时被捕的。因读书会事件被捕入狱的学生当中，只有两个是朝鲜学生，其余都是中国学生。

我们问他说，要是整了看守长，就得蹲单人牢房，少说也得多受五个月的苦，行吗？黄秀田说，为了同志们，牺牲就牺牲吧，一定要想办法整他，我要用巧妙的方法让他脱胎换骨，你们就在旁边看热闹好啦。他把竹筷子削得尖尖的，当看守长从监视孔窥视牢房时，用它捅破了他的眼球。看守长的眼里流出了血和墨液。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牢房里的学生们也都称赞黄秀田是英雄。但是黄秀田本人却在寒冷的冬天被关进不生火的单人牢房，受了几天罪。

学生们要求看守赶快把黄秀田从单人牢里放出来，并威胁他们说，如果不把他从单人牢房放出来，就把他们的眼睛都给捅穿。

监狱当局被迫答应了学生的要求。

从那以后，我们在牢房里就可以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愿意开个会就开，如有必要还可以随意到别的牢房去。我说要到哪个牢房去，看守们就立刻应允，还给我开门。

我在坐牢时，得到孙贞道牧师的很多帮助。

孙贞道牧师是我在吉林进行革命活动的整个期间，像亲骨肉一样积极支援了我的人。他在国内的时候就和我父亲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同窗（崇实中学）观念固然也起了作用，但我想更主要的是思想和信念的共同性使我父亲和孙贞道牧师以热烈的友情结合起来。

父亲生前谈了很多关于孙牧师的事。

三•一起义后，孙贞道牧师流亡中国，在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担任过议政院议长。又有一个时期，他在上海同金九、赵尚燮、李裕弼、尹琦燮等一起组织以培养将担负起武装抗战的军事人材为使命的老兵会，担任过它的劳工部长。

但是，老兵会被解散，临时政府内的派别斗争激烈起来，他就感到幻灭，迁移到吉林去了。

他到吉林后，办一个礼拜堂，从事独立运动。我们作为群众教育场所广泛利用的礼拜堂就是这个礼拜堂。本来，孙牧师是信仰心强的笃实的基督教徒。

他在吉林的基督教徒和独立运动者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在我国的基督教徒中，有很多像孙贞道那样把一生献给了独立运动的优秀的爱国者。他们祷告也为朝鲜祷告，向“上帝”祈求也是祈求消除亡国的不幸。他们的信仰心一向同爱国心结合在一起，他们要建设一个和平、和睦、自由的乐园的愿望，在争取祖国光复的爱国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天道教和佛教的信徒绝大多数也是爱国者。

孙贞道是留吉学友会的顾问，所以我经常和他接触。他每见到我

就对我父亲的过早逝世表示惋惜，并鼓励我继承父亲的遗志，成为独立运动的先锋，为民族忘我奋斗。

我到吉林能够在毓文中学念三年书，是因为得到了孙贞道等我父亲的朋友的很大帮助。

孙贞道牧师为我家靠母亲给人洗衣、做针线勉强维持的贫穷生活操心，多次补助我的学费。牧师夫人也十分疼爱我。每逢节日，她就邀我去，做些美味的朝鲜饭菜招待我。我在他们家吃的兔肉炒豆腐和清明菜糕，真是别有风味。清明菜是一种叶子上长了茸毛的草本植物，无臭无毒。他们说，他们家在平壤的时候就用这种菜做糕吃。那天我在牧师家吃的糕，是用从北山公园摘来的清明菜做的。

孙贞道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在吉林参与过我们运动的是二儿子孙元泰和小女儿孙仁实。

那时候，孙仁实同黄贵轩、尹善湖、金炳淑、尹玉彩一样，都是朝鲜人吉林少年会会员。她在我进行青年学生运动和在监狱受苦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帮助。

有一天，看守把一个新来的囚犯推进了我们的牢房。这个人被拷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原来他是旅新青年会组织部长姜明根。他在1929年春突然被军阀当局逮捕，我们一直不知他生死与否，没想到今天竟在监狱里见到了他，真是又惊又喜。他被捕是由于宗派分子的诬告。姜明根是因驻中青总事件而遭到宗派分子报复的。

旅新青年会的代表退出在集厂子召开的驻中青总会议，发表声讨

书，揭露了宗派分子们的冒险行动。宗派分子们便怀恨在心，百般谋害，最后把一个在蛟河病死的青年说成是毒杀，向军阀当局诬告说这是姜明根他们所为。

姜明根流着泪说，他是无辜受刑，太冤枉了。我对他说，一个立大志要干革命的青年不能为这点事气馁。我鼓励他说，一个人要是豁出命来干，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要同军阀当局斗下去，证明自己无罪。后来，姜明根真地按照我们说的做了，他在法庭上豁出命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姜明根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朝鲜的整个期间坚持了革命气节，解放后回到祖国，接受我们党交给的任务，忠实地做友党的工作。

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之后，我才听到他还活着，而且住在不远的地方。于是我派人去跟他约好要见一次面。

看来，他接到这个信过于激动了，在我们就要见面的前夕，他不幸突然患了脑溢血。

如果他没有死，我们是可以久别重逢，回顾吉林时代，畅叙衷肠的。

在监狱里，我对我国民族解放斗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作了分析，也对别国革命运动的经验作了研究。

我们民族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进行过示威斗争、罢工斗争，也进行过义兵斗争和独立军运动。但是，这一切斗争都未能避免失败的命运。

尽管进行了多次的斗争，洒下了很多鲜血，我们民族的斗争为什

么每次都不能取得胜利，都被挫败呢？

我国反日斗争队伍的内部出现了宗派，给民族解放斗争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举起反日抗战的第一把火炬驰骋在八道江山（当时朝鲜共有八个道——译注）的义兵队伍，因为上下不一致而处在分裂状态中。希望复辟王朝政治的儒生出身的义兵将领，和主张改革旧秩序的平民出身的义兵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思想上的矛盾和对立，这使义兵的战斗力无法加强。

以复辟旧制度为绝对目标的部分义兵将领，甚至为了得到政府的官职，互相争斗，争战功，以致分裂了队伍。

平民出身的义兵将领不肯同儒生出身的义兵将领联合，这招致了削弱义兵力量的后果。

独立军的情况也与此相差不大。独立军，其组织本身就暴露了分散性和散漫性。

在满洲地方进行活动的许多独立运动团体合并为三府之后，派别斗争仍然在持续。

虽然三个府合并了，成立了国民府，但其上层集团却分裂成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仍不断地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

民族主义者就这样分裂成许多派别，各自仰仗着一个大国，进行着无谓的争吵。

占据了独立运动领导地位的人物当中，有的企图依靠中国实现朝鲜的独立，有的企图借苏联的力量战胜日本，有的还指望美国把独立

“恩赐”给朝鲜。

民族主义者之所以搞事大主义，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民族主义运动脱离人民群众，停留在上层运动上，所以它没有牢固的基础，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脱离人民，只有几个上层人物聚在一起以空谈和争权夺利虚度岁月，不去发动群众投入革命斗争——这一本质上的弱点，也出现在所谓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之中。

早期共产主义者们不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教育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投入斗争，反而脱离人民，专事空谈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未能克服内部的宗派。

我国的宗派分子是民族主义系统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以及没落的封建贵族和两班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是随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工人运动迅速高涨，马列主义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支持的时代趋势，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被卷进革命潮流的人。

他们一开始就形成派别，进行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宗派分子们极尽欺骗讹诈、玩弄权术之能事，甚至制造出暴力团来，像强盗那样互相斗殴。

由于宗派分子的派别活动，朝鲜共产党没能实现队伍的统一，没能经得住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

早期共产主义者们为事大主义思想所俘虏，不想用自己的力量建设党，进行革命，却各自都说本派才是“正统派”，甚至用土豆刻印章，为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而奔走。

我分析过我国民族主义运动和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情况后，深刻认识到革命决不能用这种方式进行。

由此，我就有了这样的信念：本国的革命只有由自己负责，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进行，才能取得胜利，革命中的一切问题都必须自主地创造性地加以解决。这就是现在所说的主体思想的出发点。

我在监狱里从各方面研究过今后将如何引导朝鲜革命前进的问题。

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光复祖国，应该用何种形式和方法进行斗争，怎样使反日力量团结一致，怎样建立作为革命的领导机关的党，我为研究这些问题绞尽了脑汁。同时也想过出狱后首先该做哪些工作。

当时，从我国的实际和社会阶级诸关系出发，我把朝鲜革命的性质规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确定了斗争方针：要打败武装的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就必须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把工人、农民、民族资本家、宗教徒等一切反日爱国力量团结在反日的旗帜下，发动他们投入斗争；建立没有派别斗争的新的革命政党。

我们在朝鲜革命中应坚持的立场和观点已明确，路线和方针也就清楚地浮现在脑子里了。我抑制不住要尽早出狱的强烈冲动，我决心开展争取提前出狱的斗争。

我们同因“学生事件”入狱的同志们一起，为开展出狱斗争，作了周密细致的准备。

当时，我们想出的斗争方法是绝食。我们抱着我们的正当要求得

不到实现就坐地不起的悲壮决心，投入了斗争。

在绝食斗争开始以前，我曾担心过，在一般囚犯也参加的情况下，保证这次斗争的行动一致是会有困难的。可是，绝食一开始，每个牢房都把饭食原封不动地退出来了。连那些前不久还为一碗饭吵架斗殴的一般囚犯，也没有一个伸手动筷子。因“学生事件”入狱的同志们悄悄进行的教育，现在发挥了很大效力。

监狱外的同志们也积极地帮助了我们的出狱斗争。我们的同志配合狱中斗争，揭露吉林监狱对囚犯的非人待遇，唤起了社会舆论的同情。

军阀当局终于在我们紧密团结的斗争面前屈服了。

1930年5月初，我从吉林监狱出来了。走出穹隆式的监狱大门时，我的心充满了信念和热情。

我在监狱里总结了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在其教训的基础上设计了朝鲜革命的前途。

回顾起来，我的父亲在平壤监狱里摸索了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途径；而我又在吉林监狱里构想了我们应走的朝鲜革命的道路。

因为都是不幸的亡国奴的儿子，父亲和我不得不在监狱里构想祖国和民族的前途。

注　释

[1]　“韩日合并”：1910年8月29日日本强行吞并朝鲜。

[2]　“总督制令”：为了镇压朝鲜民族，掠夺朝鲜的资源，总督制定的各种反动法令。

[3]　海牙密使事件：1907年，朝鲜高宗皇帝的密使参加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野心，呼吁支援朝鲜独立，密使中的一人李俊剖腹自杀，以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4]　乙巳五贼：1905年11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侵略性的《韩日协约》（《乙巳条约》）时，向日本屈服的五个卖国大臣，即学部大臣李完用、内部大臣李址镕、军部大臣李根泽、农商工部大臣权重显、外部大臣朴齐纯。

[5]　安重根（1879～1910）：黄海道海州人。独立运动者。从17岁起研究军事学。作为西北学会会员从事过教育活动。1907年底，到俄国滨海省去作为反日义兵队指挥员进行活动。1909年6月，率领300多名义兵攻打咸镜北道庆兴（现在的恩德）的日本守备队。1909年10月，在哈尔滨站击毙以“北满视察团”的名义到满洲的侵略朝鲜的元凶伊藤博文。

[6]　高宗皇帝（1864～1907年在位）：李朝封建国家的第26代皇帝。

[7]　甲午改革：1894年成立的内阁实行的资产阶级改革，亦称甲午更张。

[8]　洪范图（1868～1943）：反日义兵将、独立军指挥员。1907年组织猎人建

立了反日义兵队，以咸镜南道一带为中心，多次同日本侵略军进行激战。1919年在北满组织朝鲜独立军，任总司令，奇袭甲山、惠山、江界、满浦、慈城等地的日本侵略军，后来在黑龙江一带组织独立军团，作为指挥员进行了活动。

[9] 金九（1876～1949）：黄海道海州人，朝鲜的独立运动者。早期参加反日义兵斗争，三·一人民起义后到上海历任临时政府主席等职，组织了韩国独立党。日本战败后归国，在南朝鲜，反对美国的奴役。

1948年参加在平壤举行的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代表联席会议后回汉城，为联共统一而斗争，被暗杀。

[10] 李奉昌（1900～1932）：京畿道汉城人，独立运动者，金九组织的韩人爱国团团员。1932年1月，在日本东京向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投掷手榴弹。

[11] 尹奉吉（1908～1932）：忠清南道礼山人，独立运动者、韩人爱国团团员。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炸死日本军要人多人。

[12] 光州学生事件：1929年以在全罗南道光州地区朝鲜学生和日本学生的摩擦为开端扩大的全国范围的朝鲜学生青年的群众性反日爱国斗争。

[13] 四·一九起义：1960年春，南朝鲜青年学生和人民在争取新政治、新生活的口号下举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独裁政权的人民起义，推翻了李承晚政权。

[14] 光州人民起义（1980年）：全罗南道光州地区青年学生和各阶层人民为争取南朝鲜社会的民主化、打倒军事法西斯独裁政权而举行的群众性起义。

[15] 隆熙皇帝（1874～1926）：李朝封建国家的最后一代皇帝（1908～1910年在位）